940903

椿園載記

羅章龍

椿园载记

罗章龙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

目　　录

自　　序 ……（1）

一、新民学会 ……（1）

二十八划生“征友启事” ……（1）

新民学会成立 ……（4）

东游返旆 ……（5）

新民学会北征 ……（7）

赴法勤工俭学运动 ……（10）

《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 ……（15）

二、北京大学 ……（22）

蔡元培出长北大 ……（22）

陈独秀 ……（24）

三、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 ……（31）

北大新闻学会 ……（31）

一代报人邵振青 ……（33）

四、“五四”运动 ……（39）

从“五四”到“六三” ……（39）

“辅仁学社” ……（45）

“共进社” ……（47）

五、曦园 ……（49）

六、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57）

北京大学发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启事 ……（59）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人名录 ……（62）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活动 …… (68)
七、北京中共建党小组与社会主义青年团 …… (73)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 …… (73)
北京大学社会主义青年团 …… (78)
八、"亢慕义斋"及其活动 …… (87)
非宗教同盟 …… (90)
九、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 (98)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 …… (99)
中央九月扩大会议 …… (100)
北方工运工作开展 …… (101)
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 …… (106)
和工人相结合 …… (112)
十、中共北方区委…… (117)
李守常与北方区委 …… (118)
北方区委的各项工作 …… (121)
十一、中共北方区党报——《工人周刊》 …… (126)
《劳伣音》 …… (126)
《工人周刊》的创办 …… (127)
印刷与发行 …… (128)
声援罢工斗争 …… (130)
坚持阶级教育 …… (138)
工人心目中的《工人周刊》 …… (141)
《工人周刊》社与劳动通讯社 …… (142)
《劳动界》与《劳动周刊》 …… (144)
《工人周刊》建刊时的主要编辑人员 …… (145)
十二、陇海铁路大罢工 …… (147)
陇海路工人的境况 …… (147)
罢工的缘起与爆发 …… (150)
罢工胜利 …… (163)

王会长舌战西宫 …… (167)
游天洋 …… (169)
白眉珊 …… (173)
十三、东方民族大会 …… (175)
十四、京汉铁路八月罢工的胜利 …… (179)
制定斗争方案 …… (180)
八月罢工 …… (183)
八月罢工谢函 …… (185)
粤汉路罢工 …… (186)
十五、北京迤东地区的罢工斗争 …… (188)
规划和起步 …… (188)
山海关与唐山罢工 …… (191)
开滦五矿沿革与斗争形势 …… (196)
开滦罢工的准备 …… (197)
羽檄纷驰　声援罢工 …… (208)
募集罢工基金 …… (212)
矿务局让步与复工 …… (215)
铁牛事件 …… (216)
罢工经验与教训 …… (219)
十六、京绥铁路罢工 …… (224)
十七、正太铁路罢工 …… (229)
石家庄早期的党员 …… (229)
九项要求与五项条件 …… (232)
高登五巧计退敌 …… (237)
罢工胜利 …… (238)
十八、“二七”大罢工 …… (240)
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 …… (240)
风云突变　全线罢工 …… (245)

自北而南——京汉路工人惨遭屠杀 …… (250)
《京汉工人流血记》 …… (259)
十九、中共“三大”及中央执委会 …… (268)
“三大”前后 …… (268)
中央执行委员会 …… (275)
关于中央通告 …… (281)
“三大”前后发行的主要报刊 …… (283)
三曾里三户楼 …… (287)
国际代表马林 …… (290)
环龙路国民党执行总部 …… (294)
国民党“一大” …… (295)
上海执行部国民党主持人 …… (296)

自　　序

《载记》之作，源于抗日战争时期。时大好河山沦于敌寇，国难深重，展望国家民族前途，令人坐卧不安。中国大革命功败垂成，其前因后果诸问题，亦时时萦回脑际。我从华北西迁汉中城固，执教西北联合大学，每在课余，探索上述问题，并忆录史实，草拟论文，以备遗忘。在城固十年之余暇中，积稿成帙，初步整理得三十万字，其中一部分便是载记的题材。

一九四七年，我回长沙岳麓山湖南大学任教，住至善村。乃重访秋收起义诸胜迹。我从长沙参加秋收起义，时过二十余年，旧地重游，往事仍历历在目，于是又写了一些资料。适为杨树达教授所见，颇感兴趣，认为所记新颖真实，非局外人所能道，殆属旷代逸史。因劝我赓续勿辍。我决心亲临一九二七年九月间各处战场遗迹，进行考察，于是寻觅附近水陆洲、洞庭庙、牛头洲、捞刀河、猴子石、大托铺、暮云市、麻园岭、识字岭、杨家坟等秋收起义旧址，访问一些健在的有关战士及英烈人物遗属，开拓了新的意境。

一九五三年院系调整，湖南大学解散，我调中南财经学院任教（后扩充为湖北大学），寓蛇山抱冰堂，邻胭脂山（原中共湖北省委所在地），隔江与汉口丹水池、汉阳琴台相望。二十多年前当地乃武汉国共合作政府“京兆地区”。作者时适在中共中央工作，并兼汉口市委书记、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主任，当年北伐军攻下汀泗桥、克武昌、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戡定夏斗寅叛乱、荡平黄安、阳

新反革命武装叛乱诸役，作者均躬与其事。

我怀兴奋心情，忆触目惊心之往事，访旧地，探史迹，重履武汉政府所辖三镇地区和长江中上游，东至九江，黄蕲，西达宜昌，南往岳阳与澧县，北出武胜关等地区。在此期间积稿略具规模，乃将全稿分订成册，私心颇觉自慰。

但是这些卷帙，当时无法印行，正不知如何处理。一九六六年七月"扫四旧"运动，动乱中全稿散失，多年辛劳毁于一旦，良堪惋惜！原稿无存，当年斗争史迹和生死与共的同志英雄风貌，仍深铭心版，永难忘怀，乃思重写，以复其旧。

一九七八年夏，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会同湖北省党校、湖北省革命博物馆、湖北农讲所、武汉大学、湖北财经学院等单位，在武汉东湖翠柳村舍举行座谈有关党史问题，邀我主讲，历时一月有余，事后与会同志朱玉莲、于桔楠、张俊、廖鑫初、张英宣、甘俊等，协助我写成了一份《东湖座谈录》。

九月，我应邀赴北京，参加李维汉同志主持、由中国革命博物馆和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联合举办的大革命时期党史问题座谈会，座谈至春节结束。会后，革命博物馆同志整理了一份座谈记录稿，其中部分曾发表在《党史研究资料》上。

一九七九年六月我奉调来京后，各省市地区来访的同志较多，谈论的问题尤为广泛、具体，更引起我对当年先行人物的怀念。他们在大革命艰难时期，犹如闪电爆雷、声光灿烂，奇情壮彩的英勇史迹，不应长期沉霾。在一些同志的敦促建议下，我才重加董理，在原有工作的基础上重新回忆，补充、整理成《椿园载记》。谨以此书奉献给我国大革命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共产主义伟大真理而奋斗、献身的英烈们。

由于时间仓促，本书内容失当与谬误之处所在都有，至希读者不吝指教，以便再版时改正。

在本书整理过程中，曾得到夏立平、黄高谦、赵春濂、季国平、张德忠、高荣光、李峻晨、李长盛诸同志帮助，盛谊至为可感。谨此致谢！

罗章龙

一九八三年九月中秋节于椿园书屋

一、新 民 学 会

二十八划生“征友启事”

一九一二年，我由浏阳至长沙求学，就读于长沙第一联合中学，于一九一七年上期毕业，其间我结识了毛泽东。

一九一五年五月中旬某日，我赴司马里第一中学（校址为南宋时辛弃疾练飞虎营遗址）访友，于该校会客室门外墙端，偶见署名“二十八划生征友启事”一则①，启事是用八裁湘纸油印的，古典文体，书法挺秀。我竚足浏览，见启事引句为《诗经》语：“愿嘤鸣以求友，敢步将伯之呼。”内容为求志同道合的朋友，其文情真挚、辞复典丽可诵，看后颇为感动。返校后，我立作一书应之，署名纵宇一郎。逾三日而复书至，略云：接大示，空谷足音，跫然色喜，愿趋前晤教云云。旋双方订于次星期日至定王台湖南省立图书馆见面。是日，适逢久雨初晴，丽日行空，空气清新宜人。同学陈君圣皋②也欣然同往。

定王台位于长沙东城，乃汉长沙定王发所筑。昔人诗尝以潭州马定王台并列，如“定王虚旧业，潭郡古雄州。”北宋时朱晦庵登

---

① 二十八划生征友启事时间，约在1915年夏秋之间，有关征友动机可从毛泽东致黎邵西信中见到（1915年9月），信中云：“人谁不思上进，而当其求涂不得，歧路徬徨，其苦有不可胜言者！”

② 陈圣皋，湖南浏阳人，联中学生，学冠侪辈，倜傥多异行。1927年前后，陈任里仁小学校长，后辞职隐沦以终。

定王台诗云：

寂寞藩王后，光华帝子来。千年余故国，万事只空台。日月东西见，湖山表里开，从知爽鸠乐，莫作雍门哀。

定王台表里湖山，风物开廓可观。上午九时左右，我们到达定王台省立图书馆。但见阅览者熙攘杂遝，人数众多。在走廊处有一少年仪表端庄，器宇轩昂，心知即所欲晤见之人。我们乃趋前为礼，彼此互通姓名，方知少年姓毛名泽东，字润之。二十八划乃其名字的笔划数。略谈数语后，圣皋则去阅览室看书，润之建议到院内觅一僻静处倾谈。进得院内，寂静无哗，我们就坐在一长条石上，直谈到图书馆中午休息时止，足约二、三小时始别。

谈话内容涉及很广，包括国内外政治、经济以至宇宙人生等等。而对于治学方针与方法，新旧文学与史学的评价等，谈论尤多。谈到音韵改革问题，主张以曲韵代诗韵，以新的文学艺术代替“高文典册”与宫廷文学。在旧文学著作中，我们对于离骚颇感兴趣，曾主张对离骚赋予新评价。

关于治学问题，润之认为，对于宇宙，对于人生，对于国家，对于教育，均属茫然！因此主张在学问方面用全付力量向宇宙、国家社会作穷源竟委的探讨，研究有得，便可解释一切。关于生活方面所涉及较少。临别，润之表示“愿结管鲍之谊”，并嘱以后常见面①。

我归后翌日，适一师同学彭道良来访，谈话中提到定王台事，

---

① 斯诺著《西行漫记》内称毛自述：“征友初得三个半人，第一个为罗章龙，另外还有两个。”据所知其中一个为湘阴黄焕，即黄铭功老师的侄子，亦联中学生，体弱多病，早逝了。所谓半个人指李隆郅。后邹彝鼎提到此事云：按通俗解释，一个人是完全的人，半个是残阙不全的意思，含有贬义。但按古典此语亦有所本。昔苻坚谓仆射权翼曰：“吾以十万之师取襄阳，唯得一人半耳。”翼问：“谁耶？”坚曰：“释道安一人，习凿齿半人也。”（见《高僧传》）

又毛泽东于1915年11月9日寄黎锦熙信提到：“两年以来求友之心甚炽，夏假后，乃作一启事张之各校，应者亦五、六人，近日以来稍快惟此耳！”记述此事。

彭乃询其详，我以实告。彭笑道："昨日之事可称三奇会。"我问何故？彭云："圣皋与兄为联中二奇，益以毛奇，岂非三奇？"时黄昆吾同学在侧，因问毛奇之名何自来？彭从容解说道："我与二十八划生同班同学，颇知其为人品学兼优，且具特立独行之性格。他常语人：'丈夫要为天下奇（此乃宋王廷珪送王邦衡诗句），即读奇书、交奇友、著奇文、创奇迹，作个奇男子。'伊本人近所写日记，亦有惊人语，如云：'力拔山兮气盖世，猛烈而已！不斩楼兰誓不还，不畏而已！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忍耐而已！'（后发表于一九一七年四月一日《新青年》三卷二号）合而观之，此君可谓奇特之士，因此同学中戏称为毛奇，且语意双关。"（毛奇（Molkt）系德意志建国时普鲁士著名将领，在普法战争中功绩卓著。）

后我又以彭所语往询同乡陈赞周（圣皋之弟，亦在一师肄业）。赞周道："润之气质沉雄，确为我校一奇士，但择友甚严，居恒骜高远而卑流俗，有九天俛视之慨。观其所为诗文戛戛独造，言为心声，非修养有素不克臻此！直谅多闻，堪称益友！"我闻赞周语后，心益释然！乃写诗纪其事：

定王台晤二十八划生

白日东城① 路，娜嬛② 丽且清，风尘交北海③，空谷④ 见庄生。策⑤ 喜长沙傅，骚⑥ 怀楚屈平，风流期共赏，同证此时情。

---

① 东城：指长沙东城，定王台所在地，当时晤二十八划生处。

② 娜嬛：见伊世珍《娜嬛记》，传说中的神仙洞府，藏书甚富。

③ 北海：指唐李邕。长沙定王台图书馆藏有李北海书写的麓山寺碑文。

④ 空谷：即空谷足音，比喻极难得的音信或事物。作者见到二十八划生的"征友启事"，立即投函询问，旋得回信，中有"空谷足音，跫然色喜"，语出庄子《徐无鬼》篇："夫逃虚空者……闻人足音跫然而喜矣。"跫（qióng 穷）然：行人之声。庄生：指庄周。

⑤ 策：指汉贾谊上文帝的《治安策》。贾太傅即贾谊，曾为长沙王太傅。

⑥ 骚：指楚屈原所作的《离骚》。屈平即屈原。

自定王台谈话后，每遇周末，我们两人经常约定到天心阁、城南书院、长郡中学、韩玄墓、板仓杨寓等处晤谈。或到郊外云麓宫、自卑亭、水陆洲、溁湾市、猴子石、东南渡等处远足游览。

天心阁为长沙东城古堡，地势高峻，俯瞰全城，极形胜。天心阁有古铁炮百余尊。联云：拔地千寻，四面云山齐首俯，距天一尺，九霄日月正肩摩。

板仓杨寓位于河西，岳麓山自卑亭迤北。有稻田数十亩，均为长沙东乡杨氏祀田，庄前有古樟林高数十尺，广荫数亩，前有小溪，自山麓流入湘江。其后平原即岳麓书院。

一次，我与润之一起步行去韶山，走到长沙与湘潭之间，离长沙三、四十里处，甚为乏累，就在路边休息。见一位老农在茅屋边打草鞋，润之就与他攀谈家常，边谈边帮他锤草，搓绳，编织，织好后又帮他把草鞋锤平。我见润之对打草鞋的工序很熟练，便问，你会打草鞋？他说，我会，走路很费鞋子，大家都应该学会打草鞋。

在长沙，我陪润之到过许多地方。长沙附近有个拖船埠，那里有座禹王碑，传说禹王曾在此拖过船，古史说："大禹治水，栉风沐雨，八年于外三过家门而不入。"润之对他颇有兴趣。认为禹王是个劳动人民，对他怀有好感。

对于湖南历史上先进人物的遗迹，如：楚国屈原的故居（玉笥山），汉朝贾太傅祠，岳麓山上的崇德寺（唐朝诗人杜甫流浪时曾在此寺住过），长沙的飞虎营（南宋文学家辛稼轩将军在长沙练兵的地方），以及王夫之的家乡等地，我们都同去访问过。

新民学会成立

定王台会晤后，长沙各校续有青年学生加入谈话，历时约二年，遂共同发起组织新民学会。

一九一八年四月十四日，是个星期日。这天，在岳麓山周家台沩痴寄庐举行了新民学会成立会。

沩痴寄庐坐落在湘湾市小镇，湘江的西岸，系宁乡人周姓所居。周以耕、商为生，有水田庄基方圆约数十亩，竹篱茅舍，木屋十余间，宅前有晒谷坪。成立会即在坪前举行。

沩痴寄庐于日军侵犯长沙时遭炮火毁灭，后又重建。一九五〇年，我与陈启民教授同往访主人周家七爹，三人同在舍前拍照留影，但该屋后被拆除。

出席成立会的约十余人，我亦赴会。会议通过新民学会公约，并选举了干事会。会员中以萧旭东与毛泽东年资较高，分别被选为学会总干事和副干事。

我当时曾写新民学会成立会诗：

济济新民会，风云一代英。
沩痴盟众士，湘水泛流觥。
佳气郁衡麓，春风拂郡城。
庄严公约在，掷地作金声。

初期会员除我外均为长沙第一师范学生，其中以何叔衡（字瞻岵）年龄最长，瞻岵为新民学会发起人之一，他平日生活节俭，待人如己，遇事自出主张，戛戛独造，不屑人云亦云。平生自矢："甘作奸宄之敌，不为乡愿之亲。"文彩特出，有射石殁羽气概。尝谓："屈原清狂，冥思独到，文采富丽，经纶殊感不足。李白佻达不入大雅，杜甫拘谨，字句杂有腐儒之见。"但又云："太白流夜郎，杜陵恻生别，他们究竟比常人要高一筹。"其风趣如此！

东游返旆

新民学会在一九一七年冬季曾对会员升学问题加以详细研

究。当时有人主张就地升学或就业。瞻岵率先提出会员留学东瀛路线，经过讨论，群谋佥同，决定由我先行，其他人俟得我回讯后，再继续出发。瞻岵向我说："目前不急于就业，再读十年书，然后定事业方向，大器晚成，水到渠流。"并在平浪宫设宴，为我饯行。大家热情洋溢，并赋诗赠别。我遂乘华盛轮船东行赴沪。启梗前，润之到码头送行，当面交给我一个信封，说内有诗一首相赠。启封一看，系题为"送纵宇一郎东游"的七言古风，诗云：

云开衡岳积阴止①，天马凤凰② 春树里。
年少峥嵘屈贾③ 才，山川奇气曾钟此。
君行吾为发浩歌，鲲鹏④ 击浪从兹始。
洞庭湘水涨连天，艨艟⑤ 巨舰直东指。
无端散出一天愁，幸被东风吹万里。
丈夫何事足萦怀，要将宇宙看稊米⑥。
沧海横流⑦ 安足虑，世事纷纭何足理。
管却自家身与心，心中日月常新美。
名世⑧ 于今五百年，诸公碌碌皆余子⑨。

---

① 我东行前，连日阴雨，轮船起碇时，积阴转晴。"云开衡岳"句，见唐代韩愈《岳庙诗》。

② 天马凤凰，系岳麓山区两个山名。

③ 屈贾，指屈原、贾谊。

④ 鲲鹏，古代传说中的大鱼和大鸟。见《庄子·逍遥游》。

⑤ 艨艟，指巨轮。

⑥ 稊米，一种形似稗的草，实如小米。语出《庄子·秋水》："不似稊米之在太仓乎？"

⑦ 沧海横流：指社会动荡不安。

⑧ 名世，即闻名于当世。《孟子·公孙丑下》："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

⑨ 余子，见刘克庄《沁园春·梦孚若》词："天下英雄，使君与操，余子谁堪共酒杯"。

平浪宫⑩前友谊多，崇明对马⑪衣带水。

东瀛⑫濯剑有书还，我返自崖君去矣。

何叔衡⑬、萧子昇、陈绍庥、彭道良诸君亦到码头送行。

轮船越洞庭湖沿长江东下，沿途停泊九江、安庆、南京、镇江等城市。我得以上岸，畅游名胜古迹。抵上海后，我向日本大阪公司购得舱位，准备转轮往日本神户。正待出发时，忽闻东京发生日警迫害中国侨民风潮，闻讯后，我激于义愤，乃退船票登岸，中止赴日本。

我在留居上海期间，接触到一些留日归国同学，了解了东京风潮内幕及留日学界内幕。又从结识的北京、天津南归同学中得悉北京一些学校正酝酿新思潮的动向，十分令人神往。

在上海，我购得《新青年》杂志数期，返湘后送与学会同志传阅，大家被陈独秀的思想所吸引。我也将此行经过及留沪见闻向大家作了报告，我认为当时日本政治闇黮，学术剽袭，无甚可师学之处。建议东行计划从此可以打消，主张今后改辙北向。

新民学会北征

自从我东游返旆后，对于学会方向问题经常在讨论计议中。当时有人主张到南洋去谋生，但感不切时宜。我在沪时了解到北京文化界潜流正在变动不居之中，因倡议北行。另外，《新青年》上刊

---

⑩ 平浪宫在长沙北门外，轮船停泊处。友谊多，指到平浪宫送行的新民学会会员。

⑪ 崇明，指上海崇明岛。对马，指对马海峡。

⑫ 东瀛，指日本。

⑬ 瞻岵于临别时，曾书短句赠我，云："若金发硎，若陶在钧，进德修业，光辉日新！"其中若金发硎句，语出《荀子·劝学篇》："金就砺则利"。陶钧，指制陶器所用的转轮。杜甫《瞿塘怀古》诗："疏凿功虽美，陶钧力大哉！"

登的赴法勤工俭学的介绍（一九一七年四月号），也引起大家的关注。蔡和森更是急切地跃跃欲试。在萧子昇和蔡和森先行赴京安排勤工俭学事之后，于一九一八年暑假期间，决定由何叔衡留守长沙，润之和我等十余人首批赴京。我们一行由长沙乘轮船直航武汉，经由汉口大智门车站登火车过花园、广水，出武胜关。时值秋汛季节，火车抵河南漯河寨（郾城），适遇附近沙河水涨，孟庙村一带水漫路基，火车停止前进。我们只得下车宿郾城县，观览寨景，知该地古称元辉寨，东界沙河，北界里河，为河南一重要市镇。隔了一日，水始退。我们行三十里至大石桥。从大石桥又步行二十二里，到任庄休息，再经九里到许昌。许昌乃古魏国都城，我们观看了当地古迹，登文峰塔（许昌旧城在城东十里许）。车行凡二日，到达北京前门车站。我先寓浏阳会馆，此地为谭嗣同旧居，流风余韵，发人深省。

浏阳会馆位于宣武门外北半截胡同。据会馆执事刘长班谈："戊戌政变蒙难人谭嗣同曾住会馆北屋。"即"莽苍苍斋"旧址。书斋陈设笔、砚仍旧。谭有遗照尚悬室中，其中之一为着夜行衣装束，手舞大刀，栩栩如生。谭当时有随侍二仆，名罗升与邱顺，均浏阳人。谭禁锢狱中赋绝命诗，有句云："去留肝胆两昆仑（奴）"，即指二仆而言。

初到北京，人地生疏，食宿昂贵，这对我们这群穷学生来说，是很困难的。好在当时湖南各县多在京设有会馆，大家分住在各县会馆。但各县会馆彼此相距甚远，会员们相聚，往来步行，费时旷事，诸多不便。我与润之商议，共同租了一小房于景山东街，遂同搬至嵩祝寺后三眼井吉安所夹道七号居住。吉安所原来是清廷皇室停放梓宫及灵柩的行宫。清室覆灭以后，该地成为废址，宫殿依旧。其迤东有一夹道，有几所矮小住房，据说原是抬灵柩的工人住室，后来因陋就简，又搭盖矮房出租。因地势偏僻，房租亦便宜，便

由子昇出面租了三间小屋。先是子昇、绍庚、润之、焜甫、玉山、荣熙和我七人搬入，后来，和森亦由布里村迁来，共八人。子暲住隔壁八号。当时诸人分住东西二室，子昇、润之、绍庚和我住东间，其余住西间，每室有一铺通炕，由于人多炕窄，每席仅宽一砖半，只能骈足而卧。润之在《新民学会会务报告》中记述此事："八个人聚居三间很小的房子里，隆然高炕，大被同眠。"湖南人被子大，摊不开，只好合盖。"大被同眠"此句出于唐书典故，尚有象征团结之意。

初始，大家在外吃饭，食费昂贵且不习惯，于是商议自行炊爨，各事所宜，无分劳逸，体弱及事冗者亦伴食无碍。尝因缺乏炊釜，乃以搪瓷面盆做锅。北京米贵难买，经常以炒面调成糊，加葱花、盐末充食。一次子昇做了一面盆浆糊，大家外出劳累了一天，虽饿亦无法下咽。房东是一满族少妇，人极腼腆，平日很少出门，只从窗户里探望我们，有事则让其七、八岁的小女儿来通话。她见我们不会做面食，觉得好笑，便亲自出来教我们发面蒸馍。还有送水的山东人老侯，也愿意帮忙，他说："我不要你们工钱，我做好馍和你们一起吃就可以了。"并将自己的炊具也搬来，每天为我们做饭，和我们一起吃馍馍、咸菜。

我们八人只有外套二件，出门时轮流着穿。因室小人多，地狭不足以回旋，入冬以后，则昼往沙滩北京大学第一院图书阅览室避寒，夜则返寓围炉共话。那时生活很苦，大家从中得到锻炼，不以为苦，反以为乐。我们还步行游历了许多地方，交结了许多工农朋友，由于工作学习紧张，物质生活的困难就不在意了。

吉安所同人生活一直维持到一九一九年一、二月间。这时，子昇赴法，润之回湘，我亦因参加北大学生会工作和其他学术团体活动而改寓他处。

赴法勤工俭学运动

一九一八年八月十九日，由湖南到北京的新民学会会员有：和森、子昇、子暲、赞周、焜甫、芝圃、星煌、鼎丞、和笙、云熙、润之和我等。除润之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我在北大文科学习外，其余都到留法预备班。

赴法勤工俭学是新民学会会员北上的一个重要任务。至于勤工俭学运动的缘起，是到了北京，经多方了解，事隔多年之后，才逐渐知其内幕。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法国壮丁大部上前线参战，农业、工业缺乏劳力，因而法政府从西班牙、意大利等国输进大批工人，亦与中国政府签订合同，招募三十万华工赴法做工。北京政府为此成立了惠民公司，由张弧出名承办签证、输运事宜。前后输送了几十万华工赴法做工。张则乘机中饱。在法的李石曾等人见张获取暴利，亦想从中捞到好处，于是也向法政府商取招募华工的代理权，亦发了一笔横财。李石曾直隶高阳人，清代巨宦李鸿藻的后人，父亲亦为大官，祖传遗产很多。大战期间（一九一四——一九一八）赴法留学，学生物学兼营商业。他精通法语，往来于法国上层社会，在法国外交界亦有地位，对中国官场也很熟悉。他在法国经营了一些工厂和企业，其中较大的有巴黎豆腐公司。当时社会上有人提倡素食主义，结果李大赚其钱。他以这些为资本，勾结法政界上层官僚，获得了招募华工的权利。但过不久大战结束，大批军人复员，劳工不再缺乏，部分华工亦被遣送回国。这一来一往，中国官厅都是有利可图的。但李石曾颇有心计，看到华工不能继续去法，这事已无前途，但又不愿放手，就转向中国学生，鼓动青年赴法勤工俭学，一则继续招募工作，二来也可博得青年学生的信仰，便

于今后在政治上有所活动。

李石曾以创办华法教育为名，要求法国政府步美国后尘，退还庚子赔款，筹办里昂大学。赔款额达几百万法郎。以此，李便可以上下其手，取得该款的支配权。李还伙同汪精卫、吴敬恒等中国教育界的上层人物，向国内青年鼓吹勤工俭学的好处。为扩大自己的力量和影响，他们办刊物，立门户，树旗帜，大肆宣传勤工俭学运动。一九一七年四月间，他们开始在《新青年》杂志刊登广告，介绍留法勤工俭学规章。于是，勤工俭学运动在全国兴盛起来了。

湖南新民学会首先响应，子昇与和森先行到京联系，接着第一批会员于一九一八年八月间来到北京。当时李石曾已回国，并在北京大学兼课，他当即表示欢迎。是年冬，李石曾曾邀子昇、和森、润之和我到其西山寓所商谈赴法留学问题。李在席上谈话自称，他平日信仰世界主义，反对强权，强调无政府思想；在学术上研究生物学，奉拉马克(Lamark，系法国生物学家)为师，兼以工学救世。李并宣称自己不茹荤酒数十年，长期吃素，平生自奉俭约，借以取信于我们青年。他装得清流自许，貌为崖岸。我们也深为所动，认为勤工俭学一事非常紧要，作为一种反抗旧思想和反抗剥削阶级的利器，奉工读为主义，决心大力提倡，并推润之执笔，写出勤工俭学的实施方案。经子昇修改文字后，送交李石曾，李表示同意。新民学会诸人在最初推动这一运动，出了大力。湖南学生以及四川等地青年，一时响应者极众，如水赴壑，不能自止。其中大多数为失学、失业青年和穷苦学生。我也为此奔走呼号，在青年学生群中作过多次讲演，倡导世界工学运动，并在《新生活》等刊物上作文——《世界工读运动的讨论》。事后回想，不免有些不切实际，系主观片面之臆说，经过深思熟虑后，深觉今日万事应从中国做起。润之亦认为，这些只是一时冲动，所谓"急不择路"，此路未必走得通，但事已至此，欲罢不能，只好徐觅良途。后来，我和润之都

决定暂不出国。

湖南学生汇集北京，等待放洋急如星火，而华法教育会徒托空言，无补实惠，于是湖南同学被迫自筹旅费。关于湖南学生筹措赴法旅费方面颇多曲折。先是在清朝末年铁路风潮中，湖南省为商办粤汉铁路曾收集民股二百万元（自由募集）；米盐公股一百二十八万元（由湘省出口米捐与盐附加税，积累而成）；长沙房捐四万元，以上共三百三十二万元，存放北京银行，均为湘籍官绅把持中饱。辛亥以后从未理落。此事渐为外间所闻，旅京学生声言查账。经手人湘绅熊秉三、范静生等，为和缓舆论攻讦，乃声言愿从此款中提出数万元，作为津贴湘籍赴法学生费用。于是，乃由熊、范二人出面在湖南善后协款中拨出一万六千元，作为湖南学生赴法路费贷款，发每人四百元。第一批接受贷款学生共四十名，其中法文专修馆二十名，保定留法预备班十六名，其它四名。第一批放洋赴法的有蔡和森、陈绍庥、熊光楚、萧植蕃、郭名忠、欧阳泽、成湘、黄昆吾、何长工、李蕃、刘明俨、孙发力、罗学瓒、萧拔、王守素、李维汉、陈毅、侯昌国、王人达、龙协群、陈炎、罗汉、张增益、陈闻纳、穆青、娄绍丞、贺果、李富春等。同时蔡和森以个人名义向上海纱厂资本家聂云台（湘乡人）请求帮助，聂允其请，捐三千元作蔡全家赴法用费，始得成行。新民学会会员离京赴法时，同人纷纷赋诗赠别，我写五言律诗一首云：

送新民学会会员赴法（一九一九年冬）

雪月映西山，冰封渤海湾。
围炉忻笑语，别意动燕关。
徙倚双轮动，踟蹰落日阑。
车书观万国，海上有书还。

一九二〇年间，中国留法学生集中巴黎者数以千计，其中湖南学生四百人（有一部分是自费赴法，如徐懋徇、曾琦等），因觅工不

易，初由华法教育会给每人每日补助五法郎，至一九二一年一月止。华法教育会宣称：自是年二月份起与学生断绝经济关系。学生群起申诉，被置之不理。李石曾对学生表示决绝，于是勤工俭学运动陷入困境。子昇曾从巴黎写信给我，表示勤工俭学毫无成功希望，本人想离开巴黎。其它学生，家资富裕者继续留法或进里昂大学，后来，部分勤工留法学生先后赴苏联，大多数则被遣送回国。

但李石曾等却为此事欺世盗名，声誉大增。他与法国政客赫里欧勾结，取得法国政府退还的庚款，办了里昂大学，扩张己派势力。后又回国勾结军阀、政客，盗卖北京故宫古物，立成巨富。继又设立投资银行，进行政治投机，取得了特殊地位，得鱼忘筌，不复再谈往事。

新民学会在长沙时，初计议全体赴法，但到北京以后，审度情势与长沙所闻不同，我鉴于国事日非，大变将临，恝然去国，良非本怀。曾以此意函告瞻岵，瞻岵复函也以为然。润之亦中途易辙，停止赴法。但和森则坚持赴法，谓势成骑虎，舍此无它途。陈绍庥初犹豫，未起程。其弟绍常坚请行，绍庥遂护送其弟出国，后竟客死巴黎，诚非始料所及！杨楚亦病殁于巴黎。

在勤工俭学运动告一段落后，我与润之共留北京从事学习与工作，期望在北方开辟一个新的革命阵地。当时，北京是中国政治、军事、文化中心，是全国铁路枢纽地带，兼为国际通衢，居高屋建瓴之势。先是我自东游返旆后，便拟投考北京大学。此事瞻岵首表赞成。他说："师范同学受限制，非服务期满，不能投考国立大学。"所以特别希望我能进入北大学习，为新民学会在北方工作开辟先路。当时的会员中，主张我投考北大者还有和森与芝圃等。和森在一九一八年七月致子昇信中所云："罗君到省未？北京大学报名在本月二十五日截止，请电知，速定行止，盖罗于此必须另辟佳处，则后来者，愈有地步也。"信中所谈，均涉及我投考北大问题。

润之原则上同意上项意见，但更具体指出说："我们同志不应该堆积在一起，最好是一个人或几个人担任开辟一个方面。各方面的阵地都要开辟，各方面都应该决定打先锋的人。"

当时全国国立综合大学只有一个北京大学（清末称京师大学堂）。其招生范围包括国内二十一个省，各省分有一定名额。北方诸省占名额多，南方各省名额较少，录取颇受限制。我既考入北大，同时，润之亦通过守常介绍，进入北大图书馆任馆员。他的具体工作是管理报纸杂志阅览室（每月工饷八元）。我们两人在北大时期，都积极参加了北大的各种学术及青年活动，参与建立新闻学会、哲学会等学术团体。

自新民学会北上后（即一九一九年前后），北方革命形势有如春云渐展，各方面均有进步。我乃作长期坚持的决心与计划。但此时润之忽怀念乡国，浩然有归志，遂决定辞去现职南行。行前，我们两人连日在沙滩红楼聚谈，商定去留大计，往往深夜始散。当初，我殷切挽留润之继续在京工作，因向润之说："北京方面不宜削弱力量，你去后学会力量不免单薄，何以为继？"润之回答说："学生身份比职员胜得多，那时你自会有办法的，莫急就好！"于是双方商定三年为期，南北分途努力，必能有所成就！他辞去北大职务，于一九一九年二月离京南行，遄返长沙。润之南归后，北方新民学会工作由我独当一面，自尔以还，彼此天各一方，南北分途，共着祖鞭，奋勇前进。直到四年以后，两人才在上海中央会合。

润之返回乡里后，诸方面工作颇有建树。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中旬，湖南新民学会联合各界人士发起驱逐湘督张敬尧运动，润之率领驱张代表团来到北京请愿。他初进京即到北京大学西斋找我，会商发动湖南旅京学生进行响应事宜，组织"湖南旅京学生联合会"等。后来他迁住北长街九十九号（福佑寺）。他曾出示旅京代表名单约三十人，加上北京新民学会会员、湖南旅京学生及各界

人士，共数百人，声势颇盛。并于十二月二十一日在北大召开慰劳湖南代表团大会，与会代表痛斥张敬尧祸湘罪行，慷慨激昂，驱张活动在京进行月余后，未获进展，于是在一九二〇年一月二十八日即在湖南会馆举行群众大会，会毕游行到新华门北京政府请愿，声势大振。驱张运动结果，迫使张敬尧去职离湘，傅良佐继任，以暴易暴，湘政鲜所改进。润之于一九二〇年夏离开北京绕道上海回湘。

《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

新民学会的会员有五十多人，后来发展到七十多人。会员与干事会通信，这是学会给会员规定的义务。每个会员一年要给干事会写一封信，这样一年至少就有好几十封。干事会以毛泽东为主。会员与会员之间的通信数量最多。这些信由毛泽东收集汇编成册，现在看到的有三集，还有个附录。

收在集子中的信不多，平均每人一封，个别人有几封。这些通信应分前期和后期。前期是学会成立不久的一两年内，主要是讨论学术和意识形态问题，同时也谈了些有关生活方面的问题，如身体锻炼、婚姻问题等，这是初期的情况。后期从一九一九年以后到党成立之前，着重讨论政治问题，这是自然的发展，中心问题是改造中国与世界，再就是中国革命的手段，是采取苏俄十月革命的道路，还是采取其他道路。

当时，会员与会员之间有什么问题就通信讨论，内容也广泛。我到北京后，陈绍庥、萧子昇等多次写信，要我出国。他们说我一个人留在北京，朋友都走了，很单调，主张我出洋留学，专心读书。陈绍庥认为我专心做学问，搞个专业合适些，他表示自己要在法国长期蹲下去，将来回国立志著书立说，不做官。但润之不同意，瞻岵也不同意。润之说，那些舍近求远的想法不免有离开现实的意

思，不论遇到什么困难都应凝神一志以赴之。这段话对我有很大启发，我认为很对。润之从北京到上海后又给我写信，他怕我动摇，勉励我坚持。这样，我就长期留在北京工作了。可见，会员之间互相勉励颇有影响，作用也大。

我和润之来往通信的事，现在有文字记载的前后有好几次。从一九一五年征友启事开始，到一九三〇年前后十五年中，断断续续地通信从未间断过。在通信集里发表了两封信。一封是一九二〇年七月我写给他的，当时正是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工作开展之时。他接到此信后，接着就回了两封信。他第二封信的第一句话就讲："昨信谅到。重翻你七月二十五日的信，我昨信竟没有一句答复你信内的话，真对不住。今再奉复大意如下。"可见他对通信解决问题是很注意的。第二封回信是发表了。这就有三封了。有关资料目录上载有他在一九二〇年六月还给我写了一封信。这样，四封信已有文献可证。

一九二〇年六月，他在上海给我写信，大致内容是：说他出京到上海的见闻；询问他出京后，北京大学内部发生了些什么情况和问题，对北大颇为关心；还提到邵飘萍，这是他所关心的人。另外在信中还鼓励我说，你在北京有困难，朋友们都走了，我们的力量比以前少了些，不要走，要乐观，要坚持下去。信中热情洋溢，讲了好些感动人的话，又谈了些生活方面的情况等等。我写信希望他不必操心，我已经习惯了。

此外，往上追溯到一九一七年，他还有信给我。这封信情文并茂，我当时曾能背得出来。一九一七年，润之游览了南岳，登上了祝融峰，在下山归途中，走到衡阳南边的中伙铺，在路边的一个小饭店里给我写了这封信。他用的是湖南草纸，有两、三张，信写得很详细，说他看到了南岳，第一句话就是："诚大山也！"意思说果真是座大山，对南岳的风光描绘了一番，文风与"海赋"格调相仿。他

还谈到了古今名人志士笔下的南岳，特别提到了唐朝的韩愈宿南岳庙的诗，这首诗刻在岳庙的石板上。这些内容谈了一大段。信的最后说：为了给你写这封信，整整花了我大半天的时间，因此，今日不能登程了。信中还寄给我一首他游南岳写的诗。可惜这封信散失了，没有保存下来。

现将我在一九二〇年给他的信，和他的回信录后（见《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二））：

润之兄：

你六月三十的信，辗转交付，今日才到我手里，我读过之后，非常喜慰。你们这一年的劳苦，代价不小，有志竟成，足矜愚懦。希望你今后的生活，更趋高尚，日进无止。

自从你赴沪后，我因不知你住所，又是彼此忙着，所以少通信。但我们意气相期，理性上的交谊不浅，这些小处，何必介意！我所以觉得你的话，还嫌琐碎，润之！几经锻炼的老伴侣（战友），现在还这般客气，岂不是太斯文了么？

你的意思，注意一省的事业，想将湖南办好，我也很赞成。零碎解决，本来是很切实的入手处，于此，我只祝你成功，并不用再申私见。

学会会务发达，我觉得很高兴。现在中国最缺乏的就是知识界没有善良的有势力的士气，因之没有舆论，没有是非。青年学生，浮沉人海，随俗靡化，这便是国病。我希望我们的学会，竭力反抗这一点，便不怕没有成绩了。至于现在一班所谓学会性质，无非预谋干禄，把持一界饭碗，滔滔皆是，尤其盼望大家力避其染，自己估量一个最高的价格。“会务报告”内容如何？我当然可以贡献点意思，但是请你将要目告我，不然，我胸无题目，殊觉茫然。湘江①出版请寄下一阅。所说湖南青年界研究兴味不大浓厚，你还是先

① 湘江指《湘江评论》。

觉的人，责任自然很重。再出版的要求，更不可少了。

你下学期担任课么？最好多挪出些自修时间。耀灵急节，岁月易逝，无法可以挽回。况思想学术，节节僵化，更不可不注意。你的英文近想大有进取，关于肄业的近况及预计程序，也可以告我一些么？至于我自己，本想在此二年（已过），便图出国。不过现在形势又不同了，出国的事，还须延展。我校虽不是十分好读书的处所，北京却是个顶好藏书的地方，我不是身体的无用，想也有些境界了。自去年来，我读书又颇有点头绪，厌世观念，自谓绝少，不过有些旧识，近来都远去了，生活不免有些不快，但这也是偶然的感觉，不算甚么。我们达教胡同的团体（曦园），因人数中减，已告解散，现在我搬在马神庙西斋（第一寄宿舍）居住，以后将继续住下，以后的生活，自期更当秩序些，安慰〔定〕些，有甚么话时，再向你说。我省教育界情形，想有大改造，大建设。但是关于学款，可有了把握没有？关于人才，新到了些好名角没有？你们最好将教育状况，通信京报，俾我们大家明了。

章龙上。　　九.七.二五。

章龙兄：

昨信谅到。重翻你七月二十五日的信，我昨信竟没有一句答复你信内的话，真对不住。今再奉复大意如下。我虽然不反对零碎解决，但我不赞成没有主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解决。我主张湖南人不与闻外事，专把湖南一省弄好，有两个意思：一是中国太大了，各省的感情利害和民智程度又至不齐，要弄好他也无从着手。从康梁维新至孙黄革命（两者亦自有他们相当的价值当别论），都只在这大组织上用功，结果均归失败。急应改涂易辙，从各省小组织下手。湖南人便应以湖南一省为全国倡。各省小组织好了，全国总组织不怕他不好。一是湖南的地理民性，均极有为，杂在全国的总组织中，既消磨特长，复阻碍进步。独立自治，可以定

出一种较进步的办法(湖南宪法)，内之自庄严璀璨其河山，外之与世界有觉悟的民族直接携手，共为世界的大改造。全国各省也可因此而激厉进化。所以弟直主张湖南应自立为国，湖南完全自治，丝毫不受外力干涉，不要再为不中用的"中国"所累。这实是进于总解决的一个紧要手段，而非和有些人所谓零碎解决实则是不痛不痒的解决相同，此意前函未尽，今再补陈于此。

兄所谓善良的有势力的士气，确是要紧。中国坏空气太深太厚，吾们诚哉要造成一种有势力的新空气，才可以将他斟换过来。我想这种空气，固然要有一班刻苦励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我想我们学会，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兄以为何如？

"会务报告"专纪会务，不载论述文字，尚未着手编辑，大略每季一册尽够了。此外会友通信，发刊通信专集，为会友相互辩论商讨的场所，兄处有与会友间往还信稿，不论新旧，请检出寄弟。

"湘江"尚未出版，固因事忙，亦怕出而不好，到底出否，尚待斟酌。

弟本期在城南附小办一点事，杂以他务，自修时间很少，读"岁月易逝，无法挽回"，"思想学术，节节僵化"诸语，使我不寒而栗。我回湘时，原想无论如何每天要有一点钟看报，两点钟看书，竟不能实践。我想忙过今冬，从明年起，一定要实践这个条件才好。求学程序预计，略有一点，迟后当可奉告。

讲到湖南教育，真是欲哭无泪。我于湖南教育只有两个希望：一个是希望至今还存在的一班造孽的教育家死尽，这个希望是做不到的。一个是希望学生自决，我唯一的希望在此。怪不得人家说"湖南学生的思想幼稚"(沈仲九的话)，从来没有人供给过他们

以思想，也没有自决的想将自己的思想开发过，思想怎么会不幼稚呢？望时赐信为感！

弟　泽东。　　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在一九二〇年间，新民学会主要成员分布在北京、长沙与巴黎三处。此时国际与国内政治动态瞬息万变，对于“国是”主张，众说纷纭，见仁见智，各有不同。如北京会员主张社会革命总解决；长沙会员提出湖南省建国问题；巴黎方面对于改造中国采取的革命方式意见分歧，莫衷一是。上述情况，可从学会会员通讯中见到（现存通讯虽然为数不多，但亦可见一斑。此外，还有很多会员信函未能刊出）。

我在北大时，对当时中国革命，主张走苏俄十月革命的道路。与此同时，正酝酿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实践方面，主张与产业工人群众结合一致，进行社会革命，期望中国实行彻底改造，来个总解决。

在北洋军阀统治时代，全国黑漆一团。当时湖南会员方面鉴于国事棼如乱丝，无下手理落处。他们憧憬历史上的斯巴达和普鲁士所走过的道路。因此“湖南建国”之说应运而生。一九二〇年三月间，长沙方面公布了《湖南建设问题条件宣言》，鼓吹一省建国的主张。润之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给我的信中，亦主张湖南自立为国，“湖南人不与闻外事，专把湖南一省弄好。”理由：一是中国太大，民智不齐。二是湖南的地理民性均很有作为，全国各省可因此激厉进化，并与“世界有觉悟的民族直接携手。”他也同意我在信中的意见，强调说：造成“善良的有势力的士气，确是要紧。”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润之在给向警予信中又明确提出：“湖南自立为国，务与不进化之北方各省及情势不同之南方各省离异，打破空洞无组织的大中国。”意思是说，当前的中国是一个大而无当的大国，宜实行分治。对此，我自北方去信，表示异议，提出北

方同仁的主张，因此发生争论。这次辩论，在一九二〇年间，我们两人的几次往来通信中，均有详细反映。记得在一次通信中我说道："我们在北方难道能组织一个'汉沙'？成立威尼斯小邦或佛罗伦斯小城国一样的组织吗？这当然是不合理的。"这个问题到一九二一年南北渐归一致，"湖南建国"的问题就不存在了。

巴黎方面会员的情况又有所不同。他们虽然离开本土，远适异国，对中国当局政情变化不甚了解。但是，对于中国的政治改造，也曾提出过他们各自的看法。这从蒙达尔尼会议纪录中可以窥其大旨。当时，萧子昇在来信中，认为学会政策与方针，为："改造中国与世界"，"和森赞成马克思式的革命。"而此时，北京已正式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大力开展科学社会主义革命宣传与组织工作，并深入产业工人阶级基层，推动工会革命斗争。

新民学会成立初期，大家一致，精诚团结，去私存公，力争上游，会务蒸蒸日上，会员自十余人发展至十数倍，会员分布南北，隐然为中国革命重镇！

在中共成立以后，我和润之分负北方与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责任，实际指导当地工人斗争。"二七"大罢工后，在一九二三年六月中共"三大"的选举结果，我们两人联袂参加中枢领导！同时蔡和森、向警予等亦参加三届中央工作。由是南北壁垒，殊途同归。毛、蔡、向和我四人均湖南新民学会会员。我们自四年前北京分散后，现又从各方齐集来到上海中共中央共事。当时代英戏称之为"新民学会大团圆"。某日，代英与中夏到中共中央开会，闲谈时又向我提及此事。中夏说："几年来新民学会主要成员由分而合，看似偶然，其实也是必然。"中夏所谓"分"是指一九二〇年我留京，和森赴法，润之返长沙。"合"是指当前四人又合在一起共事而言。

由于中共成立，新民学会对外停止活动，过去的新民学会会员大多加入中共组织。

二、北京大学

一九一八年九月我考入北京大学，学了两年预科和四年本科后，于一九二四年毕业。后因工作需要，又往还于北大达三、四年之久。

北京大学建于清朝，原名京师大学堂。宣统元年即辛亥革命前，清廷宣布“君主立宪”制，废科举，立新学，模仿西方国家政制（在这以前清朝只有“国子监”，为皇族的大学），创建了这所大学。其目的主要是造就官僚。学生多为仕宦子弟。学校行政为封建官吏所把持，他们多半出身科举。学校的教学也多由举人、进士担任。所以，它仍是一所旧式学校。辛亥革命后（一九一二年），改名为北京大学。

蔡元培出长北大

一九一七年，任用蔡元培长校（前任校长为张百熙）。蔡曾是翰林院学士，长期从事教育，又是留德学者，在学术界很有声望。他到任后，对推动北京大学的新旧更替起了较大的作用。

当时，学校风气很坏，腐败污习极深。师生中追求物质享受，讲究吃喝玩乐，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者大有人在。学生中还流行一种小报，叫《消闲录》，系私人团体主办，每天出刊，销路为北京各类小报之最。它单讲怎样过生活，鼓吹最好的娱乐是听戏、捧名角。教师中也有人公开宣扬混世主义。他们引导学生混文凭，并以不谈

政治为信条。我和毛泽东刚到北大时，每与论及，无不大感惊异。

当时，学校教师大致可分为三部分人：旧派人物占大部分；西洋学者居次；思想激进的民主分子数量最少。进士出身的林纾和颇具名望的翻译家辜汤生，可说是北京大学的逊清遗老。他们主张复辟帝制，公开向学生灌输封建保守思想。由于他们的学术地位，深得一部分学生的崇拜，因而影响也较大。留学西洋的教员中，从美国留学回来的，有亲美派。他们推崇美国的“民主制度”，大力奉倡杜威的实证哲学。而从英国留学回来的，则歌颂英国的“议会制度”，羡慕英国的生活。甚至有人公开说：“假如中国有一天亡国了，我希望亡在英国手里。”这自然是属于极端的例子，亦足见当时教师中的思想状况。此外，还有一些是亲日派的人物。以上这些人物构成了北大教师的主要阵营，与新式人物尖锐对立。在对待马克思主义、对待苏俄十月革命以及对待宗教问题上，他们与后者是针锋相对的。

在新旧势力斗争中，蔡元培是倾向革新的。蔡先生长校时，倡导和支持了多种学会。如进德会、新闻学会以及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进德会是针对学生中以求学为猎官之阶、教师中以“风雅”而相尚（指玩妓、纳妾等）的腐败习气而创立的。蔡元培亲自主持进德学会，提倡生活简朴，号召会员不做官，不纳妾，不狎妓等，以冀收移风易俗之效。

他在任人上采用“兼容并包”的方略，引进一些新人。在治学上提出“陶冶中西”的方针。这也许是由于他尚无足够的力量，以革除根深蒂固的旧派人物，只好采取新旧折中，使旧势力不反对，新势力从容展布，学校也得以暂时安定。但这种兼容并蓄，也使北大的人事杂遝，鱼龙混杂，贤愚互见。蔡的一生也深受此影响。

在引进新式人物上，蔡先生是很有胆识的。其中最著者为引进陈独秀。

陈 独 秀

陈独秀字仲甫，安徽怀宁人，是前清秀才。父亲是个守备军官。门第平凡。但陈先生对旧思想的批判很有魄力。他笔阵纵横，独具风格。他所主办的《新青年》杂志，在思想、学术界尤为突出，深为蔡先生所赏识。为请他到北大任教，蔡亲自登门拜访。陈先生当时住在前门西河沿一间普通旅馆里，两人面谈之后，就礼聘陈仲甫先生为文科学长（相当文学院长）。依当时门第之见，一位二甲进士出身的翰林屈尊于一个初露头角的秀才，这也是很不平常的事。

陈先生任文科学长后，没有教课，专心致力于教学改革。他在校务会议上多次提出改革学制，修改课程的倡议，见识卓著，但开始颇有些阻力。陈先生不善交际，一旦居于众多教授之上，于他也不自安。有些自命不凡的人，瞧不起陈先生，对蔡校长的做法也不以为然。而蔡先生对陈先生却极为尊重，对陈的倡议和言论极力支持。文学院的人事、行政，一切均由陈先生主持，不稍加干涉。陈先生负责文科的改革，分成了中国文学、哲学、史学和外语的英、德、法、俄等七个系；先后延聘了许多著名教授，济济多士，盛极一时；课程也有较大改进，不但必修课增加，还开了新的选修课。象李大钊先生开的《唯物史观》，把马克思学说搬进大学讲堂，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破天荒的事。陈先生改革教学的这些措施，促进了学术研究和思想解放，使北大在思想界、学术界居于领先地位。从而博得了一些人的信服，终于在北大站住了脚。

陈先生到北大后，把《新青年》编辑部也搬到了北京，主编改由陈先生和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胡适、鲁迅、沈尹默等轮流担任。当时中国处在帝国主义侵略和北洋军阀政府统治之下，内忧外患

达于极点。《新青年》高举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旗帜，提倡民主，提倡科学，主张政治革命；宣扬新文化，反对旧礼教，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特别是发表李大钊介绍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学说的文章，在当时中国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新青年》宛如火炬，照亮了全国青年前进的道路。

我进北大时，陈先生已在校执教了。在中学时，我就是《新青年》的热情读者，尤爱读署名独秀的文章。进校初期，又听到有关陈先生的许多传闻，对他是很敬仰的。但我认识陈先生，却是很偶然的。

当时，我所在的德文班有三、四十人，彼此学历很不一样，大致有三种类型：一是从国外回来的，他们大多是外交官的子弟，随家在德国学习，回国后又转入北大继续升学；一部分是在青岛大学读完两年以后，转入北大重读预科的，青岛大学为德国人所办，用德语授课，德文水平较高；再就是象我这样的普通中学毕业生，在中学学过四年德语。这个班由于程度参差不齐，老师授课颇感困难。同学们学习进展也不一致，对学习进度不免意见分歧。为此，我们开了几次班会，进行协商，最后确定向学校交涉，请求解决。班里决定从三种程度不同的同学中各推一名代表主持此事。我是代表之一，和其余两位同去见文科学长陈独秀。事先我们还拟了一个书面报告，由年长的一位代表面呈陈先生。陈在办公室接见了我们，说：“你们来干什么？”

我们申述来意后，提出分班的要求。陈先生听后说：“分班？办不到，目前教员和教室都没有多余的。”

我们接着提出：“是否可采用甄别的方法，部分同学经过考试合格后，可升到本科学习。”陈先生听到这里，打断了我们的话，说：“你们学生是想读书，还是想早毕业？你们希望早毕业好做官为官？多读两年书有何不好？”

我们申辩说："不是这个意思。再说，早毕业进入社会、转入仕途也不是坏事。"陈先生听后便有些光火，说："你们根本不想认真读书。你们平时对社会上的重大问题也不愿研究，只知道考虑个人……"声调越说越高，语气失和。同学也不耐烦，起身就走，结果不欢而散。

陈先生送我们出门时，似有悔意。我在班上年纪较轻，在申述理由时，越次发言颇多，出门时走在后面，陈先生边走边对我问道："你是哪里人？"我回答说："湖南人，湖南联合中学毕业生。"他听后点点头说："你且留下，我们再谈谈。"我留下后，陈先生问我："你说说看，这事该怎么办？"我回答："同学们的意见是合理的，并不过分。没有教员和教室也不是您的责任，可以转告学校有关部门，让他们解决！"陈点点头。我又说："同学们要求通过甄别考试提前毕业，也是正当的。有人想做官入仕，不能说我们都是怀有做官的思想。今天没有解决问题，大家不会就此罢休。"陈先生若有所思地又点了点头。我谈完意见就告辞走了。

代表们回去报告交涉的经过后，果然，大家不以为然。经过讨论，又派我们三人再去找陈先生。这次陈答应了，同意向学校反映，设法分班。并说，提前毕业事还要经教育部核准。一场风波得以解决了。经过这件事后，我认识了陈先生，此后，我和他的交往也逐渐多起来了，印象也逐步深入了。

陈先生当时确具革命领导者的品质。他学识渊博，才能出众，目光敏锐，敢说敢干。与刚从美国留学回来，倾心于美式民主，宣扬实用主义的胡适相反，他常向我们谈到法国大革命和巴黎公社，对巴黎市民攻破巴士底狱和建立工人政权的革命壮举十分向往。他常说，人类文明的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并以"出了研究室，便入监狱"、"出了监狱，便入研究室"的豪言与我们青年共勉。"五四"时他一再强调，要采取"直接行动"对中国进行

“根本改造”。他的这些言论非常符合当时激进青年的心意。青年们对他十分敬佩，亦步亦趋团结在他的周围。正是在他这些号召的鼓动下，易克嶷、匡互生、吴坚民、宋天放、李梅羹、王复生、刘克俊、夏秀峰、张树荣、吴慎恭、吴学裴、王有德和我等各院校的青年学生，在“五四”前夕，秘密组成了一个行动小组。在“五四”那天采取了“火烧赵家楼，痛殴章宗祥”的直接行动。

陈先生不只是号召青年行动，他自己也身体力行，“五四”后不久，六月十一日，他亲自带领我们上街散发《市民宣言》。那天，当他从新世界香厂游艺场屋顶向下撒传单时，被侦探发觉了，他走到天坛就被逮捕了。陈先生被捕可以说是“五四”运动中的一大事件。

陈先生早就为北洋政府所注目，他被看作“过激派”的“元凶”，军阀恨他入骨，早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他被捕时所散发的《市民宣言》，就足以罗致重罪。《宣言》中强烈要求政府“一、对日外交不抛弃山东省经济上的权利，并取消民国四年、七年两次密约；二、免去徐树铮、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段芝贵、王怀庆六人官职，并驱逐出京；三、取消步兵统领及警备司令两机关；四、北京保安队改为市民组织；五、市民须有绝对集会言论自由。”这五项要求揭露了北洋政府勾结日本、出卖主权的罪行，指名道姓地要求惩办当政的显要，并提出了解除反动政府武装这一要害问题。《宣言》最后说，政府如“不完全听从市民的希望，我等学生、商人、农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的改造。”这就是：要采取革命手段来推翻政府了，在这帮杀人不眨眼的反动军阀眼中，岂不是犯了“忤逆大罪”。如今，陈先生落到了他们手中，真是凶多吉少，若是被他们杀害，将对“五四”运动造成严重后果。

李大钊先生一向对陈先生十分敬重，看到陈先生落在敌人手里，非常着急，马上领导同学设法营救。大家首先想到的办法，是将陈先生的被捕消息通告全国，借以造成强大舆论，使北洋军阀政

府有所顾忌，不敢胡作非为。果然，这个消息由北京学生致上海学生的电报传出后，全国舆论沸腾，函电交加，要求释放陈先生。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亦大声疾呼，抨击北洋政府。

李大钊先生想了各种方法来营救陈先生。这对当时的警察总监吴炳湘等人产生了一些影响，北洋政府中一些人也怕事情闹得不可收拾，才于九月中旬将陈先生释放出来。

陈先生出狱的喜讯传来，大家十分欣喜，李先生尤感高兴，特写了一首诗《欢迎独秀出狱》，全文如下：

（一）

你今出狱了，
我们很欢喜！
他们的强权和威力，
终究战不胜真理。
什么监狱什么死，
都不能屈服了你；
因为你拥护真理，
所以真理拥护你。

（二）

你今出狱了，
我们很欢喜！
相别才有几十日，
这里有了许多更易：
从前我的“只眼”忽然丧失，
我们的报便缺了光明，减了价值；
如今“只眼”的光明复启，

却不见了你和我们手创的报纸！
可是你不必感慨，不必叹息，
我们现在有了很多的化身，同时奋起；
好象花草的种子，
被风吹散在遍地。

（三）

你今出狱了，
我们很欢喜！
有许多的好青年，
已经实行了你那句言语：
“出了研究室便入监狱，
出了监狱便入研究室。”
他们都入了监狱，
监狱便成了研究室；
你便久住在监狱里，
也不须愁着孤寂没有伴侣。

李先生的诗表达了他和陈先生的友谊，也反映了“五四”时期给青年一代带来的革命风貌，为当年北大青年所进行的斗争留下了一块纪念碑。

陈先生出狱后，并没有停止战斗，他随时有被再次逮捕的危险，他先是隐居在刘文典先生家中。李先生考虑他的安全，遂与我们反复研究，最后征得陈先生同意，决定护送他出京。李先生亲自就如何护送问题精心设计，并为此一度亲到天津，作出了周密妥善的安排。一九一九年底，李先生带了我们几个学生，与陈先生一起，都打扮成商人，雇了一辆骡车，趁着晨光曦微悄悄出城，由小路经廊坊前往天津。李先生是位老成持重、胆大心细的人，他一口道地

的河北口音，乡情又熟，因此，他们顺利地到达了天津。

一九二〇年一月，李先生又在天津亲送陈先生登上开往上海的轮船。从此，陈先生结束了在北大的教学生活，而开始了新的征途。

三、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

一九一八年以还，北大学术研究与活动盛极一时，其中以哲学研究会与新闻研究会会员人数最多，均公开活动。其活动情况由当时的校刊《北大日刊》择要公布，至今犹斑斑可以考见。

北大新闻学会

北大新闻学研究会为我国最早研究新闻学的团体，历时也较长。除课堂研究外，兼重实践。会员中，参加当时的革命行动者不乏其人。其中邵振青便是代表人物之一。

溯至辛亥革命后，中国新闻事业如雨后春笋，一时勃兴起来，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日报刊行颇多。当时北大同学在课余之暇自办刊物兼从事新闻记者工作的不乏其人。北大创办了各种周刊，于是同学爱好新闻事业遂一时蔚为风尚，谭鸣谦、谭植棠、高尚德、区声白、毛润之与我等诸同学，自办刊物并经常为各报刊撰写稿件。同时，也喜欢研究有关新闻业务的理论与实践诸问题。

可是当时北大没有设置“新闻学”课程，北京各大学中，也没有设新闻专业。一天，我和几个同学在景山公园散步，途中谈及此事，大家觉得何不联合同学，共同来研究这门学问。回校后我们便去向徐宝璜教授请教。徐教授是江西人，新从美国回来，会谈之下，十分热诚。自称：“在美国时，已学习过几门有关新闻学的课程”，很愿意指导我们学习。同时，我们又将这个意思，告诉了常向

我们索稿的邵振青。邵氏是《京报》报社社长，浙江人。为人聪慧开朗，一表非凡。他亲为《京报》写社论，编新闻，时感人力不足，因向北大同学组稿。他曾主动写信给蔡元培校长，倡议设立新闻学研究会。

此事酝酿多时，经北大师生多人共同努力，北大新闻学研究会终于在一九一八年十月成立。讲习会址在沙滩东口红楼三十四教室，先后参加的会员五十余人，均系北大同学。蔡元培校长因势利导，并积极参加学会工作，被选为会长。徐宝璜与邵振青选为导师。徐先生还兼任学会总干事，亲授新闻史。他自编的讲义约百余页，内容新颖。徐先生诲人不倦，心地诚实，有心做一个中国新闻事业的开拓者。高兴时，他滔滔不绝，一讲就是两、三个小时，毫无倦意。讲到一个段落，他发问责答，十分认真。有时，发给每人卷纸，令大家作题实习。如发现有错误，立即援笔批改，我们着实获益，短期讲用，一生受用不少。

新闻学研究会每周讲习三至五次，主要在第一院文科三十六教室举行。学会还举办一个临时性的小型报，是为北京全市运动会开幕而出版的，会毕随即停刊。经过五个月的讲习后，举行了一次结业仪式，蔡校长亲自主持毕业典礼，由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发给文凭，文凭上有会长蔡元培与总干事徐宝璜的亲笔签名，大家如获珍宝。计学会会员中取得证书者共五十五名。其中得听讲一年证书者共二十三人，即：

何邦瑞、谭植棠、区声白，倪世积、谭鸣谦、黄欣、严显扬、翟俊千、张廷珍、曹杰、杜近渭、徐思达、杨亮功、章鑑诒、傅馥桂、温锡锐、缪金源、冯嗣贤、萧鸣籁、欧阳英、丘昭文、罗汝荣与陈公博等。

取得听讲半年证书者共三十二人：

李吴祯、陈秉瀚、徐云光、姜绍谟、来焕文、马义述、杨立诚、易道尊、毛泽东、罗璈阶、钟希尹、常惠、吴世晋、王南邱、鲍贞、韩荫

毅、陈光普、朱存粹、华超、朱如儒、舒启元、刘德泽、梁颖文、倪振华、杨兴栋、曲宗邦、慰士杰、黄琴、吴宗屏、高尚德与陈鹏等。

上述诸人其思想分野与政治倾向，互不相同，如谭植棠、谭鸣谦、陈公博、毛泽东、罗璈阶、舒启元、高尚德等均先后参加中国共产党，其余分别参加不同政治团体者，不遑悉举。尚有一部分会员从事革命文学活动，思想进步，均曾积极参加"五四"运动的直接行动与新文化革命运动。

由于北大师生同心合力，新闻学研究会办得很有成绩，声誉日盛，因此，他们被誉为中国新闻学界的拓荒者。

一代报人邵振青

在北大新闻学会的学习研究和活动中，还应郑重提到邵振青。他是北京大学新闻学会的倡议者和促成者。北京大学新闻学会的开展当时虽然名义上由北大校长蔡元培负责，但蔡因校务殷繁，实际工作均由导师二人主持。同学实习辅导则由邵振青独立承担。因此，他实负重任。大家对邵都怀有好感。我由于工作上的关系，与邵接触频繁。他的言论和行动，后来渐渐与中共北方区委党的政策发生共鸣。一九二六年，他以"宣传赤化"被北洋军阀政府逮捕入狱，枪杀于北京天桥刑场。他对党的革命事业是有卓越贡献的。

邵振青，字飘萍，浙江东阳县（一说金华）人。在浙江高校毕业后，曾为中学教员，同时兼任地方报纸通讯员，辛亥革命时曾与杭辛斋经营浙江《汉民日报》（一九一二至一九一三年）。该报与浙江旧势力抗争，与官厅立于反对地位，因此邵被逮捕三次，拘禁九个多月，最后《汉民日报》竟被封闭，邵乃东赴日本，自设东京通讯社，向中国各大城市供应新闻稿件。他又在北京自办昭明印刷厂。邵在北方时与李大钊过从颇久，结为文字之交，实为后日加入政治活

动之媒介。邵到北京后，创办《京报》，参加新闻学会，一生事业从此发轫。

邵振青是具有革新思想和较有魄力的新闻记者，他是最早创建中国新闻学专业的拓荒者。

一九一九年四月，他为徐宝璜所著《新闻学纲要》写序时，说："自蔡元培先生任北京大学校长以来，各种学科，渐臻完备，又注意于临时讲演，以补教科书所未及。……窃叹我国新闻界人才之寥落。远观欧美及日本近年以来，新闻之学，与日俱进，专门著述，汗牛充栋，其新闻事业之发达，亦即学术进步之效果耳。去年之春蔡校长有增设新闻讲演会之计划，余乃致书以促其成。比得蔡先生复书，极承奖饬，斯会遂于暑假以后成立，请教授徐伯轩先生主任其事。蔡先生复以余从事新闻记者有年，并函聘为导师。自维于新闻之学，素乏研究，而以蔡先生之所期许，于理又不敢辞，遂与伯轩先生分任演讲。区区之意，欲为未来之新闻界开一生面。"

从上述文字可见邵振青对新闻学极有抱负，慨然欲为中国新闻界别开生面，可谓前无古人。不仅如此，同时邵还写有《实际应用新闻学》一书（一九二三年八月北京京报馆出版）。他在该书序言中开宗明义阐明，我国新闻界所最需要者，为培养各种外交记者（访员 Reporter）。他说："记者精神上之要素，以品性为第一，所谓品性者，乃包含人格操守，侠义勇敢，诚实、忍耐，及种种新闻记者应守之道德，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泰山崩于前，麋鹿兴于后，而志不乱。"他参考欧美日本学者专门著述，及自身十余年来实地经验所得，以极浅显之理论，供有志青年之研究，书中所述理想的外交记者应"取法乎上"。邵振青又认为从事新闻事业应对各国社会思想有真知灼见。他著的《综合研究各国社会思潮》一书流行国内。他在采访新闻时强调政治经济与劳工诸因素。

各工厂，举凡工矿中之黑暗，工人之待遇，工资，时间，工头制度，徒弟生活，工人团体（教育训练），罢工酝酿等均应为社会记者所特别注意。邵特别重视劳工运动，关于同盟罢工问题，他主张采访下列各项新闻：①公司组合，工厂及地方名称，②工厂等所有者及经理人姓名，③罢工者人数，④以前该地有无罢工其时日及原因（与今次比较），⑤劳动者方面代表的姓名，⑥今次罢工的真正原因，⑦劳动者方面提出条件（如对工资削减不平，及加工资要求等），⑧工厂方面提出的条件，⑨劳动者与工厂争论始末，⑩现在的工资，⑪劳动时间，⑫工资及时间，近来曾行改革否，⑬与其他地方企业的工资时间比较，⑭劳动者的团结力，⑮劳动者中破坏团结作业者，⑯罢工前途的预测，⑰劳动者已受到社会方面的同情，⑱上次罢工时的结果，⑲与工厂接洽总代表姓名，⑳解决前途的推测，调停者活动情况，㉑罢工业务的种类产额及现况，㉒新劳动者雇入之预计量，㉓雇主等的威吓行动，㉔警方之处置，㉕罢工的结果，㉖工会方面的光景，㉗工厂方面的态度，㉘罢工者罢工中之生活费所从出，㉙商业及公众所蒙受的影响等。由此可见他同情罢工追求新闻自由，思想是激进的。对新闻学理论与实践是有深刻修养的。

邵在北大新闻学会讲授新闻实践，他自己承认学问根底不佳，其实他文采丰富，议论通畅，思想敏捷，真是下笔千言，倚马可待。他在这方面给我们的训练影响很大。他最能干的是采访新闻的手段，他自诩“守如处女，动若脱兔，有鬼神莫测之机”。例如当时刺宋渔父要犯洪述祖正在北平就逮，他运用方法从洪之妾手中获取洪氏亲笔日记露布《京报》，幽燕人士，无不惊其采访绝技。

邵为人做事极能干切实，且机警肆应，故《京报》销路首屈一指，广告收入大为增加，他以报社经济力量，支持北方区革命事业，做了许多对革命有益的事情。

邵振青对于非宗教运动工作，曾作出重要的贡献，当年北方区

党组织曾给予良好的评价，事情大概经过是这样的。

我当时担任北大中共支部书记，除联合北京国立八校教育界师生和北京新闻界共策进行公开集会讲演外，并出版《非宗教论》一书。

该书中刊有八英寸铜版肖像三十四幅，另有中国分省宗教“教毒”地图一巨册，内有总图二幅，均须用锌版。

此项工作均由邵振青所主办的昭明印刷厂承印办理。他在这方面给我们提供了不少的义务援助。

当年《京报》在《非宗教论》一书上刊登广告，首称：“《京报》由邵飘萍主干，专门学子十余人，分任编辑。”所谓专门学子，大都系北京大学学生，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员。他们是通过北京党组织派往工作的，由邵本人负责培养训练，后来都渐渐成为新闻战线上的干部、有才能的记者和编辑。

与此同时，邵振青在本位工作上，又不断向我们党组织提供了关于北洋军阀政府方面的重要军事、政治、经济等一系列情报资料。同时他又从东交民巷外交团、路透社、电通社，法国、德国等为我们取得特殊重要的新闻消息。这些工作都很有价值。

一九二三年二七大罢工期间，中共北方区委政治宣传任务十分繁剧，而北京地区白色恐怖严重，缇骑密布，禁网森严，我与北大支部同志高君宇、缪伯英、宋天放、江囚、刘伯青等坚守岗位，隐蔽居住，在骑河楼等处主编《京汉工人流血记》。一夕数迁，不遑宁处。当时印刷发行条件极端困难，排字、铸版、打纸型、装订等项工作，原来主要放在北京大学地下室印刷厂秘密进行，后因发行数量激增，人力物力均感不足，幸得《京报》尽力支持。这样《京汉工人流血记》数以万计的发行量，方得顺利完成。因此，同志们都说这是《京报》对革命工作雪中送炭！

一九二二年前后，我党在北方发动八条铁路的同盟罢工和唐

山、开滦大罢工，在革命宣传方面出版了《工人周刊》，创立劳动通讯社，同时也得到邵飘萍的同情和支持。此后，我作为北方党的负责人经常和他联系工作，在北京市工会工作方面成立了革命的印刷工会，《京报》印刷厂工人也参加了这个组织。

一九二三年六月我离开北京到上海中共中央局工作。随后又奉命出国，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旅途中我和邵飘萍仍保持通讯联系。

一九二六年，北方革命如火如荼，向前发展。我负责铁路总工会工作，曾留居北京数月，知道《京报》工作也极有进步。邵振青在主持《京报》期间，在一九二四年时，热情拥护国民政府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歌颂俄国的十月革命。在《京报》出版“纪念马克思诞辰专号”和“列宁特刊”，一时人人争购，号称“洛阳纸贵”。其中部分编辑系由北方区委派往工作的，大都是北京大学学生。由于《京报》内容刷新与充实，销数骤增至六千份以上。这在当时，已是相当不错的了。

邵振青生平性格开朗，交游极为广阔。曾先后受聘任上海《申报》驻京记者，日本东京《朝日新闻》驻沪特派记者，在京时与《泰晤士报》记者 Morison 往还，增加了他在国际上的声誉，因此他名满京华，誉望极高。但誉之所至，毁亦随之，他却处之泰然，尝对我说要从事革命就难免“尽如人意”，但求心无愧怍就够了！但反动政府对于他的政治背景是多方进行侦查的，所以最后以“宣传赤化”罪名将他杀害，这决不是偶然的事。如所周知，邵振青在军阀专政下，从事新闻记者工作是备受压迫的。他在政治上与中共北方区地下党发生联系后，更引起军警方面的经常注意。《京报》的言论和新闻，旗帜相当鲜明。因此一九二三年二七惨案发生，《京报》一度被查封。该报被封时，军警搜查，如捕大盗，他仓促间从屋顶逃出，暂避居于东交民巷六国饭店。当时安福系内阁即以扰乱京师

治安罪名照会公使团引渡，并行文全国通缉，他乃仓皇逃往天津。

一九二六年二月，《京报》再被搜查，他走避东交民巷，四月二十四日晚间化装回馆清理文件，在琉璃厂被警察捕去，同时《京报》被封。

二十五日，北京各界推举代表谒见奉军第三军团长张学良，请求释放。张学良说："取缔宣传赤化分子，早经奉天军事会议决定，警厅奉令执行，邵不过其中之一人而已。"邵在警厅受到军法审讯，二十六日清晨被绑赴天桥枪杀。他临刑时态度从容，面不改色。

邵为中国新闻事业，为中国革命做了大量的工作，最后为人类伟大目的，贡献出自己的生命，这是求仁得仁，中国人民对他是永远怀念的。

四、“五 四”运 动

从“五 四”到“六 三”

我进入北京大学的第二年——一九一九年，爆发了著名的“五四”爱国运动。其发源地亦在北大，我适逢其会，见闻较为亲切。

当时的北大一如前述：自蔡元培出长北大后，力图把旧式的北大办成一所新式的学校。他聘请各方面有名望的人物来校任教。这些人中，又以当时有进步思想的学者为主。蔡先生的这些主张和做法，对形成北大活跃的学术空气，使一些进步的学者云集北大，从而成为一种文化上的新力量，无疑起了颇大的作用。

文科学长陈独秀所主办的《新青年》，更成为革命青年意识形态的启蒙刊物，它大力宣传“科学与民主”的新思想。陈独秀和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上撰写了很多批判旧思想的文章，特别是十月革命后，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经验方面，更是一马当先，不遗余力。如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在当时影响很大。同时，这些新思想也有力地冲击着封建礼教、孔孟思想的集中地——落后的北京大学。其势犹如江河决口，沛然莫御。

北京大学内部这些新、旧思想斗争的展开，随着一九一八年末——一九一九年初的社会政治变动和政府外交上的吃紧，也就一天比一天扩大，一天比一天活跃。它的具体表现之一，乃是各种社团的涌现犹如雨后春笋。在当时主要还是学术性质的社团，如

哲学、新闻、进德三个学会，是以学校名义组织、由蔡元培先生领导的。除了这种“官方”的以外，在当时也有一些学生自己组织的团体，较重要的如国民杂志社、新潮社、平民教育讲演团、辅仁社等等。

其中的国民杂志社，在“五四”运动中曾起过中坚的作用。该社的负责人周长宪、吴迪恭等，均是北大法律系学生。周还是《国民》杂志的主编人之一。国民杂志社的成员遍及北京国立八校，在北大的会员尤为众多。

李大钊和其他一些教授，如吴虞、杨怀中也经常参加一些学会的活动。

除上述各种社团外，还有各班、各系、各科(院)的学生会组织。但从整个北大说来，还没有正式的全校性的学生会组织。在院一级的学生会中，以文科、理科的学生会组织比较整齐、比较坚强，而其他的则不十分严密。除北大外，国立八校如高师、工专、医专、法政、俄文专修科、法文专修科、农科等，也都有各自的学生组织。还有跨院校的会社组织，如湖南学生会，陕西旅京学生联合会(即“共进社”的前身)，新滇社等等。

参加各种学会的成员，有一批追求进步、立志社会改革或思想急进的青年。其中有不少人，从此走向革命，参加了党和团的组织。

以上种种事实表明，“五四”运动前夕，在青年学生中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为即将到来的暴风骤雨式的群众运动奠定了思想和组织的基础。

一九一九年一月十八日，巴黎和会开幕，消息不断传来，各校学生对于北洋军阀政府的腐败无能、丧权辱国、奴颜婢膝的种种倒行逆施愈益不满。二月九日，北大学生曾集会，专电中国政府派往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陆宗舆等不要退让。在平日，学生中讨论国

是的活动也愈益频繁，他们通过各校组织，经常聚会。我参加了一个以湖南学生为主的小组活动。这个小组的人数起初虽然不多，只二、三十人，但有代表性，国立八校的同学都有，但以北大同学为主，小组及其成员具有组织力量，可以发动各校的运动。这个小组的主要成员是：易克嶷、宋天放、匡互生、罗汉（海潮）、吴予坚、李梅羹、吴慎恭、刘澄宇、陈德荣、吴铿、张树荣、王复生和我。小组没有设正式委员会或书记，对外也没有名称。其中许多是我过去辅仁社的同学。小组成员常常碰头，议论当时的重大政治问题。他们也都是一些学校学生会和社团的负责人或积极分子。平时则分散活动，遇有重大事情，小组便集中一起讨论。

四月底，青岛事件发生，巴黎噩耗传来，广大学生群众非常愤慨，小组讨论就集中在这个外交问题上。议论一番后，大家认为静等政府处置是没有希望的，必须发挥国民外交作用，采用民众的力量来制裁。于是，一致主张“外争国权，内惩国贼”。为了有效地推动运动，我们组成了秘密行动组。这时，国内外形势急转直下，行动组有人主张采取暴力手段制裁卖国贼。大家都同意这样作，于是分头准备。组内成员有不少同学是南方人，身强力壮，具有南方强悍民风和勇于斗争的精神。大家斗志昂扬，并推定易克嶷、罗汉、匡互生及我为全组负责人，具体部署，分途进行。

经过商量研究，确定宋天放、吴慎恭等去探查卖国贼的住宅，查明行动的门路、进出的路线；另外，易克嶷、刘澄宇等想办法认识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人的面貌。为认识曹、陆、章等人，大家想了一个办法，北京的廊坊头条胡同，是几家照相馆的集中地，当时政府一些官员为了显示自己，将个人的照片都陈列出来。我们就派人到照相馆去对号。这些准备工作都是事先完成的。

到了五月一、二号，最先是北京大学内部从下而上的进行了各

级学生会的讨论。学生组织掌握在中年级同学手里，经过从班到系层层发动，于五月三日晚召开了学生大会，决定次日在天安门前开北京各校学生联合大会并举行大规模游行。行动组连夜讨论，安排了几项工作：第一，推定执行主席负责控制大会主席台；第二，派专人负责指挥几个大学带队掌旗的；第三，组织交通队和口号队，口号队还设有英语的，标语、传单也分中西两种文字，目的是让外国人也懂得大会的意义；第四，作好打卖国贼和可能发生冲突的准备。

五月四日这天，十几个学校的学生队伍潮水般云集天安门，北大的队伍到得较晚。我们到那里时，小组的一些成员正在进行演说和鼓动，群情振奋。接着，就宣布出发游行。

游行开始时，没有公布详细路线，按过去习惯，游行是经东西长安街、东单、西单、前门一带。这时有人提议到东交民巷去，向日本公使馆提抗议。群众跟随着校旗，浩浩荡荡，呼着口号前进。除了小组的负责人，谁也不知道这次游行要去攻打赵家楼。队伍在东交民巷受阻，经过一番交涉后，领队就簇拥着校旗，改道把队伍带到东城猪市北边的一个较大的胡同（赵家楼就在这里）。我们领头的四、五个人见胡同里外已布有军警队伍，曹宅铁门紧闭，没法打开，便想走后门进去。但经研究又觉不行，怕调动中队伍走散了。最后决定派三个人搭人梯，从事先探明的窗子里爬进去。我们陆续攀登进去十余人。其中匡互生、罗汉、吴予坚和我都先后由窗口进去了。当时，院子里站着一排军警，都上着刺刀。我们在门外的同学，不断地喊口号，有的还用砖头、大石砸门，其势甚为汹涌。警察未奉上级命令，不敢擅自开枪，也不敢随便乱动。我们进去的人，有的去给警察作解释，宣传爱国反日。有几人乘其不备，将大铁门打开，人流象潮水一样涌进来。我们没有找到曹汝霖，只发现了章宗祥，大家一涌而上，把他痛打了一顿。章宗祥被打时，

有一个日本人扑在章的身上，连声喊叫："不要打了"。还有一个时髦的年青女子，见状吓得了不得，有人叫她离开，并护送她到另外的地方躲避。后来，匡互生等同学没有找到曹汝霖，气愤地将屋子里一些易燃的挂画都扯下来，集中起来点火烧了。——匡互生又名日休、务逊，湖南宝庆（今邵阳）人。他是我们行动组的中坚分子，高大个头，有股侠义劲，敢说、敢干，但思想倾向无政府主义。

火一起，外面的军警就包围进来了。群众开始撤退。因有些人负责掩护断后，结果有三十一、二人被军警逮捕了。其中有几个是行动组成员，如易克嶷、吴予坚等。

"五四"这天游行示威与火烧赵家楼的行动，北京大学及其他学校的教职员均没有参加。《北大日刊》当时对于五月四日运动也心存顾虑，亦未加报导。

为了援救被捕同学，五月五日上午，北大召开了学生大会，蔡元培校长也出席了。会上，决定成立统一的北大学生干事会，决心把斗争坚持下去，进一步争取全市学生的联合行动。

"痛打章宗祥、火烧赵家楼"的行动毕竟在社会上产生了效果，卖国贼的气焰低落下去了，反动政府也着了慌。五月七日，被捕的同学全部获释，但是军阀政府又提出"追查肇事学生、依法惩办"和"严禁学生扰乱社会秩序"等，进一步迫害爱国学生，而对卖国贼却不予惩办。学生们继续坚持斗争，外出讲演，罢课抗议。这一运动已得到全国各地响应，声势也愈来愈大。

从六月一日至六月三日，演讲、请愿斗争更为激烈。这是"五四"运动后的又一高潮。几天来，从清晨到傍晚，北京及全国各地赴京请愿的学生，布满大街小巷，到处是游行的队伍，到处是呐喊的声音。"六三"那天，我和班里同学组成一组，按约定到东城讲演。时值炎夏，烈日当空，同学们挥汗如雨，但仍不顾疲劳进行宣传。不久，忽来一队军警，将我们组全部捕去，关进北河沿北大三

院临时监狱中。此时北大三院大门外沿河一带遍布军队帐篷，已将三院团团包围。当天下午，北大学生会和北京学生联合会，发动了一、二万人赴新华门总统府请愿，要求北京政府总统徐世昌出来接见学生，回答问题。这次请愿规模声势之大，斗争精神之坚韧、顽强，在我国学生运动历史上是空前的。

爱国学生的革命行动，使军阀政府极为震惊。当晚，徐世昌总统在中南海召开了内阁阁员紧急会议。以北洋军阀段祺瑞的参谋长徐树铮为首的一些武职官员，认为学生无法无天，“太猖狂了”，叫嚣要用“武力解决”。徐树铮还建议把大炮架到景山，轰平北大；另外，徐世昌等人主张“和平解决”。但是，虽然内阁会议做出了“和平解决”的决议，没有炮轰北大，徐世昌还在接见方豪等十名学生代表之后，表示同意学生提出的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惩办卖国贼、释放被捕学生等要求；而另一方面，徐树铮等却早已做好了镇压学生的部署。我们请愿队伍在深夜解散回校途中，又一次遭到反动军警的大逮捕。关进北大三院临时监狱的人不断增加，行动组的成员全都被关进去了。被捕的学生当中，还有不少女同学。

北洋军阀政府镇压学生运动的暴行，激怒了全国各界民众。罢课、罢工、罢市之举蜂起，全国陷于一片混乱之中。在举国一致的强大压力下，北京政府不得不向爱国学生让步，于六月五日下令释放被捕学生。六月十日，北京政府下令罢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个卖国贼的职务；六月二十八日，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拒签和约。至此，伟大的“五四”运动便胜利地告一段落了。

值得一提的是长辛店的铁路工人所组织的“救国十人团”。它在“五四”期间曾到北京，参加了学生运动。

我们这个行动小组的许多人，后来都成了中国共产党党员，北方小组成员，或青年团的基干。“五四”运动对我们来说，是一次革命的演习，也是一次很好的锻炼。

“辅仁学社”

“辅仁学社”成立于一九一三年。它是由湖南长沙长郡中学部分同学组成的。成员有三十多人。学社名称取其意为“以文会友，以友辅仁”，是个研究学术的团体。

长郡中学原为长沙府中学堂，辛亥革命后改名长郡中学。因它是由长沙郡十二县公款筹办的，故又称长沙第一联合中学。

“辅仁学社”简称“辅社”。一九一八年前，“辅社”的大部分成员都已中学毕业，其中一部分成员，有的升入大学学习，有的出国留学。它虽是一个纯学术团体，主要是以研究科学知识为主，但后来，它的许多成员在各次政治斗争以及某些地区的斗争（如湖南的驱张运动）中，都成了其中的领导者或积极分子。

毛泽东和部分“辅社”成员，过从甚密。一九二〇年他因驱张运动到北京时，“辅社”在京的部分成员曾组织欢迎会。现尚保存在革命博物馆的一张照片，就是当年“辅社”部分成员与毛泽东等在陶然亭合影的纪念。照片中，除毛泽东和我外，还有周长宪、易克嶷、匡务逊和陈兴霸等。现在尚记得的“辅社”成员除我外尚有：

易克嶷（赓甫）　北大文学院
陈兴霸（远谟）　北大法学院
周长宪（邦式）　北大法学院
吴汝铭　　北大法学院
吴汝霖　　政法专科
匡务逊（日休）　北京高师

以上是中学毕业后到北京的成员。留在湖南以及其他地方的成员有：

张孝骞　湖南湘雅医学院（后留美，是我国著名的医学专家）

彭治朴　湖南湘雅医学院(后留美,是我国著名的医学专家)

张　维　湖南湘雅医学院（后留美，是我国著名的医学专家）

熊亨仁　后为长沙女中校长

萧盛礼(乐天)　警官学校

彭光闾　保定军官学校

陈忠杰　商务印书馆编辑

郑家俊(点石)　留学德国柏林大学

刘克俊　北大毕业后留学德国柏林大学

曾祥梓　留学日本帝国大学

萧　成　星加坡中学任教

萧延煦　联中毕业

杨　堃　联中毕业

周　立　联中毕业

曹　昌　联中毕业

沈开益　联中毕业

邓毓灵　联中毕业

龙若云　联中毕业

“五四”时期，“辅社”成员中参加直接行动小组者有易克嶷、匡务逊和我。“五四”后，我参加发起组织“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吴汝铭、吴迪恭参加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匡务逊组织高师工学社。

后来,易克嶷回长沙;刘克俊、郑家俊赴德国留学;张孝骞赴美留学;曾祥梓留学日本。由是“辅社”社员星散,自动停止活动。

“辅社”社员彭光闾、萧乐天参加军事行动,反对北洋军阀,为革命独树一帜(护国军),已如前述。

“共进社”

一九一八年暑假期间，我刚考入北京大学文学预科，寓居三眼井吉安所左巷七号院时，与我们一墙之隔的左巷六号，住有陕西旅京同学李子洲（即李登瀛）、刘天章、杨钟健、杨晓初等。六号院共有十来间房子，全由他们包租了。他们组织了“陕西旅京学生联合会”，编有《秦钟》、《共进半月刊》等刊物。“五四”后，正式定名为“共进社”，亦是北大较著名的社团。“共进社”人多势众。从吉安所左巷到西老胡同、中老胡同、东老胡同及至沙滩，都有他们的寓所。李子洲是“共进社”的主要领导人，人们尊称他为“大脑”，在他和“共进社”周围，团结了一大批陕西的进步青年学生。他们朝夕相处，往来频繁。每逢星期天或节假日，居住在别处的陕西同乡，也多来左巷六号聚会，热闹非凡。其中有刘含初、屈经文、耿炳光、方仲如、营尔斌、潘自力（以上均为北大同学）、杨明轩、魏野畴、魏惜言（以上为北高师学生）等。

当年，“共进社”在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倡导科学与民主及传播马克思主义等许多重大问题上，都很有影响。

我们原是一墙之隔的近邻，“共进社”的李子洲、刘天章、杨晓初、杨仲健、魏野畴等，与我和毛泽东、蔡和森、陈绍庥、萧三等“新民学会”的会员相处较熟。饭后茶余，常聚在一起谈天，从国家民族大事到学术思想问题，以至生活趣闻，无所不谈。

我们寓所距红楼很近，只有“一箭之地”。学校钟声、哨声声声相闻。在“五四”期间，北大学生会或北京学生联合会一有号令，吉安所左巷一带便闻风而动。北京学联的总务科，全是“共进社”的人。李子洲等同志工作得很出色，每次集会、游行，在他的带领下，很快就能把游行需用的大、小旗子制作齐全，及时写出和刻印好所

用的标语、传单。李子洲嗓门宏亮，富于鼓动。北大成立学生干事会（简称学生会）时，李子洲被选为学生会干事。

在稍后发生的罢课斗争，“救国十人团”的宣传活动和“六·三”请愿斗争中，“共进社”的同志们，都是积极的参加者和组织者。“六·三”晚上及以后的大逮捕中，“共进社”的社员也大多被投进监狱。在激烈的斗争中，我们和“共进社”结下的战斗情谊，历久不渝。

一九二〇年三月，李大钊和我们在北大秘密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党的“一大”后，“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公开活动，并征收会员，李子洲是最早报名参加的基本会员之一。“共进社”的刘天章、魏野畴等，也是其中的基本会员。

“共进社”很多同志，早期就加入了党的组织。他们回到陕西后，对陕西各地党组织的建立、根据地的开拓，都有许多建树。可以说，他们是党在陕西地区进行斗争的早期开拓者。

五、曦　　园

曦园是由国立八校一部分思想激进的同学组织的。它是一个倡议并实行泛劳动与自由研究的大专学生的团体，成立于一九一九年秋季。地点在北大附近东皇城根达教胡同二号。主要由北京大学、北京高师、北京工专、医专与农专等校同学三十余人所组成。其成员犹能记其姓名、学籍者，除我外尚有：

邓中夏　湖南省宜章县人，北京大学文学院二年级。

张国焘（特立）　江西省萍乡县人，北京大学理学院二年级。

吴汝铭　湖南省长沙县人，北京大学法学院旁听生。

李梅羹　湖南省浏阳县人，北京医学院二年级。

杨人杞　湖南省醴陵县人，北京大学文学院一年级。

易克嶷　湖南省长沙县人，北京大学文学院三年级。

刘克俊　江西省安福县人，北京大学法学院二年级。

萧镇湘　湖南省醴陵县人，北京工学院四年级。

杨亦曾　湖南省新化县人，北京大学文学院四年级。

刘　汇　直隶省大兴县人，北京大学文学院四年级。

陈　锡　湖南省邵阳县人，北京大学理学院四年级。

吴学斐　湖南省长沙县人，北京大学法学院旁听生。

杨副时　湖南省宜章县人，北京中学学生。

罗　汉　湖南省浏阳县人，北京法文专修科。

马元材　湖南省新化县人，北京大学文学院一年级。

以上诸人大部分是五四运动中的积极分子，有的还是行动小

组的成员。

曦园同学提倡泛劳动主义，他们泛观中外古今，认为中国古代哲人多从事劳动，如：舜耕历山，陶于河滨，渔于雷泽；傅说版筑；胶鬲渔盐；百里奚贩牛；卜式牧羊。至于西方人杰如：哥伦布、瓦特，大都为水手与工人。故特别强调学习应躬行实践，不宜徒托空谈。

基于上述理由，我们在曦园订有公约，规定成员务必亲身参加园内劳动，如值班、烧饭、做菜、洗衣、挑水、扫地等，事必躬亲，一律不得雇用仆役。食堂伙食多按本人经济能力负担用费，或多或少，自愿决定，共度互助互济的生活。成员衣食住行等一切，均力求简单朴素，并不得闲逛荒嬉，出入娱乐场所、酒楼戏院等。严格实行“三不”，即：不做官、不纳妾、不狎妓。成员们厉行新风尚，提倡发扬互相批评精神，彼此互为诤友！我们并提出，要以新道德代替奴役道德，同时提倡青年采取行动，调查、访问北方地区工矿、农村与城市贫民的生活，寻求解决社会问题之方案。坐言起行，奋发有为。

在曦园，每个成员都积极参加学术活动。

学术活动划分为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两大范畴。订定必需阅览的图书目录，由各人认定专题研究，坚持自学。在这方面，我保存有部分学习笔记，主要内容于后，可能有助于了解当时一些青年的学习情况。

在自然科学方面，主要要求认识当代自然科学的成就，远自银河系与太阳系诸天体运动情况，近及地球史发展过程，并进而要求阐明运动与时间及空间的关系。此外，关于物质的转化，生命的成因与毁灭，亦为大家所共同关注之问题。关于天体发生与发展问题，除钻研哥白尼、伽里略、开普勒的著作外，还参阅了康德诸人的著作。

康德著的《宇宙发展史概论》认为，宇宙在洪荒时代，是以气体

状态的星云团开始旋转运动的，一切天体均系通过星云旋转运动而凝聚结成。宇宙诸星体经过亿万斯年，仍然走向由成而毁的过程，最后消失在太空之中。星云学说所阐明的天体运动正与中国庄周的“方成方毁”之说吻合。同时并参看康德著的《普通自然史与天体理论》(1755 年出版)。

在地球成因方面，则研读德国地质学家加贺孚(Karl Hoff)所著《地壳自然变迁史》(1834 年出版)，及其他有关地质学著作。

在生物学方面，主要集中阅览英国达尔文著的《物种起源》(1859 年出版)、德国赫克尔著的《宇宙之谜》(Emst Haeckel, Die Weltraetsel)(当时尚无中译本)。

在解剖学与生理学方面，需要攻读希腊语文，以求直接阅读亚里士多德、盖伦(希腊医学家)的著作。同时，更应看乌伦甫特(德国细菌学家)等人的著作。

特别提出研究生物学与生理学。生物学注重进化论（包括物种发生与胚胎学发展史)及生物组织与解剖学；生理学包含动物与植物的功能。前者指动物感官及运动学，后者指营养，新陈代谢与生殖遗传等。

在生理学方面，则读英国威廉·哈微(William Harvey 1578—1657)的著作。哈微发现血液循环系统，尝云：“一切生命由于卵。”

通过解剖学与生理学进一步研究人类学，从而对人类躯体构造的规律性有所认识。在人猿进化过程方面参考的专著主要为：

法国动物学家戈甫洛 (Geoffroy de Sant-Hilaire 1772—1884)的一系列著作。他长期实地研究世界各地栖息的猿猴，掌握了大量资料，因而断定人类是从东南亚一种已绝种的狭鼻猿猴进化而来。这类著作可谓“益人神智”！

以上是属于自然科学方面的学习情况。在此以前我们头脑中

充满许多杂乱无章的“天问”式的问题，如月球是卫星中的大观园，有广大的艺术宫殿等等。道听途说，十分茫然。

至此，对于自然界现象，有了科学的、比较明确的认识，知道人类生命起源于象蛋白质一类物质；细胞分裂、胚胎发育是生命发展的物质过程，不是什么“生死轮回”之说。“死”与“生”是一对相对的概念，而死不是生的继续，所以二者又是绝对概念。这都是当时在短期中学习自然科学书籍的心得。

在人文科学方面，当时要求精读兼选译下列诸种世界名著：

1. Plato, Republik（柏拉图：《共和国》）
2. Tomas Moor, Utopia (1)（托马斯谟尔：《乌托邦》）
3. Saint Simon, Idel Sosiety（圣西门：《空想社会主义》）
4. Montesquier, Vom Geist der Gesetz（孟德斯鸠：《法意》）
5. Rousaw, Emil（卢梭：《埃米尔》）
6. Fourier, Phanlang（傅立叶：《方兰》）
7. Robert Owen, New Lanark（欧文：《新协和村》）
8. Adam Smith, Wealth（亚当·斯密：《原富》）
9. Karl Marx, Das Kapital（马克思：《资本论》）
10. Hegel, Philosophy（黑格尔：《哲学》）
11. Nitze, Ueber-Menschen（尼采：《超人哲学》）

当时，文科同学大都在北大哲学系听讲，所以在哲学方面富有研究兴趣。据一般见解：“一元论是统一的世界观，即物质与精神世界的统一；二元论是物质与精神世界彼此分离、互不相涉。”在研习哲学过程中，我们主张一元论及其相应的认识论，同时反对形而上学（玄学）。理解到所谓美育，是“真善美”的一种圆满的哲学信念。

对无机世界与有机世界，应作融会贯通的解释。对于时空问题的理解：“空间为外界的直观形式，时间为内在的直观形式”（康

德语)。

这种哲学思想表现在文学方面。我们认为歌德在其著作《浮士德》、《普罗米修斯》、《诗与真实》等诗篇中，阐扬一元哲学达到了完美的境地。

怎样探讨真理、追求真理，体现在认识的实践过程中。认识真理方法分别为二：一元论者主张认识是一种自然过程而非奇迹，认识是一种生理现象，主要源于大脑皮质，即思维器官；一切认识均非先天存在，而是后天由于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如历史经验）所形成的。二元论者主张认识是一种超自然过程，它是一种先验过程而与实体定律无涉。下面是历史观的笔记：

关于历史观，大宇长宙，横尽虚空，竖尽往劫，不可纪极！就人类历史言，自广义言历史时间非常短促。据推算，世界史在其全程一亿年中（假定最小数字）相当于一天二十四小时中的五秒钟；至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则更是白驹过隙，不足以喻其短促。

人类发生与发展的历史进程，与一般生物界进化史并行不悖。如所周知，物种起源的主要论旨，是说一切物种由于通过遗传而继续生存；由于适应环境而发生变异，物竞天择，百世难改其度。人类社会制度也应该是如此，不断传递与不断改变，适者生存，违者止息。绝非少数人主观愿望所能更改。

中国历史见于文字记载已历四千余年，历代鼎革形式不一而足：或禅让篡弒（尧舜禹的传说）；或征诛相伐，其间统一与分裂交互发生，战争不息。要而言之：长期以奴役制度（农奴与工奴）为主，以贵役贱，以富役贫，产生等级制度与门阀思想，可谓万变不离其宗。与奴役制度平行、势所必至者，乃发生反抗运动，民众运动起于不平。如火炎上，如水决堤，历代鼎革，遂不可避免，无论任何强力与压制，绝难制止，于是乃有改朝换代之事，循环不止！

中国数千年“相砍”的历史，形成一种反动的旧史观，旧史观乃

由皇权神圣，万世一系，“受命于天，奉天承运”，神器至上等正统观念所构成。所谓正统与儒家的宗法思想，同理学的道统观念一脉相通。它把纲常名教、忠君守节等奴隶思想强加于人，根深蒂固，遂成痼习。所以旧史学阿谀专制，崇拜偶像，以此相尚，人民违之者则遭受迫害，诬为“叛逆”，称为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

自两汉以来，历代史官均祖述班马，奉为圭臬，视同金科玉律。翻开二十四史所歌颂咏叹者均属帝王将相，至于后妃宫妾，外戚宦官，官僚地主，富商巨贾，以及食客、鹰犬之徒，对于统治阶级及其附庸厮养不惜大书特书，津津乐道，连篇累牍，是非颠倒，黑白混淆。如此史书，实属玷辱人类尊严，无以复加。

按照上述论证，可知吾人对于“圣贤经传”必需从其时代与地域加以分析和批评，都应本新史学精神去观察理解和估价。

因此，如建立新史观，首先在于破除中国二十四史的陈规旧套，肃清历代御用史官之一切陈词滥调。与此同时，又必需建立新的历史观点，也就是说建立以人民群众为历史中心的观点，遵照新史观重写当代历史、批判古代历史，使历史还其本来面目。按照新史观写述历史，具体要求有以下诸事：

1. 废除两千年来一脉相承的历史正统论：成王败寇；

2. 泯灭过去正史与野史的分界；

3. 是非善恶一本于群体的至公大正的精神；

4. 历史题材主要内容着重治与被治、贵与贱、富与贫、诸阶层间的奴役关系；

5. 记载以人民的创造进化为中心，强调国民经济、技艺、创造与发明。

曦园同人为集思广益起见，还共同商订了一个读书计划，将世界学术名著逐一加以浏览；同时又由于个人研究兴趣有所互异与外文阅读能力的差别，各成员又自订读书计划与研究专题，二者互

为补充，有相得益彰之效。

曦园同人鉴于当代欧美出版之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书刊典籍虽浩繁，但其中译成中文者为数有限。于是同学们加强外语学习，并着手从事原本翻译工作。我当时选定康德哲学与西方宗教问题等为定期目标。康德为近代世界著名学者，学问道德素为西方所崇仰。康德于一八七四年十一月受到东普鲁士国王手谕谴责。其一生言行触犯时讳，尤为可同情。当时北大图书馆馆藏德文书籍丰富，阅览方便。浏览所及，见到康德著作有《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逻辑学》，均属第一流名著。为更进一步探索康德学术思想，我和北大同学商承祖共同商议着手从事翻译康德几种主要著作，拟从译述过程中透彻了解康德全部思想体系。我们入手的方法是先阅读与译述康德传记，然后译述其他主要著作。关于康德生平原著，德国出版界流行极广，堪称浩繁，其中富尔伦德（K. Vorlander）所著实为当代善本。译写过程遵循“信、达、雅”三原则进行。首先二人各自阅读原著，每日十页为度；其次交换阅读初译稿，遇有疑义共同提出，互相研究讨论，务求不失原意。待双方大致取得一致，然后作为改正稿。第二阶段工作经过时间较长，两人反复商讨，期于至当，无误为止。最后交由我执笔整理全稿，修饰润色，字斟句酌。前后费时一个多学期，全书方告完成，后由北大校长出函介绍，委托上海中华书局哲学丛书委员会排印出版。这部《康德传》自一九二二年二月初起，连续重版多次，为当时国内《康德传》中文本唯一译著。

康德著书，哲理幽奥，文笔高深，素称难解。其中有些语句虽心知其意，却极难表达。因此我们在译述时往往遇到困难。记得英马奴埃·康德曾有下列名句：“有两种事物充满心灵中，如果持续的去思索便觉得不断地惊异，这就是在我头上星辰密布的天空和内心的道德规律。”（引自《康德传》末章语）上述简短格言与警句

原意颇不易表达，我们二人斟酌损益，易稿数次，经时既久，始获定稿，举此为例，可见一斑！

继《康德传》出版后，我曾选译赫克尔《宇宙之谜》(Haekl: Welt Rätel)，同时又选译 Goete Faust与 Storm: Immsee 稿存箧中，因人事殷繁，均未及整理出版。

我与商承祖，共同从事译著工作，前后经历数载。承祖字章孙，原系北方人，其父宦游广州，故寄籍番禺，但不谙粤语。其父商衍鎏为清朝探花，曾出使德国。章孙幼年随父母出国，就读于柏林大学，辛亥回国，后转学北京大学德文系。他在北大毕业后，赴德国汉堡大学担任汉文教授，前后三年，回国后任南京大学教授兼德语教研室主任，译著德国文学书籍多种。

曦园生活于一九二〇年七月结束，曦园存在时间约一年左右。虽然时间短促，但对于我个人思想洗濯，生活磨炼，却有不少收获，如建立新史学，否定宗教，对新型革命思想的酝酿，颇有影响。

在曦园结束后，我迁入北大西斋居住，转入新的学习与实践。之后，我们的生活逐渐从纯书斋转入到产业工人群众中去，即深入中国工农兵群众而开展新的革命活动，前后达十五年之久。

六、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五四”运动大大地触动了学术界、思想界。“五四”运动的结束，意味着轰轰烈烈的革命告一段落，大家也想进一步研究学问。于是，以“五四”运动中的核心小组部分成员为基础，成立了曦园这一生活团体，大家在科学领域中广采博收，其中一些人逐渐转向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而又不满足于原来过于广博的研讨方式，于是我们一些人开始酝酿新的组织形式，我们直接取名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是一些更为志同道合，倾心十月革命道路的人的结合。酝酿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也促成了曦园的解体。当然曦园的解散，还由于一些高年级同学已经毕业离校等其他因素。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开始是一种秘密团体，因为当时社会上嫉视马克思主义，认为它主张“过激”，形同“洪水猛兽”。在我们对此还未深入研究时，为了不致引来不必要的干扰和非议，我们暂时保持秘密状态，更有利于会员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十月革命文献的研究。当然这时的组织形式仍是比较松散的，除了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阅读和译述外，还从事一些工人运动的实践。这个研究会的会员到一九二一年夏，发展为十九人，其中一些核心会员已成为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成员。学会设有书记二人，由王有德和我担任，我兼负学会对外联络责任。

有一次，研究会的成员在中央公园来今雨轩开会讨论会务，不少人感到研究会长期处于秘密组织状态，不能扩大影响，我们不能以学院式的研究来对待马克思主义，而应作为一种终身的事业，这

就更感人力物力的不足。持这种意见的会员，其中有一些已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了，而且已经从事工人运动实践很久了。但也有人担心，若要公开，会碰到一些问题，会受到一些阻力。经过反复商讨，最后大家决定公开，好在社会上争取合法地位，至少要在北大取得合法地位。只有公开，工作才能开展。为了减少阻力，我们进行了多方面的工作。校长办公室的秘书同我们很接近，还有《北大日刊》的一位编辑，他是蔡元培先生很信任的人，也表示同情我们。可以通过他们向校长办公室做工作，争取对我们的支持。蔡元培周围有些守旧的顽固派，他们当然会持反对态度，但蔡元培本人对学校新生力量有相当认识，做事颇有勇气。为争取蔡先生的支持，我们预先做了一些工作。蔡元培先生曾留学德国，中年以后还学外语，很好学。有一次他演讲，内容是批评宗教思想，主张以美育代替宗教。我们去给他做记录。他讲演的内容在理论上颇为深奥，我们事先预习了一些参考书，所以记录做得深入浅出，平实易解。送给他看时，他认为表达了他的本来意思，便对人讲："能记录到这种程度就算不错了！"因此，他对我们的印象很好。此后，我们就不断同他接触，希望得到他的赞助。

学会最后决定先在《北大日刊》上登一个启事，把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牌子打出去。记得启事的草稿曾几经修改，由我定稿后，大家推我和另一同学去找蔡元培先生，请他同意将启事登在《北大日刊》上。我向蔡先生陈词略云："中国二千年来学术思想界先后受儒、佛思想的影响甚大，时至今日，儒、佛思想已不能范围人心，行见新的思潮必将起而代之。"蔡先生颔首，我继续说："卡尔·马克思的学说在本质上运用，均有超越前人之处，我校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是试图对于革新思想界，做些促进工作。"我强调："凡事'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马克思学说今后对中国人行将发生不可估计和极深远的影响！"蔡先生详细阅看了启事和发起人的名

单，终于欣然同意，我们兴辞而出，同学们闻讯也喜形于色。下面即是登在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十七日的《北大日刊》上的启事原文：

北京大学发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启事

马克思学说在近代学术思想界底价值，用不着这里多说了。但是我们愿意研究他的同志，现在大家都觉得有两层缺憾：（一）关于这类著作博大渊深，便是他们德意志人，对此尚且有“皓首穷经”的感想。何况我们研究的时候，更加上一重或二重文字上的障碍，不消说，单独研究是件比较不甚容易完成的事业了。（二）搜集此项书籍，也是我们研究上的重要先务。但是现在图书馆简单的设备，实不能应我们的要求。个人藏书，因经济的限制，也是一样的贫乏。那么，关于书籍一项，也是个人没有解决的问题。

我们根据这两个要求，所以各人都觉得应有一个分工互助的共学组织，祛除事实上的困难。上年三月间便发起了这一个研究会。现在我们已有同志19人了。筹集了一百二十元的购书费，至少要购备《马克思全集》英、德、法三种文字的各一份。各书现已陆续寄到，并且马上就要找定一个事务所，可以供藏书、阅览、开会、讨论之用。我们的意思在凭着这个单纯的组织，渐次完成我们理想中应有的希望。

现在谨致意校内外的同志们，盼望你们热心的赞助，并欢迎你们加入共同研究。今将我们暂拟的几行规约写在下面：

一、本会叫做“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以研究关于马克思派的著述为目的。

二、对于马克思派学说研究有兴味的和愿意研究马氏学说的人，都可以做本会底会员。入会手续，由会员介绍或自己请愿，但须经会中认可。

三、研究的方法分四项：

1、搜集马氏学说底德、英、法、日、中文各种图书；

2、讨论会；

3、讲演会；

4、编译刊印《马克思全集》和其他有关的论文。

四、本会设书记二人，担任购置、管理和分配书籍事务。

五、会员有分担购置书籍费的义务。

六、本会书籍，会员得自由借阅，但须限期缴还。如会外人想借阅时，须经本会特别许可，并交纳保证金。

通讯处：（一）北京大学第一院王有德君

（二）北京大学西斋罗章龙君

发起人　高崇焕　王有德　邓中夏　罗章龙　吴汝铭

黄绍谷　王复生　黄日葵　李　骏　杨人杞

李梅羹　吴容沧　刘仁静　范鸿劼　宋天放

高尚德　何孟雄　朱务善　范齐韩

启事刊出后，报名者十分踊跃，同学辗转相嘱，国立八校同学亦争相报名，外地也有来信要求入会者。有鉴于此，我们又在《北大日刊》上发表启事云：不论何人，凡愿加入本会者，都可以接洽，外地可以通信联系。并增设李骏处为一新联络地点。

启事刊出后也引来一些非议，冷嘲热讽不乏其人，如某经学教授看后，对启事中的一句话，“皓首穷经”的典故，很不以为然。该教授在课堂上讥讪道：“儒家群经汗牛充栋，浩如烟海，马克思何许人？他写过几篇文字，值得‘皓首穷经’吗？”宋天放即席回答：“儒家十三经中孔子亲自写作的如《易经文言系辞》、《春秋》等，为数本来不多，这是人所共晓的事。马克思所著的《资本论》卷帙浩繁，博大精深，方之孔丘论著，有过之无不及，难道一般人都通晓吗？”某教授闻后，自觉失言，默然无以应。

蔡先生左右的人很有谋略，很能办事，但颇为保守。我们找蔡先生刊登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启事这件事，就没让他们知道。等到《北大日刊》将启事登出来以后，他们说："今后学校不得太平了。"

经月余，会员已增至四、五十人，学会准备借北大会议厅开成立大会，蔡先生也颔首许诺，还应我们的邀请，参加了成立大会，并在会上讲了话。会后，我们还共同照了像。我继任正式成立后的第一任书记。学会成立后，我又去找《北大日刊》的编辑，让他替学会致意校长，提出找一所房子作图书室和办公会址，希望学校对于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与其他学术团体一视同仁。该编辑应允后，先找到当时的总务长，试探性地了解一下房子问题，总务长表示犹豫说，如果此端一开，学校以后将穷于应付了。言外之意，即使有房子，也不愿拨给。干事会商量结果，决定还是由我出面去找校长本人交涉。我以研究会书记的名义去会见蔡先生，此事总务长事先已给蔡讲过了，蔡心里是明白的。一见面他就对我讲，你们的房子可请蒋总务长解决，与学校其他学会同等待遇。结果给了两间颇宽大的房子。房子应有设备齐全，火炉、用具都有，还派有工友值勤。事后，日刊编辑对我讲，这次你们碰上好运气了。蔡先生左右有人很不赞成此举，他们对学会是心怀敌意的，他们认为答应给房子事小，从此，北京大学将不得安宁了。但蔡告他们："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正因为要学校安宁，所以才要安置他们哩！"翌日，学会即搬进新址。从此以后，北京大学师生生活中政治风气和精神面貌渐渐改观了！从这件事可以看出，蔡元培先生确实是一个很有胆识、很有远见的教育家。

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公开征求会员时只有十九人，到年底开成立大会时，已有五十余人。

一九二二年初，我因忙于劳动组合书记部事，而辞去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具体事务，经过新会章的制定和改选，成立了黄绍

谷、范鸿劼和李骏等四人的新干事会。

与此同时，以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为基础，先后成立了北京大学党支部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成员中有少数北大印刷厂的工人，我兼任党支部书记，黄绍谷任团支部书记。以后，北京八校也逐渐建立了共产党和社青团的支部。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人名录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最初发起的十九人，绝大多数是北大学生，李守常先生是赞助的，他没有在启事上签名，但是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当然会员。

发起人名单没有一定的顺序，按签名先后排列，现将十九个发起人当时的情况略作介绍：

高崇焕：河北人，北大法学院学生，在“五四”运动中是活动分子，北大学生会的负责人之一。

王有德：云南少数民族学生，外貌有点象广西人（或是彝族）。他原来在昆明进过军事学校，毕业后当了个下级军官。当时他看了些进步杂志，不满现实，辞掉了军职来到北京念书。他绕道越南坐海船到上海再至北京，沿途千辛万苦，用完了所带的全部旅费。到北京后，他凭学识考取北大，但无钱入学，人生地疏。既没有熟人，语言也不通，处境十分困难。一天，蔡元培坐车外出开会，王在路上拦车。蔡初很惊愕，继见他模样很朴实，便问他有什么事？王说：“我是北大新生，想跟你说几句话没有机会。”蔡答：“那就另约个时间谈谈。”王有德回去后写了份“万言书”，介绍他自己的经历。蔡见他文采颇佳，很重视，问他有何要求，经王说明后，蔡说：“你到总务处报个名，以后每天上完课后，做一、两小时的工。”王有德想学德文，但没有基础，于是重新学起。王是中年人，诚实能干，我们大

家就帮助他的学习和生活。他在工作过程中入了党，在北方来说，他是少数民族中第一个党员。后来他搞工运工作，很勇敢，是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得力的工作者，起过很大的作用。

邓中夏：北大中文系学生。他父亲在日本留学回国后考取了法官，在司法部工作。当时我们很需要这方面的人，他对我们的工作有帮助。邓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早期成员之一，任平民教育讲演团主任。

吴汝铭：湖南长沙人，法学院学生，是第一个报名志愿到长辛店担任劳动补习学校教员的。这个工作很艰苦，并无薪资，他一直任劳任怨，坚持不懈。吴后来入了党，任长辛店支部的第一任书记，兼京汉铁路总工会秘书。

黄绍谷：当年是共青团北大支部负责人，是北大最早的团支部书记，后来入党。

王复生：云南人，学法文，是研究会法文组的组长。他在家乡时当过小学教员、校长，作过一段工作，后来到北大来念书。他曾在河内读书，所以法文学得很好，是北大法文班会的负责人，其弟儒廷。王氏兄弟号称“夜郎三王”①。

黄日葵：广西人，是我在上海遇见的日本回国学生之一，是研究会日文组的组长。他在日本学了三、四年，文章写得很好，后来入了党，做了不少工作。

李　骏：湖北人，英文系学生，英文很好，后来也是党员，参加翻译工作。

杨人杞：湖南人，任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教员。

李梅羹：北大德文班学生，原来是学医的，以医专学生的身份加入研究会，以后转入北大读书。后来到苏联，在第三国际东方大

---

① 夜郎即在今云南省地区；三王系指王复生、王德三和王有德。

学当翻译，是党员。

吴容沧：杭州人，坚持在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当教员，参加了许多次斗争，既勇敢，又机智，能吃苦耐劳，是党员。

刘仁静：湖北应城人，北大英文系学生，是党员，后任《先驱》主编。

范鸿劼：湖北鄂城人，北大英文班高才生，英文系学生会领导人之一。

宋天放：湖南浏阳人，德文班班会的负责人之一，为人忠诚，做了不少工作，是党员。

高尚德（君宇）：山西榆次人，北大英文班学生，原系山西太原学生联合会主席，文学院学生，是最早加入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成员，后来参加了“二七”大罢工。

何孟雄：湖南江华人，起初是北京工读互助团领导人之一，工读互助团有几十个人，这个团体带有无政府主义倾向。以后何到了北大，入了党。

朱务善：湖南澧县人，北大学生，平民教育讲演团团员。

范齐韩：北大法律系学生，湖南人。

上述十八人，加上我十九人，其中党、团员十六人。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先后发展的会员数字，说法不一。据我所知，曾前后统计过几次。第三次统计时有会员一百一十人；一九二二年第四次统计时有一百五十人；一九二三年“二七”前统计时有二百五十至三百人。以后我离开北京，可能又有些变化。解放后我找到一份记录有一百五十一人的名单。沧海遗珠，上述名单也是不完全的。兹将名单附后。

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发起人及部分会员名录

罗章龙（书记）	湖南浏阳	北京大学文学院
王有德（干事）	云南昆明	北大文学院
高崇焕	河　北	北大法学院
邓中夏	湖南宜章	北大文学院
吴汝铭	湖南长沙	北大文学院
黄绍谷（干事）	湖南岳阳	北大文学院
王复生	云南昆明	北大法文系
黄日葵	广西桂林	北大中文系
李　骏（干事）	湖　南	北大英文系
杨人杞	湖　北	北大旁听生
李梅羹	湖南浏阳	北大德文系
吴容沧	杭　州	长辛店
刘仁静	湖北应城	北大英文系
范鸿劼（干事）	湖　北	北大英文系
宋天放	湖南浏阳	北大德文系
高尚德（君宇）	山　西	北大英文系
何孟雄	湖南江华	工读互助团
朱务善	湖南常德	北大文学院
范齐韩	湖南宜章	北大文学院
李子洲	陕西榆林	北大文学院
李大钊	河北乐亭	北京大学
安体诚	河北丰润	天津法政学校
吴先瑞	湖南平乡	长沙一中
张人凤	河　北	平民学校
陈公博	广　东	北大文学院
彭礼和	湖南长沙	长沙联中
王　铮	台湾基隆	北大文学院
刘　恕	湖南长沙	清华大学
李宝成	济　南	津浦铁路工人
梁　成	广东江门	达士通讯社
梁鹏万	河北唐山	京奉铁路工人
邓　培	广东香山	京奉铁路工人
史文彬	山东济南	京汉铁路工人
张泰清	河　北张家口	京绥铁路工人
贺其颖	山西离石	太原中学
王仲一	山西太原	太原中学
许兴凯	河北大兴	高师
贺　闿	湖南邵阳	高师
蔡　牖	山　东	北洋大学
石评梅（女）	山　西	女高师
缪伯英（女）	湖南长沙	女高师
夏秀峰	湖南长沙	北京高工
萧镇湘	湖南醴陵	北京高工
舒大桢	湖南长沙	北大中文系
李鸿斌	河北滦州	唐山交通大学
许孝炎	江　苏	唐山交通大学
张剑鸣	河　南	唐山交通大学
许启元	江　苏	唐山交通大学
戴培元	河北任邱	河北大学
任开国	东　北	北京大学
郝　英（赤耳）	安徽阜阳	北大印厂
王儒廷	云南昭通	北大法文系
游　泳（天洋）	福　建	唐山交通大学

韩麟符	天　　津	南开中学
安幸生	河北沧州	天津中学
王瑞俊	山东莒县	济南中学
于方舟	河北静海	天津学联会
郭增昌	山西太原	保定军校
杨明斋	山东济南	教员
王忠秀	河北保定	北大文学院
王净尘	河北保定	北大文学院
辛璞田	河北天津	天津学联
辛克让	河北正定	石家庄中学
陈为人	湖南酃县	衡阳师范
姚佐唐	安徽桐城	津浦工人
王　璧	安徽安庆	徐州铁路工人
许鸿儒	江苏滁州	津浦铁路工人
葛树贵	河北良乡	长辛店铁路工人
林育南	湖　　北	武昌中学
施伯皋（洋）	湖北竹山	湖北法专
胡信之	山　　东	青岛日报
张隐韬	河北元氏	保定军官学校
刘少游	云南昆明	北大文学院
张兆丰	河北保定	河北讲武堂
戴朝震	湖南浏阳	北大法科
侯绍裘	江苏淞江	松江中学
恽代英	浙江湖州	武昌师范
白秀卿	河南洛阳	小学教师
魏野畴	陕西关中	北京高师
张昆弟	湖南益阳	第一师范
郭寿生	福　　建	烟台海军学校
李之龙	湖　　北	烟台海军学校
李求实	湖北汉口	武昌外语学校
许白昊	湖北汉阳	武昌工人夜校
谭平山	广　　东	北京大学文学院
茅延贞	安徽安庆	保定军官学校
王荷波	福建闽侯	浦镇铁路工人
马尚德	河南确山	河南开封师范
王克新	河南信阳	信阳中学
王新元	湖南长沙	上海交通大学
李树彝	湖南郴州	北大文学院
张树荣	湖南浏阳	北京法文专校
罗　汉	湖南浏阳	北京法文专校
陈延年	安徽怀宁	北京震旦大学
柯庆施	安徽歙县	芜湖中学
刘子倩	四川简阳	川东师范
李希逸	河北静海	北大文学院
董鸿猷	河北唐山	开滦煤矿
李渤海	山　　东	北大文学院
罗运磷	江西萍乡	北大理科
冯品毅	河　　南	北京高师
谢连清	台　　湾	厦门集美
高玉涵	安徽合肥	安徽中学教员
王右木	四川重庆	东京早大
李味农	安徽巢湖	安庆中学
赵醒侬	江西南昌	九江店员
张春木（太雷）	江苏常州	南开中学
谢怀龙（女）	浙江杭州	启秀女中
刘天章	陕西三原	三原中学
沈干城	浙江萧山	沪杭铁路工人
谭因甫（女）	湖南长沙	北大中文系
杨善南	湖南长沙	北京法政专校
陶永立	河北唐县	保定育德中学
高仁山	浙　　江	北大教授
江　浩	河北天津	众议院议员

李季达	四　　川	法文专科学校
孙云鹏	河北天津	正太铁路工人
孙津川	江苏江宁	沪宁铁路工人
李青山	山东潍县	胶济铁路工人
阮永钊	安徽芜湖	北大英文系
奚　贞（女）	上海浦东	北大英文系
郝克勤	河北沧县	北大印刷厂
王　力	奉天营口	大连报记者
徐名鸿	广东大埔	北京高师
凌芝藩	湖南湘阴	京汉郑州技术员
刘志丹	陕　　西	榆林中学
陈　毅（仲弘）	四　　川	省中法大学
王人旋	湖南浏阳	湖南第一联中
匡务逊	湖南邵阳	北京高师
吴　明	湖　　南	法文专修班
高语罕	安　　徽	芜湖中学教员
陈启修	四　　川	北大教授
李　季	湖南平江	北大文学院
刘孝恕	湖南浏阳	清华大学、麻省理工学院
耿白钊（丹）	湖　　北	武昌文华留英
邵振青（飘萍）	江　　苏	《京报》主编
贺　恕	湖南衡阳	第三师范
朱圣之（女）	湖　　南	衡阳师范
田波扬	湖南浏阳	民国大学
潘心源	湖南浏阳	民国大学
廖汉星	湖南衡阳	衡阳三师
彭泽湘	湖南岳阳	
孙光余（琅工）	湖南湘潭	北高师
李书渠（须除，伯刚）	武　　昌	武昌外语
杨锺健	陕　　西	北大理科
陈兴霸	湖南长沙	北大法科
周长宪	湖南长沙	北大法科
鲁士毅	浙　　江	北大理科
王力心	河南信阳	信阳师范
赵子健	湖　　北	扶轮学校教员
田奇瑛	湖　　南	北大理科
唐宏经	大　　连	铁路工人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那时我们已注意在工人中发展会员，在上述一百多人的名单中，就有二十五人是工人。如李宝成，津浦路工人；梁鹏万，京奉路工人；邓培，京奉路工人；史文彬，京汉路工人；张太清，京绥路工人；姚佐唐，津浦路工人；王璧，徐州铁路工人；许鸿儒，津浦路工人；葛树贵，长辛店工人；王荷波，浦镇工人；沈干城，沪杭路工人；孙云鹏，正太路工人；孙津川，沪宁路工人；李青山，胶济路工人，唐宏经，大连铁路工人等。他们主要是长辛店、唐山、

石家庄、郑州等大厂的工人。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活动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正式成立后，我们一面公开接纳会员，不断扩大这块阵地，一面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研究活动。一九二二年二月二日，我们发表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第三个通告。通告这样写道：

会员公鉴：

本会正式成立，已经一月有余。其间经过新旧两个年关，耽误日子不少。故仅仅只开过两次讨论会，一次纪念会。起初会员虽不足二十人，现在已增至六十三人了。

本会成立之时，都讲实用，不事虚文。所以简章未定，至今尚付阙如。惟经一月余试验的结果，每次开会，例必有新会员数人加入。因此书记又不能不每次将本会议决几条实用的办法，当众重述一次。书记固不胜麻烦，旧会员亦甚觉其讨厌。为免除这个困难起见，特详细通告于此，务希查照。

一、研究方法

（1）讨论会——每星期六晚七时开一次（准时开会，过时不候），先由会员一人述释该题之内容及其要点，然后付诸讨论。一次讨论不完，下次续之。

（2）讲演会——每月终开一次。暂时敦请名人学者担任讲演员，由书记负责接洽。俟本会研究确有成绩后，则完全自行担任。

（3）特别研究——完全由会员自动的自由组合，现已有了三个：

A. 劳动运动研究　由几个感觉此项知识之需要的

会员组成的。每星期三晚集会一次。

B.《共产党宣言》研究　由几个感觉西文程度不佳的会员组成的，采此书为教本。每星期一、四、五晚请会员一人教授之。

C.远东问题研究　材料分三种搜集，英文的、日文的、中文的。已在酝酿中，尚未开会。

以上三个小组会，任何会员皆可随时加入。

以后拟实行固定的分组研究如下：

第一组　唯物史观

第二组　阶级斗争

第三组　剩余价值

第四组　无产阶级专政及马克思预定共产主义完成的三个时期

第五组　社会主义史

第六组　晚近各种社会主义之比较及其批评

第七组　经济史及经济学史

第八组　俄国革命及其建设

第九组　布尔札维克党与第三国际共产党之研究

第十组　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各弱小民族掠夺之实况——特别注意于中国

但会员研究，选一组选三四组或全选皆可，只要力量来得及。请即来函认定，以便刻期着手实行，至要至要！

我们的研究活动得到了李守常先生以及北大一些进步教授、讲师的大力支持。一九二二年二月十九日下午，守常先生在北大第二院大礼堂给会员们作了马克思经济学说的讲演。这是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召开的第一次公开讲演会，参加的人除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会员外，还有许多尚未入会的人。他们都为守常先生的精

彩讲演所深深吸引，反响很强烈。此后，我们又多次组织这样的讲演会、纪念会，吸引更多的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也随之日渐发展、扩大起来。

学会的图书室，收藏中、外各种图书、报章，并于每日下午四时至八时开放（星期日在上午八时至十二时开放），供会员借阅。我记得一九二二年二月，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曾出一个通告，向会员报告此事。经查此报告登在《北大日刊》上原文如下：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通告（四）

（一九二二年二月十六日）

本会现已有西文书籍四十余种，中文书籍二十余种，兹报于下：

社会主义丛书

Communist Manifesto (Marx and Engels)

Socialism, Utopian and Science (Engels)

The Books on socialist Philosophy (Engels)

The Poverty of Philosophy (Marx)

The Origin of Family (Engels)

The infantile Sickness of Leftistien Communism (Lenin)

The Proletarian Revolution (Lenin)

共产党宣言　（陈望道译）

阶级斗争　（恽代英译）

马克思资本论入门　（李汉俊译）

马克思经济学说　（李达译）

社会主义史　（李季译）

社会问题详解　（李季译）

经济丛书

Wage Labour and Capital (Marx)

工钱、劳动与资本　(袁让译)

历史丛书

Revolution and Counter Revolution (Marx)

The 18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Marx)

The Civil War in France (Marx)

俄国问题丛书

劳农会之建设　(列宁著)

讨论进行计划书　(列宁著)

杂志报章

Soviet Russia　(苏维埃俄罗斯)

Asia　(亚细亚)

Weekly Review of the Far East　(米勒评论)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国际共产党)

大陆报　共产党　新青年　先驱　工人周刊　劳动周刊　济南劳动周刊　长沙劳工周刊　晨报　民国日报　时事新报　申报　广东群报　时事月刊　妇女声

以上各书，或系会有，或系私有，皆有符号，归众共览。尚有四、五会员出金购买一百四十元之英、德文书籍，当不久可到，并告。

当年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所进行的这些工作，是很有意义的，成绩也是不小的。它不仅扩大了我们的视野，丰富了我们的知识，更重要的是使我们进一步接受了马克思的革命思想，为后来开展革命斗争活动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骨干。随着革命事业的发展，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也逐步成为党的外围组织，不再是一个学术讨论团体，而是直接参预革命的行动组织了。而当年参加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绝大多数会员，后来都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在全国各地分别担任党、团领导工作或参加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为

党的事业做出了他们应有的贡献。学会的活动据说一直延续到一九二六年，不过，我早已离开北大，此后就不知其详了。

七、北京中共建党小组与社会主义青年团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这个名称，是后人起的。在过去，对内对外都没有用过这个名字，现在既然用惯了，为了称呼方便起见，我们还沿用这个名称。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范围在北京，北京区委则是稍后的事。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从五四运动以后，一些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青年学生，自发地组织起来，做些宣传、翻译工作，同时也有过一些行动。后来，组成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些工作，得到李守常先生的支持。我们经常聚集在守常先生的办公室里探讨一些有关理论和实践的问题。在这些谈话中，自然而然地涉及到需要建立一个更为严密的政治组织。我记得守常先生常提到：“我们应该组织起来，要吸收很多人，只有这样才能做一番事业。”许多同学向往俄国十月革命，向往俄共组织，也迫切想建立类似的组织。我们不止一次、也不止一个人，更不止在一个地方酝酿这个问题，但真正组织起小组，还是在一九二〇年五月，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到北京来，在李大钊办公室召集了几次座谈会之后。

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后，苏俄内部许多事情还没有就绪，远东还有白俄捣乱，赤塔政权还未解决，因此中俄关系没有解决，中俄之间尚无来往。

一九一九年三月第三国际成立，中俄也开始有了往来。共产国际是支持远东各国的民族革命运动的，同时俄国革命胜利后，处于帝国主义封锁包围之中，因此他们也需要找同盟军。于是一九二〇年五月第三国际的使者维金斯基偕译员杨明斋来到北京。

那时听说维金斯基来北京是经日本到中国的，又有人说他是直接来中国的。维金斯基来北京之后，首先见到了李大钊。

北京大学经五四运动以后，在国际上有了一些声望，当时欧洲一些国家，渐渐与北大有往来。一是图书的交换，二是北大的同学出国留学，只要由北大出一个证明，证明学习过什么课程，国外大学都承认有效，而其他学校则没有此种地位。

李大钊是北大教授兼图书馆馆长，他在当时写了不少水平很高、语言精彩的文章。《新青年》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数他的最多。他公开赞扬十月革命，是我国最早宣扬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因此，他在那时，就享有很高的名望。维金斯基到北大会见李大钊是很自然的事。

维金斯基访问李大钊也不是盲目而来，而是事先做了些准备工作。首先维金斯基了解到李大钊先生是赞成十月革命的。他同李大钊见面谈了一席话之后，便要求见见参加过“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的一些同学。这样大钊先生就找了几个同学和维金斯基见面。人数不多，其中有我和张国焘、李梅羹、刘仁静等。这些人后来都成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

我们同维金斯基见面的谈话会，是在图书馆举行的。会上，他首先介绍了十月革命。他还带来一些书刊，如《国际》、《震撼世界十日记》等。后者是位美国记者介绍十月革命的英文书。他为了便利不懂俄文的人也能看，所带的书，除俄文版外，还有英文、德文版本。维金斯基在会上还详细介绍了苏俄的各项政策、法令，如土地法令，工业、矿山、银行等收归国有的政策，工厂实行工人监督与

管理，苏俄国民经济最高委员会管理全国经济工作的制度，列宁提出的电气化的宏伟规划等。他还讲到苏俄在十月革命胜利后，面临种种困难，为了解决困难，不得不临时实行军事共产主义、余粮征集制等等。这次谈话内容相当广泛。当时我们很想了解十月革命，了解革命后的俄国，他谈的这些情况，使我们耳目一新，大家非常感兴趣。这就使我们对苏维埃制度从政治、经济、军事到文化都有了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看到了一个新型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轮廓。

维金斯基这个人工作很细致。他来了之后，除了开座谈会，介绍苏俄情况，了解中国情况之外，还找人个别谈话。通过个别谈话，可以了解座谈会上不易得到的情况。他是一个有知识，有工作经验的人，对大家提出的问题，回答得恰如其分。他的英文德文很好，能用英语直接与同学谈话。他对中国的历史，中国的问题颇有研究。关于五四运动，他问得很详细；对帝国主义和中国军阀相互勾结的情况看得也清楚；对五四运动，辛亥革命以前我国的历史也很熟。他同李大钊先生谈得很融洽，对李大钊先生评价很高。他在座谈会上曾暗示说，你们在座的同学参加了五四运动，又在研究马克思学说，你们都是当前中国革命需要的人才。他勉励在座的人，要好好学习，要了解苏俄十月革命，正因如此，中国应有一个象俄国共产党那样的组织。我们认为他谈的这些话，很符合我们的心愿。我个人体会，通过他的谈话，使我们对十月革命，对苏维埃制度，对世界革命都有信心了。

维金斯基住在东城王府井外国公寓处。进行几次座谈后，又邀约我到他的寓所谈过两次。我们谈话是漫谈性质，主要是了解个人学习、工作情况，涉及面也很广泛。有一次谈话我记得比较清楚。当我坐下之后，他象谈家常一样，问我，“你是哪里人？”我说：“我是湖南人。”他找了张地图看了看，说：“这离北京很远吧！”他还

说："你们同学中间，南方人不少，家离这里都很远。"然后他又问，你们是如何学习的，从前读过一些什么书，现在在读什么书，学校里现在教些什么，学些什么？我就把学习的情况，看过的书刊，一一同他谈了。同时把我们学习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也跟他说了。我说，现在我们学习的书很少。他就把北大地址、个人名字及通讯处都记下来，并答应回去以后寄些读物来。此外，他还同我谈了一些青年的理想、前途等问题。他还说，俄国在革命以前是非常落后的。维金斯基是学经济统计的，他对苏俄国民经济发展的有关数字记得很清楚，谈话时列出数字说明革命胜利后工农业生产的增长。他说这些成就的取得主要是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从这次谈话中，我了解到维金斯基十月革命前在美国学习多年，研究政治经济学，学习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对美国工人运动研究也很全面，后又游学欧洲。维金斯基年纪四十开外，文质彬彬，学者风度，在谈话中，他表示来华前，对中国问题曾作过研究，特别是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他很关心中国革命的发展。从他的谈话中可以看出他确实阅读了不少有关中国问题的书籍。他曾谈到义和团和同盟会主要人物的思想及活动等，又询问五四运动以来北大学生运动的情况，从《新青年》杂志起旁及北大内部教员、学生的思想情况。通过与他谈话，我感到维金斯基是一个学问渊博、思想革命的人。他还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作了详尽介绍。在两人漫谈间，维金斯基强调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他谈到中俄两国的国情，从过去及展望未来，说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他说帝俄时代俄国经济比西欧落后五十年到一百年，工业生产尤为落后，汽车、拖拉机、飞机、电气设备都不能制造。钢铁工业的产量比美国落后七倍，比德国少三倍，燃料比美国少十七倍，比英国少十倍。外国资本占全俄一半，外资工业占百分之五十以上，外国银行占全俄金融资本三分之一。当前追赶上去的唯一办法，就是采

用社会主义革命。俄国十月革命正在开辟一条新的道路。

他谈话辩才横溢，感情奔放。他的说理内容切实、新颖、动人。他的一席话，使我在政治方面的视野与过去显然不同了。我们憧憬共产主义革命的远景，更是看得真切，一往无前了。

在他离京前，我们召开了一次会，会议地点在北大图书馆办公室。这个会可说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正式成立大会，他以第三国际代表身份亲临小组参加会议，是相当肃穆的。他在会上作了讲话，说他的访问是双方共同的需要，说参加座谈会的人都是信仰共产主义的中坚分子，拥护十月革命，积极参加当前革命斗争的先进分子，同意应邀参加座谈会的人是共产党员，并表示要向共产国际汇报。守常在会上简明致词，感谢第三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关怀。还说：我们这些人只是几颗革命种子，以后要好好耕作，把种子栽培起来，将来是一定会有收获的。之后，他还赠送了一些书籍刊物作为礼物。他行前与我重谈了一次话，主要是有关双方联系的事。我们后来源源收到从国外寄来的外文书刊。他在北京工作结束后，由守常写信介绍到上海，是作为北京小组写信给上海的。他决定离开北京，转往上海访问，临行时对我说："我们谈话很有意义，不是'老生常谈'，不久的将来会有重要结果。"连称"此行成功。后会有期！"握手道别而去。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最初的成员有：李大钊、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李梅羹等人。后来加入的有邓中夏、高君宇（即尚德）、范鸿劼、缪伯英、吴汝铭、王仲一、宋天放等。当时我们已明确几点：第一，我们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第二，我们是拥护俄国十月革命的；第三，我们是要搞工人运动的。在这三点上，我们与无政府主义的看法有根本的不同。

当时，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中的中坚分子，参加过工人运动的，后来都成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以后工人党员渐渐增加了。

当时的工作没有严格的分工，主要是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工人运动。大家推守常作为小组领导人，其他人遇到什么工作做什么工作。后来工作渐渐发展，开始有了简单分工。张国焘主持组织、交际；邓中夏主持学生、青年与共青团工作；我负责宣传，主编《工人周刊》，兼管北方工人运动。刘仁静主要搞翻译工作，当时彼此分工界线不明显，可以说是既分工又合作。

北京大学社会主义青年团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的一件大事，是成立北京大学社会主义青年团。

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仿效苏俄共青团在青年中建立的组织。当时，少共国际有位代表格林(Green)继维金斯基之后来到北京，他原是莫斯科共青团的书记，他的到来使北大社青团和少共国际建立了联系。

青年团员的年龄应比党员小一些，但那时青年团没有年龄限制，因大学毕业一般是二十五、六岁。李大钊和我们都是团员。

北京大学社会主义青年团约在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前后成立。一九二一年三月十六日统计团员有四十七人，月底团员增加到五十多人。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活动是由共产主义小组决定的。开会地点经常借用二院校长办公室(当时叫会议室)开会。我主持了首次成立大会。会议的议程包括：报告筹备经过和讨论章程，章程是以少共国际转来的青年团章程为蓝本的。最后选举了团的委员会。会议进行得简短顺利，就这样开始了团的工作。大致每隔一月开一次全会。

大约在第三次大会后，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在我们开会时，混进了一个名叫关谦的谍报员，他是北京军阀政府步军统领衙

门派来的。并在次日就把会上情况呈报给步军统领王怀庆了。他在北大社青团组织中，活动了很长时间。这是事隔多年之后，从敌伪档案中发现的，倒是十分有趣，给我们保留了当年北大社青团活动的一鳞半爪。尽管关谦不可能悉知当时社青团活动的内幕，但援引他的报告，也可略知当年的情况。

关于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
活动情形致王怀庆报告

为报告事：窃三月十六日早，由陈德荣电招，谦于下午二时到北大第二院共产主义青年团会议。谦此为第一次到青年团大会，须有二团员介绍，故谦于一时到陈德荣处，约王伯时同往。适值无政府党陈廷璠、黄兼生、陈友琴、邰光典等在座，讨论将来统一会议之通知书，订期八月十号至二十号在汉口或广东召集，以便合力进行，谦亦签名"伊知"。发起人又议如何联合或攻击陈独秀之方法，因独秀与广东无政府党势同仇敌，每日在广东《群报》(青年团报)与《晨报》(互助团报)两相攻击，然独秀又来函至京，甚为和蔼，联络凌霜、廷璠等人，议决由北京方面去书独秀，劝勿自相伤斗，总以协力推倒现政府为要，如其再事反对，则进为排斥也。因阅广东报论说，遂延至二时四十分，谦方与廷璠、德荣、伯时同到青年团会议。查是日到会者共二十四人，探知其姓名者如罗章龙、李一志、徐六几、张作陶、顾文仪、徐文义、郭文华、宋价、何孟雄及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廷璠、伯时、德荣。由书记报告：俄国少年共产党人格林现年不过二十岁，住天津，时来北京，住灯市口十二号，已来京两星期之久，今来函陈述赴津有事，不克莅会，惟希望我们即日选出赴世界少年共产党大会代表，此次会期为四月二十五日，会址柏林，总机关或在莫斯科分处，说明川资由伊代垫云云。查期限已近，此次会议最关紧要，将来国际间运动与信用，是吾人必须

参加，愿望今日同人，以投票式慎重公推一人为北京代表，随同格林齐往。于是以何孟雄多票当选。随即建议临时设一审查委员会，以五人组织之，专收此次各同志对于赴会之意见书，并审查将来赴会提议各案事。谦于选举时，并未投票，因未知各人之名。遂于事毕由德荣起立介绍，谓谦热心改造之好同志，请众赞成入会后，谦谓连日病魔，今日不克多发言论。甚歉！唯声明愿牺牲一切，以追随诸君之骥尾，建设新社会之义务云云。后各人稍有议论，当即散会。预定收齐意见书再作饯行之大会云云。……兹将经过情形呈请

堂宪大人钧鉴

关　谦　谨呈

中华民国十年三月十七日

从关谦的谍报中，看出这个密探是骗取了个别团员的信任，才混入团内进行活动的。当年团组织的一些重要文件及会议情况都被他窃去了。

在关谦呈王怀庆的报告中，附有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致国际少年共产党大会书一份。其全文如下：

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致

国际少年共产党大会书

（1921年3月）

诸位同志们：因为交通上的阻碍，竟把远东和社会主义者运动的国际中心隔离，所以我们久想和世界具有革命精神的青年联络，但未能如愿以偿。自从接读国际少年共产党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格林君的信，我们在三月十六日召集了一个特别会议，并决定派代表出席这个会议，但是在中国还没有一个中国青年社会主义者的总会，所以我们的代表只有发言权无表决权。

我们的青年团成立只有四个月，现有团员已过半百之数，但我们相信，我们的团体将来必然发达得很快。

我们的报告将用种种的可能的方法，送达国际少年共产党的总局或东方局。

国际少年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之主义——万岁！

北京青年团上

三月底，我们召开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第四次大会，商议成立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一事。开会的情况也被关谦窃走了。他在四月二日给北洋政府步军统领的报告中说：

为报告事：窃于三月三十日下午一时三十分钟，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北大第二院开第四次大会。查是日到会者共二十五人，探知其姓名者，有李大钊、罗章龙、张国焘、刘仁静、高尚德、宋价、顾文萃、王伯时、郭〔郑〕振铎、徐六几、张作陶、陈德荣、李一志、顾文仪、徐文义、郭文华等。首由书记张国焘报告：在三月十六日以前，共计会员四十七人，现又加入八人，共计五十五人。但内中已有出京者七人。这几日极力设法筹经费，今由会员所缴来之款及特别捐等，共得现洋九十六元五角，并陈述料理何孟雄出发种种手续。次由李大钊、顾文萃提议，本团事务日渐纷繁，实际上发达得亦很快，所以应极急进行的手续，势必多起，兹拟设立一个事务所及筹备油印机，使总机关成立，以利办理。随付表决，多数赞成。事务所由调查股极力寻找，而油印机由李大钊、顾文萃担任筹借。惟会计刘仁静发言，谓设立事务所必添设什物，经济上应请各同志设法特别捐助云云。再由团员张君临时动议，将本团旧有之四股制及委员制，改正为执行委员会，设置委员十一人，分书记一人，会计一人，组织三人，教育三人，出版三人，并说明改组之理由：（一）旧有之四部制及委员制，有互无关连之弊。（二）将来本团人数增加，势必不能人

人俱负事务上之责任，或因此影响本团精神。若改行执行委员会制，则可以免此二弊，况同志皆系负责者，有事时自可随时分担职务等语。即付讨论，大多数同意，当即投票改选。公推张国焘为书记委员；刘仁静为会计委员，顾文萃、高尚德、祁某为组织委员；宋价、王伯时、某为教育委员；李大钊、郑振铎、某为出版委员。并议决：每星期执行委员会集议一次，大会每月一次。又由陈德荣提议，谓昨接同志李茂来函，谓本团象少爷式的平民集合，试思此语极是，欲救此弊，便须多介绍工人、中学生入团云云。公议赞成。至于如何向全国中学生及工人宣传，请同志发意见书，由大会决择。并公议办理同志赴俄调查及赴俄留学事；筹经费及造预算，事务所问题，因组织改变，须修改章程等事，统归执行委员会斟酌办理后报告大会。议至四时十五分始散。谦连日到无政府党人处，探悉该党近日并无特别议案，但各人拟半月刊出版底稿而已，前日有上海无政府同志张秀书、邹进二人来京，谓由上海方面派赴俄调查，随后一星期内尚有同志二人北上云云。查该二人准于一日晚由京出发。并由陈德荣转来汉口萧俊章来函，报告抵汉后之进行及请助资事，原函抄呈〔略〕。谦又觅得青年团代表何孟雄带交国际少年共产党书，原函译呈。以上均数日经过情形，合亟报告。按各方面进行，日见紧急，至于如何联络资助等情，以便窥其全豹，而易进行之处，恭请核夺施行。呈请

堂宪大人钧鉴

关　谦　谨呈

四月六日和二十四日，我们又开会研究开展纪念“五一”活动的事情。关谦探知后，也把这两次会议的情况于四月八日和二十五日先后都给北洋政府步军统领写了报告。他的报告是这样写的：

关于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筹备“五一”活动等事项报告

为报告事：兹探得共产主义青年团于四月六日在北大第一院开执行委员会，所讨论之事有六：(一)筹备五一运动，使群众游行，为劳动大会以作平民自决之始。(二)筹备五一运动时，刊行一、二种小册子，征求团员文稿，以为社会运动之文化品。(三)讨论委托团员分任职务问题。(四)调查北京之平民学校及平民讲演所，并设法使变为社会主义化。(五)印刷及其他工人组织问题，以便鼓吹工党联盟，要挟资本家。(六)讲演会之筹备及如何研究主义等事。……合亟报告。呈请

堂宪大人钧鉴

关　谦　谨呈　四月八日

关于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五次大会情形报告

为报告事：窃于四月二十四日下午二时，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北大第二院开第五次大会。查是日出席者十六人：李大钊、王伯时、谌小岑、王永禄、易道尊、王复生、张国焘、高尚德、祁大鹏、宋价、刘仁静、罗章龙，不知姓名三人及谦等。首由书记张国焘报告前三次执行委员会所议决之事：(一)修改章程，请大会通过。(二)“五一”运动已付印一种小册子，定名“五一日”，二千本；又一种明信片式之纪念品乙千张，皆于三十日前分散工厂。又一种简明宣言传单，注重工人每日作工八小时，星期停工，仍支薪金，鼓吹抵抗资本家，要求加薪，于五月一日散发各处。(三)会址因无适宜之处，暂设于平民讲演所内，以便办公。(四)陈述前次国焘与李实赴津，联合该津会，亦拟于五一日发布传单；及到唐山，此处本无青年团，经伊等联

络工业学生① 数名，从事组织，并于五一日由京派代表及印刷品助辅进行，谓该处工人俱粤民，较易传播也。（五）宣告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同志来函，拟于五月一日开工团成立大会，是日招集工人演讲游行，请京派多数同志莅会帮助云云。次由会计刘仁静报告：收支数目尚余十七元二角，随即讨论。何孟雄来函，谓在满洲里京、沪、津赴俄同志十三人被拘，转解于黑龙江陆军监狱，已十余日，饱受痛苦，因伊有格林介绍赴莫斯科书，故只好承认赴俄考查教育，请设法向学务局或本校去电证明释放。当由书记发言：幸未被搜出本团证书及致大会书，“因该件缝在棉衣内，大半由格林带去”，尚易营救，此次是同人公推他去，现在被捕，理应尽力请公决办法。即由李大钊云：接各处来函，皆说上海代表自认过激，以致招祸，而学务局及本校事前未发证书、护照，此种彩色断然不允援救，且时隔多日，恐更有不便。兹有黑省友人熟识督署，托为设法，料有八九成功。惟昨与之预算，往返交际等费，至少所需三百元，再加孟雄回资，合计四百元应用，请公决如何募捐。当议由到会人先行认出特别捐，有李大钊签十元，张国焘、刘仁静各五元，高尚德及谦各四元，其余各捐一、二、三元不等，共计筹得四十九元；则所差尚多，拟再以分担法，每团员二元，除出京十数人，预得一百元；其不敷之数，李大钊提议向北京方面无政府党筹负小半数，“因该党亦有刘仲容、刘稀、孟知眠三人被捕”，附带代为设法；其余之数，再由热心同志分头募捐，李大钊担认总包足此数，并于未筹足以前，由伊垫办，以促救出。又议设“五一”运动委员会，推选法即：举出七人，如王永禄、罗章龙、王复生、高某等，先期设法联络北大印刷工人及各校役，财政部印刷工人，同文、新社会、国京各报工人，在北大“五一”以前集合，帮助其游行运动劝诱及派传单，预备印刷品或国旗，担任散布；并选出三人赴长辛店，及二人赴唐山，协助进行，所有各

① 指唐山路矿工业学校的学生。

费，由会计发通知，征收四、五、六月份各团员常费及请特别捐；并请各团员于三日内拟运动法之意见书，七日内交常费及特别捐等事。……合亟报告。

呈请堂宪大人钧鉴

关　谦　谨呈

关谦谍报中提到何孟雄被囚，确有其事。先是格林来华还负有邀请中国青年团参加少共国际大会的使命，当时还没有全国性的团组织，于是指定一些青年团体选派代表列席。北大社青团选派何孟雄为出席代表，北方还有一些青年代表，如王铮等人，一行十多人，大部为青年学生，年长的不过二十四、五岁，年轻的只有十五、六岁。他们初次出国，非常兴奋，沿路高谈阔论，更无秘密工作经验可言，也不熟悉北方语言和东北生活习惯。以致引起地方军警的注意，当他们一到满洲里时，就全体被捕。

何孟雄等在黑龙江被捕后，当地督军孙烈臣极为重视，亲自审问。孙系行伍出身，质朴无文。我们的同志在审讯中据理力争，庄谐并出，使孙非常难堪，遂延未结案。

自我们接到了何孟雄由黑龙江狱中的来信后，了解到他们被捕的经过和狱中生活。虽然已是早春天气，北满一带仍是风雪载途，严寒铺地，狱中困难极多。我们乃先寄去寒衣、食物和药品等，鼓励他们坚持下去；同时筹款托人向黑龙江当局疏通转圜。何孟雄已是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员，我亦向北大校方请求出面营救孟雄出狱，得到校长首肯，嘱我代拟电稿，说明案情原由，并经他审阅后，由学校拍发。经一段时日后，得到黑龙江同意开释的复电。于是我们又派人持北大公函前往东北办理觅保手续，将他们领回，此案遂告结束。据督署办案人宣称："咱衙门向来是'捉贼容易放贼难'！这次算京师大学堂有面子，一切免究。这重大案子就轻易处理了。今后难免还要打交道哩！"

何孟雄等一行回京后，风尘满面虮虱遍体，但精神还饱满。孟雄说："此次坐牢，殊出意外，但机会难得，确也增长了不少见识。"自此，孟雄起用笔名"江囚"，意指曾作过黑龙江的囚徒。我为此曾赋诗赠他以纪其事，诗为：

闻道邻邦洚水流，
网罗冲决压神州！
少年意气峥嵘志，
万里龙江作楚囚！

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初期，也容纳有其他社会主义派别的青年和无政府主义者参加。因为当时的青年中，信仰空想社会主义、信仰英国基尔特社会主义的人，为数不少，有的则是无政府主义者。但这些青年，在反帝、反封建、反复辟、反孔等重要问题上，与我们是有共同点的。在党成立以前有些活动就是联合进行的，如："五四"运动中，我们就曾并肩战斗过。对于信仰无政府主义的青年来说，其中以北京大学学生为主。他们提倡"互助"、"泛劳动"；他们对统治阶级、军阀是仇视的，主张采取激烈行动。但他们反对阶级斗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而他们周围也团结了一些人。我们认为，在这派人中，有部分人是可以争取到我们阵营中来的，争取的策略是多做些细致的工作，有的确被争取过来了，如工读互助团的何孟雄、罗海潮、吴容沧、张树荣等人。为争取他们，双方进行过多次辩论，最后他们同意了我们的观点，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当时对于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要求并不是很严格，因为入党没有候补期，往往是先入团，经过一段时期考察再根据表现吸收入党，年龄限制也不严格，李大钊和我们一样都参加团的活动，所以，在一段时期中，团成为党的预备队伍，许多同志都是先吸收入团，经过一段实践考察后才转为党员的。

八、“亢慕义斋”及其活动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后，由于得到校方的支持，学校拨出西斋宿舍中两间宽敞的房子，作为学会的活动场所。这套房子，我们都亲切地称它为“亢慕义斋”，其中“亢慕义”① 是德文译音，全文意思是“共产主义小室”(Das Kammunistsches Zimmer)，对内习惯用“亢慕义斋”或“亢斋”，我们的图书、资料以及对外发出公告，都是用的“亢慕义斋图书”印记（北京大学图书馆现在还保存着六十年前珍藏下来的盖有“亢慕义斋图书”图章② 的德文书八册）。这些图书一部分是由北大图书馆购进转给学会的，大部分则是第三国际代表东来后，陆续由第三国际及其出版机构提供的。

“亢慕义斋”，既是图书室又是翻译室，还做学会办公室，党支部与青年团和其它一些革命团体常在这里集会活动。“亢斋”的地址在景山东街第二院，地名“马神庙”，又叫“公主府”，同校长办公室相距不远，有校警站岗，闲杂人等不得入内。它在校内是公开的。有一个时期守常常到这里工作。

---

① 当年对“亢慕义”进行汉语译音时，曾借重于古汉语的释义。按：《周易》乾卦，爻辞云：“亢龙有悔”，历代注释者自东汉郑玄、唐孔颖达，到南宋朱熹等均释“亢”为“极”、“穷高”、“亢阳之至、大而极盛”等义。《周易》文言传云：“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综言之，“亢”乃“盈、高、穷、极”之义，即吾人理想的最高境界，极高明而致幽远的境界，故称为“亢斋”。

② 亢斋图书室成立后公推我和天放等主持图书的征集和对外联系，以及图书的编目、出纳等事务。当时由我设计，天放自刻“亢慕义斋图书”章一枚，图章正方形长宽各 32 毫米，篆文六字左右直列分二行，每行三字。天放素善治印，篆文简朴，线条清晰，六十年后犹可想见其治印风格。

“亢斋”室内墙壁正中挂有马克思像，像的两边贴有一副对联：“出研究室入监狱，南方兼有北方强”，还有两个口号：“不破不立，不立不破”；四壁贴有革命诗歌、箴语、格言等，气氛庄严、热烈。自分得房子后，大家欢腾雀跃，连日聚会。守常也和大家一起朗诵诗歌，表示庆祝，亢斋同人如贺天健、宋天放和我都写诗纪念。

对联“出研究室入监狱，南方兼有北方强”是宋天放的手书，取自独秀和守常的诗句。上联意指搞科学研究和干革命，革命是准备坐监牢的；下联“南方兼有北方强”，意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里，有南方人，有北方人，守常称南方人为南方之强，我们则誉守常等为北方之强，南方之强又加上北方之强，表示南北同志团结互助，同心一德。这副对联概括了当时学会生活奋发图强的精神。

“亢斋”中“不破不立”“不立不破”的口号，反映了北京大学校内的斗争。当时的北大，是新旧思想矛盾集中的地方，一方面代表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如日方升；另一方面，守旧、复古思想其势犹炽，唯心主义、宗教思想也相当活跃。北大开唯心论的课，听的人不少，学生中研究印度佛经和老聃、庄子思想的人也很多，许多留日、留英、留美的先生们，也把西洋资产阶级反动思想贩运到中国来，可说是五花八门，样样货色都有。蔡元培当时的思想是居中偏左的，对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人怀有好感。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不把马克思学说立起来，就无法破对方，不破对方，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也打不起来。为了开展思想意识形态的斗争，我们努力翻译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宣传马克思主义。当时也有有利条件，蔡元培先生很强调学习外语，课程安排上，外语比重相当大，有英、德、法、日、俄、西班牙语以及拉丁文，印度梵文等七、八种之多，都开了班。我们亢斋的翻译组就是吸收这些外语系的同学，计有三、四十人，其中德语有十来人，英语二十多人，俄语四、五人，法语五、六人，日语也有一些人。此外，还有老师辅导我们。

开始，我们翻译了《共产党宣言》和《震撼世界十日记》，还翻译了一些宣传唯物论、进化论的西方科学书籍。这些书当时可以印行，在我们也是个练习过程，锻炼和提高了我们的外文基础和翻译技术。以后，慢慢翻译马克思的著作和十月革命以后的书籍。前后规划有二十种，陆续译成付印，一九二三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根据人民出版社通告（广州昌兴新街二十八号），该社编译社会主义新书和重版书籍共计四十八种，其中标明康明尼斯特丛书十种，列宁全书十四种，均系亢慕义斋翻译任务。又马克思全书十四种，是亢慕义斋与上海、广州同志分任编译的，书中编译者大都用笔名，其他九种亦同。

我兼任德文翻译组长，蔡校长对德文组非常关心，他曾在德国莱比锡(Leipzig)大学修习哲学、历史、美学、文学等课程，他刻苦学习，成绩优秀。回国出任北大校长时，在北大设立了德语系。他对德文翻译极感兴趣，我们最先翻译的一本书是《英马鲁埃·康德传》，接着我们翻译了《共产党宣言》，以后又试译《资本论》。对于翻译我们提出三个标准，即：信、达、雅。信是忠于原著；达，即要用中文通畅地表达出来；雅，还要有文采，要讲究语言修辞。我们德文组先后翻译了《马克思传》、《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第一卷初稿，我参加了这些工作，并为执笔人。《共产党宣言》原著理论深邃，语言精练。但要达到以上三条标准殊为不易。我们先是就原著反复通读，并背诵一些精辟的段落，不懂的地方就集体研究。然后直译，但译出来后仍自觉不能完全满意。后来，我们在必要的地方试加了一种解释性的文字，使读者明白文章的含义。例如：《共产党宣言》第一句是："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陈望道译语）对于这句话研究时间很长，觉得怎样译都不甚恰当，"幽灵"在中文是贬意词，"徘徊"亦然。于是加了一段说明文字："有一股思潮在欧洲大陆泛滥，反动派视这股思潮为洪水猛兽，这就是共

产主义。”以后，我们译的《共产党宣言》中文本油印出来了。由于当时不便公开，同时恐译文不尽准确，只在内部传阅学习。在以后公开发行的《共产党宣言》之前，在北京见到的油印本，可能就是这个版本。

《资本论》是巨著。我们的思想理论水平不够，但很想翻译，开始是直译，参加这个工作的有一位北大教授和德文组的同学。这个本子是最早的中文本。我因工作忙碌没有参加译完，但以后仍续译成出版了。郭大力译的《资本论》是在一九三八年，这是十几年后的事了。我出国在欧洲还碰到参加译《资本论》第一卷的同志，当时他还继续在做翻译工作。

在一九二一年前后，我们在亢慕义斋做翻译工作，是因为有以下几个有利条件：

首先是北大有大量新出版的西文书，可以说，北大是当时中国各大学中拥有进步书籍比较多的地方。

其次，北大有一个相当强大的外文队伍。因当时北大对外语教学很重视，各种外语都有名教授。有的是中国名教授（杨丙辰、辜鸿铭等），有的是外国教授 Volker，刚和太等。

非宗教同盟

这段时间，我们除了集中精力从事马克思学说的研究和翻译工作外，还做了一件极有意义的工作，即组织非宗教同盟。

在一九二〇至一九二一年间，亢慕义斋同人就积极探讨科学与宗教关联问题。当时在巴黎的萧子昇与我通讯频繁，大都是讨论北方新民学会工作与新文化及学术建设诸问题，同时亦涉及宗教与科学的关系问题。双方强调了在思想领域内，当前不应回避宗教问题。一九二〇年十二月萧子昇归国到北京后找我，我们共

同商定组织非宗教同盟事，并定期邀约北大师生组织讲演会。主持者多为北大哲学会会员及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会员。随后由我与蔡校长商量进行办法。蔡校长在思想上反对各种宗教，主张以美育代宗教，所以力赞此议。商讨结果，大家决定组织非宗教同盟 (Un-Religion Bunde)，并由北大师生联合国立八校师生共同发起。

非宗教同盟成立后，公布了非宗教同盟纲领(李墨耕与我共同起草)。非宗教同盟的基本成员，是以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会员为基础，采取广泛方式，联络了北京各校的部分师生。蔡元培、陈独秀、李守常等是当时学术界著名人物，也是非宗教同盟的重要成员。非宗教同盟在北京方面的会员后来发展到二百余人。

非宗教同盟的目的首要是反对神道设教，肃清迷信，解放思想，反对玄学，为科学大众化开辟道路。其次是打倒封建思想，发扬民权主义，为民主政治奠定基础。非宗教同盟的活动是在各校开展活动的基础上，扩大其组织到京外各工厂和中等学校的，包括社会各阶层及劳动人民。

非宗教同盟的常规活动，起先是以北大为基地，组织公开的学术讲演。如蔡先生以“美育代宗教”为题作讲演，具有深邃的哲学与美学的学术水平，有很强的感染力与说服力。学术界轰动一时，影响显著。后来非宗教讲台渐渐推广到全国各大城市，与各地教派正面交锋起来。当年王尽美就在济南亲自组织过反宗教的群众运动。

随后，我们出版了《非宗教论》，这是一本反映当时思想战线斗争的重要文献，曾一时风行全国。

《非宗教论》是一九二二年六月出版的，全书有一万七千多字。

对于出版《非宗教论》，当时的京报社、华俄通信社、光报等都从人力、物力给予大力支援。为出版这本书，邵振青采用支付广告

费的方式，捐助许多纸张，印刷也是按成本计算的。当时铜版印刷价格昂贵，费用均由京报社一力担承，它所提供的资助是最多的。

在《非宗教论文集》一书中，我们列入书首者有世界著名科学家培根(Francis Becon)、戴楷尔(Réné Descartes)、服尔德(François de Voltaire)、狄岱鲁(Denis Diderot)、边沁(Jérémy Bentham)、拉普拉斯(Pierre de Laplace)、拉马克(Jean Lamark)、孔德(Auguste Comte)、许峨(Victor Hugo)、达尔文(Charles Darwin)、卡富尔(Camills di Cavour)、贝尔纳德(Claude Bernard)、巴枯宁(Alexandre Bakounine)、马克思(Karl Marx)、卢月(Clémence Royer)、邵可侣(Elisó Reclus)、纳凯(Alfred Naquet)、克鲁泡特金(Pierre Kropotkine)等人的照片，并附简略的传记及他们关于“非宗教”的名言，如马克思的像下有他的名言：“宗教是人群的鸦片”，意指宗教能使人迷惘，失其性灵，人们应迷途知返。克鲁泡特金的像下有他的名言：“人群思想，进步很慢，正如一个人睡了很久，方才清醒过来。在清醒后，就即刻要将皇帝、教士所用来缚他的锁链去了，恢复原有的自由，方得安乐。这条锁链丢去了以外，还要攻击向来诱惑他，禁锢他的宗教偏见，自己找一条新生活的道路，从新走去。”

在法国女经济学家卢月的像下有她的名言：“自然的法则决不会为一个想象的上帝所扰乱，宇宙的秩序，是由于各星球间有‘以太’一类的东西在那里运动，‘互相维系成的。宇宙是一种自然物，是一种公共的组织，不是经什么造物主的意思可以创造，可以毁灭的”。

《非宗教论》是由旭东、墨耕、明斋、怀龙、咏裳、振青和我共同组稿编辑、发行的。《非宗教论》的序是由我执笔写的。“非宗教论序”中有以下说明：

非宗教论，是非宗教丛刊的一种。我们第一次汇集非宗教同志

的言论，得了萧子昇、罗章龙、罗素、蔡孑民、张耀翔、陈仲甫、周太玄、吴又陵、李幼椿、李石曾、李守常、汪精卫、朱执信、王抚五诸君的文字共数十万言。以各个人的文字为段落；除首列附有近世界非宗教大家肖像插图者外，以著者姓氏笔画多寡为先后将它合编起来，按实定名，叫做“非宗教论”。

还有各同志关于信教与自由一类的文字，我们预备另行编辑。各同志非宗教的文字，也有未汇齐或汇印以后又有新著的；我们预备在第二版以后，随时增订。外国同志非宗教的书报，我们也要择要翻译，努力介绍。

“海内外各地同志，有以非宗教文字惠寄我们的，无论何项，均所欢迎。”

当时，非宗教论文来自各方者为数颇多，因此，我们预定出两集，后因有事迁延，未来得及继续印行，只出一集。此书是当时很有影响的读物，京、沪各大图书馆，均有馆藏。

在《非宗教论》中，我们共收入三十篇论文，执笔人是：

萧子昇（法华教育会秘书） 五篇

罗章龙（中共北大支部书记、北方区委委员、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 二篇

罗素（英国哲学家） 一篇

蔡元培（北京大学校长） 七篇

张耀翔（北大心理学教授） 一篇

陈独秀（中共书记） 二篇

周太玄（四川大学教授） 二篇

吴又陵（北大讲师） 一篇

李幼椿 一篇

李石曾（华法教育会会长、北大生物学系教授） 四篇

李守常（北方区委负责人、北大教授兼图书馆主任） 一篇

汪精卫(国民党中委)　二篇

朱执信(国民党《建设》杂志主编)　一篇

王抚五(北京大学教授)　一篇

我在《我们何故反对宗教》的论文中，首先指明了“宗教是社会革新的大障碍”。为论证这个观点，我从三个方面加以阐明。

第一，社会改造的动机，起于不满足现实的生活。我们目击现代不安的社会，剥削阶级的横暴，愚贫小民这般可悯——凡有血气者，没有不惊心动魄、图谋挽救的。可是宗教徒对于这等重大的、紧急的问题，偏有些糊涂的解释。他们主张，人生罪过是与生俱有的；环境的压迫是应该容许的。人人只当熬忍眼前的痛苦，图谋未来的超升。是以他们所努力的仅有超人的神界，虚空的幻想界，与实际生活绝无关系。推原人类社会，所以有改善的希望，全在乎他们时时有自觉的动机，有革新的要求，若是尽象宗教家的理想，直可谓是自杀，这岂不是一件绝可危险的事吗？所以宗教上这种暗示，我们认为它与人类有生死存亡的关系，无论如何，不敢赞同。

第二，社会革新的信仰既是立脚于近世纪的进化论上，并且同时承认人类具有伟大的能力，可以驾驭自然界多种质力，渐次完成我们各样的理想。因为我们相信社会是进化性的，故一切文化制度风俗，递演递变，变动不居，由野蛮而开明，由简陋而繁颐，人类应常怀善于推陈出新，勇迈无前的气概，才是正当的态度。说到宗教的理想，可就大不同了，他们的极乐界是悠悠无为迎送岁月的。他们的宇宙观是“天造地设”，一切归上帝统御的。所以社会间一切应行解决的问题，在他们看来，简直是“好事”。他们自视，俨同刑余的囚犯，尽毕生的力，还不能了却自己浑身的罪过。试问时至今日，社会的动态，日趋险恶，莽莽大地，一切表现尚不能脱去原始人类的痕迹，我们的责任便是兼程并进还恐不及，象这样袖手旁观，谦让未遑，任听自然界的宰制，那就除非甘心毁灭社会不可。这是

我们的信仰与宗教根本冲突之第二点，万不能疏忽的。

第三，革新社会是以科学真理为依据，科学的态度是明显的，分析透的，实验的。宗教教义恰与它相反，它是神秘的，笼统的，唯心造作的。以神秘的、笼统的、唯心造作的方法去求知识，现代稍有常识的人，都可以断言它不但无益，且有危险。关于这层已为人所易晓，并且前期宗教与新学术反复论列，已很明了，所以不加详述。现在我们只问：科学贡献的成绩能不能否认？如果不能，这个与科学势不两立的主体，决保不住不倾覆了。宗教倾覆，科学愈益昌明，即社会的革新就有希望。统上三点云之，不过举出荦荦大者。总之社会是亟待改造的，宗教则给予人以不正当的安慰；社会是进化性的，宗教则以一定的偶像为归宿；实际生活的改善是人类能动性的表现，宗教则宅心于超尘的想象界；人类的最大价值是尊重本能，宗教则毁灭人格，遏抑个性；科学的真理是救拔人类的唯一途径，宗教则到处与他刺谬，此处虽然还有其它的事实没有一一指出，可是仅凭这几件显见的罪案，也就万难饶恕了。

在这篇论文的后半部分，我进一步阐明，任何宗教都是“建立在神秘的基础上的”，是“违乎理性的”。“宗教的一个绝大谬误的见解，就是崇拜偶像的存在——广义的偶像——并且对于所崇拜的偶像均有唯一而限于一的一元心理。”因此，我认为宗教“是人类精神上一层极深厚的壁垒”，是人类进步的极大障碍，应大声疾呼“打破宗教！”

在《再论反对宗教》一文中，我驳斥了几种为宗教辩护的借口：

(一)宗教可以安慰人生；

(二)宗教可以鼓舞人类向上的勇气；

(三)宗教可以增进道德。

最后我得出的结论是：“总之以上诸端，均是以宗教为生命人的梦想，据我们看来，宗教的成绩只有杀人，战争，遏抑个性，阻碍

进化。纵然有一二无庸反对的地方，也不是他们的特有性，并且常有利不胜弊的危险，我们于此应该寻求其它的方法——科学的方法——去代替它，决不是因循苟且可以了事的。”

当时除《非宗教论》一书外，尚编辑出版了《中国教毒图（分省）》，此图系将各省耶稣教流毒情形，详细绘出，按教堂的实数一一标明，并有教毒总图两幅比较教毒漫衍的情况，以及蔡元培先生反对宗教的论文，编定成册出售。

非宗教同盟活动的开展，使国内宗教迷信者大感不安，于是北大教授钱玄同、周作人、沈兼士、沈士远、马叙伦等一九二二年于三月三十一日发表宣言，反对非宗教同盟及其发起人（另一些人则暗中破坏）斥责反宗教运动是违反约法与宪章的，对北大主持非宗教运动者大肆攻击。这时候陈独秀挺身而出，于四月十一日在北京《晨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论信教自由》的公开信。该信全文如下：

启明玄同兼士士远幼渔诸先生：

顷在报上得见公等主张信教自由的宣言，颇难索解。无论何种主义学说皆应许人有赞成反对之自由；公等宣言颇尊重信教者自由，但对于反对宗教者的自由何以不加以容许？宗教果神圣不可侵犯么？青年人发点狂思想狂议论似乎算不得什么，象这样指斥宗教的举动，在欧洲是时常有的，在中国还是萌芽，或者是青年界去迷信而趋理性的好现象，似乎不劳公等作反对运动。私人的言论反对，与政府的法律制裁不同，似乎也说不上什么“干涉”“破坏”他（人）的自由，公等何以为此惊慌？此间非基督学生开会已被捕房禁止，我们的言论集会的自由在哪里？基督教有许多强有力的后盾，又何劳公等为之要求自由？公等真尊重自由么？请尊重弱者的自由，勿拿自由人道主义许多礼物向强者献媚！

四月二日　　弟　陈独秀白

这封信发表后，一方面使争论告一段落，另方面对广大青年给予很大的启发。

当时在青年思想界，由于旧社会痼习尚存，因此有些不明事理的青年学生，起初以为尘世纷扰，怀有出世思想，认为信仰宗教可令心境宁静得到解脱，读了《非宗教论》后恍然大悟，纷纷表示毅然放弃出世思想，参加非宗教同盟。

综观《非宗教论》的要点：a、宗教、迷信神权及祭司与科学对立；b、宗教定于一尊与民主不相容；c、宗教派生之变相宗教（教条主义）亵渎人类尊严，祸害与宗教无异；d、铲除宗教与变相宗教后，人类始获真正自由与平等；e、政治应与宗教及变相宗教分离，否则便成为专制独裁与暴政。《非宗教论》对宗教颇发挥反击力量，由是反宗教运动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

北方区委对这件事很重视；认为这在思想上是反对唯心主义，宣传唯物主义，在政治上是反对帝国主义，在教育上是反对文化侵略。

当时党中央也很重视此事，认为北方区发动的反宗教运动是意识形态的重要斗争，足使帝国主义、中国统治集团惶然不安！我们还收到不少国外学术界的来信，说明此运动的国际影响良好。

九、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亦称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以下简称书记部），正式建立于中共“一大”之后，其迅速发展则在一九二二年间。书记部在一九二一年初只是一个人数不多的工人革命宣传组织，后来逐渐发展成为领导数十万工人斗争的司令部。书记部成员以学生和工人为主，这个庞大的男女青年队伍包括有各项专才。他们之中有学政治、法律和经济的，也有学理工农医的，还有学文学、艺术以及军事的。他们在工作上各尽所能，发挥自己的力量，接触面极广。当他们和广大工农群众结合起来以后，战斗力就更加强大了。他们团结一致、勇敢坚毅、不屈不挠地在城市与乡村进行严酷的对敌斗争。在早期工人运动中作出了可歌可泣的牺牲与贡献。现就其源起组织、活动业绩等简述如下。

在书记部成立以前，北京大学学生数人，即后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但是该会原是一个研究革命理论的团体，固然会员在进行研究的时候，同时也进行了某些革命活动，但究竟不是革命行动的集团。因此在中共北方地区小组建立后，才开始认真从事实际革命工作。经过多次研讨，认为应该建立一个接触工人运动的机构，并派人到长辛店、南口、唐山等地进行探索，借与当地工人建立工作关系。在这个时期中，我和张国焘、何孟雄等分途到上述各地旅行访问，结识了当地工人某些组织的领袖多人，又通过这些人认识了更多的工人群众，初步建立了工

作据点，这就是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前身。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

“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名称源于外文 Trade Union Secretariate. 其中 Trade Union 系“工会”之意，早先日本人译作“劳动组合”；Secretariate 则系“书记处”之意。合起来即“劳动组合书记部”。这一名称可能是由马林引荐到上海的，他早年曾在日本作过工运工作。

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共党组织决议在上海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是年八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正式成立，主任为张国焘，办公处设在法租界渔洋里六号。张国焘领衔发表宣言，签名者二十六人，其中少数为中共党员与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如张国焘、李启汉、李中、李震瀛、袁笃实、张秋人等。以及青年学生李新旦、刘荦人、顾耕野、汪洋、杨意贞、董锄平等。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宣言在一九二一年七月七日出版的《共产党》月刊第六号上刊出。其大意是阐述工人阶级的产生及其痛苦生活，客观上要求团结，团结应采取产业组合形式。书记部是联络各劳动团体的总机构，并着重与国际的联系。书记部作为产业工人群众的战斗组织，它与当时上海一般有名无实的工会有根本上的区别。一九二一年八月书记部出版《劳动周刊》，通讯地址：上海公共租界北成都路十九号。该刊每星期六出刊，自一九二一年八月至一九二二年六月，前后十个月共出版四十期。书记部又在小沙渡设立劳动补习学校，由李启汉主持。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后，在北京成立了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由我负责。在济南、广州、长沙、武汉分别成立各地区劳动组合书记部，济南由王尽美，武汉由林育南，湖南由毛泽东，广州由陈公博负责。总部仅在上海地区工作。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经时约一年，工作进展极为困难。一九二二年六月一日李启汉忽被捕，六月九日解往上海会审公堂，判刑三月，同时《劳动周刊》及书记部被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查封，停止活动。李启汉在上海西牢居三月，接着于一九二二年九月被引渡到上海护军使署继续关押，直到一九二四年十月始获释，前后在狱中历两年四个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被封、李启汉被捕下狱后，当地工作无法继续，总部名义虽存但无具体工作。其他各地书记部仍照常工作，均由党中央直接领导。

中央九月扩大会议

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以后，北方工人运动有春云渐展之势，但面临许多新问题，人力与经验俱感不足。此时中央自上海来信，通知北方区派代表前往出席中央扩大会议，主要是讨论推动工人运动与产业工人区域建立党与团的组织等问题。

中央扩大会是在一九二一年九月间召开的，这是陈独秀从广东回到上海担任中央书记后第一次召集的扩大会议。

上海中央负责人仅陈独秀、张国焘及国际代表等人，当时对于如何开展中国工人运动尚无经验，所以召开扩大会的目的主要是讨论如何发展工人运动。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上海、北京、武汉、长沙、广州等处代表。北京方面为邓培与我，武汉为许白昊，上海为李震瀛、袁笃实，山东为王尽美，湖南为毛泽东，广东为冯菊坡等，合计有代表十多人。

代表住在上海新闸路三元里，会期五天。会上由国际代表作关于工人运动的报告，各地代表作当地工人生活问题报告。讨论后决定了一个工作计划，并调整北方书记部组织及确定北方分部范围、人选等问题。北方书记部仍由我负责。

我曾向独秀陈情，北方工人运动范围甚广，工作繁难，最好另由中央选派经验较丰富的同志前往负责，本人目前无此能力。独秀笑道："你说谁有经验？大家不都是一样！你不做谁做？"几句话把我说得无词可对。最后独秀又说："你回去做，有什么为难的地方随时来信，大家商量，必要时，以后可补充人员。"我尚犹豫，独秀断然向我说道："你不要舍近求远，应把读书计划全部放弃，再来向我讲话。"我无法再辩，承诺暂行负责。独秀转嗔为喜，立促我北返。在会议上，我与尽美向中央建议调尽美到北方区工作，中央赞成，但山东党组织不同意。后来各方继续商量，最后结果是山东书记部与北京合并，尽美调到北京，山东党组织由邓恩铭负责，北京区党委另派专人驻济南协助山东党委工作。一九二一年十月山东书记部正式合并于北方书记部。尽美到京后任书记部秘书兼京奉路工会特派员。北方书记部工作范围管辖北方十二个省和十六个大城市的工人运动，即：顺直（河北）、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热河、察哈尔、绥远、甘肃、奉天、吉林、黑龙江和北京、天津、开封、太原、济南、青岛、西安、兰州、沈阳、长春、哈尔滨、郑州、洛阳、徐州、蚌埠、张家口。后来为全国铁路总工会所管辖的全国各铁路工会，亦包括在内，所以事实上北方书记部涉及范围很广。沿铁路南至上海、武汉、广州、安源、昆明、腾越、蒙自等城市都有工作联系。

北方工运工作开展

中央扩大会议结束后，我从上海回到北京，将扩大会议决议向中共北方区委报告后，即讨论具体措施。在讨论中大家说到，咱们当初曾从事工人群众中的组织宣传与教育活动，创办《工人周刊》，开办长辛店补习学校、劳动通讯社，并在南口、丰台、唐山等地开展工作，今后就从这些据点向前推进，努力工作，坚持勿懈，自然会有

成就。最后，决定了北方工运工作的初步方案。

（一）选定长辛店、唐山、南口和丰台四处作为工作试点。因为上述四地是北方铁路工人集中的地区，且长辛店、南口靠近北京，丰台为交通枢纽站，唐山是靠近北京的最大煤矿。（二）在上述各地设立两个或三个工人补习学校，向工人灌输革命意识，讲述罢工斗争知识。（三）试行开辟工人斗争战线，设法争取参与领导北方区内重大的工人自发斗争。（四）加强党报《工人周刊》编辑阵容与发行工作。（五）在铁路、矿山城市建立党与团的组织。（六）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制定合法斗争与直接行动的罢工斗争方案。（七）调查了解情况，决定对抗交通系斗争方案。（八）筹办工人运动讲习班，训练工会工作人员。（九）在工人集中地区筹办工人消费合作社，减少商人居间剥削。特别重要的是密切注意激发工人的斗争意志，有计划地推动与组织工人群众的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并且对于任何自发斗争都要积极参加、引导和组织，使其获得成功，以扩大书记部的政治影响。

当然，要实现上述方案，就当时北方书记部人力条件来说，是相差很远的，只凭书记部极少数青年学生奔走呼号是无济于事的。因此会议决定北方区党员以全力参加书记部工作。后来，又从公开后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中征集一批志愿工作人员，参加北方书记部工作。

从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中征求志愿工作人员一事，开始采取自由报名的办法，但是结果报名的人寥寥无几，大多数会员思想上存在着顾虑，除恐耽误学业外，主要认为学生去做工人运动既无“出息”，又无“前途”，于己有损，于事无益。有鉴于此，乃重新研究，改进征集方式与办法。在北京区委会议上经过多次讨论，大家认为要求一个学生献身工人革命运动作一个职业革命家，既是革命实践问题，也是建立有关革命人生观问题，因此会议决定发起一个关

于革命人生观的辩论。通过这次活动，多数会员在革命事业面前有了明晰的态度，但是学生在参加工人运动方面仍有思想隔阂。为此，党决定由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组织辩论当前中国革命方向问题，使大家明了工人运动对革命的意义，消除思想分歧，统一斗争意志。当时在青年学生中有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对工运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中国历史一贯是以专制为特色构成帝王、军阀、官僚的武力统治，各朝代鼎革不论其名义若何，实质上均以砍杀终局，此起彼落，演成数千年无休止的残酷斗争局面，这正是中国历史演进的特征。数千年积习是难以一朝改变的，过去“弔民伐罪，顺天应民”固是一片谎言，当今共和民主，同属有名无实。所谓民国统治实是徒有共和虚名，对人民却无实惠，中国革命是难以超脱封建专制轮回的。因此某些人公然宣称“所谓共和政体，也不过为野心家驱使罢了，结果仍是武力统治的变形，过去鼎革后人民在新暴政下依然是遭受涂炭的命运。”总之，他们认为不管什么形式的革命，“牺牲的是劳苦大众，交替执政集团都是不劳动的、说谎话的政治骗子。历史上几千年来都是人民骷髅铺的道路，都是打冤家的道路，‘民治’、‘民享’都是做梦。”因此，他们不愿意参加这个行列。第二种意见是根据马克思的理论，认为在世界历史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东西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虽然不同，但工人阶级在未来革命中必然占主要地位。在这些国家以共产党为领导，通过工人运动，运用统一战线，团结革命势力，等候时机成熟，经过国内革命战争可以推翻反动统治，建立全国性革命政权。而且通过此种途径可以根本消灭武力统治，消灭割据，实现民主政治，这是减少人民牺牲与物资损失，一劳永逸，保全国家元气的办法。同时也可以导入真正民主政治，实现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改造，进入共产主义。俄国一九一七年的革命一举成功也是这样。赞成这种意见的人很多，并认为中国历史大都是农民揭竿而起，由群雄割据，建立

专制王朝，暴政相循，如环无端。今后改弦易辙，可以工人为主力领导革命，可谓别开生面，造福人民，好处实多。针对上述两种意见在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中经过反复辩论，结果渐趋一致。会上大家认为持前说者虽言之成理，但对人类未来历史全盘否定，亦属不当。人类历史虽长蒙专制暴政的侵袭，但人民民主终不可抗，历史发展进程最后将仍导致民主政治。自此以后，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大多数会员对社会主义革命实践渐渐接近。但要做到人人自觉躬行，则并不容易，何孟雄等加入书记部工作经过，就是一个典型事例。

何孟雄原系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发起人，后加入社青团但久未参加实际工作。他向人表白，革命应先把理论弄明白才能实践，否则便是盲从附和，实际是怕供人利用；也出于对个别同志狂妄自大心怀不满。党组织数次派高君宇等去同他们谈话，何仍观望不前不愿参加实际工作。我考虑到：何孟雄不只是一个人问题，他具有代表性，我们应好好地说服他们。我先将此意告缪伯英（伯英先入党），伯英说："我说过，他只是不同意。"我乃往见何，何固执成见，说："我们的工读互助团可能失败，书记部良莠不齐，我与他们共事，岂不是帮倒忙！"我说："你夫妇名'英'称'雄'（孟雄与伯英），可是不参加实际革命，不唯道理上说不过去，也会遭旁人议论，'何'其太谬！"（双关语）何默然不语，有顷，答道："我也自知不对，老实告诉你，我们大家还担心的是'去一木偶，招来毒蛇'，所以可虑。"我道："这是你过虑处，近于宿命论，只能坐享其成，不能革命，革命要自己掌握命运。"我们两人辩论竟日不决。次日伯英告我说："孟雄平日好高骛远，目中无人，你昨日谈话，他似意有所动，你如不直言针砭，他就难以自拔。"翌日我再往，继续向何进言"劝驾"，何不再坚持，但又忽转话题道："中国革命的命运，固然应由群众自己掌握，但须以党内实行充分民主为条件。"我答："革命千头

万绪方在起步走，只要大家意志坚强统一，内部谁敢专制？万一将来党内发生妄人，群众自然把他打倒，也不会是难事。”何说：“内部如此，可是外来干涉违反民主也是完全可能的，所谓‘赵孟能贵，赵孟能贱。’你能保证吗？”我道：“有话在先，万一不幸有此事发生，不难一例对付。况且外力干涉源于内奸，只要没有内奸，外祸就不易侵入……。”这样我与孟雄连续谈了三次，他才表示接受书记部工作。后来，伯英告我说：“这次确是孟雄思想上的一大转折点，只要引擎开动，车子就自然向前飞奔！”立即决定派孟雄到京绥铁路为特派员，负该路全责。自此许多同志如李树彝、贾纡青等也先后加入书记部。这是书记部的重大收获。自此书记部组织渐渐充实起来，先后派遣特派员驻路工作。张昆弟、陈为人、王仲一、萧明、佘立亚、李震瀛等相继派往各铁路开展工作。

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成员如下：罗章龙（主任）、王尽美（副主任兼秘书）、邓培（唐山大厂负责人）、史文彬（长辛店工会委员长）、孙云鹏（正太路工会会长）、王荷波（津浦工会委员长）、时奎元（开滦矿工会会长）、张汉清（京绥路工会会长）、傅书堂（胶济铁路负责人）、伦克忠（青岛四方纱厂负责人）、王符圣（陇海工会负责人）。特派员：京绥路：何孟雄、张汉清、王旭文、马净尘；京汉路：吴汝铭、凌楚藩、项英；陇海路：游天洋、王忠秀、魏荣珊；京奉路：王瑞俊、王麟书、韩玉山；津浦路：王仲一、张振成、孙鸿儒、李保成；胶济路：郭恒祥、李青山；道清路：童昌荣；淞沪路：佘立亚；正太路：袁子贞、刘明俨、贾纡青；粤汉北段：郭亮；株萍路：朱绍莲、李涤生；开滦五矿：李昌兴；天津市：安幸生、李培良；北京市：陈楚梗、萧明；唐山市：李树彝、彭礼和、吴先瑞；郑州市：汪平万；济南：李味农、刘俊才；南满铁路：唐宏经（大连工学会），时间稍后（余从略）。

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

开办劳动补习学校，也是颇费周折历尽艰辛的。早在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之初，我们就酝酿筹办劳动补习学校。筹备时间颇长，所遇困难亦多，兹举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为例，以概其余。

一九二〇年暑假，我与梅羹、国焘等第一次来到长辛店。长辛店距芦沟桥不远，在桑干河南，昔人诗称："山形依督亢，天影接桑干"，昔荆轲入秦，持督亢地图，即指此地。那天是星期日，三人先到芦沟桥芦苇荡行猎，就地野餐，餐毕到车站访问一个电报房工人吴敏珂。他原是北京法文学校学生，山东人，"五四"时曾到过北京大学西斋，与我相识。吴热情招待，引导大家去参观慈禧太后回銮时的花车，大家就在花车旁合摄一影。随后吴引导去访工人住宅，会到了他的同乡史文彬等人，史又引大家到大厂内外参观，后在史家闲谈，情意颇洽，直到下午才搭车返校。从史师傅谈话中知道长辛店机车厂于一八九七年开办，成立已二十四年，厂址原在芦沟桥畔，由英国工程师创建。一九〇一年因扩充厂址，改由法、比两国工程师任厂长，有外籍工程人员与职员约四十余人。现任厂长孙瑞章，副厂长谭继先与王荫春，比、法总管为若曼与札曼，他们是直接压迫工人的。长辛店技术工人多来自德州及天津，职员多属于交通系，体力工人多就附近定州一带招募而来，工资最低，勉强维持本身生活，一般人无力抚养妻室儿女及父母。他说："工人们总是憧憬穿暖吃饱，劳动适度，精神舒畅，言论自由，这都与北大先生们所见相同。但终不过是'镜花水月'，一时空想……"

在多次访问工人区生活以后，大家渐渐向工人进一步谈论有关政治性的问题。工人们，特别是老年工人，对学生隐约怀有若即若离的态度，这就是当时所称为"工学界限"问题。很能说明当时

"工学界限"的，有这样一个例子。社会主义青年团派贺其颖找孙云鹏谈话（其颖是山西人，所以最先被派到正太铁路工作）。见面时，其颖向他宣传社会主义革命的道理，云鹏聆毕问道："小伙计，你们卖的是哪一号膏药？"其颖不由得着起急来，连忙解释道："我们决不是哄人的江湖医生，我们是诚心诚意来同你谈造福工人的革命问题……。"云鹏不待对方答毕，把话岔开说道："这些话我也听得不少了，卖瓜的都是夸自己的瓜甜，究竟怎样，我们工人脑筋简单，实在闹不清楚。"随后他就提出一连串的疑问，其颖虽加以讲解，但云鹏总是半信半疑，追问得他紧了，他就不说话了。其颖颓然而返。工学界限使学生与工人不易接近，因而影响革命宣传与组织的深入，这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开始有人主张采用旧社会拜把子结兄弟的办法与工人建立友谊，李启汉、杨殷等曾采用过这种办法，与工人在神像前烧香歃血为盟，发誓云："一人有事，众人帮忙，一人丧命，大家报仇！"但是旋即发觉此种落后方式，缓不济急，且易滋流弊，遂决定禁止采用。

为了解决工学界限，曾举行多次会议专门讨论，最后结论是要求生活方面忍苦耐劳，与工人打成一片，就是说，学生生活工人化，使工人感到学生不是外人，而尤其重要的是对于工人心中的疑难问题耐心解释，使双方观点渐趋一致。关于前者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曾动员发起普遍访问工区与工人交朋友的运动，以后每逢大礼拜（工人休息日）就有不少同学几人一队分途到长辛店、丰台、南口、石家庄，甚至更远的地方进行访问调查。他们往往裹粮步行到郊区很远的工人区铁路道棚及门头沟煤矿等地去进行访问，写成笔记，返校后向会员作报告。他们报告丰台见闻时说道："此地所见妇女儿童面色凄凉，如同囚犯，劳动者长期在自然灾害与人造灾难交替中过生活，都在饮泣吞声地吃着杂粮饼子。"同样的访问与报告不乏其例。

仅仅通过访问调查，是不能彻底解决工学界限的。当时党组织曾认真加以分析过，认为工学界限来自两方面：一是从工人本身疑虑所产生的，这是认识问题；其次是来自工人以外的政客官僚对工人与学生挑拨离间造成的。前者源于贫苦工人的自卑感，他们素来认为工人是命运安排才受苦受难，大学生是金枝玉叶，将来做官为宦的人，是统治工人的候补者，学生与工人并不是一伙儿，怎能一道结交共事呢？这其中一定有蹊跷吧，工人还是安分守己不要同学生瞎混，工人的事，还是工人自己来干，莫让学生插手为好。至于政客官僚们唯恐学生叛逆造反，扰乱秩序，所以不断向工人聒噪："学生是危险人物，是过激派，穷党。他们是专门来煽动工潮，借此捣乱的，你们千万不要上学生的当！"这样更加深了工人和学生的隔阂。

工学界限问题是工作最大难关，必须采取各种方式缓和工人情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除采用实际行动以团结工人外，又特别注重召集各型工人会议，进行宣传、解释。在双方多次互相访问后，召开工学座谈会，讨论工学联合、工人团结等问题。座谈会多在例假日邀请工人来京游园时举行，或到长辛店、南口等工厂所在地方举行。有时联合几个地区的工人和学生共同开会讨论互感兴趣的问题，经过长时间互相讨论，一些误解得以澄清，感情日见接近。后来，书记部把当年保留下来的双方辩论中的"问题与解答"整理成文，为后继者参考，兹介绍如下：

（一）学生多属社会上层人物子弟，来到工人区，动机何在？究竟何所为而来？恐其中难免有诈。

解：学生为革命而来，为帮助工人反抗剥削者与压迫者而来，并无不利于工人处，于工人本身无损失可言，工人可放心，学生决不会从工人手里拿走什么东西。当前，中国革命的敌人很多，靠工人单枪匹马是推倒不了很多强大的敌人的，所以革命是工农商学

兵各界共同的事业。革命不怕人多，为什么独对学生防避，今后我们应多讲工学联合，化除工学界限，推心置腹，不分彼此。工学界限化除后，参加革命的人就更多了，主意也多了，力量也增大了。

（二）工人数量少，生活苦，知识浅，力量薄，只求安分守己工作，实在用不着提出革命大题目。工人们承担不了这个大担子。工人想进行政治革命，未免太不自量了！

解：工人数量不算少，所占地位也很重要，能生产万物，不要小看了自己。工人的生活贫困和不自由，这与军阀独裁和官僚剥削有密切关系，统治者是病源，对症下药就是革命、推翻统治者。古人云："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工人难道没有责任吗？至于说工人人数少，可是统治我们的敌人，他们人数更少，两方的区别是统治者有党派有集团组织，所以显得有力量，工人无组织，所以斗不过他们。工人应该组织起来，才能保护自己的利益，最后把统治者推翻。

（三）学生天天叫嚷打倒军阀，推翻帝国主义，可是我们既没有军队，又没有军舰，行吗？

解：工人在没有武器以前第一步是团结，工会就是不可侮的力量，往后就能取得武器，打倒敌人，达到革命的目的。各国工人革命足为我们的示范。

（四）学生年轻阅历浅，一股冲劲，热心革命，难免不受人利用。工人跟学生走，易受牵累，恐招致将来后悔！

解：学生心地光明纯洁，才讲革命，在革命中遇困难一肩承担，决无利用工人谋取富贵的意思，更不推卸责任，也不会拖累他人。工学一条心，就会真正把国家的事办好。如果有坏心眼的人，有心打算利用工人火中取栗，争取个人权力地位，我们工学界联合，可以把他们打倒。

（五）学生与过激派通声气。过激派杀人整人，不让人自由，私

通外国，人说是卖国贼。

解：今天的卖国贼是官僚政客，只有他们与外国签订条约出卖国土，出卖主权。学生没有条件卖国，却是尽忠报国，是坚决反对卖国政府的人，不主张杀人、整人，也不主张剥夺人们自由。

（六）书记部大都是南方人，南方人为何要来北方革命？

解：革命不分南北，正如读书、做工不分南北一样。南方人来到北方做工、读书，南方人也自然可以在北方革命。革命不嫌人多，革命成功后南北人一体沾到好处，所以应该化除工学与南北界限，大家同心协力一体干革命。

……

除此以外，为了使工人和学生在日常生活各方面互相接近，当时北方书记部还要求工作人员在工作中严守下列公约：

（一）献身革命工人运动，百折不回，誓为实现真诚无欺的民主自由而奋斗。

（二）不争夺地位荣誉，万众一心为革命，时时站在最前线。

（三）胜则相让，败则相救，牺牲个人利益。

（四）廉洁奉公，生活朴素，重视劳动，尊敬妇女，不嫖不赌，不捧角，限制谈恋爱，禁绝一切败坏道德的行为。

因此后来有人称书记部为新的清教徒、政治童贞。事实上书记部人生活均极清苦，通常生活水平规定不得超过普通工人，收入逾定额时，余者一律交作党费或捐助工会。去各路工作，来往多乘煤车或货车，以节费用。

除了思想上的隔阂，学生在工作中仍然遇到其它的困难。如生活习惯与语言隔阂，均使工作进展增加阻力。由于书记部的南方同学乡音很重，生活习惯与本地劳动人民多所异趣，时有格格不入之感。如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会员中有位广东同学来京不久，自告奋勇到丰台工作，初凭热情在车站住了数日，毫无所获，失望而回。

他半开玩笑似地埋怨自己说："我实在不行，这工作真难办，恰似白狗吃青天，不知从何处下口。"但是在大家的坚持下，所有遭遇的困难都逐渐被克服了。

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教员几乎全是南方人，南人操北语非常别扭，不止是笑话百出，有时更构成误会。因此《工人周刊》的编辑宋天放编成《应用京话词汇》，油印多份，供大家学习。兹举数例：见年长者称"二哥"，"大哥"便不礼貌；店主人称"掌柜的"、"当家的"；乱说话为"胡诌"；乱行动为"瞎闹"；散步为"遛跶"；话多为"唠叨"、"罗唆"；不要为"别"（如"别嚷"、"别闹"）；烟酒不用称"在理"；洋车为"胶皮车"等等。当时大家把这本应用词汇揣在怀里随时翻阅，过了些时，居然可以说出对方能听懂的蓝青官话了。

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于一九二一年正月正式开学。学校位于车站迤南工人住宅区一个名叫铁匠营的小胡同内，门宇低垂，伸手可触檐瓦，计有屋三间，一大二小，东大间作教室，中小间作办公及阅报文娱室，西小间为教员卧室。史文彬即住在学校附近。娘娘庙在车站迤东，庙前有广场可容数千人，工人群众较大集会则在娘娘庙举行。一九二一年五月长辛店工人第一次在此举行纪念五一劳动节集会，散发了《五月一日》及《工人的胜利》的小册子，争取八小时工作，这在中国是空前盛举。大会结束后，长辛店教员全体参加游行到车站，教员吴容沧把手中大旗插在火车头上，一直开到南方去，沿路换车头时，工人把旗传下去，一直带到江岸。

在补习学校任教的有：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主任吴汝铭，教务主任李实，教员贾祝年、张纯、吴容沧、罗运麟、王铮、杨人杞、张至刚和我等。洛阳劳动补习学校主任白眉珊、张宝泉。唐山劳动补习学校主任梁鹏万。天津劳动补习学校主任安存斋。丰台、张家口、吴淞、徐家棚、沟邦子、大槐树、长沙、九江、昆明、包头等处均先后设立过补习学校。

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开办初期，北京党组织决定由我和国焘、梅羹、中夏等几个党员轮流前往任教员，朝去暮返，或每周驻校一、二天，随时换班。授课教本由教员自行编印，学生所需纸张笔砚由教员捐助不收费用。后来因为国焘出国，中夏离京教书，我事繁，乃改为专任教员制度并推定一人负责，长期驻校。该校负责人为李实，继为吴汝铭，后为吴容沧，前后易人数次。各劳动学校教材由书记部教育委员会编辑，内容取材于《共产党》月刊、《工人周刊》、《向导》、《苦力》、《劳动界》及《国际通讯》英、德、法文版本的资料等。

劳动补习学校教员大都是经过审慎选择的，所以对待工作十分认真。他们平日经常向工友们讲解革命大义（工友二字即最先为长辛店教师所采用），同时对工友生活非常关怀，事无巨细，有求必应，故工人称学校为“工友之家”。

某次修车厂工人吴国有屡受工头欺压，无处申诉，乃到北京大学西斋找书记部负责人商量对付办法，并说如能直函外国总管讲明事实或能得直。时王复生适在侧，因就其所讲情节书一法文信嘱吴带回递交札曼。札曼立召工头与吴对质，工头意料不及，以报告不实受责，吴遂从宽发落。吴事后逢人便讲，王先生摆连环计把他从困难中搭救出来了。人问何故，吴说：“王先生给外国人写的信，大环套小环，中间杂些芝麻雨点”（指信中的法文及标点符号）。说得伙伴们大乐起来。从此工人中到处传开了，说书记部真不错，真正能替工人们办事。

和工人相结合

起初书记部人到工人区时，双方称呼均表示客气，北大学生见工人称某师傅，工人见学生则称某先生，后厮混渐熟，双方互称老

史、老罗，更久则互以绰号相称。如呼老史为麻哥、老王（俊）称毛子（王原为天主教布道师）、陶善琮为张良。后来工人对学生几乎每人都给以绰号，如见书记部人生活简约，不御烟酒.不近妇女，则称为清教徒，张国焘足智多谋称为张孔明（转为张空明与Коммунизм谐音），见王铮年幼天真称为小炕馍，高君宇举止斯文称为老夫子，李震瀛体貌魁梧称为关西大汉，邓中夏称为邓大炮，何孟雄对人说话腼腆称为小闺女，王尽美机智勇敢称盖韩信，吴容沧性如烈火称南方蛮子，吴汝铭极度近视称吴瞎子，王仲一粗犷耿直称为王提辖，宋天放温文尔雅兼善书法，称为宋学士，其他绰号不一而足，依各人体态性格，颇多贴切。当时以绰号称人者表示亲昵，受之者不以为忤，此时一切嫌猜悉化为乌有，彼此推心置腹，一心向前！特别是当工人们亲眼看到书记部人在历次罢工斗争中总是冲锋陷阵，勇往直前，前仆后继，虽牺牲累累仍百折不回而深受感动。这时他们心坎中的任何疑虑不仅完全冰消瓦解，而且信心倍增。所以孙云鹏对人说："书记部是真心追求民主政治的人，绝对不是在政治上玩猴把戏的，是工人们难逢难遇的。今天如果再有人攻击书记部的话，那他们一定是不识好歹，不辨邪正的人了，我们一定不答应！"老史（文彬）说："今日中国整个工人阶级都应该与书记部结义，联合干咱们的事业。"因此他首先请求入党，曾三次到北大西斋找我谈话。

在游天洋烈士追悼大会上，高碑店工会代表康景星说："书记部为咱们，咱们一定跟书记部一道，任何刀斧也斩不断咱们工人与书记部的关系"。此时工人们不只是对书记部有了正确认识.就是对一般政治问题也渐渐养成认识和分析能力。如某次北京几个议员到长辛店工会参观，其中一位向工人讲话，题目为"劳工神圣"，说了些时髦的恭维工人的话。讲毕，工会负责人致答词说："劳工神圣当分别去看，自由平等的劳动才是神圣，才是光荣，如果是受

剥削受压迫的劳动，不自由的劳动，那便是耻辱，刑罚与苦役，资本主义统治下的工人哪有什么神圣可言？我们工会的目的是追求自由劳动，反对不自由的劳动！”某议员聆言，立感不安，甚赞工人见解透辟，自悔失言。

北方书记部成立之初，成员只是为数不多的赤手空拳的男女学生，却面对着强大的北洋军阀、买办洋奴交通系。他们动员御用报刊谩骂诅咒书记部是一群乱党、叛徒与匪帮，人人得而诛之的国贼罪人。北京政府所属军警机关经常搜捕书记部工作人员，置诸重典，投之监狱，并封闭其机关，制止其活动。当时特别敌视书记部的还有交通系的附和者工贼集团。

交通系原为梁士诒、叶恭绰、郑洪年等买办政客兼财阀所组织的小集团。他们在光绪末年进入邮传部为小京官，窟宅其间，结成帮派，入民国后助袁世凯称帝为恶，后又勾结安福系卖国借款，从中渔利。由于国营交通企业拥有独立生产工厂、铁路警察武装、职工教育系统、交通银行等庞大的机构，又兼经营陆海运输和电讯等，对外放债，获有大量回扣收入，故在政治经济上形成特殊势力。铁路工人运动发展，直接威胁交通系本身利益，故当长辛店工会开始组织时，他们便全力抵抗，以企苟全禄位。交通系的组织是采取各部门分立办法，职工教育有扶轮学校、技术训练所等。职员有同人会，不与工人混合。在工人中间，开车、车务与工厂工头各有独立组织。如交通传习所、精业研究所、车务见习所、留法预备班，分隶于交通系直接领导。凡工人就业、升降级、生活福利、工资、教育等事均由该系掌握。他们根据派系路线垄断一切，顺之者生，逆之者亡！京汉铁路在组织工人俱乐部时期，即与交通系开始正面冲突。叶恭绰、郑洪年、赵继贤等策划反“过激党”、反工会，种种活动，层出不穷，荼毒工人无所不用其极，但其中不少阴谋行动被书记部击退。京汉路罢工前，交通系认为有机可乘，立即动员该系爪

牙猛攻书记部，因此沿路多处机关被破获，北京、保定监狱中政治犯猛增，铁路工人失业数量亦有加无已。他们对工人所欠血债累累，陇海铁路秘书游泳（天洋），洛阳工会秘书王忠秀，津浦工会会长张振成，西直门工会秘书王净尘等被害，均为交通系所指使。李味农、伦克忠、胡信之等被杀害，亦与交通系有关。一九二七年夏北伐军到郑州，全国铁路总工会特派员在郑州组织工人罢工响应，事为交通系所闻，指使军警逮捕郑州铁路总办事处工作人员汪胜友、司文德，处以破坏交通罪，九月将汪、司二人枪杀于郑州长春桥畔。以上所举不过荦荦大者，交通系的罪行实属罄竹难书。

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所规定的革命计划，在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三年间的工作实践中，经过罢工斗争，改善了工人的经济生活，取得了工人的自由权利，提高了工人的政治地位。与此同时，北方书记部创建了全国铁路总工会、北方矿工会、各大城市产业与地区总工会，并进一步成立了全国总工会。由于上述工会组织与罢工斗争的发展，在全国范围内，特别是北方广大地区内，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支部与社会主义青年团。这里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中共北方区党的组织乃通过若干次重大的罢工得以迅速发展。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立与发展对团结青年学生工人固然起过很大作用，但在北方产业工人区域，特别是铁路矿山城市地区建立党与团的组织，则完全以几次重大罢工为契机。所以自从一九二二年间，北方路矿工会接连十余次的大罢工有如万弩齐发，表现出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巨大威力，同时也使中国工人政党名实相符地成长壮大起来。

中共六届中委史文彬（全国铁路总工会委员长，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在一九二九年回忆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时，写道："京汉铁路工人与北京的革命学生（劳动组合书记部）在这样极困难的环境之下艰苦地、忍耐地开始团结工人的力量，他们与交通系奋斗，

与军阀官僚奋斗，与厂长、站长奋斗，与当地的土豪劣绅、工贼等奋斗，在二年多长期奋斗中，大的罢工、小的罢工，以及一切合法的、非法的争斗，不知经过了几十次，才将北方全部铁路的重要站口工会先后成立起来，京汉铁路工会便是当时用力最多，工会力量较为雄厚的地方”（史文彬：《“二七”的精神是什么？》载《中国工人》第六期，一九二九年二月七日出版）。

当时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成为国内外革命工会联络地点。中国工会代表参观访问往来如织，南北工会通过北方书记部互相联络。各地工会发生罢工斗争时，北方书记部遂成实际斗争中宣传、组织、募集罢工基金的中心机关。同时各国工会与赤色职工国际派人来远东活动时，必来北京访问，与北方书记部交换政治情报、革命书刊，并由劳动通讯社发布有关新闻稿。国际工会代表如沙发洛夫(Safalow)、里卜西·士莫尔吉士(Smolgies)、西马文(Simaon)、尼可尔逊(Nikolson)、希尔曼(Hielman)、罗伯尔特 (Robert) 等均先后来北京访问，与北方书记部互相交换意见，讨论国际工运策略、罢工基金、工会统一战线等问题，并将讨论记录陆续在国际通讯外文版刊布。

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重心固然是放在工人运动方面，但是在工人运动打开了局面之后，又把力量投入到铁路沿线的广大北方农村，发动农民斗争，争取和保卫农民，特别是贫农和雇农的政治和经济的权利。

十、中共北方区委

党的第一次全国会后，在原来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基础上，中央决定成立北京区委(包括山东)、广东区委、江浙区委、湖北区委、湖南区委等，以便更好地领导各区工作，开展各地人民革命斗争。

北京区委的组织及其成员的演变，是由简而繁，前后互有更迭。区委书记一直由李守常担任，我主持过区委组织工作，高君宇曾负责宣传工作，邓中夏负责青年工作，缪伯英负责妇女工作，李梅羹任区委秘书。一九二五年北京区委改称北方区委(这一名称与其管辖地区更相符合些，为叙述简便计，本章一律用北方区委名称)。以后区委成员增加，工作繁重，天津、唐山、北京、东北等地，亦先后成立了地委。

中共北方区委当年领导地区很广，除北京、天津、唐山、石家庄等顺直省地区外，还包括河南、山东、山西、陕西、东北和内蒙古地区，甚至和云南、贵州也有联系，除此之外还包括全国各条铁路等。

北方区委在组织上受上海中央领导，但还有它独特的地位。当时国际代表和苏联公使常驻北京或路过北京，因此在政治上还接受他们的指导，如维金斯基(一九二一年)，马林(一九二三年)，加拉罕(一九二四年)均驻过北京，一九二二年陈独秀也一度驻在北京。

当时北方区实行集体领导制，在党中央指示领导下进行工作。凡重要决策和方案，均通过会议慎重研究，详细讨论，多数表决，然后付诸实施，通过先后成立的工委、农委、青运、妇运、民运转交劳

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共青团等机关贯彻执行，并责成各部门互相协作。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独秀以中央书记名义向全党各区发出通知，强调建党工作和开展工人运动，事前又在上海召开了工作会议，确定全党以主要力量用于开展工人运动，并建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和各地区分部。

在北方区委领导下，从一九二一年下半年起，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几经讨论，对北方地区和主要铁路、矿山等建产业工会和开展罢工斗争的工作进行了规划，前后计陇海铁路大罢工、长辛店大罢工、开滦五矿罢工以及二七大罢工等大小斗争百余次。在这些斗争中，建立了各级工会，吸收了大量工人成份的党、团员，建立了许多基层党、团支部。

北方区委始终注重集体领导，充分发挥“临事而惧，好谋而成”的精神。如一九二一年组织陇海铁路罢工，是第一次重大斗争的演习。又如一九二二年发动长辛店八月罢工后连续组织了京绥、正太、京奉、津浦各铁路的罢工斗争。当时敌我形势错综复杂，北方区委会议讨论上述联合斗争时，气氛热烈，也有人认为“风险不小，后果难料”。书记守常指出：“论理就是这样，我们应该‘临事而惧，好谋而成。’我相信一定会成功的。”上述各次斗争的方案大都是通过充分讨论坚决施行的。

李守常与北方区委

守常生前一直负责主持北方区委工作。他在工作中，以身作则，贯彻党内民主，实行集体领导。他坚持原则，服从中央，根绝派性，排除宗派思想。在他带领下，北方区组织长期稳定，团结一致，发扬正气，严斥奸佞，形成了一整套有关合理使用干部的人事制度，

使北方区委成为一个艰苦朴素、忠心革命、既是指导北方地区各项活动的运筹帷幄的决策机关，又是一个执行决议的坚强战斗集体，守常同志在北方建党中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守常同志谦虚谨慎，作风民主，很尊重群众的意见。区委成员最初人数较少，且北大同学居多。随着工人运动的开展，北方区委成员中逐渐增加了产业工人的成份，先后相继参加区委领导的有京汉铁路的史文彬，津浦铁路的王荷波、京奉铁路的邓培，胶济铁路的郭恒祥，正太铁路的孙云鹏及张清泰等。这些工人领袖参加区委领导后，工作局面大为改观，区委发挥集体力量，成功地领导和发动了多次大规模的罢工斗争。再者，区委下属的许多支部是由工人党员所组成，他们和群众有紧密的联系，也是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当时国际代表评说："北方区委很有些象工人党的样子。"守常听后，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凡事要虚心，'盛德容貌若愚'，不要自满，还应努力作好实际工作，使各方面都能名实相符，成为工人阶级的政党。"

守常使用干部，大胆放手，对同志十分信任，常说："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何况革命同志更非他人可比，是同生死共患难的，应比家人还亲。"在叮咛工作时，他常爱说的口头语是"大而化之，你瞧着去办吧！"我们听了总是喜惧交并，奉命唯谨地去执行。

在人事制度方面，北方区委任用干部，本着大公无私，不分亲疏，不讲派系，一视同仁。是非升黜，全凭革命品德才能，及在革命实践中的贡献；赏罚付诸群众，曲直自有公评。

随着斗争的发展，北方区局面日益扩大，工作人员众多。在教育党员方面，守常总是主张革命原则，一秉大公至正，主张团结，既不损害同志，也不放松批评。事实上，在守常同志主持北方区委时期，他不止一次地论述革命者要怀有智信，不搞宗派，反对盲从，根绝偶像思想，认为这些思想作风都是旧时代流传下来的，极不正当

的恶习。因此，北方区党内生活纪律严明，战斗行列组织严整，士气旺盛，同志间和谐合作，心情愉快，各级领导工作同志都实行以德服人，反对压服，摒除那些纵横捭阖，尔虞我诈的坏作风。在实际斗争中，形成见利不争，见害不避的品德，北方区数以百计的干部，在对敌斗争中与全体党员一道，均能临危不惧，英勇奋斗，不怕牺牲，很少有降敌或为虎作伥的事情。在一九二七年前后，北方区的干部，自守常同志起，英勇牺牲的，前后不下百数十人，著名的有游天洋、戴培元、王忠秀、李味农、李季达、江震寰、胡信之、伦克忠、邓培、范鸿劼、王荷波等。

在经济管理制度方面，守常同志带领大家以艰苦卓绝，忠心为革命，为党，为人民大众服务的作风，上下一心，不争权夺利，埋头苦干。并规定会计、出纳独立，实行群众监督，公开决算帐目，党的干部一律不得直接经手现金出纳以及物资发放等。对贪污舞弊事项，先事预防。因此，北方区前后经历近百数次大小罢工斗争，募款、赈济，来往大量现金和物资，很少发生贪污现象。最大的如开滦五矿罢工，数万工人历时四十多天，经手累万的现款和物资一清二楚，维持斗争局面直至胜利，的确是一件难能可贵的事。

北方区委对党员教育非常重视，要求建立革命生活，学习时事理论，从事工人教育事业和参加群众斗争。当时北京社会风气很坏，市民中以听戏捧角，哼唱京调为习尚。在北京大学内风行《消闲录》小报，以狎妓捧角为风雅。北方区委要求党团员和劳动组合书记部成员一律不许沾染此风，保持高尚的革命情操。守常提倡革命生活，每当罢工斗争胜利时，他就邀请大家到西城后闸他家中聚会，为大家包饺子。一面汇报斗争经过，一面聚餐，并弹琴、唱歌、讲故事、说笑话等，共庆胜利。

北方区委在守常同志领导下，集体领导形成制度，不论他外出度假或出国开会等，都能照样运行自如。一九二三年春，寒假期

间，守常应邀去武汉大学讲学，借以扩大宣传阵地，我们也极力赞助他去。当时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正筹备建立京汉路总工会，临行时守常让我兼为主持区委工作。岂知守常走后，吴佩孚突然大肆镇压京汉铁路工人。面对这一白色恐怖，北方区委留京同志贯彻集体领导，应付局势，坚持工作，临危不乱，并积极开展斗争。这个期间，没有一个人擅离职守。这是守常平日对区委同志严格要求与训练的结果。

区委干部之间是团结互助的。在区委工作的许多人，都是守常的学生，大家对他非常尊重。他当时有教学工作，除北大外还在北高师兼课，课程排得满满的，社团活动以及社交活动也很频繁。因此，一些具体工作我们也都尽力承担，不去多麻烦他，事后向他汇报。

北方区委的各项工作

北方区委除了积极开展工人运动外，还积极开展了包括上层联合战线、民族运动、军事工作和农民运动等各项工作，除工人运动将专文介绍外，这里仅对其他工作作一简单回顾。

中共北方区委成立以后，守常同志就很注重抓好上层联络工作，后来慢慢发展成为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即我党有关国共合作、联合战线的工作。这项工作对我们开展其它工作，争取朋友，孤立分化敌人，赢得有利的稳定局面是很重要的一环。守常在这方面独担重任，贡献最多。他在国共合作、主持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等一系列统战工作中，为党作出了重大贡献。

先是守常同孙洪伊、王乐平、汤化龙等宪法研究委员会的人（这些人原属研究系）有接触，他通过和这些人的往来，慢慢发展，认识了不少国会议员。

当时国会议员中，靠近共产党并和北方区委有往来的有王乐平、丁惟汾、江浩、王衡、李鼎声等二、三十人。北方区委对他们作了些团结争取的工作。他们在必要时就站出来帮我们说话，当时这些议员虽无实权，但在制造社会舆论，揭露敌人方面却有一定作用。一些公开活动，由于有他们的参加，扩大了社会影响。如北京第一次十月革命节纪念会，是在北京大学第三院召开的。守常同志在大会上作了重要讲演。当时到会的人很多，其中教育界、议会两院、各部会的人来了不少，他们有的还在会上发表演说，使会议开得很热烈。

再是一九二二年越飞大使到中国，在苏联大使馆举行了一次几百人的盛大招待会，到会的都是北京的名流，其中议员不少，我们也去参加了。蔡元培先生在会上讲话说："我们大家济济一堂。"我们纪念"五一"的活动，不少社会名流也参加了。这些活动都增加了我们在社会上的影响。

我们搞开滦五矿罢工时，议员中也有帮助我们的，一方面他们在议会中发言质问当局，另一方面帮助我们募款。"二七"罢工时，我见到两三个议员骑着毛驴去长辛店，其中有一个叫王素民。当时环境很危险，这可是不容易的。"二七"罢工后，长辛店举行追悼会，议员们也有去参加的。

还有一个银行界的议员对守常谈，你们太穷，工作开展不容易，搞群众运动，需要经费，我可以支援。类似这样的事情还很多，当时很有一些议员团结在北方区委的周围，为我们说话，提供一些情报，有时还作一些掩护工作。

做好上层工作，我们就能方便地了解北洋军阀政府中的一些内幕和动向，这对我们决定斗争策略是有帮助的。有些事我们知道后，就及时写文章在《向导》上加以揭露，唤起群众觉悟。当时帝国主义的情况，我们比较容易知道，因为帝国主义之间矛盾重重，

他们常常要在报刊上互相揭露；而军阀内部的情况，我们就不容易知道。通过这些关系，往往就能知道军阀的内幕。如曹锟贿选一事，我们最先是从议员嘴里听到的，于是我们就写文章揭露曹锟。我们有组织地把一些内幕资料写成文章，送报刊发表，这对直系军阀是一个打击。当时议员中的江浩、李鼎声、王法勤都是比较进步的，是守常的好友，其中一些人后来也加入了党，在国共合作中发挥了作用。

北方区委也很注意农民运动，守常曾对北方地区农民武装斗争作过一番深入的研究。根据北方区委对北方各省农村所作的详细调查，区委会议提出了加强北方农民武装斗争的报告，并作成方案付诸实施。守常根据该项材料写成题为《鲁豫陕等省红枪会》的文章，刊登在《政治生活》周刊上，作为当时指导农民运动的重要文献。

一九二五年守常刊布的《土地与农民》一文，长达一万余字。文中阐明了北方区委关于北方土地政策的决定与策略问题，提出以贫雇农为主导的农民协会，进行土地改革，与广东农民运动遥相呼应。北方区委还输送干部去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为北方地区培植农运骨干。

北方地区是汉、满、蒙古、回、藏各族聚居地带，同时也是历代民族矛盾集中的地区。当时（一九二三年）守常同志就注意到民族问题的重要性，指出应当在北京蒙藏学校发展党与团组织；培养民族干部，并建议设置在北方区委领导下的民族工作委员会，由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中籍隶热河、绥远、察哈尔等地区的同学组成，其中有王仲一（张家口人）、韩致祥（热河人）、何资琛、李渤海等同志参加，并开展民族运动工作。当时在蒙藏学校中建立党、团组织，又在内蒙古旗盟中发展党组织，由是奎璧、荣耀先、吉雅太、乌兰夫等同志先后被吸收入党，自是内蒙古地区革命工作日有起色。一九二五

年建立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同时在喇嘛中进行了统战工作，使他们中有些人走上了革命道路。

北方区委对军事工作也是十分重视的。区委成立后，当时在组织部下设立一个军事运动工作小组，由我兼管。这时区委重视军运工作的主要原因：一是北方区是北洋军阀政府军事力量集中的地区，北方区的革命斗争运动存在着随时遭受敌人武力镇压的危险；二是北洋军阀的部队内部不稳定，且士兵大都来自农村，有条件进行这方面的工作。

北方区委进行军事工作，先是从各军事院校入手的。当时北方有保定军官学校、清河陆军大学、烟台海军学校、各省区的讲武堂等。这些军事院校招收的学员大多数是青年学生，我们利用这个特点，向他们宣传革命思想，渐渐地在学校发展起党、团组织，党的影响和力量也慢慢渗透到北洋军阀的部队中去了。如在曹锟的部队中，在冯玉祥的部队中和其他军阀的部队中，都有我们的同志在开展工作。另外，我们对北洋军阀部队的情况、兵工厂的情况，也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研究，并派人打了进去。一九二五年，我们成功地在内蒙组织了党的武装队伍。到一九二六年，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区委的军运小组随之发展为军事工作委员会，其成员有我、张兆丰、张隐韬、郭增昌、李之龙、郭寿生、茅延桢、廖星庭等。

军事工作的初步开展，对我们组织罢工斗争，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如在开滦五矿罢工中，由于我们做了董政国旅的工作，争取这个部队的部分军官和士兵同情工人罢工斗争，因此减少了许多阻力。同时，我们还派军事人员训练工人纠察队。

从一九二六年起，北方区委先后派遣部分军事工作干部和学员，到广州、武汉、内蒙等地参加北伐战争及革命斗争活动，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从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七年，北方区委工作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一九二七年上半年，大使馆案发生，守常被捕牺牲，北方区委工作受到了很大的挫折。

十一、 中共北方区党报——《工人周刊》

《劳 动 音》

《工人周刊》的创办要溯源到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早期的刊物《劳动音》。

一九二〇年上半年，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酝酿组成后，会员一面研究和译述马克思主义著作，一面特别注重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与实践。部分会员分赴铁路、矿山和工厂进行调查、访问，获得了有关工人劳动、生活的第一手资料，同时也体察到一些问题，包括如何在工人中传播阶级革命的思想，启发工人阶级觉悟等。其中一些调查报告曾发表于当时的报刊上，但为数有限，影响也不够深远，大家感到有必要自办一个刊物，专门研讨和报导有关工人方面的问题和消息，以唤起社会的广泛注视。随后不久，北京共产主义小组诞生，这种想法就更趋迫切，为创办一个旨在工人中进行革命思想教育的刊物，已是势在必行了。于是，与上海小组的《劳动界》、广东小组的《劳动者》创刊的同时，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劳动音》也应运而生了。它于一九二〇年的十月革命节出版了创刊号。我参加了编辑工作，但主要编辑者是北大学生陈德荣。陈是湖南浏阳人，北大旁听生，具有无政府主义倾向。

《劳动音》的宗旨，在它的创刊号上《我们为什么出版这个“劳动音”呢?》一文中，曾表示为“使国内各工人容易联络，及使留心社

会问题的人，做研究的资料，使热心社会改革的人，去求解决的方法，更使世界的劳动者和社会改造家，明白我们国内的劳动真相，来设法帮助我们解决，共促文化的进步，世界的和平，人类的幸福。”

这时的《劳动音》，还不能完全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内部思想也不统一，多少带有学院式的气息和无政府主义色彩。

不久，发生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中无政府主义者退出的事件，这对于加强党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基础上的统一，无疑是好事。此后，《劳动音》的出刊工作就由我承担了。

《劳动音》在长辛店、南口等工人聚集区发行后，颇受工人欢迎，每期可销售二千份左右，办到五、六期时，因言论忤及当政者，而遭到北京军阀政府的查禁。有人说，后又改名为《仁声》① 继续出版，我已记不清了。那时我正忙于在长辛店筹办工人补习学校和组织俱乐部工作事宜。刊物没有能维持多久，就停刊了。

《工人周刊》的创办

次年的四、五月份，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一次会上，讨论到如何加强党的宣传教育问题。这一时期，我们在长辛店、南口等地的局面已经打开，长辛店的工人补习学校，已是遐迩皆闻，外地工人纷纷来信询问，工人俱乐部也在组织酝酿中，工人运动的经验急需交流推广。于是，有人建议恢复《劳动音》的出版。我建议新办一个刊物，作为宣传品，介绍各地工人运动的状况和经验，启迪工人的阶级觉悟，鼓动工人运动。既是党的喉舌又是工人自己的言论机关。对此，大家不谋而同，一致主张立即办起来。有人还提议办

① 《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一文中提到此事，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文件》。

成一个《工人日报》，大家随即考虑到人力物力不济，一时不易成功，最后决定先办一个《工人周刊》，并推定我来主持筹办工作。开创的经费由同志们筹措，各人当场认捐，集资八十多元，已够办创刊号的费用。守常说："最近可再拿出五十元，一定要办好这件事。"就这样，大家齐心协力开始了筹办工作。当时新闻纸是从日本或瑞典进口，价格昂贵。幸得北大印刷厂工人大力赞助，设法弄来一些廉价纸张，并承担印刷任务。经费方面还得到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和各地工会、俱乐部及工人的多方支援。

《工人周刊》从刊头到版面设计都是自己动手，甚至捡字、排印，我们也和工人一起利用业余时间去做，这样可以节省开支、缩短时间。创刊号的版面是由子青设计的，宋天放亲题刊头，由于刊头一时不易制备，他又亲自用木头雕刻出《工人周刊》四字，制成印版。这样，《工人周刊》终于按原定计划出版了。

创刊号大约在一九二一年六、七月① 间出版。

印　刷　与　发　行

《工人周刊》是党在北方的主要党报，它始终旗帜鲜明地宣传共产主义思想，鼓吹工人运动，因而为历届北洋军阀政府所深恶嫉视，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尽管秘密印刷出版，但仍屡遭查禁，报刊工作人员横遭缉捕、关监。加之，刊物经费主要仰仗党员自筹，经费十分拮据，以致经常脱期，停而复出不知几多次。其艰难困苦程度可以想见。但报社同志屡败屡战使刊物得以继续出版，坚持下来。从一九二一年开始到一九二六年止，前后有五年之久，累计期数约

---

① 据现保存的最早一期第12号，按日推算，若不脱期，约在七月下旬，但当时由于种种原因，脱期是经常的。据《共产党》月刊第6号（1921年7月7日）报导：《工人周刊》已出六期，按此推算，当在五月中旬，但该刊本身已是延期出版了。

在一百五十期以上，成为大革命时期持续最久的党刊之一。可惜这份刊物留传下来的期数很少，不到十分之一。最早的一期为一九二一年十月九日出版的第十二号，最晚的为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五日出版的第一三七号，现已经中国革命博物馆汇集整理，准备重印。

《工人周刊》在长期出版过程中，印刷地点几经更易，最早是在北大讲义课所属印刷厂印行的，曾得到当时任讲义课主任李辛白先生的协助。李系安徽人，一九一九年八月自办《新生活》周刊，常因拉稿关系与我认识，我曾为《新生活》写文和荐稿，往还较熟。因请他协助承印《工人周刊》和劳动组合书记部的一些文件书刊，李欣然同意。双方并言定印刷费用只算成本。印刷《工人周刊》事对外严守秘密。时北大印刷厂领班工人郝克勤系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会员，借助于他，我们得到许多便利，每遇经费困难，一时难于筹措时，即可通融记帐。《工人周刊》的印刷多挤工余时间进行，工人亦多方赞助，有些人后来加入了工会或党组织。

郝克勤于一九二三年三月《工人周刊》被京师军警督察机关查封时，被牵连入狱，禁锢二年。中共北方区委设法营救，得释后，介绍郝到河南工作。在工作中郝取得中共党籍。后于赴洛阳途中为当地驻军所捕，解往开封。某军阀见郝佯示优容，郝向他侃侃而谈革命道理，冀以感动他，该军阀断定必为中共重要分子立判死刑，杀郝于开封南关外。

“二七”后北大印刷厂不能再承印《工人周刊》了，便改在虎坊桥商务印刷厂秘密印行。当时，那里已有一个工人党支部，后来又改在大栅栏里一个小印刷厂印行，直至一九二六年被军阀政府查封止。

《工人周刊》第一期试印一千五百份，逐期增加至二千份，后来发行激增，由三千份最高升到六千份，以后长期稳定在五千份左

右。该刊发行范围不仅限于北方，遍及全国，远至东南亚、远东赤塔、海参崴和法国等地华工中间，影响很大。

每逢《工人周刊》出版时，大家都齐集参加义务劳动。其中有的是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成员，或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员和党小组同志等。大家齐心协力，包扎付邮，如遇所需邮票不足，即由参加人员自动捐赠，务期当天将全部《工人周刊》发出，才算完毕。

如遇星期天或假日，往往是我和宋天放、李梅羹、缪伯英、席咏怀、王复生等，分途乘车亲自将《工人周刊》带到长辛店、丰台、门头沟、南口各工厂送发，并就地征求工人对报刊的意见，和邀约通讯稿件。

当时，我们在各地都聘有《工人周刊》通讯员和经理发行人员。开始《工人周刊》是作为非卖品，由当地经理人员负责发送到工厂工人俱乐部或工人读者手中。凡索要者都可向当地经理人员联系。后来，随着读户的稳定，为减少同志们的负担，约在一九二二年后，改为销售，每份一枚铜元，基本作到独立维持。此后，仍由当地经理人员销售，他们既是经理者又是通讯联络员，成为《工人周刊》社的派出代表，他们还肩负调查工作，经常将当地工厂中工人劳动状况、工人的要求和困难反映到劳动组合书记部来。

随着发行量的增大，读者分布亦愈广阔，运送刊物的工作交由史文彬、孙云鹏、张清泰等负责。他们通过各条铁路机车与各路车务工会负责人进行运送，采用此种方法，迅速可靠，避免反动政府的检查，尚可节约邮资、简化手续。

声援罢工斗争

在《工人周刊》创刊号上，宋天放就手书有“为工人阶级的喉舌，为工人阶级呼吁”及“工人阶级第一份自己的新刊物”等语。此

刊在其漫长的发行过程中，始终不渝地坚持了这一方针。

我为创刊号写了发刊词，其中大意是：中国工人阶级是我国历史上新兴的阶级，他赋有改造旧政治、旧经济、旧文化的重任，是革命的力量，但在历史舞台上，他长期受统治阶级的压迫与剥削，没有政治、经济的自由，本报是广大工人阶级的喉舌，将为保卫自身的权利而说话。

《工人周刊》从创刊起，就积极报道各地工人受剥削、受压迫的困状，刊载工人劳动、生活状况的调查，如对南口工人的调查报告。如介绍长辛店工人斗工贼、建立工人俱乐部的情况，特别着重报道工人反抗压迫、要求改善经济现状的罢工斗争。每有大罢工发生时，除积极宣传介绍外，并号召各地工人团结起来，声援罢工斗争的工友。如对一九二一年十一月陇海路第一次大罢工，一九二二年的香港海员大罢工，京汉路八月罢工，京绥、正太、津浦、道清、粤汉、京奉等各条铁路的罢工斗争，开滦煤矿大罢工，京汉“二七”大罢工、焦作大罢工等，无不作了详尽的报导和声援，并由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派往领导罢工的人员亲自撰文报导。

一九二一年陇海路罢工期间，《工人周刊》从第十八号直到第三十号，连续报导罢工情况，并发表评论号召各路工友急起援助，直到取得胜利。我代表北方区委和以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负责人的身份，前往参加领导陇海路大罢工，曾以记者名义发表了《陇海路劳动考察记》，详记这次罢工情景与工人组织情况，后又以笔名慕敢写了《各铁路工友应急起援助陇海路罢工》的评论文章，着重号召各路工友以实际行动从经济上予以声援，现分别援引如下，以窥一斑。

调查：陇海路劳动考察记　（记者）

我此次因陇海路罢工，特专程前往考察，此行有几层重要意

思:(一)调查风潮真象及援助。(二)调查劳动组合实况。(三)说明工人对于社会改造的重大责任。(四)宣传劳动组合的意旨。(五)介绍世界劳动运动潮流。现在漫游归京,特将重要各点简单记出,以供热心劳动人士参考。

查陇海路此次罢工前后经过十日,参加罢工工人计两千余人,路局损失约七十余万。真可谓在中国劳动运动史上一桩极可惊异的事了。但是问他们为什么能做这般巨大的事业,必须先明白他们觉悟的程度,要明白他们觉悟的程度必须看他们组织的情形。该路工人半年前,可谓毫无动静,数月以来,内受洋人的虐待,外感宣传的影响,沿路四大站(开封、徐州、郑州、洛阳)均已先后于一月内成立工人团体。现将他们组织的内容略述于下:

(一)开封

开封工人组合机关现名"老君会"是一九二一年十月廿一日成立的。地址原在车站南庙拈梅寺,十一月十七日移至鼎济亨第一号。计房屋十三间,每月房金十五元,内分账房,招待室,老君堂,演讲堂,教室等。……会员一百八十人,会长林芝荣,副会长张良彦,熊福海,会计方立荣,凌必应,正干事魏荣山,文牍任子湘。行车升火的工人有五十人,小工六十人,大工三十人,木工二十人,铁工二十人。行车工人的工资,自二十六元至四十六元,小工的工资自七元五角至九元,升火工人的工资,自十三至二十一元,大工的工资自十九元半至三十元,木工的工资自十二元至二十元,铁工自十八元至二十七元,各种工人都有家眷,家眷概居工厂附近。工人子弟,多半在私塾念书。会员每月捐一工工资,会中每月共收一百八十元。每星期集会一次,每晚八人值日。会中设备了许多报纸乐器,每星期集大会一次,每年阴历二月十五全体宴会一次。

(二)徐州

"徐州陇海工业补习所"是该处工人一九二一年十月十日成立

的。地址在北关外北站观音庙，计房十一间，每月房金十元，内分讲室，会客室，寝室等。……会员三百人，行车升火工人五十人，大工一百五十人，小工百人。他们的工资：升火工的工资自十二元至廿一元，行车工的工资自十八元至四十元，大工工资自十八元至五十元，小工自六元至十元半。会中的正会长是宋桂森、副会长宋启勋，朱明勋。总干事代表陈仲山，副干事代表陈风，王汉卿，杜玉田，王思义，酆明喜，傅阳春，朱占魁，王琏魁，张云峰，谭金玉，黄金才。评议员六人。调查刘吉祥。招待三人。干事员二十六人。文书王哲堂。庶务员二人。会员每月捐一天工资，会中每月共收百三十六元。开支相同，内中设有阅报室。藏书很多。集会的期间不定，遇着相当的时候随时召集。

《工人周刊》第 22 号　1921.12.18.

评论：各铁路工友应急起援助陇海路罢工（慕敢）

这次陇海全路工友罢工的举动，是为铁路工人争人格，争生存的最大关头。本来无论何处工友都应该向他们表十二分的同情，然最当急起援助的便是铁路工友。因为他们这次的起因是受总管虐待，生活不安，等等。这些事既可在陇海路发生，也可在京津、京奉、京汉等处发生。外路工人如果今天袖手旁观，往后这些虐待轮到自己的时候，也会无人帮助你们了。所以现在表面上虽是援救他人，实际却是为将来援救自己。也许因这次各路互助的声势，可以增加铁路工界的威权，使资本家畏惧，可以无形中消灭将来的虐待。那么，援助陇海罢工，更是各路工人应该做的事了。

至于援助的办法，各地工人也有已行的（参看本号劳动新潮栏陇海路罢工续志），大家自然可以仿效，但是最要紧的便是援助经费，因为罢工中工友们的生活费和其余的活动费，在在需钱，如果经费不够马上便难支持，支持不住便要失败了。如果失败那就不独

陇海工人的不幸了，恐怕凡是铁路工人都永会变成了奴隶牛马。工友们！这是大家的生死关头，大家努力捐输罢！攻破这个关头，以后的好处正多着呢！

《工人周刊》第 19 号　1921.11.27.

一九二二年一月爆发了著名的香港海员大罢工，我们闻讯后，即在《工人周刊》上广为介绍，发表综合文章《香港海员罢工的现状及各地援助的踊跃》、《香港海员罢工快要得胜利了》、《海员罢工之最后五分钟》，一面鼓舞罢工斗争的海员工友，一面教导各地工人从声援中吸取罢工斗争的经验教训，如平日要多集"准备金"、要注意加强与各工人团体间的联合、只有组织强大才能与资本家斗争而取得胜利，从罢工中学会罢工。

一九二二年十月爆发的开滦五矿同盟大罢工，《工人周刊》对此不遗余力，派遣记者及其所属"劳动通讯社"人员，分赴天津、唐山进行采访报导，并向全国各大报刊发稿。可惜这一期间的《工人周刊》荡然无存，不能引述以飨读者。

一九二三年举世闻名的"二七"斗争，《工人周刊》更是站在前列。从一九二二年底就不断报导京汉路总工会各地分会筹建和活动情况，著文《为什么要组织总工会》号召进行"行业"的大联合，还积极筹备"全国铁路总工会"并对此进行讨论，借以提高广大工人对总工会的认识和觉悟。由于《工人周刊》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军阀政府的坚决斗争态度，号召工人逐步由经济斗争转向政治斗争，深为反动军阀政府所嫉视，京汉路大罢工伊始，《工人周刊》就迅即遭到军阀政府的残酷镇压，无端加以"实含过激主义、关系地方治安颇大"的罪名予以查禁，工友遭逮捕，编辑人员遭追缉，致使本该一月底出版的第六十三期无法付印，刊物濒临绝境。

《工人周刊》全体同志，经历"二七"惨杀后，部分同志遭监禁，余下同志不顾军警缉捕，仍然坚守岗位，再接再厉，一面进行大量

善后救济工作，一面冒着危险迅速编辑了《京汉工人流血记》一书，揭露敌人的狡猾凶残。经过重整旗鼓，继续斗争，此书只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即由北大印刷厂工人奋力赶排出版。该书成为我党全面报导“二七”斗争最早和最翔实的一本历史文献。

接着，于是年五月一日，又使延误已久的第六十三期作为“五一特刊号”和读者见面了。该刊转载了我写的《京汉工人流血记》的自序，君宇、树彝、先瑞和我都在刊内写文抨击吴佩孚军阀政府的罪恶行径，并总结了“二七”大罢工的教训，指出进一步开展斗争的目标。我以文虎的名字写了《年年五月一日》一文，痛斥了大小军阀和帝国主义者的罪恶。从该文可以看到当时的宣传情况。该文的内容如下：

“自一八九〇年五月一日起，这个五一劳动节来了又去，真不知有几番岁月了。我们对于平常的节日，总不免带有许多伤感过去的情绪，只有对于五月一日这一天，却是一年一年的翻新，很含有未来的意义。因为自一八九〇年到现在，世界的无产阶级是一天盛似一天勃兴起来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已经占据世界最广大的疆土了，全世界的资产阶级已经在苏维埃俄罗斯之前后发抖了。所以我们以过去的五一推测未来的五一，是可以预卜资本主义的灭亡的。

我看看桌上的赤色工人日历，知道几年来的今日，真有许多壮伟的举动，是很可感念的。单就德国说，当一九一六年德国的军国主义疯狂的时候，全欧洲被战云遮蔽了资本主义的各国政府拿爱国主义的招牌鞭策成千成万的青年工人和农民到战壕中去死。这些被骗的人如饮狂药一般，视死如归去替资本家军阀拚命，谁也不敢说一个不字。独有柏林的共产党和工人等，看明白了这个骗局，乘着‘五一’这一天，结队千万人，举行要求和平的大示威运动，要给资本家军阀政府一个很大的打击。这次运动死伤很多，我们劳

动界领袖最可钦佩的加尔·李卜克内西特就在这天被捕了，后来更被杀害了。从此德国百年来的霍亨坐伦皇朝也随着倒了，德国的共和国出现了。

一九二〇年今日，正当苏维埃俄罗斯内忧外患交乘的时候，欧洲各国正竭力图谋扑灭劳农俄国的基础，不断的明抢暗劫向苏维埃俄国进攻，那天就有德国共产党和独立社会党在柏林举行赞助苏俄的大示威运动。这次示威运动的结果，唤醒许多欧洲的工人和资本家隔绝，使劳农俄国明白变成世界工人的祖国，使许多不成材的国际主义者受了一场很大的教训。

到了去年今日，德国全部，无论是乡村也好，小市镇也好，到处均有三个社会党人的大队伍游行示威，罢工巷战，涨漫全国，也是给了全世界资本家军阀一个很大的威胁。

劳动界的兄弟们啊！五月一日四字真是启示我们向仇人进攻的符咒啊！你们有未了的心事么？有不两立的仇家么？封闭我们五十多个工会的是谁呢？杀我们开滦煤矿的十数个劳动弟兄的是谁呢？枪毙我们的指导者施洋的是谁呢？杀我们江岸、辛店工友四十余人的是谁呢？驱火车头轧毙粤汉工友的是谁呢？囚辱我们的兄弟在保定军法处和其他监狱的是谁呢？开除我们无数的工友，使我们全家冻饿的是谁呢？伙同仇人们压迫我们的又是谁呢？兄弟们！我们的仇家谁也知道是现在到处的大小军阀和军阀的走狗，洋资本主义者更是我们仇敌中的最厉害最可恨的呵！

五月一日告诉我们向仇敌进攻了，我们快挽着手前进罢！”

“五一特刊号”在《五月一日》的简介中，说明“五一”节的来由，并号召市民起来争取六件事：

（1）农工集会结社自由！

（2）打倒军阀——吴佩孚萧耀南曹锟！

（3）释放京汉罢工被捕者！

（4）恢复各铁路及各业工会！

（5）废止治安警察条例及罢工刑律！

（6）实行八小时工作制！

在该月出版的《工人周刊》第六十四期上，我以文虎的名字写了《本号发刊的话》，讲述了刊物发行的困难，准备改为出版有关劳动的书籍，当时已出版的有《京汉工人流血记》和《五月一日》两种。现将该文录后：

“亲爱的阅者诸君！大家想必都知道，‘二月七日’惨杀以来，我们劳动界的形势是怎样的情形了。一方面，我们劳动界的兄弟们看清了敌人的真面目，无情的向军阀，官僚，资产阶级和洋资本主义进攻，一方面仇敌方面的反动也是很厉害的：囚辱我们的同志，断绝我们的交通，禁止我们的言论，甚至要将我们的工会全数摧残。在这样情景之下，我们发表言论的刊物自然更困难了。本刊是北方劳动界的言论机关，我们相信曾经对于我们劳动界有不少的贡献，我们的阅者至少在五千人以上。但是这几期来，因为印制的监视，邮局的检查，及本社所受万恶政府军阀种种摧残和压迫，竟使我们不能如期出版，想读者诸君早已明白这些原因了。所以本刊在此期内，便改变计划，刊行有关劳动的书籍，现已出版的有了两种。我们的意思便是要有系统的宣传我们的主义，想尽点较大的义务。

但是就最近时候看来，外界要求的十分迫切，使我们这个周刊再不能不按期出版了。不过因为我们的精力大部分既用在编书上面，所以本刊的篇幅更不能不改订一下。故自本期改成现在的新篇样。我们一方面竭力图谋对劳动界尽本社原来应尽的义务，一方面还请读者原谅和指教。”

我们还看到，在第六十四期的杂感《忘不了》中说：“我们相信无论处在何种轻视和压迫底下的工人，对待自己的权利一定忘不

了。……现在潜伏不动的工人，对于这些不共戴天的仇敌，一定忘不了。为反抗和支配而结合的营垒——工会，被摧残了，封闭了，这是工人的第二生命，我们相信除一时都死掉，绝了种，不然，图谋恢复和发展的思想，一定忘不了。”又在《慰勉京汉工人几句话》中说“各路团体都坚如铁石，且都能表示他的精神所在。我们京汉路工人遭了这次惨杀后，受了种种困苦，团体进行，势不得不暂取守势，然亦事在人为，他们各路都能干，难道京汉路就永远除外？干！干！干！恢宏前业，慰死的灵，吐活的气。起！起！起！大家联合起来，干事要干到底。”《去年“五一”的回顾谈到今年“五一”》中说“想要自己解放自己，就要自己得着支配权力。人类自从有史以来皆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是一阶级征服一阶级。现在无产阶级要消灭经济政治上的压迫，惟一的方法，就是靠自己勇敢的精神，自己跑到权利路上去，掌握政权，毫不容讲客气就算举起铁腕权力，屈服一班被支配阶级，到那时无产阶级方可仰首扬眉吐气了。”

在这两期的《工人周刊》，集中反映了中国工人阶级经过“二七”惨案后的风貌，他们并没有被压服，而是对反动军阀怀着满腔的义愤和切齿的仇恨，并且正以大无畏的英勇气概，准备重整旗鼓继续斗争。同时也认识到“要消灭经济政治上的压迫。”唯一的方法就是夺取政权。表明我国工人阶级，经过“二七”之役更加觉悟、更加勇敢和更为自觉了，工人阶级已成为我国政治舞台上一股不容忽视的伟大力量了，我们党也经受了锻炼而且成熟了。回顾所走的历程，也不过三年时间，这一进步是何等巨大！

坚持阶级教育

《工人周刊》始终把阶级教育放在优先地位，报导和声援各地工人罢工斗争自然属于其中内容之一。另外，在报导世界各地的

工人运动的同时，揭露帝国主义和形形色色的资本集团和军阀们的伪善面目，也是启发工人阶级觉悟的重要方面。在每期的《劳动新潮》和《调查》、《特载》等栏内，都载有各地工人的组织情况和活动。在《评论》栏中，编辑以评论方式对该期某些内容加以引申，如之君的《敬告陇海路工人》（第二十号），《读了〈本社旅行记者的来信〉以后》（第二十一号）等，我在第十二号中以景云的笔名写了《我们工人所感觉的"双十节"》一篇评论，揭露军阀官僚的虚伪性，工人不应盲从附和，振奋起来求自身的解放，涤荡"双十节"的污痕，重新估定其价值，其全文如下：

"我写下这个题目，心中说不出有无限的感叹，我们如果在这个庆祝声中，昧着良心，追陪大家闹嚷一回，倒也没有甚么可说；这'双十节'到底有什么，无意识的举动，我们是不甘附和的。简单一句话：这'双十节'到底有什么意义，我们工友至少应该认识他一下才对。

说到这里必定有人以为奇怪，定会问到：'国庆日岂不是已过了十次，难道现在才去认识他？'这却不然，听我细说。

大凡一个纪念，必有他自身的真正价值，换句话说：我们所纪念的日子，必定他实在值得纪念。如果他本身的价值于我们无甚重要，甚至于有害，我们反去纪念他，这不是很愚的举动吗？我们是工人，试想当年十月十日所谓'革命'于我们有什么关系？一流士绅阶级个个存着功名利禄的心事，摇着革命的旗子，干他们自己的把戏，除却少数死事的外，一旦高官厚禄便什么都抛却了。他们的事业不过写了一块共和招牌，连清室皇帝的名号都没有动弹着；他们的伙伴大部分厚拥资财在租界内堕落，八九年刀兵水旱尽交给无辜的柔懦的同胞去承受。——然而这还不过就普通的情形说说，论到我们工界的事那更不消说得了：我们的罢工权，他们的法律承认了么？我们生活卑陷，他们行政上看到了么？大多数国家

工人的参政权他们容纳了么？我们颠连困苦的境遇，是不是做了他们的牺牲？……不必细表，大家一想，便知道这流士绅阶级对我们的冷酷了。那么，他们的举动在我们看来，根本上已无甚价值，还值得去纪念吗？

回想今日以前，年年今日，我们每次都要加百十倍的痛苦，但是每次总有些虚伪盲从的庆祝，甚至全国烽火，军阀官僚私斗最厉害，人民被戮辱最残酷的时候，偏偏北京的长街马路还是满目‘普天同庆’，‘共享升平’的许多彩楼，这样无耻的行为，难道不是无聊的吗？是工人应该盲从的吗？

工友们呵！这不值得庆祝的纪念日，我们再也不要无意识的附和他了。我们倒要借着这个机会，唤醒同阶级朋友的觉悟，示威！反对！求我们的自身幸福，扑灭士绅阶级，解放全人类，才是我们正当的态度！所以我们希望全国工界同胞自此以后振奋，团结，发一个大誓愿，到明年今日至少要做到我们的事业一部分，要扫荡廓清十月十日的几条污痕，要重新估定十月十日的价值，这才是我们的伟大的责任。

进一步说：我们要将这类的纪念节的精神，完全改造（如法、美共和成立纪念日，南京政府成立纪念日）……务使部落的化为国际的，阶级的化为平民的，暗淡的化为光明的，简单一句话：我们有一天要联合世界的工人，一脚踢翻现代恶社会的种种坏制度，建设劳动者理想社会，这便是我们理想中的大可纪念的日子了。”

《工人周刊》以通俗易解的形式，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十月革命的道路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如江囚（何孟雄）的《无产阶级战术》（第三十号），在分析了资本主义“营寨”赖以统治的基础，是“组织得很精密的”以后，接着肯定了工人阶级是人类多数，必胜无疑，但要战胜资本家只有联合起来，组织无产阶级

自己的军队，进行阶级斗争，第一步，把国家变成无产阶级的国家，定出无产阶级的法律，剥夺有产阶级的所有权，工厂中一切的管理归工人自己去管理……。这种以马克思主义鲜明的阶级立场，对工人进行完整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思想教育，成为《工人周刊》的经常内容之一。又如江囚在第二十九号的《谁是工人之友?》一文中，教育工人在为自身解放斗争中，如何识别真假朋友，不致上那种打着工人之友的旗号，实际上却是资本家的走狗和暗探的当，只有象马克思、列宁这样的共产党人才是工人求解放的真正朋友。

《工人周刊》在积极宣传全国铁路总工会筹建的必要性时，还翔实地教导工人如何按照民主集中制的方式，组成全国铁路总工会。

此外，《工人周刊》还辟有专栏《工人常识》，向工人教授文化、技术知识。《工人谈话》、《工人之声》专栏则直接刊载来自工人的要求和呼声。《工人周刊》当时已成为工人不可缺少的读物。

工人心目中的《工人周刊》

《工人周刊》自发行以来，备受工人的爱戴和欢迎。各地工人把它作为自己的指导机关，成为中共北方区委和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工人中的代称。如在一九二一年陇海路罢工胜利后，陇海路工会致《工人周刊》社的函中称：

"……同人饮水思源，知道此次罢工的所以致胜，是由于各地的联络；但是联络的指导，则赖贵社的功劳，同人深感大惠，没世不忘！但是同人知识浅乏，以后究竟应怎样进行？千祈贵社不弃，时常指导！则同人更感激无量，此致大安——洛阳陇海路同人俱乐部启"。类似的函件，不遑悉举。

工人和《工人周刊》关系十分亲密，工人对《工人周刊》爱护备

至，各地工人生活尽管十分困苦，为了使刊物得以维持，不时捐赠款项，集腋成裘，三元、五元不等，补助刊物邮费纸费，一般我们都在《工人周刊》上予以刊载、鸣谢。《工人周刊》也不负工人愿望，如给郑州京汉工人俱乐部的复信(十九号)中重申“敝社当不畏强御，申张公理，拥护工人，特此奉闻。”它以实践履行了自己的诺言。

《工人周刊》篇幅适度，文风最讲实际，体裁自成一格；长短不拘，其长文如江河，波涛滚滚，短文似剑光火花，笔触犀利，词旨明白畅晓，言简意赅，最能指导工人运动的斗争方向。

《工人周刊》每遇重要文章均经编委会成员集体讨论，然后才发稿。因此该刊文章在工人中极有威望，并受到各方赞誉，认为她“办得很有精神”、“不愧乎北方劳动界的一颗明星”，“是全国劳动运动的急先锋”，是“为全国铁路工人谋利益的”。这些誉称，对于《工人周刊》是当之无愧的。

《工人周刊》社与劳动通讯社

一如前述，《工人周刊》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刊物，但是以《工人周刊》社的名义对外发行。一九二一年十月，中共中央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和各地分部，大力开展工人运动，中共北方区委也在这前后建立。一次区委会议上，决定扩大《工人周刊》的发行，扩大《工人周刊》社，凡是各地工会或工人愿意加入的，都可以成为社员，作为社的通讯联络员和经理发行人员。同时在《工人周刊》上发表启事如下：

“本社现改为全国工人言论机关，内容愈加扩充，并于介绍各地劳动界消息尤其注意，国内外同志如有以各该地劳动界新闻投稿的，毋任欢迎。”(第十二号)

这时的《工人周刊》已成为中共北方区委的党报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的机关报了。不过对外则仍以“工人周刊社”名义出版。而“工人周刊社”也就成了北方劳动组合书部的别称。

《工人周刊》设有编委会，一九二三年前曾任过编委常委的有李守常、宋天放、高君宇、何孟雄和我，我担任主编。除上述诸人外，还有编委杨明斋、缪伯英、陈为人、吴汝铭、王忠秀、李梅羹等。发行部负责人刘伯青，成员有郝克勤、陈楚梗、舒大桢、李启元等。

在《工人周刊》编委会下附设有北京劳动通讯社。劳动通讯社在各地招聘有通讯员和特约记者，他们采集了大量的新闻报导，除部分供《工人周刊》选用外，还向国内各大报刊如北京的《晨报》、上海的《申报》等发稿。劳动通讯社的编辑委员会成员有王有德、高君宇、韩麟符、吴容沧、王儒廷、于方舟、黄璧成、缪伯英、李梅羹、黄绍谷、邓仲懈、梁鹏万、阮章、黄日葵、杨明斋、马素英、王立刚、王懋廷等。发稿负责人为刘铭勋。各地特约通讯员和记者有王英谐（台湾人）、李凤池、高步安、金太瑞、许兴凯、阮啸仙、赵醒侬、孟冰、李书渠、李树夷、席咏怀、唐檄等。

一九二三年九月“三大”会后，我调往中央局常委工作，《工人周刊》交由吴汝铭负责。一九二四年全国铁路总工会成立，《工人周刊》改为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的机关刊物，归属中共中央铁路职工委员会宣传部。时我兼任铁委宣传部长，曾兼管过一段时间，编辑发行地点，亦由北京迁往当时铁总所在地郑州。后来，《工人周刊》于一九二六年改由李菩元任主编，编辑发行地点迁往天津。一九二六年北方局势益趋严重，大部分北方干部南下，《工人周刊》在一九二六年底停刊。

“劳动通讯社”后与《京报》合作采访，邵飘萍亲加指导，业务蒸蒸日上，邵于一九二六年四月二十六日被北京政府所杀，其“罪状”

云："邵振青勾结赤贼，宣传赤化，罪大恶极，实无可恕，着即执行枪决，以昭炯戒。"故邵实为"劳动通讯社"而致死。邵既被杀，劳动通讯社被迫停止发稿。

《劳动界》与《劳动周刊》

《劳动界》周报创刊于一九二〇年秋，由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出版，主编为陈独秀，编辑有：戴季陶、李汉俊、沈玄庐、吴芳、李少穆、李震瀛、陈为人、袁笃实等。该报于一九二〇年八月十五日创刊，一九二一年一月十六日停刊，共出二十三期。因独秀于一九二〇年底已离沪去粤，所以未能继续出版。

《劳动周刊》创刊于一九二一年八月廿日，由上海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出版，编辑主任张国焘，编辑李震瀛、李启汉、李新旦、刘芾人、董锄平、汪洋、韦素兰、杨慧贞等。先是李震瀛为主编，一九二二年春李震瀛调来北方，改由李启汉主编。一九二二年六月李启汉被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该刊亦于六月被勒令停刊。

有人说，《劳动周刊》被封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迁至北京，《工人周刊》改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刊物。实际上，《工人周刊》早在一九二一年十月以前，即发表启事改为全国工人言论机关，远在《劳动周刊》查封以前，二者并无关联。另外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与各地分部并无垂直领导关系，从未发号施令。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要管上海及其附近地区的工人运动，各地分部则受当地中共区委和中央领导。一九二二年六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被查封后，已属名存实亡，以后只作为一种名义，用来对全国性工人活动发布文告而已。

《工人周刊》建刊时的主要编辑人员

高君宇——高君宇原名尚德，一八九六年生，山西静乐县人，山西第一中学学生，一九一八年进入北京大学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发起人之一，担任学会英文翻译组长，任《工人周刊》编辑。一九二二年一月二十日出席莫斯科远东大会，返回后担任北京《政治生活》周报主编，并加入书记部工作，自强不息，闻过必改，对工人革命有卓识，尝云：革命基本问题是怎样善于运用政权使为人民创造真正的幸福，物质平等与生活自由。他说："夺取政权是第一步，正确发挥政权作用更为重要，善于运用政权主要是珍惜人民权利。我们革命不只是继往而着重开来，不择手段维持政权与运用权谋术数是革命的敌人。只有诚恳与永恒地为劳动群众，全面消除剥削与压迫，其他的任何形式独裁道路都走不得，如此才能免于堕落。否则彼此以诈伪相尚，革命便失去诚心，人民痛苦亦将原封不动。这样，以革命始必以反革命终，如此陈陈相因，实属出尔反尔，此与过去朝代更迭何异？何必多此一举。"因此，君宇痛恶一切偶像与专制。君宇在工作中废寝忘餐，为工人运动打头阵，积极参加工人运动与"二七"斗争，曾为我著的《京汉工人流血记》写后序一篇，强调革命性的党的作用。后因积劳体弱，于一九二五年三月五日以肠炎病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君宇自题像云："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生为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即此可以想见其为人。君宇去世后，其未婚妻石评梅（山西人，女师大学生）经理其丧事，葬于北京南郊陶然亭锦秋墪畔。一九二八年石亦病殁于京师，骈葬君宇墓傍。我于一九三一年过北京时往谒其墓，憩慈悲院，悼以诗云：

浩浩愁怀棘满园，

城南零落旧山川，
一腔孤愤双人冢，
寂寞寒烟又经年。

杨明斋——山东平度人，清代秀才，家贫，少时出国至海参崴作华工，俄国十月革命后，参加革命，徒步西行经黑河、赤塔至莫斯科参加工作，为苏俄党员。他曾向守常道及经历，守常大加赞赏，称他“万里投荒，一身是胆”。一九二〇年返国，初任国际代表翻译，继留北方，在济南发起成立共产主义小组，旋到北方区委工作，亦在《工人周刊》工作。杨时年已四十许，独身无家室，朴实好学，具工人本色，住北京地安门大街鼓楼福祐寺偏院，翻译著述所有收入除少数自维生活外，余数均作为党费交出，暇时为书记部同志讲解俄文语法课程，炕头中西书籍散乱。他无嗜好，所著《评中西文化》一书，蜚声国内，其书内容分四卷十六章，一评“中西文化及其哲学”，二评“先秦政治思想史”，三评“农国辨”，四总解释。全书主要在解析中西文化之由来及其社会进化史之结果，并说明中西政治、经济民族性格不同之所由然。

明斋平日自甘韬晦，埋首革命，后来不知所终。

云南三王：王复生——字儒廷，原留学越南中学，后来返国为北京大学法文系学生，深邃于法国文学，主持法文翻译事。其弟懋廷亦在北大法文系。一九二六年任黄埔政治教官，后改名王德三，任云南省委书记。又一九二一年王有德亦为《工人周刊》工作，自称：“拙有余而巧不足”，主持德文翻译组，对一切新要求有从头来的勇气，初进北大时欲习德国文学，但德文无根底，他遂从头学习德文。以上三王均云南人，即所谓夜郎三王，擅长文字，醉心民主，均长期在北方党报工作。

十二、陇海铁路大罢工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爆发的陇海路大罢工，似惊雷震响在西起观音堂(河南境内)东至连云港的千里铁道线上，自此以后，我国工人运动走上了蓬勃发展的道路。

这次罢工的最初发动者是洛阳大厂的工程师游天洋（游泳），罢工开始后，中共北方区委立即派我前往协助和领导这次罢工斗争，罢工坚持了近十天，最后以实现工会提出的经济要求和撤换法人总管若里等条件而胜利结束。

这次罢工可说是我党初出茅庐，直接领导的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罢工斗争。当时距我党正式成立还不足四个月，党员人数很少，没有实践经验。但是同志们却抱着对马克思主义的笃实信念，以不计成败，勇往直前的精神去干，最后终于开拓了道路，团结统一了陇海全路的工会组织，涌现和锻炼了一批受群众拥戴的党的优秀战士，为北方地区以后进行的大小数十次斗争奠定了基础。取得这些成果是我们开始所未料及的，也使我深深感到马克思主义只要和工人运动相结合，就会出现奇迹般的力量，改变工人阶级和它的政党的面貌。这和当时的一些空谈的改革家们和所谓的社会党人以及国民党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陇海路工人的境况

陇海铁路是横贯河南、江苏二省的国民经济大动脉，它在郑州

和徐州与京汉铁路和津浦铁路相交，在政治、经济、交通运输和军事方面都占有重要地位。

当时，陇海铁路被三大反动势力统治着。陇海铁路是靠比利时借款修建的，根据合同规定，比利时的资本家及其代理人掌管着路政大权。他们掌握着铁路上的计划、人事、财务、材料、行车调度的权力，事实上又有确定铁路客货运价的实权。这是陇海铁路上的第一种势力，也是最主要的反动势力，代表着帝国主义的利益。第二种势力是北洋军阀政府以梁士诒、叶恭绰为首的交通系的政治官僚集团。当时，北洋军阀政府内阁虽然经常更换，但交通总长多由交通系充任，他们的爪牙布满了各条铁路，在全国铁路上的势力已根深蒂固，对陇海铁路进行着严密的控制。一九二〇年七月直皖战争后，交通系在奉系军阀张作霖的支持下组织了内阁，由梁士诒任总理，叶恭绰任交通部总长。交通部设立职工教育委员会，在各路开办学校，如郑州就组织了“交通传习所”，在陇海铁路上，指使其爪牙利用同事同乡的关系拉拢一部分工人组织团体，破坏工人阶级队伍的团结，争夺铁路工人群众。第三种势力是直系军阀吴佩孚的军事政治集团。当时，直系军阀首领吴佩孚的军队进驻河南，坐镇洛阳，在陇海铁路沿线的洛阳、郑州、开封、商丘等地驻有重兵，对河南和陇海铁路实行反动的统治。这三种反动势力之间虽有明争暗斗，但对陇海铁路工人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却是完全一致的。

陇海铁路工人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下，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生活上受虐待，过着暗无天日的人间地狱生活。陇海铁路工人的劳动时间很长，全年的工作日数为三百四十天，星期日亦不停工，多是每月在分班时休息一日或两日。工人又被分为长牌工（即长期工人）和短牌工（即临时工人），每天的劳动时间一般都在十至十二个小时，最长的达十六、七个小时。但工人的工资却极

其微薄，被帝国主义分子称为“廉价劳工最好的猎取市场”。铁路上雇佣外籍人员很多，而比我国人员的薪金要高数十倍或上百倍。例如：当时外籍会计处长月薪为二千六百法郎，车务副处长月薪为二千四百法郎，如以六法郎折合一银元计算，均在四百银元以上，并且还享受有回国休假、旅游报销等待遇。而中国的一般职员月薪为三十二元至四十元，工人的薪资却仅有四元至十二元，悬殊如此之大！而当时的米价每石要十六元。我国工人生活之苦可以想见。工人为了生活，不得不仰鼻息于工头。工人为了进厂工作，必须先向工头缴纳一笔贿赂金；进厂后，为了保持工作，还须给工头一笔酬劳金，逢年过节要送礼物。河南地处中原，是军阀混战的战场，直系军阀吴佩孚不仅截取车辆，强迫工人运兵运粮，还经常霸占路款，克扣工人工资，有时只发给工资的八、九成，拖欠薪资更是常事。他们奴役和惩罚工人的手段，更是花样翻新，无奇不有，对工人任意虐待、污辱、打骂和惩罚。工人在政治上也毫无自由可言，组织工会和罢工，是非法的。陇海路局以北洋军阀政府制订的“暂行新刑律”、“治安警察条例”、“治安警察法”为依据，明文规定：同盟罢工者，要判处有期徒刑或处以罚金。“最高当局为维持社会秩序的安宁……决定采取一切力量，来制止一切工人的结会及行动。”甚至明文具体载明禁止工人在以下情形中举行集会：“有领导怠工情形者，有领导罢工情形者，有领导要求增加工资情形者，有破坏社会秩序及公共安宁者，有违反一切良好道德习惯者。”这种残酷的政治压迫、经济剥削和生活折磨，使陇海铁路工人心中蕴藏着民族恨，凝聚着阶级仇，反抗的情绪十分激昂，一触即发。

中共北京区委和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十分重视陇海铁路工人运动的情况。当时的陇海铁路是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非常尖锐、非常突出的地方。由于陇海铁路工人长期受帝国主义、资本家的剥削压迫，具有强烈的反帝反侵略的民族意识和阶级觉悟，最容易

接受革命思想。加之，陇海铁路有五千左右工人，又多集中在洛阳、郑州、开封、徐州等地，有利于阶级的团结和战斗，易于形成强大的政治力量。当时几年间，全路有些地方时而发生过一些自发性的小型怠工斗争，带有浓厚的帮会色彩，迫切需要有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基于上述特点，我们把陇海铁路作为开展工人运动的重点地区之一。

早在一九二〇年秋，与我党有过联系的唐山交通大学毕业生游天洋同志到洛阳陇海路局工作。他平日利用自己工作的方便，深入调查工人的劳动、生活情况，了解工人的要求，宣传无产阶级的革命思想，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与此同时，我们通过《工人周刊》征聘了一些通讯员，并在洛阳、郑州、开封、徐州等大站设点，设有经理人员，散发《工人周刊》，经常不断地介绍国内国外劳工解放运动的消息，开拓工人的眼界，促使广大铁路工人从沉沦于数千百年的旧传统中觉悟过来。还邀约洛阳、开封、郑州等地工人来长辛店参观、学习办工会的经验，为此，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进行了一系列工作。

罢工的缘起与爆发

一九二一年三月，陇海路局把洋员若里派到洛阳充任机务厂总管。他为人奸险，一味强横虐待工人超过历届前任。他还使用了法属安南殖民统治的一套方法，这就更加剧了这一地区的民族和阶级矛盾，促成工人迫切要求组织起来，为自身的利益进行斗争。于是游天洋在克服了重重的困难，仿效长辛店的办法，最先在洛阳建立了工会组织。

导致陇海路罢工的近因，则是徐州站“八号门事件”，那是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八日下午下工时间，厂方虐待工人，有意延长工时，

将八号栅门锁闭，工人气愤不过将门挤破。事后，厂方想借此破坏该厂工会团体，无端开革工人领袖二人，工人起而抵制。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同月十七日，洛阳机务厂又发生比国洋员狄孟(Dimon)殴打前去上工工人，工人不服，群起评理。狄孟强词夺理，反而开除为首的二十名工人。而这时的工人已不是一年前的工人了，他们已经在“老君会”的名义下组织起来了。在事件发生的当天(十七日)，陇海路洛阳老君会在游天洋的主持下召开了紧急会议，详细地分析了机务厂和全路的形势，认为要使比国资本家屈服，非采取罢工手段不可，而且要把机务厂的斗争扩展到全路去；联络全路工人实现总同盟罢工。根据会议决定，成立了游天洋、白眉珊、黄文渊、王符圣等人组成的罢工委员会。并即时派人来京与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联系，请求派人指导；同时派人到郑州、开封、商丘、徐州等东线各地联络。洛阳机务厂从十七日起首先举行罢工，如得不到答复，则于二十日全路响应，实现总同盟罢工。于是，一场革命风暴在洛阳上空迅即爆发了。

罢工开始后，工人向路局要求撤换狄孟、不再有虐待工人的事件发生，限三日内答复，讵料路局无视工人要求，反加训斥。工人闻讯，莫不义愤填膺，全路其他站老君会组织亦纷纷致电响应洛阳老君会的罢工号召，成立罢工委员会，准备全路总同盟罢工。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二十日午后，陇海铁路线上的洛阳、郑州、开封、徐州等地火车头汽笛齐鸣，冲天怒啸，此起彼应，宣布了陇海全线罢工开始了。当时的《申报》、《晨报》曾作如下报导：“陇海路洋员管理路政，平日本属严厉，工人皆啧有烦言，自新总管若里接办后，对于工人，犹为峻厉，因此工人‘反动’愈甚，竟于今日(二十日)实行罢工。今日开封西赴郑、洛，东赴归、徐之车，均未开驶；而由徐西驶、由观音堂东驶之车，均未到开封；陇海全路工人完全罢工，已可证明。”千里陇海铁路，象断了脊骨的长蛇，僵死在中州

大地。

罢工实现后，陇海全路机务工人以汴省陇海老君会的名义，发表了《敬告全国各路同胞同业弟兄们恳乞救援》宣言书。宣言书在深刻地揭露了陇海铁路大总管若里的十大罪状和这次罢工的起因之后，庄严宣告：陇海铁路“同人等不能受亡国奴之耻，作无人格之工人”。提出：“务恳我各路工人协力，与本路工人作同一之举动，以救同人，为中国争人格，不受外人无理之欺凌。”为争国格，正义凛然！

罢工开始后，游天洋曾派急使来北京，向北方书记部报告详情，并请求支援。但该使在途中被阻，未能及时赶到。因此北京方面对此急剧发生的情况，知之不详。十一月十八日清晨，我同马净尘夫妇因事乘车去长辛店，在车站上偶遇电报房工友，他悄悄地告我：“郑州东西两路客货车都已不通了。”我忙问发生何事，他说：“还不太清楚。”我立即赶到前门站火车房，问一个刚从郑州段来的司机，从他口中知道陇海路工人确于十一月十七日举行罢工，至于详细情况他也不十分明白。并说，连日此路交通系分子很活跃，谣言蜂起，郑州已戒严，检查过往客人极苛！我想此事关系重大，应与同志们立商对策，沉闷的陇海路局势或可借此打开，乃匆匆搭乘十二点五分的班车回校。

是日下午二时，我到图书馆办公室，会晤守常，把在长辛店所得的陇海路消息详细告诉他，并请召集区委扩大会议商讨对陇海路罢工的支援办法。守常听后很兴奋，立即让刘伯青通知：今晚七时举行区委扩大会议。六时半起，大家陆续来到，会议准时召开。参加会议的有李守常、罗章龙、何孟雄、高君宇、李梅羹、王仲一、缪伯英、王铮等。守常首先说，今晚的会系临时召集的，但很重要，时间可能比平常要长一些，请大家认真讨论。我便将陇海路罢工消息作了说明，以及同守常交换意见后的建议也在会上提出。当时

会场讨论十分热烈，大家对陇海路罢工寄予很大同情和希望，但也存在一些困难，主要是陇海路到目前为止，既无真正的工会组织，也缺乏较强的党、团力量。当时究竟从何处下手，可说茫无头绪。会议沉静片刻后，守常问陇海方面有无支部联络？我答："那方面尚未建立支部，但是《工人周刊》却有几处通讯关系。"当时书记部初期除在辛店、南口、唐山等少数地点设有工作站外，大多数地区和工人并无组织联系，只是派人以书记部名义或《工人周刊》名义分别在各路聘有特约通讯员、发行员等。郑州、洛阳、徐州等处亦属这类情况。梅羹接着说："石家庄以南无正式工会组织，郑州、洛阳有《工人周刊》通讯员兼发行站，洛阳有《工刊》通讯员游泳，开封、徐州力量更弱。"素喜说话的孟雄此时发表意见，他说："陇海路向来是交通系势力根深蒂固的大本营，上层员司的组织极有力量，工人待遇很低，缺乏斗争训练，对书记部来说是最薄弱的一环，最好在罢工消息证实以后由书记部发表援助罢工公开宣言，看形势发展，再采取具体对策。"但君宇不同意这样做，他说："陇海路政治形势不宜于采取这种宣传方式，应设法深入罢工斗争中去，正确了解敌情，推动工人群众向革命工会走。"仲一适从太原来，列席会议时附议君宇的意见，朝着孟雄悻悻地叫道："人家已行动起来了，我们却在说空话，看你有啥用？照你的话，那么书记部的招牌不如索性摘掉吧！"仲一性格历来是长枪大戟，对人不讲情面的，一席话说得孟雄哑口无言，也把大家提醒了，于是众人都主张采取积极办法去领导陇海路罢工，会上讨论渐集中在如何行动起来的问题，经过半小时讨论，大家意见逐渐一致，认为陇海路既已罢工，书记部理应去领导，纵然有困难也应立刻派人前往。

经过区委扩大会议讨论，会上作出如下决定：（一）以书记部名义派人前往洛阳与陇海铁路罢工指挥机关联络，对罢工给予全力帮助，并发挥领导作用。（二）书记部准备力量在时机许可时派一

个组前往协助工作。(三)通知各工会公开捐款援助陇海路罢工，并通电各公众团体支援，同时决定以中共北方区委及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名义进行下列工作：(1)设法筹建北方铁路沿线各车站、矿山、城市党与团的组织工作；(2)建立上述各地革命工会组织；(3)建立上述地区宣传联络及党报书刊通讯网；(4)搜集敌方反宣传及反动组织活动情况。

当具体讨论派人去洛阳时，书记部同志人人都争相表示愿意前去，但讨论了很长时间没有作出决定。最后守常捻须颔首以目视我说道："还是你去走一遭吧！至于书记部的事，人手不够，我可以抽出时间帮同照料。"我正在踌躇未及作答，仲一忽催促道："不容迟疑，放大胆些！"此时大家都主张我去，遂决定下来。接着守常问我打算几时起程，我不加思索回答："今夜就走！"守常说："行！越快越好！但你这次赴洛阳距西宫不远，这事却千万不能让当地军阀知道，以免别生枝节。"我说："对！我一定注意！您放心吧！"守常立刻告诉大家协助我成行，并帮同办理各项工作交代等事，当场又决定在我离京期间书记部事务由伯英、孟雄代理，《工人周刊》主编由梅羹、王铮代理。散会后，守常和我又谈了些问题，向我说："交通部素来注视我们行动，你不要大意，应谨慎应付以防万一。"又嘱咐道："陇海的事'大而化之'完全交你去办"(大而化之是守常平时说话时的口头语)。我答："我一定尽心力去执行区委决议，随时向您报告！"我与孟雄立即回到西斋交代工作，伯英代整行装时，并随手取书一册放在提包内，预备车上阅览。君宇、仲一忙于筹措旅费和到车站购票，一时间大家分头忙于办理诸事，孟雄陪我到车站附近小餐馆等候。顷之，君宇、梅羹、伯英均到，伯英转达守常的话，说钱不够用，来信再汇。她并送来半新旧长毛围巾一条，高檐吕宋帽一顶，既可御寒又可化装障面。君宇说："伯英对事、对同志真是细心，想得周到！"说罢快到开车时间，我请他们先回去歇息。

当晚十二时，火车自北京出发，我静坐车厢，思潮激涌，回味北京会议上讨论情形，心怀惴惴，惟恐虚此一行，辜负众意，久久不能入寐。车过漳河，已进入河南地界，南下客车沿途旅客上下频繁，我独坐车厢，静聆旅客们谈话，其中偶然也听到关于陇海罢工消息，传说不一。有的说罢工风潮已经平息，有的说沿途桥梁被毁，工人被押数百人，更有的说陇海全路都陷入恐怖状态。我心中疑惑不定，暗自忖度，“百闻不如一见”，想到这里，心也就安定下来了。

车到郑州，但见站上人山人海，拥挤不堪，郑州街市旅店客满，浴室、饭馆席地坐卧的人弥望皆是，闹成一片，大多是因陇海路罢工无法转车的旅客。我正在为难，找不到落脚地点，猛然想到扶轮学校① 有《工人周刊》投稿员赵天俊与钮传琪。就扛起被盖行李前往扶轮学校访赵、钮二人。赵适外出，只见到钮，我说明来意后，钮说：“车既不通，外人自然无法前去，交通系对外封锁极严，沿途军警密布，预防局外人插手罢工，你只好在此等候几天再说。”

正在无法可想时，忽闻钟声响，钮即携书去教室上课，临行时嘱我在房内坐候。顷之，有一青年工人抱皮球从外进来找钮传琪，见房中有客，遂坐下攀谈，知我从北京来，青年亦有表兄阚育先在北大读书，常寄《工人周刊》与新文化书报与他。二人谈话渐及陇海罢工问题，因问我在郑住处，我以路过此地，西行无车事相告。青年工人自言姓黄名璧成，现为陇海路火车房擦车学徒，其父任陇海铁路郑州车房司机，人缘颇宽，可以设法找车西去。说后，黄即带我到钱塘里会见其父，并怂恿其父设法找车，其父允诺，外出时嘱其子陪客人在家坐候。黄父名文渊，清末时为秀才，应试不第，弃儒为工，自号工隐，言谈不俗。黄有二子，均扶轮高级班毕业，长子钰成，在徐州站电厂任职，幼子即璧成，新补学徒，好高骛远，自云

---

① 扶轮学校，由交通部直接开办的中学和小学，又称扶轮中学、扶轮小学。

喜读奇书，其父多纵容，不甚干涉其行动。璧成素好交游，奋志进取，受阙影响，并有弃工赴京读书计划。

黄父当时到车站去约一小时，即匆匆回家向我说："今晚陇海路有公事车开洛阳，系工会专车，已与司机说好，可以附乘前往。"我即回到扶轮学校取行李，璧成亦同行，二人在外进餐，谈话范围很广，同时璧成又细细询问到北京有关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情况。届暮时黄璧成代负行李，向车站走去，及我到月台时，黄父子二人已先在，即登守车(即公事车)。黄父又把司机找来郑重介绍，附耳叮咛数语，始与我握手而别。公事车深夜始开出车站，我在车中静坐一隅，筹思到洛阳后行动计划。车行极速，颠簸殊甚！思潮起伏，一种患得患失心情搅扰，竟夕不安。公事车于沿途加水停车时，司机王符圣时来找我谈话。王是砀山县牧马集人，与黄文渊为结拜兄弟，时任陇海路司机工会委员。王与我谈话情感颇为融洽。车快到洛阳，王问我到洛阳找谁？我答："看望一个朋友。"王又问："贵友为谁？"我率直告他："找游天洋。"王闻言大为动容，见左右无人，低声说："你是从北京大学来的先生吗？天洋是咱们的军师哩！"我就将来洛阳的使命，向王符圣实说了。王喜不自胜，满面笑容说："果不出我与老黄所料，下车后我陪你去找天洋，如果你一人去是见不到他的面的，你来洛阳的事千万不能让洛阳的狗子(指交通系人)或鬼子(指法国洋人)们知道，否则就要误了大事。"

下车后，符圣引我先到他家中歇息，向家人介绍佯认我为东路亲戚，晚饭后亲送我到天洋住处，符圣手持电筒，撑手杖在北风疾劲、崎岖多石的山坡小路上摸索前进，行约半小时，抵达一所小洋房，此即罢工工人地下指挥部。二人抵小洋房门外，符圣先去叩门。门启，有一老工友向王低声问话，再次通报往返，始邀二人进入室内。但见天洋睡衣拖鞋从内急忙迎出，一见面紧握我手摇了几下，说道："您一路辛苦！我前已派人到北京请你去了。"边说边

把我们往屋里让，我进入天洋卧室，但见桌灯明亮，炉火通红，桌上堆着文件，架上满列着中西文书籍，壁端悬挂长剑一柄，油画数幅。三人坐定，谈了片刻，符圣即告辞回家歇息。

天洋开始谈了一些陇海铁路工人的生活状况和罢工的远因和近因，根据天洋的分析：陇海路一般工人的生活地位比较京汉路要差，洋人对工人的虐待很凶，交通系员司的势力相当强大。平时员司和工人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这次罢工天洋以中间立场尽力调和两者间的冲突，但是，双方隔阂并未完全消除，目前员司不愿罢工扩大，怕因此增长了工人的志气，所以主张早日结束。反之，工人惧为员司所卖，总是不很相信他们。至于工人与工人之间，员司与员司间还各存在着帮派的界限。我们谈着谈着，话题随即转到罢工策略问题上，天洋郑重说道："我们起初一鼓作气，把全路罢下来了，工人群众热情固然很高，也很勇敢，但是，我们没有罢工经验，目前工人队伍是很散漫的，因此大家有些着慌，怕失业。敌人以逸代劳，老是照着我们的弱点发动反攻，加以交通系施出种种阴谋分裂工人队伍，破坏罢工，看形势很难乐观；又交通系很想借助于当地军阀武力镇压罢工，工人领袖中有人胆小怕事，惟恐闹出乱子，下不了台。因此罢工正面临着胜败关头，成功固有希望，如应付不好，也难免不遭到失败。"

我从天洋简短的谈话中了解到罢工的整个局势，一方面敬佩这个青年人聪明练达，同时也看到罢工确实潜伏着危机，于是将自己的见解向天洋坦率陈说。我说："只要工人内部团结一致，就没有什么可怕！军阀武力也不是轻易可以出动的。我们应全力把工人组织起来，维护罢工秩序，坚持下去一定会胜利达到要求。"天洋听了感奋非常，我们一直谈到深夜，拟成一个坚持罢工方案，才告休息。这个方案包括下列几点：（1）选出七个具有代表性的罢工中坚分子组织中心行动委员会（工人与员司为五与二之比），统一

领导罢工委员会。（2）加强罢工中的团结一致，经济公开，一切日常工作经过民主讨论决定。（3）坚持条件，非达目的不止。（4）欢迎书记部派员指导全路工作。

第二天清晨，天洋立即通知罢工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在会议开始时，天洋即席介绍我在会上讲话。在介绍时，天洋说："我们罢工已经过五天了，我们保证胜利就在不远。今天北京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来到洛阳。劳动组合书记部是全国工人斗争的参谋部与司令部，它代表千万工人的力量，有了书记部的帮助，我们的力量更增加几倍了，胆量更大了。"会上的人很感动，齐声说："请北京书记部主任先生讲话。"

我随在会议上作了简短发言，主要意思是代表书记部慰问陇海全路罢工工人及其家属，勉励大家奋勇向前，工人阶级作事要敢作敢为！事在必成！书记部决以全力为陇海路工人作后盾，并当场表示："陇海路罢工不胜利，我决不离洛阳他去。"大家精神大振，感奋非常。接着开始讨论坚持罢工争取胜利的议案，首由各委员分别报告。据说，罢工是在发薪后二日举行，罢工后工人及家庭生活尚能维持一个时期。据东路电话报告：开封、郑州形势非常紧急，当罢工进行到第四日还没有解决时，沿路积压客货车辆极多，特别是郑州车站旅客众多，一片混乱，秩序很难维持。当地军警特别感到焦急，纷纷到路局质问几时可以通车，路局无法应付。军警动火说："如果你们路局无法解决的话，让我们来办吧，只要镇压几个煽动工潮的分子，工人们就没有主张了，到那时他们能不上工吗？"至于东路工人组织本身，敌人也有隙可乘，这就是开封老君会问题。讨论中大家认为工人为了达到加薪要求，目前应该咬紧牙关渡过困难，不吃苦头，就不能达到目的；不付出代价，就没有收获。

会上认为一部分工人群众害怕饿饭失业，想早些结束罢工，应针对此种心理，在物质上作好准备，加强互济组织，保障工人及其

家属的最低生活。委员们报告毕，天洋发言说："我方有不少缺点，但都可以纠正过来，只要大家齐心守纪律，就是最大力量的源泉，敌方的弱点比我们更大、更多，路局损失更大，但他们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正是我们下手打蛇七寸处。我们要设法突破交通系组织，从他们中间拉出一些正直的分子到我们队伍这边来。"他列举了许多具体事例后，又接着说："同时我们一定要扩大与充实工人组织，吸引全体工人（各阶层）组成工会，使全体工人均有参加罢工具体工作的机会，并立即组织纠察队、宣传队，公开活动，这样罢工队伍表现出严肃而有秩序，罢工战线就会更加坚强起来。我们同时应筹备设立互济机构，从事募集款项，预备储购粮、煤及日用必需品，必要时以便对贫苦工人家属办救济饭馆，预作长期罢工打算。"这一切随即作成决议，交罢工委员会分别办理。最后由罢工委员会发表告工商学各界人士通电及致路局信，晓以大义，并发布告军警机关及兵士书与敬告旅客书等。

计议已定，罢工委员会分途派人到东西两线活动，慰问罢工工人，加强各站组织，讲解罢工委员会主张。天洋留守洛阳罢工总部，我即偕王符圣同往开封协助解决东线问题。

所谓东线问题，乃指开封、徐州老君会问题，此处顺便加以说明。陇海路原有洛阳、开封、徐州三个工人组织，平日互相对峙，虽说这次陇海路全路工人已举行罢工，但尚未成立正式全路工会组织，所以彼此独立。开封、徐州铁路工人是在老君会名义下组织起来的。当地工人认老君（有说老子为孔子的师傅，系道教师祖）为铁工祖师——相传华山上有一段登山铁链工程即老君所修，称为老君犁沟，各铁匠炉均奉老君为祖师，加之老君会又是历史相沿流传下来的秘密反叛团体，因而工人组织多取名为老君会。开封老君会成立很早，人数仅次于洛阳而占全路第二位，开封工人大部属于湖北帮，老君会总干事为湖北人魏荣珊。魏本人读书多年，笔下

能文，且能操法语，看图纸操作，办事能干，具有江湖气派。他在陇海中段工人群众中很有地位。这次魏代表湖北帮工人出头领导罢工，颇为群众所信任，但魏与交通系及当地官绅均有往来，平日自恃能干，不欲居人之下，时想独霸一方。罢工后，对洛阳工会亦有时服从，有时阳奉阴违，交通系深知魏的脾气，所以常派人向魏游说，劝他服从路局命令，并许以种种好处。魏亦深知政客们手段朝三暮四难以尽信，因此他一方面挟老君会以自重，另方面对外多方联系，借以确保个人位置。他为人持重，不愿开罪官方，但对北方书记部也不很了解，常说："交通部与书记部两家都可得。"想从事交通部与书记部两家搭桥的工作，主张河水与井水互不相犯。

据东路电话报告说：魏在开封自成风气，如果罢工迅速胜利，魏当无问题，如果旷日持久，魏可能首先动摇，致使开封可能中途先行复工，则影响全局皆败，因此罢工委员会紧急会议决定派一专人前往开封，加强该方面罢工组织，整理内部，只要开封不发生问题则全路罢工战线可保无事。这次会议上乃决定推王符圣到开封去负责整理开封罢工阵营事。符圣自觉为难地说："老君会的老魏能说会道，口若悬河，我一人去可不行！"因提议："请书记部罗主任同到开封去。"我立即表示同意前往，当晚我们乘坐罢委会派出的公事车，翌晨到达开封。下车后即往南关老君会访问魏荣珊，魏即出迎。魏年四十许，浓髯拂胸，仪表颇英伟，对客落落大方，初疑我为广东人，试操粤话接谈。我笑道："我们是大同乡，可说家乡话！"魏爽然自失，随留客下榻老君会，并循俗例，请我与符圣到南大街浴堂洗澡，浴毕到相国寺餐馆设宴招待，魏待客客气，但神情飘忽，避谈罢工事，且频频外出，历久始返。魏最后乃引我回到老君会，坐定，魏忽屏人向我言道："魏某初不知先生来历，故未敢倾心畅谈，请您千万勿介意。现在确知先生来自北京，关心我们工人利益，非他人可比，我们一定披肝沥胆，听书记部话，陇海东路一切由我承

担下来。您有什么指示只管说吧，兄弟无不照办。”我趁势向魏进言道：“我和王司机是代表全路工会来开封讨论坚持罢工问题的，这次罢工的成功与失败关系到全路几千人命运，事情办好了，就是为大家争得生存权利，挣得工人的面子；如果办坏了，误了大事，个人也不光彩。今天正是胜败关头，只有大家坚持下去，同心合力向路局和军阀政府、法国资本家争取工人大伙利益，千万不能中敌人的反间奸计，使工人造成内部失和。”并晓以革命大义：“工人阶级创造万物，顶天立地，但一笔难写一个工字，工人阶级应无条件统一和团结起来。”劝他认识工人阶级的事业是正义的，工会群众力量比官府强大得多。

魏听后心情颇感激动，忙作分辩道：“任何来自非工人方面的话，我一概不理。我魏某人是手艺工人，靠劳动才能生活一辈子，官场政界的荣华富贵，我都看作水上浮萍，今后书记部的主张就是开封工人的主张，先生你尽管吩咐。”此时符圣从外进来，高叫一声“魏会长”，一边笑道：“梁山泊的弟兄不打不相识，现在咱们该办正事了。”说罢把洛阳罢委会紧急会议的文件送给老魏，老魏不禁哈哈大笑，连说：“我心里已通了，应该把这些道理向大家讲透。”立即传话召开全体工人大会。一会儿大众到齐，魏会长说：“工人阶级应居四民首位，书记部是工人阶级的参谋部，大公无私，一心为革命。现在洛阳罢委会已加入书记部作为工会会员，也就是说我们陇海工会也要加入全国工人队伍作为一个小兄弟。我们开封老君会从今天起也要同洛阳一道加入书记部，改组成为统一的陇海产业工会，这样才能争到我们罢工胜利！”到会会员几百人一致举手赞成。

大会是在老君会前广场举行，场北面摆了几张大方桌，搭成高台，魏荣珊随即请我登台讲话。我首先代表劳动组合书记部慰劳开封罢工兄弟，次说明统一组织建立全路产业工会的理由，说明充

实罢工机构，加强工会基础组织，建立宣传、纠察、互济等方面组织，加强斗争力量，准备长期作战，一切服从陇海全路总工会，不得总工会命令决不复工！最后，把党的政策、北方书记部计划详加说明，强调工人阶级内部应不分彼此，团结一致对付帝国主义、军阀、财阀和官僚，工人内部的问题可由书记部统一公平合理地加以解决。我报告约两小时，听众反映良好，到会全体工人群众对总工会决议热烈欢呼："陇海工会要统一！""北方书记部好！"口号声此起彼落。附近中学校师生围观、听讲者亦数百人，魏荣珊捻髯含笑，高叫"好啊！好啊！"大会当即通过决议，拥护洛阳陇海路总工会加入劳动组合书记部，选举开封工会执行委员会，正式成立开封工会（老君会名称停用）。

大会后二日内魏接连召开执委会，成立各种新机构，罢工阵营大为加强，并请书记部加派专人驻汴会工作。这一切决议实施后，开封工会面貌焕然一新。开封老君会问题解决后，徐州方面也好办了。东线问题基本解决，我与王符圣于次日同车返洛阳。

在返洛途中，符圣给我解释"梁山弟兄不打不相识"这句话的意思。据符圣说，我到洛阳不久，路局即微有所闻，但无法侦知我的下落。事后，《晨报》亦曾报导此事，其中云："京汉工人俱乐部，由京致陇海工人一电，略言北京劳农会长①，日内即可到郑援助一切，望坚持到底。"工人舆论对劳动组合书记部不仅不反对，反认为是工会上司。交通系诸人见木已成舟，无法再反对书记部了，因此凭空捏造一个谣言说，来到陇海路的人并非书记部的人，而是南方政府的探子，派到北方阴谋捣乱的，并特意将这些话通知沿途工人组织，示意他们一体防范，如有发现立即报告路局军警拿获究办，对报告人可以提拔加薪，允许加入交通系。魏荣珊早已闻悉此事，

① 北京劳农会长即指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文虎。

"今见你到来，口操南音，大启疑窦，因请你赴浴，趁你入浴机会，魏亲自搜查你衣袋文件，并将你手携提包详细检视，除盖有北大图书钤记书一册及借书证外，他无发现，遂断定交通系所言不实。由此，魏才对你由虚伪而真诚的欢迎。"

罢　工　胜　利

东路问题解决后全路工人众志成城，声势益张，罢工阵容坚强如铁，无懈可击。于是交通系、路局、外国人等一切威胁利诱、挑拨离间种种阴谋均无所施其伎，敌方气焰一落千丈，武力解决既不可能，旷日持久，损失益重。路局与地方军阀现已失去再度进攻的勇气，舍俯首就范以求速决外更无他途，因向工会表示愿意承认工会所提出的条件，双方遂于十一月二十六日正式签订了复工条件。其内容有十条：

第一条，机务总管，全体工人不承认，兹从宽办，限两个月查明再议。

第二条，因八号门锁闭被诬革罚之二人，准其一同上工。

第三条，洋厂长狄孟，因虐待工人，准将取消。

第四条，因工作忙，夜间加点，以六小时算一工。

第五条，每年终加双工资，每月有两个星期日休息给工资，中国三大节歇工，照给工资，每年应有两星期官假，照常给工资。

第六条，司机、生火，在车应做十小时，以外另行加点，饭资司机每日五角，生火三角。

第七条，按年准给回家来往免票，司机及工头二等票，其余工人三等票。

第八条，各工人加薪，因公受伤者，照给工资，自己生病者，一年愈后准复原差。

第九条，如因工亡故者，恤赏六个月工资；若因病亡故者，恤赏三个月工资。

第十条，开工后小过不准裁人，大过任行。

于是延续近十天的陇海路大罢工遂于十一月二十七日在工会取得胜利后宣告结束。陇海铁路督办施肇曾和路局代表被迫签订十条复工条件的消息一经传出，全路工人欢欣鼓舞，洛阳、开封、徐州各工会同时奉总工会命令复工。

罢工胜利后工会开会决定(一)召集全体工人大会，庆祝胜利；(二)通过组织陇海全路总工会，一切按照书记部所规定工会规章办理；(三)陇海铁路总工会加入劳动组合书记部为会员；(四)请书记部正式派专人驻徐州、开封、洛阳工会工作。中共北方区委不久开始在沿路各站建立党组织。

罢工胜利后，洛阳工会组织工作已复行巩固，乃依白眉珊建议扩大工人子弟学校班次，并加设工人夜校。洛阳以西当时尚无工厂，道棚工人仍有几百人尚未过工会组织生活，并对工会诸事隔膜，当经工会商定由天洋陪同我去西路巡视，并将分散的道棚工人组成小组，能经常过工会生活。当时陇海铁路修到陕州观音堂，乃由工会派轧道车送我们至会兴镇并在道棚住宿一晚，道棚工友从此对工会有了更深切的认识。事毕天洋与我东返，车行抵洛阳迤西五公里处时，突有一个着军服大汉在道旁土山上瞪目窥伺，及车驶近时大汉忽叫嚷停车，工人见其行迹可疑，似为暴徒，大声呵斥。大汉向前接近轨道，意欲拦车，工人不理，加劲摇车，飞驶而过，遥闻大汉仍顿足大骂不止。当时实不知此怪汉为何许人，且意欲何为。事后道棚工会负责人查明，系当地交通系所派遣的刺客云。

从会兴镇返洛阳后，我拟动身经郑州返北京，天洋告我陇海全路只有徐州工会处在最东地区，平日几乎鞭长莫及，愿乘此机会陪我循陇海路东行，直到徐州，借此可巡行全路一次，为巩固基层作

些工作。我当即赞成，遂决定东行。工会乃派天洋及二委员陪同前往。我遂于十二月初乘车向郑州进发。临行，白眉珊率学生一队到车站送行。学生唱自作陇海罢工胜利歌，握手道别时道："此地一别，不知何时复会？"

车到郑州时，郑州陇海路工会及京汉路工会黄文渊父子等五十余人均到月台会见，文渊对我说："东去沿线安徽帮工人居多，可令璧成同往，诸事方便。"我和天洋遂请璧成登车同行。

我们一行五人同车东驶，车过中牟，璧成言："前面商邱站为东路大站，有程胜贤为皖帮工人领袖，下车可见到东路工会规模"（程在桥梁厂作领工，桐城人）。因事先已电话征求程的意见，程表示欢迎。车到商邱站时，程胜贤已率领下班工人数百人到站迎候，引导我们到工会住宿。当晚召集全体工人讲演大会，讲演后并依照洛阳工会规章，选举各部门组织，至是工会阵营更趋统一。

次日，程送我们登车，各馈香芹一束，情意至殷。并以电话告知徐州车站工会沿途招待。我们一行离商邱车站向徐州进发。车抵铜山北站，时已日暮，徐州工会会长及黄钰成等人在车站迎候，工人数百聚集月台，手执灯笼火炬，引至工会休息。但见工会内外电灯通明，门外旷场高悬煤气灯，中央扎彩搭台，室内炉火熊熊，所有木器家具床褥均系新置。工人家属妇孺熙来攘往，如过元宵灯节。饭后即举行欢迎兼同乐大会，庆祝罢工胜利，演出山东、河北琴书，池州小戏节目，会场群众称兄道弟，欢笑喜谑，热情洋溢，直闹到深夜始散。

工会会长当晚召集工会委员座谈，在座诸人来自全国各省，亲友遍布南北铁路、矿山、轮船及诸大城市工厂，彼此互相介绍，提出一张几十个同乡、熟人的介绍名单，作为推广书记部报刊通讯联络参考之用。这个礼品后来为书记部在全国范围内工作提供了极大便利。

在徐州停留几天，璧成与钰成夫妇导游云龙山、戏马台、子房山诸胜。我离铜山时，正值深夜，璧成、钰成、天洋、符圣以及当地工会委员、工友群众数百人齐集月台相送。天洋在车快开动时与我握手惜别，口称："文虎兄，你此来可谓雪中送炭。"

陇海罢工胜利后，工人群众阶级觉悟普遍提高，沿路各大站开始建党建团活动，于是下列诸处在一段时期内先后建立有党组织：洛阳为王符圣、游天洋、白眉珊以及后来的王忠秀等；郑州：魏士珍、李泊之、郭启先等；开封：魏荣珊、马景山；徐州：程胜贤、黄钰成等；商邱：王连陞、姚鼎三；连云港：萧学文、韩森青；观音堂：傅敬宗、水湛寅。同时并成立社青团的组织。

我从徐州北行至德州，瑞俊来会，报告山东近日情事。抵天津北站，安存斋来见，三人同车返北京，时已十二月上旬(10日)，此行前后历三星期。三人先到区委见守常诸人，久别重逢，晤谈甚欢。守常说："文虎长时行旅劳顿，且先回西斋，洗浴换衣休息，明日长谈。"

翌日为星期日，天气晴明，守常邀大家到西城后闸寓所召开北京区委全体会议。会前厨司老李做了一顿白菜饺子，大家饱餐后开会，先由我汇报了陇海路罢工情况，大家谈了意见。为了表示庆祝，会后，由到会诸人自由唱歌，弹琴讲故事，说笑话，并未讨论其他繁剧问题。

会后，梅羹说："文虎离京数日渺无音信，道路纷传河南拿获煽动罢工南方乱党，北京区委乃派老曾前往查明事实真象。但是他到郑州后，无法赴洛阳，又见风头不妙，乃在郑州住了几天，悄然回到北京，向区委谎报：陇海罢工业已平息，文虎下落不明。守常初信以为真，十分着急，数日后始得确实信息，非常生气，责备老曾荒唐，说他'平日无一事可靠'云。"又吴汝铭言："陇海路罢工胜负未明时，该路交通系员司组织原想把持洛阳工会，收为己系工具，后

来各项阴谋均未奏效，眼睁睁看到陇海工会正式加入北方书记部，不胜气愤，逢人便攻击书记部做不花本钱的买卖，全凭口舌之力把陇海铁路工会几千人一古脑儿拉过去了！”

后来洛阳吴佩孚特派白坚武到北京大学向金刀（指守常）追询此事经过，守常略具以告，白回报大帅。吴说：“这次北大书记部人在北方铁路与交通系斗法，居然神出鬼没，打败南方财阀，他们确实有些办法哩！”

王会长舌战西宫

不多日子，眉珊托人自洛阳捎一信来北京，他向我详告陇海西线新闻颇多，并说：陇海罢工胜利消息传到西宫后，吴子玉大为震怒，对左右说：此举扰乱治安，目无法纪，工人无知，谅不敢出此，必另有人煽动。吴左右对云：“听说北大学生，什么书记部从中策划。”吴说：“此断非小事，亟应查明实情，以凭究办。”因派副官田某到工会传会长到西宫问话。工会主席王同志闻讯坦然前往西宫会谈，座中军法处长出见，态度傲慢，出语不逊，发问道：“大帅有令，你们工会目无法纪，行动自由，按法规难容，以后诸事要小心在意！”会长大声抗议道：“快快收起你这套屁话，否则咱就拒绝和你们谈话了！”其时，吴的秘书在旁见军法官谈吐粗野，王的态度倔强，知其不可以力屈！乃起立转圜，向王婉言道：“请您千万不要动气，不必计较。我们大帅对工会是很尊重的，有话请从容细谈，平心静气。”王会长答道：“咱来是同你们讲理的，不是来同你们抬杠的。”秘书说：“欢迎评理！谁敢逞强！”王接着说：“你们是扛大枪的，咱们是开火车的，挥锄头的。师长是属陆军部，咱家是属书记部！谁也管不了谁！咱工会权利条约是经北京政府交通部同意批准的，想大帅也知道，咱们井水不犯河水。如果礼尚往来，说公道

话，那么你好，咱好，大家好，以和为贵。如果有人要逞强的话，那么就是破坏和平，文来文对，武来武打，咱们也不怕。书记部一声令下，全体铁路工友就行动起来，那时再见高低吧！”

这番话，理直气壮，把对方听愣了。秘书半晌不语，仔细一想，双方再僵下去，恐怕会闹出乱子来，那时就不好办了，不如顺风转舵，乃改口道：“我们大帅也是一片好意，千万不要误会！我们既是一家，以后有什么事，大家尽管好好商量。”王会长顺口答：“这样就好，大家省事，和气生财！”说毕，扬长而去！王离去后，吴同幕僚商量，大家觉得“劳工神圣”通国皆知，工会羽翼已成，人多势大，气焰正盛，不可轻侮。如一味硬碰，火上加油，再出现罢工情事，舆论指责，反棘手难办，不如因势利导，顺应舆情，实行釜底抽薪，方可以收拾人心，减少阻力，以图大事。吴闻此议论，亦以为然，于是决定发布谈话，通电全国，声称“保护劳工”。并派秘书到工会解释一切，宣布政府德意。工会见吴软化，经委员会开会研究，决定将计就计，乘机要吴禁止军人干涉工会，两相和好，如同一家，吴亦应允。于是工会借劳动节机会举行工兵联欢大会，西宫士兵纷纷来参加，双方群众意气融洽。事后吴闻悉，大为不安，说：“工会此举显系拆我的台”，但既允于前，亦无可奈何。

由此以后，吴乃包藏祸心，待时而发。

陇海路大罢工胜利结束。过了些时，中央及国际代表先后派专人北来考察此次罢工详细经过，并带有总书记陈独秀写给我的亲笔信，信中有云：“陇海罢工捷报先传，东起连云，西达陕西，横亘中州，震动畿辅，远及南方，这是我党初显身手的重大事件。已派大汉① 等北来，盼兄放手做去，勿稍停步，如有需要，当尽力之所及，作君后盾。”何孟雄笑道：“这总算是好话头！我们大家鼓足气力向

---

① 大汉即李震瀛。

前干吧！”

陇海铁路工人一九二一年举行的这次全路性大罢工，确实是我党在工人运动方面的一次创举，一次大规模的尝试。参加领导这次初试的许多同志，如游天洋、白眉珊等，大都在大革命前后牺牲了，他们所开创的事业，和他们所付出的艰辛努力，值得永远流传，他们个人的事迹亦应得到褒扬。但由于年代久远，留在我记忆中的具体情况已经很模糊了。所幸的是，上海“一大”纪念馆收存的一本由我在一九二六年编写的小册子——《革命战士集》第一集中，尚保有纪念游天洋同志的一篇短传，现援引如下，以志怀念！

游　天　洋

天洋名泳，福建闽侯人。年十八毕业于唐山交通大学（即北洋路矿学堂）。一九一九年，被派往粤汉铁路武昌城外鲇鱼套车站实习。君幼性孤介，随兄游学南北，卓然自异。学成后见社会黑暗，民生惨淡，慨然兴改革社会之志，自到鄂任事，常觉职务与所志相距甚遥，居恒郁郁寡欢，纵情游览，不以职守为念。

武汉三镇为长江上游最雄胜之地，江山风物，壮观绝伦，又兼轮轨四通，产业茂盛，为多数人口集中之区。天洋初至时，徘徊其间，胸襟为之一振。旋见帝国主义的疮痍遍地，军阀政治之横暴腐败，劳动贫民生活之黑暗惨酷，怒焉心动，屡思辞去职务投身其间，终以人地不习，情格势禁，无入手办法。

时北京政府为北洋军阀段祺瑞当政时代，段氏鹰犬张敬尧盘踞湖南，仇视湘民，肆意劫掠屠杀，蹂躏三湘七泽几无一片净土。他犹以为不足，听了一位湘绅的建议，划分湖南为九大鸦片区域，勒令全湘农民栽种鸦片，由张按亩抽税，预计一年收入可达一万万元以上。张敬尧发现这一金穴，于是秘密向外购得大批烟种，由湘鄂

铁路运入湘境，强迫农民播种。

一日，天洋在车站办公室运货单上忽见有七十万包鸦片种子待运长沙，大为诧异。后多方访问，才知道上述原委，不由气愤已极。他想，如果这大批毒物运往湖南后将发生一场怎样悲惨的结果！湖南全省人民均将被这批毒物坑杀，就中最受影响的要算是贫苦农民了，因此，他便决定破坏张敬尧的计划。此时车上已满布武装兵士，是预备押运烟种往长沙的，一切布置停妥，只待下次货车起运。天洋即日将这消息暗中电告长沙、上海、北京各公团及报馆，要各地发起严重抗议，一面秘密向武汉各界及旅鄂湖南人民团体报告，要求他们即日用群众的力量截运，自己却驰回车站设计将车厢压住。

自天洋将这消息公布后，果然不到两天，全国舆论沸腾起来，张敬尧闻讯大惧，深恐功亏一篑，急电鲇鱼套车站火速起运，并严厉责备押运军官迁延误事。军官再四交涉车辆，均为天洋从中阻止。事为张敬尧所闻，便下令捕杀天洋以泄愤。当军队到车站谋杀天洋时，天洋前数分钟已得报告急避匿一货车内，卒为兵士发现，弹如雨下，向货车袭击，天洋急逃奔另一月台。适遇武汉学生队伍来站堵截烟种，群众呐喊之声自远而至，才将军士逼退，救护天洋出险。经过这次事变，张敬尧的罪恶愈形暴露，湖南人民驱张的空气骤行紧张起来，张氏为固位计，遂将烟种全数销毁，以谢湘人。因此衔恨天洋益甚，声言非杀天洋不止。天洋为避仇计，随即辞去粤汉路职务。

天洋自离武昌，仍回北京居住，情怀落寞，无以自遣，后来独自一个赴蒙古作长途旅行，张家口、晋北、多伦、库伦、满洲，均有他的足迹，历尽塞外险要而归。在这次旅行中，天洋身体与精神均受了一番自然的陶冶，信念愈坚。他自言，从那时候起决守独身主义，以便无挂碍地献身社会革命。

一九二〇年苏维埃俄罗斯的革命风云渐渐越过西伯利亚的莽原吹向远东来了。天洋在当时报纸和杂志上常常注意世界革命的消息和理论。一天，他猛然省悟，组织群众是革命事业的基本战略，劳动群众尤其是革命的先锋队伍，他自觉应该即刻投身到工厂做工去。于是便到洛阳在陇海铁路局觅了一个员司的位置。他到洛阳后渐渐觉得所要做的事稍有门径，他开始联络铁路工人，指导他们组织。可是事属创造，社会人士讥笑他和反对他的人正自不少，即工人自身亦沉沦于数千年封建的传统中而不容易觉悟。天洋经过众多的障碍，克服了无数的困难，几个月后，陇海路工人便在老君会名义之下号召起来了，组织略为就绪，陇海路总罢工潮，便在中国劳动运动史上第一次爆发。

正是一九二一年冬季，天洋领导工人群众，宣布陇海路总罢工，并提出有名的十四条件，发布反对法国总管宣言。此时北方社会骤见到空前的大罢工，人心惶恐不可名状。北京政府尤为震惊，陇海路工人的革命烽火在天洋煽动之下照彻大河以北，大有使军阀官僚不敢鄙视之概。

陇海路上爆发的罢工在中国北部既是一种惊人的创举，军阀官僚的交相破坏，社会人士的怨言毁谤，危疑震憾，艰难自不待言。天洋奋勇格斗，不稍顾忌。经过一星期后，胜利毕竟属于工人了。罢工胜利后，天洋在陇海工人群众中俨有宗教的魔力，会务发展日益千里，天洋便乘机整顿全路组织，引导他们走上正确革命的大道。

先是罢工时，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文虎君闻讯前往，抵洛阳得晤天洋，与共议攻守之计，事后即介绍天洋加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至是陇海铁路工人组织之老君会遂正名为陇海铁路总工会。

陇海铁路罢工胜利的影响广泛深入全国工人群众，尔后，一九二二年，铁路、海员、矿山、机器等工人异军纷起，摇撼整个军阀政

治，构成中国革命历史上最光荣的时代，便是继续这次罢工的扩大运动，所以他的意义是很伟大的。天洋自是索性辞去路局职务，专任陇海铁路总工会秘书。他对于工会运动、革命的政治与经济理论后来渐有科学的认识，天洋的思想已走上科学社会主义的正轨。

正当陇海路总工会形成的时候，敌人反攻的战垒亦在开始构筑了。法帝国主义，军阀官僚和交通系等，对于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二十日陇海罢工下之盟是不敢忘记的。他们痛恨天洋，屡以高位厚禄相饵，天洋屹不为动；又屡以武力威胁天洋，亦无效。最后，法帝国主义便建议收买一部分贵族工人，分裂工会以与天洋决胜负。

铁路工人的工资等级是相差很远的，故他们之间的经济利益往往不能一致，遂启敌人觊觎之心。此次路局采用欧洲资本家智慧实行分裂工会的政策，用重赂贿收买少数工人后，陇海工会极少数职员便发生了右倾的错误，这个倾向的渐渐发展，工会内部组织便随而松懈起来。天洋睹状愤慨万分，尽力挽救颓势未见即时恢复。敌人审天洋性忭急，屡遣使激怒天洋，天洋忧愤无极，深自怨愧，遂决计出巡全路，唤起多数群众，驱逐敌探，改组工会。行抵郑州，因过度劳瘁，益以强烈刺激，卧病旅次。天洋在病中越想越气，越气越病，又闻敌方谋之益极，顿失恒态，于某日卒患脑充血症，医治不及，逝世于郑州医院。时一九二二年冬季。

天洋是北方第一个身殉劳工运动的战士。死后，陇海路工人在郑州召开的追悼大会，为北方民众空前悲壮的集合。天洋致死的原因除凶狡的敌人设计倾陷外，最主要的还是他的偏急的个性使然。因为他自到洛阳经过长期繁剧的工作后，性情越发刚暴了，他的处事临变有如暴风骤雨，蓬勃的火焰，令人不可向迩。以这样纯感情的生活，置身极复杂极矛盾的工会运动环境中，自然烦愁与恼怒是时常困扰袭击他的。天洋的生命便在这万分愁劳中负有极重的伤困了。

天洋为人外表颇峻峭，内心充满无限同情，生活真实，奇怀磊落，独来独往，大有古游侠之风。逝后陇海工人群情悲愤，当即激起一个拥护工会的大运动，誓一致团结为天洋复仇。工贼见群众义愤磅礴，相率隐遁，陇海总工会赖此卒保持其统一，历久不衰。至今，河北劳动群众无不知有天洋名姓者。

白　眉　珊

白南薰字眉珊，河南洛阳人，清末秀才，曾任陇海路洛阳劳动补习学校教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年已四十二岁。一九二一年冬，文虎为陇海铁路罢工事至洛阳时，白自请参加罢委会工作，参加决策，多出奇谋。并亲任向导，随同分赴工地从事宣传、组织工作。罢工胜利后，曾至北京，遍游长城内外各地，自言："河源飞鸟外，雪岭大荒西"皆曾亲历其地。据称青年时期曾步行经年探黄河河源，河源在西宁西南方玛多县，距西宁二千余里，高山湖泊错列其间，藏族居住地人烟稀少，全县不足万人。归途又探汉水源，在嶓冢山，其地虽迩，但居民稀疏，住户也少，在高山洞壁里有远古文字图形云。其汴梁怀古诗云：

驱车过宋门，城阙荒草深。
昔年魏公子，访隐见侯嬴。
笑谈决大计，功名安足论。
慷慨思猛士，卓荦殊不群！
怅望樊楼渺，俯瞰大河横。
萧萧疾风劲，日暮卷黄云。

眉珊尝说："今日国事紊乱，主要由于物质与精神俱失去重心，所以人心思乱。因为物质平衡则万物互致其用，偏则助长私欲，怀忿逞争，举国不宁。吾人今日从事工人革命亦所以顺应时势，如峻

坂走丸，非及地不止。”

我在罢工斗争胜利后离洛阳东去，登车前夕止宿于洛阳子弟小学，与白眉珊联床夜话，聆白所言，学识渊博，高人一等，深觉吾辈生晚，相见恨迟。

临行眉珊出纸笔，嘱留书作纪念，我即书一联相赠，联云：

东观沧海月

西揽太华峰

上联指连云港，下联指陕西华山。

一九二三年，我离开北京到上海中央局工作，旋又出国赴欧洲工作。由于天各一方，工作繁忙，迄未通音信，稍后乃知眉珊与王忠秀诸同志，均不幸遇难牺牲，悲不自胜。

十三、东方民族大会

东方民族大会，即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是列宁在世时于莫斯科召开的。先是一九二一年十月，第三国际派出两名代表来到北京。他们到北京大学后直接找到了北京区委。第三国际的代表均较年青，象是大学生，他们没有翻译，能操英德语言。他们谈话的主要内容是，说明召集东方民族大会的意义。由于东方各民族共产党刚刚成立，还比较幼稚。组织还不够强大，所以需要召开一次国际会议，组成广泛的联合阵线，以利于各国的斗争。他们还具体谈到会议代表名额的分配问题。东方各国共去二百五十名左右的代表，中国代表为五十名，这些名额由中国南北各区按比例分配。这只是原则规定，具体的安排，可由当地的党组织决定。代表在北京住了几天，商洽此事。关于北方代表的产生，由北方区委确定。至于南方代表可由上海商量决定。国际代表一再强调，各党派各民众团体都要有代表，特别注意要容纳有代表性的人物参加。

这是北京区委首次接受共产国际交给的任务，自然十分重视。经区委研究决定，北京区派出的党和工人代表有张国焘、邓培、张太雷、梁鹏万、高尚德、贺昌、李守常和我。后因我与守常有其他工作，没有启程。山东派出的党和工人代表有王尽美、邓恩铭、王志坚、王象舞、王复元等；山东省民众团体代表为山东省议会议员王乐平。武汉学生代表有林育南等。广东机器工会代表有黄凌霜（无政府主义者）等；广州妇女代表黄璧魂（女，无政府主义者）。直

隶学生代表有于树德等。安徽全省学生联合会总会代表有宋伟年、夏揆予、马章禄、唐道海等。此外，瞿秋白以《晨报》记者身份参加大会。还有胡公冕和柯庆施也参加了大会。柯是从北京走的，但不知道他是北方代表还是南方代表。南方还有俞秀松也参加了。党外人士江亢虎也是代表之一。

各地代表确定后，分两路出发。北方的代表在北京集中，经满洲里进入苏俄。南方代表在上海集中，经海路在海参崴登陆后，坐火车到莫斯科。这是一条地下路线。

当时，苏联内部还不很稳定，特别是远东部分。代表团分组出发，并约定旅途中须随时来信报告小组活动情况，注意集体安全。我们收到他们来信，得知均平安越境，到达目的地。柯怪君（庆施）在旅途中曾寄给我几封长信，报导旅途情况。怪君平日爱好文艺，笔触清新，所写通讯采用章回小说体裁，前后约十回，途中所见所闻均跃然纸上。对于西伯利亚、贝加尔湖冰天雪地风貌、莫斯科革命文物、列宁格勒冬宫等见闻所及，均作了深刻细致的描写，极富感染力。其文稿内部流播，不胫而走，传诵一时。

《工人周刊》在一九二二年二月十二日第二十九号上刊登了一篇特载，题目是《莫斯科的“东方民族大会”开幕了》。是我根据莫斯科的电讯稿撰写的。文章向广大工人读者介绍了这次大会的意义，报道了这次大会开幕的情况，摘引如下，可以了解当年大会的概况：

莫斯科的“东方民族大会”开幕了

“全世界劳动阶级团结的表征；研究太平洋会议所讨论诸问题，远东各国代表百余人参加；演说中还有中国女代表。”

“诸君：‘太平洋会议’是干吗的？就是那些如狼似虎的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几个大资本国商量怎样宰割东方民族——中国尤其是他们的目的物——的会议。我们东方民族到底是听其宰

割呢，还是不服气呢？人心不死，谁愿意做他们的奴隶，做他们的牛马，做他们的桌上菜，俎上肉？既然这样，我们东方民族就该联合起来，反对他们啦。这个“东方民族大会”就是这样发生的。”

“这个‘东方民族大会’，非同小可，完全是我们全世界劳动阶级组织起来的。世界之上，劳动阶级的人最多，我们大家联合起来戮力同心扫除可恶的资本家，推翻这资本家的政府，真是不费吹灰之力。”

“据莫斯科来电，远东各国民族及社会团体代表百余人，本定在伊尔库次克开会，后因他故，改移至莫斯科开。至这个会所决议的事情，大约和‘太平洋会议’所处置之各项议案相符。该会已于一月二十日正式开幕了。”“首由第三国际会长俄人金诺维夫主席致开会词。大意说：‘凡事只怕没有团体，有了团体，就能战胜资产阶级，这是个个相信无疑的。故唯一希望，要全世界劳动阶级一致团结起来作战，自然得到最后的胜利。第三国际和以前各种团体不同的地方，就在不仅要变成欧洲劳动阶级的团体，而且要联络全世界的工人；又不仅要文字上通声气，而且要更为事实上的携手呢。今日以前，我们和东方各国一向不联络，关系很少。这次会议，我们东西劳动阶级大家来商量几个方法，大家来反对‘太平洋分赃会议’，大家来革资本家的命，大家来建设劳动者的世界。’云云。”

“中国代表张国焘演说。他说：‘很好！我们这个会议，有绝大的希望。自此以后，我们劳动阶级，必团结一致；我们各民族间，必联络一气；我们革资本家的命，必一举而成功。’云云。”

“中国女代表王女士演说。她说：‘女子要求平等自由，和男子是一样的。俄国是现今世界上第一个解放女子的国家，载在法律。我们中国女子愿追随俄国，而与世界资本家宣战。’云云。”

此外，还摘要报导了日本的片山潜以及朝鲜、蒙古和美国代表

发言的大意。最后主席鼓励大家，“做第三国际的忠实分子。”

这次会议自始至终是由第三国际主持的。当时列宁身体抱恙，没有经常出席会议。但在会议期间，列宁接见了中国代表，其中包括两名工人代表，一位就是唐山的邓培。中国工人代表见到了列宁是很荣幸的。列宁在谈话中表达了他对中国革命的关怀，鼓励中国工人阶级不断前进。邓培回国后向我详述了列宁接见时这一难忘的情景。

代表们除会议本身的收获外，还亲眼见到了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对社会主义的苏联有了感性认识，瞿秋白还写了《赤都心史》和《新俄游记》。代表们回国后都很高兴，工作也有了很多启示。例如，黄凌霜回国后写信给北方党，说他放弃无政府主义，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江亢虎组织社会党，是社会党领袖（后成了反共人物），他写了本书，讲了苏联的情况。总之这次会议是成功的。

十四、京汉铁路八月罢工的胜利

陇海铁路罢工胜利后，北方书记部开始筹划北方各大铁路矿山的大罢工。按照当时的情况及力量对比，计划首先从京汉铁路实行中心突破，俟京汉铁路罢工胜利后，以次扩张到粤汉、京奉、京绥、正太、津浦、胶济铁路，并向唐山煤矿、焦作地区与六河沟扩展。

当时，长辛店是京汉铁路的中心，因此，中共成立之初我就和张国焘、李梅羹、吴雨铭等先后到长辛店开展工人运动，创办了长辛店工人劳动补习学校、建立工会。一九二一年七月七日出版的《共产党》第六号刊登的《长辛店工会成立》的消息，对当时的长辛店工人运动的状况，作了生动的描述，其文如下：

“长辛店的工人，自‘五四’以来，就有点觉悟了，对于公共的事，很是留心的。今年一月间，他们办了一个劳动补习学校，除招收学生外，还预备好几种报纸杂志，给同人阅看，并且常常请人讲演吸收新思想，所以工人求知识的机会越多，各人的脑袋，也比前清楚。开会的方法，结团体的能力也渐渐地训练好了。

五月间他们又组成了一个工会，办得很有条理。工会的组织，取代议制，由厂里每科选出来的代表，组织一个代表会，代表会推出正副两个主任。工会所有进行的事务，都由这个代表会议决，再由代表会选出几个干事，去执行议决的事项。代表会定每两个星期开一次常会，有问题就讨论问题，没有问题就自由谈话。

该工会现在办了一个《工人周刊》，已出六期，办得很有精神。

他们的努力，实可令人佩服，不愧乎北方劳动界的一颗明星。”

制定斗争方案

工会成立后，我们开始了建党建团工作，由于长辛店地位密迩北京区委，各项工作能及时得到区委的指示，加之本身条件好，所以京汉铁路各站建党工作得以顺利进行。长辛店铁路工人中最早吸收入党的有史文彬，后来又发展了王俊、陶善琮、陈励茂、葛树贵、崔玉春等，成立了党的小组，京汉路的党组织发展较快，后来党在沿线各站如：高碑店、保定、正定、石家庄、新乡、郑州、信阳等站也都发展有党员，当时各站工会负责人和书记部特派员大都由中共党员和社青团员充任。

一九二二年初，陇海路罢工胜利的消息传到各地后，各路工人都很受鼓舞，也想大干一番。长辛店的史文彬、陶善琮等更是常来西斋计议“大举”（意指罢工）的事。大伙说：“陇海已走在咱们前头，咱们再不能伏在窝里不动了。”我对他们说：“京汉铁路工人的组织力量原比陇海要强，但是京汉工人面对的敌人也比陇海路敌人更凶恶，所以不能轻率举动。”老陶说：“这倒是的！凡事应深谋远虑，才能旗开得胜。”大家经过多次商量后，准备集议具体实施方案。这时正值第一次直奉战争时期。一九二二年四月的一天，我们约定在长辛店集议具体实施方案。奉直两军在长辛店作战，一时京郊火车停驶，我先期来到长辛店。二十六日那天，我偕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教员及工会负责人赴铁路东芦苇荡中开会，见到奉军高级指挥十分轻敌，在指挥车上只顾打牌喝酒，当吴佩孚军队从两侧包围上来，未经激战，奉军即溃败。我们在野外边观战边谈论，最后研究确定了一个方案。

长辛店工人俱乐部这时已形成一个坚固的领导核心。工人顺

口溜评议俱乐部领导成员时说："陶（善琮）善谋，史（文彬）善断，王俊能说会道，冲锋陷阵靠的是崔玉春和葛树贵，天大事有北方书记部扛得住。"俱乐部组织亦日臻巩固。开始规划筹备京汉全路总工会，四月上旬在长辛店曾召开第一次筹备会，讨论成立全路统一的工会组织，并以三个月为期，发展和健全基层组织。

所以，这次初步方案也和严密基层、肃清内奸有关，组织不纯就无法进行对敌斗争。另外就当时工人存在的最迫切的要求和生计问题，集中成十二条，作为向路局斗争的要求，发动俱乐部的工人进行讨论，最后再由俱乐部审慎研究确定。

五月，长辛店俱乐部将十二条取舍整理成简单明了的八项条件，作为向路局提出的要求，并为实现这一目标，加紧准备。其时，北方书记部经常有人驻守长辛店，领导基层会议，反复研讨各项具体问题。某日，在俱乐部会议上，在讨论到行动问题时，吴容沧说："现在俱乐部一般准备工作已经差不多了，要打大仗，目前应先打一个小仗。"史文彬接着说："不错，老吴说的有理，家贼不除，工人不得安宁，这一仗是少不了的。"随后大伙把话题转到如何对付大工头邓长荣的办法上。原来，邓长荣是京南一霸，从长辛店建厂以来便独霸一方。他纠合无赖，自组帮会，部下人手颇多，可谓文武齐全，同时邓又是交通系走狗，专事欺压工人，工人们无法对抗，只得忍气吞声。平时他还勾结地方官吏，经常对居民作威作福。不斗倒邓长荣，不用说工人抬不起头，就是地方居民也不得安宁。最后，吴容沧说："我看这家伙很顽固，别的办法不一定有效，还是先揍他一顿再说。"此时大家都表赞同，当即推定老吴、老崔几个人负责，由陶善琮制定斗邓长荣的周密方案。

这次采用的是武斗方案，在年初，我们就委托留学巴黎的罗海潮先后购买勃朗宁手枪几枝运回国内，方法是他在巴黎旧书店买大型字典一册，将书内按手枪形式挖空，其形状与手枪相吻合，把

枪嵌入其中，然后将书密封交邮，寄到北京大学，因字典又重又厚，国境检查容易忽视，得以蒙混耳目运到国内，工会有了少量手枪，与邓长荣斗争，遇到发生武斗场合，大家也就不怯场了。

一九二二年六月的一天中午，邓长荣下班返家途中，走到两个小土丘的夹道处。只见老吴立在土丘上，大吼一声，预先埋伏的一队工人奋力向前，真是迅雷不及掩耳，邓长荣还没有弄清情况，已被工人推翻在地，拳足交加，狠揍了一顿。邓的手下人闻声赶到，向前施救，又被埋伏在旁的另一队工人挡退。邓见势不妙，跪地求饶，老吴当场教育了他一番，然后才放他回去。陶善琮事前告诫行动的工人，对邓只施薄惩，促其醒悟，不得流血，不准伤筋动骨，造成重伤。这次行动就是按此计进行的。行动结束后，即由吴春熙等具名向宛平县递了一张诉状，诉说邓平日劣迹，近又于某日下午因细故在厂殴打工人，工人同他说理，邓不但不听，反追逐工人至厂外大打出手，并列举人证物证，请求拘邓到案究办云云。同时又向北京地方法院、检察厅提出诉讼书，诉邓平日作恶行为等事。邓既受创，忿忿不平，一面声称要施行报复，一面往法院申诉。据此，俱乐部乃部署更大规模的决斗，严阵以待。并动员俱乐部全体工友与邓对抗。同时书记部通过劳动通讯社发布新闻，并由北方书记部在北京邀约记者前来，报告邓的劣行及殴伤工人案情。一时京中各报舆论，纷纷表示同情工人，不直邓长荣所为。邓归厂后，正图谋报复，并要宛平县发拘票捉拿工人，县知事说："此事越闹越大，已引起舆论界注意，况俱乐部方面上千人，书记部上万人，人多势众，不管用文用武，人家都比你强，如果再闹下去，恐怕你下不了台。"随后，地区检察厅传邓到案听讯，各地工会申讨邓罪行的文告如雪片飞来，邓自知处境险恶，乃央求俱乐部成员谢德清等致意俱乐部，表示愿意服罪，请求撤回诉状。史文彬乃决定允其所请，并由长辛店俱乐部向邓长荣提出：要邓向工人谢罪，限于一星期后离

开长辛店回天津老家去，同时向法院撤回自诉，邓都一一应允。从此长辛店巨憝既去，人心大快！

对这次斗争，《晨报》曾连续作了报导。该报于六月二十日发表的《长辛店工人驱逐工头胜利》一文中说："长辛店工人，攻击工头邓长荣"，"态度极其坚决，誓非达到驱邓目的不止"。"经过坚决不懈的斗争，结果，邓于十四日下午出具悔过书，声明'誓不再在长辛店工作，为工界罪人'，并亲向宛平县声请撤销控告学校教员及俱乐部职员之案。于是此事遂告一段落，一时长辛店工人为之大快云。"《北方红星》一书也曾记载当年长辛店车辆厂木工马朝龙纪述此事所编写的一首歌谣。后来据说，邓长荣在离长辛店时向其亲信说："我半世英名，竟为几个毛头小子（指书记部学生）所毁，这番算把我断送了，真是意料不到！"

八　月　罢　工

工人内部主要障碍既已排除，人心振奋，于是全路大规模斗争的时机更加接近，全体工人众志成城，人人思战。八月二十日左右，书记部召集长辛店党与俱乐部负责人到北京开会，讨论有关发动斗争的行动规划。会议对罢工纲领、组织行动等作出了最后决定，并确定二十一日向路局正式提出八项条件。北京方面并将有关罢工宣言、传单等印好，送往长辛店备用。我也于同日晚乘车到达长辛店，住在俱乐部罢工指挥机关铁匠营附近的工友家中。

上项条件提出后，路局局长赵继贤故作镇静。赵为人极为狡诈，平日对书记部防备极严，屡思拉拢工人领袖，行釜底抽薪之计。他曾设法妄想收买书记部，并暗中窥伺俱乐部弱点，意欲蹈瑕抵隙，出奇制胜。因此他第一步采取拖延政策。俱乐部烛知赵的奸谋，立即决定举行罢工，予以反击。再次日北京各报（一九二二年八

月二十五日）刊布了长辛店工人全体罢工的消息。《晨报》在《京汉路工人昨日罢工》的大标题下，详细报导了这次罢工的有关情况：

“京绥路局职工罢工风潮，尚未完全平息，继之而起者，昨日（二十四）又有京汉路大罢工事实发现”，“先是京汉路局全体工人因生活日昂，工资不敷支配，向该局要求加薪，并对于工人之待遇上，亦提议请稍加优渥。路局当事左支右吾，毫无确切之表示。迨二十二日，工人方面作最后之要求，路局始漫应于二十三日正午十二时当有圆满之答复。及期，工人代表晋谒路局当事，仍是敷敷衍衍。工人大为愤激，各代表遂在长辛店工人俱乐部集议，讨论对付方法。结果决定坚持永久罢工，不达目的，誓不转圜。此掀天动地之罢工潮，乃一发而不可遏矣。”“工人既全体议决罢工，于是由北京、长辛店、琉璃河及各地铁路之工人，集于长辛店者有三千余人，共同议决八个条件。”工人向路局提出八项条件后，手执白旗，上书“不得食不如死”，“打破资本专制”，“情愿一死”，“不达目的不止”，“劳工奋斗”，“打倒国贼高恩洪”等字样，满布于长辛店一带。

这次罢工开始后，长辛店大厂工人全体罢工，长短客车亦一律停驶，工人纠察队维持秩序，井井有条。罢工后一日，交通系即谣称罢工乃南方乱党谋乱，并指使流氓分子阴谋混入厂内进行破坏，阴谋嫁祸工人俱乐部，以便为军队进驻工厂造成口实。但俱乐部预见及此，早有防范，当场捕获破坏分子谢德清、韩哲、于庆江等。

政府当局见俱乐部布置周密，敌忾同仇，万众一心，无懈可击，一切狡计无由得逞，深惧罢工扩大，影响其他各铁路，不堪收拾。乃于罢工第三日双方举行会议，同意下列各项条件：

（一）开除总管郭福祥，另有数人查实撤革（工头黄绵锦、王龙山、谈荫棠、徐家楣均革职）。（二）工人俱乐部有推荐工人之权。（三）北段自九月起，中段自十月起，南段自十一月起，工人每日加薪一角。（四）短牌换长牌，凡做工过二年者一律改为长牌（长牌为

正式工人)。(五)司机工薪凡递进至最高工薪者即为头等工资。(六)凡奉直战争开车升火工人,应开列名单候奖。(七)北京、琉璃河、高碑店等处须盖立官房,以便开车工人休息。(八)长辛店酌筑休息房。(九)工人因公受伤者在患病期间不得扣薪,并承认在罢工期内不扣薪。路局签署条件后经过长辛店工会委员会同意,乃于一九二二年八月二十七日下令复工。罢工结束后,工会提出解除法国厂长札曼(Chaman)职务,遣送回国。一九二二年八月罢工以前六任长辛店大厂厂长均法国人,至是废除外国厂长制度。

八月长辛店罢工结果,据路局估计,全路工人,每人每月增加三元,每年增加三十六元,全路三万人每年应增加工资一〇八万元,附列经济条件并入计算,不下二百万元。其他各路若准此推算,路局增加开支近千万元。低工资工人每年增加三十六元,生活亦有所改善。当时工人中流行一白话词云:"书记部,真不赖!(意为真不错)立工会,多自在!领头罢工有担戴,长工钱,歇礼拜,年节包饺子,姑娘把花戴!今后谁禁咱罢工,咱就打破他们的脑袋!"此词传为陶善琮等共同写作。京汉路罢工伟大胜利就北方全局说,可说是对敌人施行中央突破,连弩射敌,敌方遂陷于全线动摇。随后粤汉、京绥、正太、津浦、道清、沪宁、沪杭、胶济各路,远及关外中东铁路等风起云蒸,连续爆发近十次的大罢工,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造成空前壮举!

八月罢工谢函

京汉铁路八月同盟罢工的胜利,是京汉路广大工人群众在中共领导下坚决斗争所取得的一次辉煌胜利。这也是和全国各地工人群众积极声援和支持分不开的。八月罢工胜利结束后,全国各地工会组织函电交驰,纷纷询问罢工经过。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召

开了隆重的庆祝大会，会后由我执笔以长辛店工人俱乐部的名义写信给全国各地工会，公开答谢各地阶级弟兄的支援。该信现存北京中国革命博物馆，兹录全文如下：

职工会列位工友钧鉴：

我们罢工风潮已解决了，已于二十六日照常工作了。我们这次罢工，经过的日子不久——二十四和二十五两天——可是经过的困苦却不少了！如狼似虎的军阀，竟以为我们是暴徒！但是早在我们预料中，所以我们万死不辞，虽肝胆涂地而勿怯！可笑我们只坚持两天的时日，那班军阀和京汉当局就屈服于群众势力之下，把我们所要求的条件俯首应允了！我们知道你们很挂念着，所以特地将这个喜信报告于你们，一方面还要特地感谢你们！你们这种互助精神，我们真是刻铭肺腑呵！此后，还望彼此努力，同奏凯旋之歌！

敬祝劳动者胜利！ 顺祝

工友们康健！

长辛店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敬启　　八月二十七日

这封信的前段说，这次罢工经过的日子不久，但经历的困苦不少，“我们万死不辞虽肝胆涂地而勿怯。”的确，八月罢工从四月初准备到八月底胜利，是经过四个多月激烈复杂的斗争，全体工人不畏艰险，英勇战斗，胜利真是来之不易啊！

感谢信的后段对全国工会站在革命正义的立场，大公无私地对八月罢工给予全力支持，包括道义的与物质的慷慨援助表示感谢，这种出自阶级友爱的互助使人铭刻肺腑，同时也表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工人阶级精诚团结、奋勇克敌的大无畏精神。

粤汉路罢工

八月罢工的胜利，推进了各路工人运动的高涨，罢工斗争接二

连三地兴起，粤汉路最先接火，举行了罢工。

八月二十七日，京汉铁路工会决定下达复工命令。一周以来，为了应付瞬息多变的斗争局面，大家白天黑夜，通宵达旦，食不甘味，寝不安席，至是始获休息。当大家正在开会讨论复工后有关问题时，忽北京来人说，区委有急事要我火速进城。会议开完后，我立即往外走，大伙说："吃饭再走。"来人说："回去再吃。"老史、老陶齐说："我们送老罗回北大去。"于是四人乘车回京，在车上一面谈工会事，一面啃着火烧馍。火车到站后我立即赶到北大西斋。时粤汉路工会已派人抵京，报告该路正酝酿斗争，郭静笳来信称该路形势十分紧急，要求北方书记部派得力人员前往该路助战。同时，京奉铁路、山海关、唐山及开滦五矿亦来人报告正在准备斗争，因此，我回京后，北方区委立即召集会议。在区委会议上由老史报告长辛店罢工经过及胜利消息，大家甚为振奋，会场上顿时充满一片欢快声。会上讨论了粤汉路、京奉路及开滦五矿斗争问题，讨论结果，会议决定由长辛店工会选派两人偕同粤汉路代表即日动身回湖南去，帮助他们组织斗争，并由长辛店将罢工中的存余款项先行提出一部，作补助粤汉路办公费用。关于京奉、开滦方面问题，决定我即日动身往唐山，先召开唐山党团会议再行酌情决定。北方书记部也派人前往粤汉铁路帮助组织罢工，不久，粤汉铁路罢工于九月八日爆发。对此，北方书记部发出通知，要全国各铁路工会给予有力的支持，在必要时准备各路同盟罢工助战。粤汉路经过十五天的罢工，终于胜利结束。当时北方书记部主要任务为开展北京迤东地区铁路矿山工人联合大罢工，我自唐山返回后，复于十月一日前往唐山，随即驻唐山参加领导京奉路与五矿罢工。

十五、北京迤东地区的罢工斗争

规 划 和 起 步

一九二一年底，在陇海路罢工胜利的基础上，北方书记部进而考虑下一步工作，为要贯彻党中央大力发展工会组织的指示精神，亟需对北方地区作全面规划，提出一个方案来。北方书记部一向把产业工人的发动和组织工作摆在优先的地位，经过多次研究，除对几条主要铁路工会作了规划外，还着重讨论了在北京迤东的工业地区开展工作的问题。这里包括从山海关到天津、唐山一带，是北方最大的产业工人聚集地，总计约五、六万工人，他们分布在京奉路各站和唐山铁路制造厂，以及开滦五矿、启新洋灰厂、华新纱厂等大型工矿企业中。

这一地区的政治、经济地位都十分重要，它还是北方的交通枢纽。京奉路斜贯其中，经山海关直达东北三省，为去东北必经的咽喉要道，东面临海，有当时北方最大的吞吐海港秦皇岛，可通往南方各口岸和世界各地，为国际贸易的重镇。开滦的煤矿资源丰富、质地优良，生产我国唯一能用于出口的原煤，当年主要为英国所垄断。唐山地区在国际贸易中居重要地位，因而它对世界的政治、经济有一定影响，曾是英、日等帝国主义争相角逐的场所。它的位置又密迩首都与天津，对国内政治也是敏感地区，能起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因此，如能在这一地区，发动数万工人组织工会开展罢工斗争，这对全国的影响能起到高屋建瓴的作用。

由于这一地区的重要，帝国主义者和军阀政府、北洋财团、交通系等等官僚政客集团都插手其间，也是他们利益的所在，因此控制也是十分严厉的，“卧榻之侧不容他人觊觎”。可以想见，在这里发动工人斗争，其阻力和将遇到的困难是相当大的。当时，书记部同人都很年青气盛，在认准其重要意义后，就不计成败，努力去做，务求有一结果。事后回顾，虽有考虑欠周的地方，但毕竟通过实践，收获是不小的。主要是锻炼了干部，增长了才干，扩大了党的影响，涌现了一批工人出身的革命领袖，如邓培、梁鹏万、王麟书、阮章、只奎元、李兴昌、袁乃祥等和一些优秀干部如王尽美、吴先瑞、彭礼和等。

书记部的规划，是从京奉路入手，组织工会，逐步扩大影响，使开滦煤矿和唐山的一些城市工厂也组织起工会来。而京奉路则又以山海关和唐山制造厂为基点，建立一个全路的统一工会组织。与此同时，开展建团、建党工作。在铁路、矿山和城市工厂工会的组织初具规模后，一伺条件成熟，就发动一场全区性的经济和政治的同盟罢工，以求改善工人的境遇为目的，从而使工会在工人群众中的威望日臻巩固，才能把所有的工人都团结在革命工会的旗帜之下。这一种设想和计划，所要达到的目标虽然有限。但在当时，要实现这一目标，发动一场同盟罢工，真正把工人都组织在书记部领导下的工会中来，却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京奉路的工作当时已有了一些基础。很早我们就到过唐山从事调查。我们和当地唐山大学（原北洋路矿学校）的同学有过联系。我记得第一次去找线索，是我和两个北京的学生到唐山大学的。我向那里的同学说明来意，想找唐山地区铁路、矿山及其他方面的工人聊聊。他们当即表示愿意一道来做，于是我们双方联合进行。首先调查唐山产业工人的生活状况，调查之后，曾写了一个很长的报告，登在《新青年》（七卷第六号）上。通过这次及其后多

次调查，使我们对唐山情况有了比较充分的感性认识。当年，京奉路在唐山有一个广东会馆，在铁路、矿山工作的广东籍技术工人都集中于此，所以我们就从这里着手。我们通过访问工人，慢慢地发现了他们当中有一个叫邓培的，是铁路车辆厂（南厂）的技工。于是我们就去见邓培，前后找了他好几次，他很健谈。我们对他也逐渐有了了解。

邓培是广东香山人，祖父、父亲都是产业工人，邓培进过技术学校，能看图纸操作，还懂得英文并能讲点英语。不会说普通话，有时他说广东话，我们听不懂时，他就用英语来表达。邓培为人正派，思想开朗，手艺好，技术高，带有几班徒弟，在工人中间很有威信，是事实上的头领。他告诉我们，唐山在民国元年，就有人来组织过工党，让他去参加，他没有参加。当时参加的人，不少都是技术工人，这些工人受过英国工党的影响，想在中国组织工党，加入的都是技术工人。当时已有了个雏型的组织，但因中国没有建立工党的条件，人数又不多，还没有形成势力，就很快消失了。以后，陈翼龙在北京、天津组织社会党，公开活动，也派人到唐山组织社会党支部（当时宋教仁从日本回来，想在中国搞议会道路，陈翼龙原系日本留学生，可能是受了宋的影响，到唐山来组织社会党）。后来袁世凯下令封闭了北京社会党总部，并将陈翼龙下狱处死。自此以后，唐山工人中再没有人来组织政党活动。所以邓培说："现在你们来组织马克思主义的工会，我是赞成的，但鉴于前两次的失败，你们要作充分的准备。"并表示他愿意参加此项工作。唐山地区的工作，邓培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南厂也通过邓的关系，工作慢慢发展起来了。

一九二一年，经我提出，最后经过北京区委的讨论研究，决定发展邓培为中共党员，他是北方最早的一批工人党员之一。邓培入党后，唐山地区的工作进展更快了。这时，唐山工人俱乐部已经

组织完善了，邓培是俱乐部的负责人，后来又办起了唐山铁路工人图书室，陈列有各种适于工人阅读的进步书刊，如《新青年》、《工人周刊》、《劳动周刊》等。随后，唐山的党组织也建立起来了。

山海关与唐山罢工

一九二二年初夏，尽美新从苏联东方民族大会回来，主动提出到山海关工作。山海关西靠燕山，东临渤海，地势十分险要，为军事要塞，时为直系军阀所控制，对工人防御亦极严密。当地工人帮派分歧，相互嫉视，开展工作极为困难。但尽美深入基层，亲作苦工以接近群众，进行宣传说服，终于排除各种艰难险阻，博得工人群众的拥戴，约经三个多月，才建立起京奉路山海关工人俱乐部，同时又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

是年秋天，京汉路八月罢工胜利后，一次我与邓培、尽美三人同登山海关，会见了山海关俱乐部和党的负责人佟惠庭，共同研究山海关的形势问题。时适山海关俱乐部发动撵走工头赵某后，其余党陈宏经怂恿路局无端开除俱乐部委员佟惠庭和景树庭二人，恣意破坏工会，工人十分义愤。在此情形下，究竟应采取何种对策。大家分析后，决定趁此开展一个大规模的抗议斗争，以求彻底解决增加工资的问题，并作好罢工斗争的准备。这一工作由王尽美会同俱乐部负责人佟惠庭主持。与此同时，唐山也开展经济斗争，准备必要时发动罢工，与山海关相策应。由邓培准备，我赞襄其事。

唐山制造厂有三千多人，因邓培是制造厂的工会负责人，又是中共唐山地区的负责人，他对唐山地区情况很熟悉。唐山罢工决定由邓培主持。长辛店八月罢工的胜利，对京奉路各站鼓舞很大，工人为改善工资待遇也跃跃欲试，九月十一日，我偕长辛店工会代表王俊、须永德到唐山后，见到邓培，了解当地情况后，建议他立即

组织罢工委员会。主要成员有：邓培、王麟书、刘玉堂、阎福堂、罗占先、李福庆、李显廷、梁鹏万等。罢委会组成后，讨论了向厂方提出的条件和要求，并推我执笔，写了一个简短的宣言，提出所议的五项要求。宣言历数了工人的苦况。其文如下："我们在黑暗地狱的唐山制造厂工作，迄今十有余年。悠悠岁月，来了又去，去了又来。终日精疲力竭，执奴隶牛马之役，为的是资产阶级的繁华富丽。到而今工人的生活，竟至辗转沦落，每况愈下……我们怀著无限悲愤，到此万不能隐忍了！所以于今日提出最低限度条件五则，向路局交涉，限期答复。我们认为这些条件，是起码的要求，只有全部允许，决无磋商余地。现已全体公决，誓非达到目的不止。"

接着提出了如下的条件：

（一）星期及各种假日，须照常发给全薪。

（二）工人有入厂十余年或七八年未加薪者，应即日加薪。按月薪十五元以下者加三成，十五元以上者加二成，五十元以上者加一成。

（三）以后每年应加薪一次。

（四）此次直奉战争，工人所受损失，应照车房例，包含下列各项，（1）三年须有二月例假。（2）每年须有两星期例假，假期中发给全薪。（3）病假须给全薪。（4）工人向厂买物及购煤与员司受同等待遇。（5）每年发给五路乘车免费一次。

九月十三日，向厂方正式提出上述要求，并限三天答复，厂机务处未予理会。我与邓培商议，认为有必要召集全厂工人大会，讲清情况；同时进行宣传鼓动，要作立即罢工的准备。会上可请长辛店工人代表介绍八月罢工斗争胜利的经验，以壮士气；同时可联络山海关、秦皇岛等地工会派工人代表出席。于是，于十四日午后，全厂自动停工，举行群众大会。会前我们做了充分的组织动员，结果全厂三千工人都出席了大会。主席邓培宣布开会的意义后，首由

长辛店工会代表王俊演讲，大意谓：唐山工人旧有南北界线，大家要明白这是旧社会的坏习气，工人应不分南北，团结起来为本阶级的利益进行斗争。继续发言的是长辛店工友须永德，介绍长辛店八月罢工的经验。随后有山海关代表佟惠庭演说，唐山与山海关工人应密切联合，一致奋斗，互相支援，“打虎需要亲兄弟”，只有团结起来才可以很快达到目的；并报告了山海关正在做罢工的准备。大会后，全体工人敌忾同仇，战斗精神大为提高。遂于次日再次派代表向机务处交涉，厂方仍一味拖延，迟迟不予答复，直到十月初，工人忍无可忍，乃举行大会示威。厂方才不得不商量退策，经路局同意，答应工人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工人坚持必须承应全部的条件，否则于十月十三日一律罢工。厂方未予答复，于是酝酿一月之久的罢工，遂于十三日凌晨爆发了。

罢工开始以后，全厂各门派人把守，纠察队长刘玉堂带领近千人的纠察队伍，巡行维持秩序，工人个个精神焕发，与平日大异。厂方这时见工人组织纪律严明，非同小可，十分惊恐，请求警察厅出兵保护。保安队逮走了一些出外联络的工人代表。工人闻讯，积愤愈烈。罢委会随即组织群众游行示威，抗议厂方捕我工人，要求立刻释放被捕工友。

罢委会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路局用大量金钱雇买工人来破坏罢工。纠察队就一面查获破坏事件，一面揭露敌人用金钱收买工人的阴谋，劝告受蒙蔽的工人，不要轻易上当，自相残害。路局吁请当地美国驻兵出来镇压，纠察队就沉着应战，并致函美国兵营，质问他们是否明白国际法，如无视驻在国主权，激起暴动，就应由兵营长官负责，所以美兵也不敢妄动。

罢工坚持近八日，当局无法制止，厂方怕殃及周围厂矿，扩大事态，不好收拾，乃不得不作出让步，答应将所扣的工友放回，并与俱乐部商议办法，基本上答应了所提各项条件，于是在十月二十

一日复工。

现在补叙一下山海关罢工事，先是，王尽美赴山海关与山海关俱乐部主席佟惠庭积极筹备，组织罢工。在唐山罢工正在酝酿时，尽美来到唐山找我，商谈山海关罢工斗争诸问题。尽美说：山海关俱乐部已于九月二十号左右向路局提出六项要求，条件如下：

（一）速开革陈宏经，请我们的代表佟惠庭景树庭二君复职，并将二君停工期间工资完全发给。（二）每星期日及各种假日，均要休息，并须发给全薪。（三）凡工人一律加薪，按十五元以下者加三成，十五元以上者加二成，五十元以上加一成。（四）以后每年加薪一次。（五）此次直奉战争工人所受损失极大，应照火车房例，同样发给奖金。（六）关于待遇平等，包含下列各项。（1）每年须有两星期假，假中发全薪。（2）每三年须有两月例假中发全薪。（3）病假必须发给全薪。（4）工人向厂买物及购煤，必须与员司受同等待遇。（5）工人家眷来往乘车，须发给全免费票。（6）每年发给五路乘车免费票一次。

此外，尽美还谈到，廿五号召开露天大会事，当时，全体工人表示，如果路局不答应所提条件，决心坚持到底，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工人情绪十分激烈。我们对山海关斗争情况分析后，认为工人决心很大，罢工准备也已成熟，可以不等唐山，先进行罢工斗争。于九月三十日，我偕尽美同去山海关，正值路局发布一告示，宣谕工人，对工人所提条件几乎未作答复，工人对此愤懑已极。我和尽美见此情形，知道不采取罢工手段，当局是不会理睬工人的要求，遂决定次日下午召开露天大会，进行动员。开会时，满场白旗挥舞，口号声此起彼落，会场四周大幅标语，琳琅满目，气氛十分激昂、热烈。工人确已发动起来，罢工条件已趋成熟。主席佟惠庭宣布开会，并发言表示俱乐部决心奋斗到底，直至取得胜利为止，工

人报以热烈掌声。接着唐山工人代表和秦皇岛工友俱乐部代表相继发言，表示愿与山海关工友一致行动。王尽美也上台讲演，鼓动大家努力奋斗。群众情绪这时达到高潮，高呼“驱逐工贼陈宏经！”“打破奴隶制”等，观者极为动容，足见尽美平日工作之深入，他已深得工人的爱戴。最后主席宣布，限当局三号晚答复，否则举行罢工。

十月四日，山海关工人开始罢工，尽美起草宣言，吁请各地工友实力相援，一时京津各报纷载山海关罢工消息。这时唐山工人也正准备罢工事，决定加快步伐，提前罢工声援山海关工友。

罢工后，山海关路局见工人团结坚固，知不可轻侮，并风闻唐山工人要于近日罢工，若卷入唐山工潮漩涡之中，将益发不可收拾。路局即于十月十二日接受工人所提条件，并由该路局长明文批示：“陈宏经立即革除；佟惠庭、景树庭二人复职，补发全部工资。”于是，山海关罢工胜利结束，前后约历十天。

山海关罢工的胜利，曾给随即发生的唐山罢工以很大的鼓舞，唐山制造厂罢工从酝酿到胜利，历时较长，困难程度也比山海关要大，但山海关的胜利给唐山工人带来了斗争必胜的信念。而山海关和唐山制造厂罢工的胜利对开滦五矿工人又是一种促进；对于即将进行的开滦五矿斗争也是一次小练兵，大家更觉有把握了。在山海关和唐山制造厂罢工时，开滦五矿的斗争已在进行中。本来书记部准备同时进行，来一个北京迤东地区的大规模同盟罢工，但由于各处情况复杂，准备工作难易不同，发展形势变化不一，人手也告不足等等，遂造成相继罢工的形势，而又以开滦五矿同盟罢工，规模最大，历时最长最艰巨。但干部、群众有前两次罢工的胜利，信心充沛，始终顽强战斗，不溃散、不分裂、不叛变，足以坚持到最后，使开滦罢工成为震惊中外的大事件。

开滦五矿沿革与斗争形势

开滦煤矿创于一八七八年（在此以前属于手工业式经营），是最先采用近代技术经营的本国采煤企业。庚子条约以后，引进英国资本，变为中英合资公司。该矿由唐山、赵各庄、林西、马家沟、胥各庄五矿所组成，幅员几百里，年产煤平均为四百五十万吨，当时占中国新法开采煤产量的五分之一。开滦煤矿地跨开平、滦县地区，其中唐山煤矿产量最大，品质优良，靠近海港车站，水陆交通便利，中国北煤南运由此发生。自是以后，天津、上海、香港、新加坡、马尔他等地英国企业用煤、船只用煤与海军的大部分用煤均由此处供应。开滦公司名义上中英合办，但实际经营大权为英方所把持。中国方面以袁世凯及其他北洋军阀股票最多。英国方面东印度公司股东居多。每年纯利平均二百五十万英镑，最高时达一千万英镑。

这次开滦五矿罢工，其矛头不仅是指向英国资本家，而且也指向由北洋政府和军阀官僚所控制的华北财团。

当时，华北财团辖有三个银行，其中，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名义上是官商合办的银行，实际上是北洋政府的国家银行。中国银行享有铸币、发行纸币，代理国库和代募公债等特权。辛亥革命后，中国银行的大权，由北洋政客王克敏、李士伟、徐恩元等长期把持。交通银行是北洋政府国营交通事业轮、路、邮、电四政的金融机构，该行大权归政府独揽。从一九一四年后，它也成为国家性质的银行。这个银行的领导权，开始由旧交通系梁士诒、周自新等所把持，后来又由新交通系曹汝霖、陆宗舆等接手把持，一直是北洋政府新旧交通系官僚们的主要经济活动地盘。中国银行与交通银行，在当时号称为北洋政府的“中央银行”。

在华北财团各银行中，军阀官僚个人的投资和存款，占有很大比重。据估计，北洋政府主要军阀官僚七十二人，拥有私产总数达六万六千五百四十万银元之巨，其中拥有千万元以上私产的共有二十三人，曹锟和张作霖二人各五千万元。这些军阀官僚通过搜刮民脂民膏而积累的巨大财富，大量存入银行，成为大股东或总裁，把持着银行的大权。在开滦煤矿的投资中，北洋军阀银行的股票不少，毫无疑义，开滦五矿工人的罢工，是对他们的直接打击。因此，他们与英国资本家联合起来镇压工人运动，也是必然的。

英帝国主义在秦皇岛驻有重兵，中国军阀通过天津及当地驻军也对矿区十万中国居民进行统治与剥削，方式极为复杂，镇压与欺骗各显其用。开滦矿工在经济与政治高度的专制下面，生活非常贫困，工人每日平均工资二角，工作十二小时，下井一次常把两周的劳动在一周做完，劳动十分紧张。因工死亡仅得恤金四十元（死骡马一匹赔偿金约一百元）。长期以来由于技术设备逐渐陈旧，不断发生矿井淹水、瓦斯爆炸与井道陷塌等种种事故。如一九二〇年唐山九道巷煤矿瓦斯爆炸，造成死工人 432 名，伤 122 名的重大事故，数十里矿区哭声载道。工人自称备历水、火、刀、兵诸劫，并非虚语。因此，工人自发斗争如厝火积薪，时有所闻。据工人谈，开滦过去自发斗争层出不穷，如一八八二年矿上北方工人曾为要求工资平等（当时南方工人工资高于北方工人）而罢工一次；一八九一年工人为了反抗外国工程师虐待又发起斗争，结果有五位工人被捕。由于英国资本家势力雄厚，而且对付工人斗争有丰富经验，因而矿工面对的是一个相当凶狡的敌人。

开滦罢工的准备

北方书记部于一九二二年初，开始在矿山广大工人群众中进

行宣传、教育和组织工会的工作。北方书记部负责人以身作则，动员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会员，非宗教同盟会员，社青团员走出课堂、实验室，投身矿区从事艰苦工作。当时北方书记部的人来到矿井，带有《工人周刊》等各种革命书刊，向工友们介绍一些革命道理和工人进行斗争的事例，如陇海铁路、长辛店罢工斗争的经验。有些来自长辛店的工友向矿山工友进行现身说法，这对于后者启发特别深刻。由于北方书记部同志深入矿井，耐心刻苦工作，与广大工人群众取得联系，在唐山开始建立了地下工会。在组织工会过程中，我们特别注意联合当地矿工各主要帮派，当时唐山工人主要分成南北两大帮派。南派以广东人为主，工程技术人员居多。他们在广东街设立广东会馆，用以团结本帮工人。北派工人人数最多，又分为河北与山东二帮，河北省又分为大名、保府与河间三帮（保府，河间二帮合称顺直帮），北方各帮大多为一般井下工人，其他地方工人数量较少，附属于附近地区帮派，矿区家属、市民合计十余万人。各帮派彼此之间常因就业问题或语言隔阂发生争执，互不团结。书记部同志来后，晓以革命大义，使他们化除畛域，统一组织工会，为此做了不少工作。五矿工会领导机构大都是吸收南北各派中的革命意志坚强的，在群众中有威信的工人所组成。

当五矿分别成立革命工会后，又联合成立五矿工人俱乐部。实际上是领导全矿的总的工会机构。俱乐部成立后，就为改善工人的境遇着想，前面提到一般工人生活的苦况，就是技术工人也因十几年未提过工资，在物价飞涨的情况下，生活亦很艰难。这是全矿工人最切身的大事。俱乐部为此准备了向矿局提出改善工人生活的要求，同时也作了必要的组织和各项准备。

十月十六日，开滦五矿工人正式向矿务当局提出改善待遇的起码要求，它是通过一封英文信向矿务局提出的，这封英文信由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英文组的同学执笔，采用外交词令，文字风格

力求“西洋化”，是几经推敲，三易其稿，然后打印发出的。

信的内容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叙述矿局对工人待遇不公，列举事实，使矿局感到无词推托。第二部分则明确提出六条要求，合情合理，并不苛刻。六条内容如下：

1。按下列的标准增加工资：甲、每月工资在十五元以下者增加百分之三十；乙、每月工资在十五元以上者增加百分之二十；丙、每月工资在五十元以上者增加百分之十。

2. 每个年终发给奖金一个月。

3. 星期和新年假日停止工作并发给工资。

4. 廉价煤和慰劳金应和中级员司同等发给（凡支月薪十二元，应有享受这个利益的资格）。

5. 凡服务年限超过二十五年者，应给予和工资相同数目的养老金。如无严重的过失不得撤职。

6. 凡因公受伤者，应继续发给工资，而因公死亡者，应给予和五年相同数目的抚恤费作为慰劳金。

该信是指挥部第一个对外的英文文献，信中措词不卑不亢，颇为得体。另外还大量印发了中西文宣言和传单，向中外社会舆论呼吁，争取对工人的同情和支持。

英文信递交矿局时，并派八名代表前往交涉，代表态度坚决，限当局三日内答复，否则以罢工对待。这八名代表的情况，现查出的记载资料为：张瑞峰　唐山井下看守人　　五十岁

李新章	唐山铸工	三十八岁
刘　河	林西骡夫	三十五岁
刘宜美	林西骡夫	四十一岁
孙家辽	林西机器匠	三十二岁
刘　忠	赵各庄机器匠	三十三岁
葛定东	赵各庄井下机器匠	四十五岁

廖洪祥　秦皇岛机器匠，秦皇岛矿务局工友俱乐部的委员长

二十五岁

矿局接信后，见内容清楚具体，无回旋余地。总矿师杜克茹(A. Dosgties)一贯傲视矿工。他对此十分恼火，蛮横地对代表说：你们的条件可以考虑，但劳资双方不能处在政治上平等的地位来谈判，工会不能成立，矿务局也不承认俱乐部是合法团体。代表据理驳斥，终使总矿师词穷，改称需与天津总公司经理商议后再作答复，借以拖延时日。谁料他返回唐山后，竟带来两个保安队约二百多人，驻扎矿区监督工人劳动，其态度复又如前，同时出布告晓谕工人：不要受人鼓动、利用，凡提出无理要求或作扰乱的举动，本局是一定不能答应的。他又假惺惺地说："目下粮米高贵，各样花费又大。本局打算给赚小工钱的人加点工钱。从本月起所有每月赚三十块钱以下的工人，都照加一成。"这和工人提的起码要求相去甚远，尤不能容忍的是派保安队对工人实行监督，实属人格侮辱；且无视工会的存在。这时工会已把上万工人组织起来，岂能受此政治上的漠视，于是五矿俱乐部召集代表开会商讨对策。会议正在林西召开时，竟被矿局侦知，派保安队来驱散，并当场抓走表示抗议的六名代表。工人闻讯后，群情激愤。只奎元找到我和邓培商议，认为罢工势在必行，工人情绪高昂，特别在唐山、山海关、京奉路罢工胜利的鼓舞下，干部都跃跃欲试，俱乐部也只有通过斗争才能团结更广泛的群众而巩固发展。这也是半年来书记部所预期的计划，几经考虑，认为应当机立断，否则敌人将更有准备，于是决定次日五矿全体罢工，当晚各代表分头通知各矿工会传达罢工命令。于是从十月二十三日起，唐山、林西、马家沟、赵各庄、胥各庄同时举行罢工，井上，井下，机务各处总计三万多工人全部停止工作。一场震撼中外的开滦五矿同盟罢工就此开始了。

矿局方面，对罢工是早有准备的，其主要人物是比利时籍的总

矿师杜克茹和英国籍总经理杨氏(Young)，起决策作用的是英国董事会。英国是一个工矿业多，工人罢工也多的国家，英国统治者积有对付工人的丰富经验。平日，他们就和当地军阀政府相勾结，采用现代的侦缉手段，注视着工人的一举一动，当唐山铁路制造厂的罢工还在进行时，矿局就和直隶警务处互通情报，对工人严加防范。这里摘录一段事后得悉的他们往返的函告，就可管窥他们所持的一般态度。警务处给矿局的信函中，通知矿局，京奉铁路职工已罢工，很可能也影响到矿区，并说："现闻林西矿工人已被铁路职工所引诱，铁路职工答应给予他们数千元作为进行罢工的开销。据说该工人等对于他们的斗争表示热烈同情，并已决定与他们采取一致行动。此事现正在秘密进行，尚未泄露。当探知这种阴谋时，立即派出得力警察和便衣侦探到各处秘密调查，但是因为他们严密地进行阴谋活动，尚未能探出他们的机关所在以及其首领的踪迹，至于已探得的消息可以概括如下：他们拟借煤斛加价为名要求增工资。他们打算提出以下五项要求：（一）在开滦矿务局服务二十五年或超过二十五年的工人每年给予慰劳金。（二）因为生活高涨，全体工人应增一定数目的工资。（三）建立工人医院，工人病伤得在此医院治疗，由开滦矿务局负担花费。（四）工人死亡，开滦矿务局应给予埋葬费。另外，工人因公受伤，在医疗期间，应照付每日工资，不得扣减。（五）全体工人在星期日免于工作，如果需要工作，这天应给予他们双薪。以上五项要求将在他们罢工开始之前提出。如果他们的要求不蒙允许，他们将以罢工相威胁以求接受他们的条件。这是我们所探来的全部消息，……。查唐山路工罢工风潮现时尚未平静，矿厂相距甚近，煽惑引诱亦势所不免，除饬该署长督饬官警，受姚队长指挥，严密防范，一面晓以大义，切实开导，俾知其各人切身利益关系以维公安外，相应函请查照。"

在另一封信中说："制造厂罢工现已四天，连日局长（指公安局

长）随同路局人员与工会代表讨论要求各条件。该代表等坚持甚力，一时恐难了结。”

矿局给警务处的回函中说：“近来有煽惑者到达矿上，他们为了政治缘故，正在试图制造工潮。这些人引导工人组织联合会，并向敝局提出许多要求。”这里的“联合会”就是指“五矿工人俱乐部”。他们之间互通情报，往还紧密，对俱乐部的活动也早有觉察。

后来在警务处长杨以德给陆军部的呈文中提到：罢工中发现“山海关京奉铁路工友俱乐部”的传单，其首端标有ㄐ符号。此符号即系俄国过激派。并由此下结论云：“查此次罢工风潮，并非纯系工人生计问题，内中因有由京来唐过激主义杂手其间，前日在唐山罢工机关内查获函件，均属传布过激主义函件。”由此概见当年杨以德坚持施行铁血政策，是认为开滦罢工是一个政治事件，而对书记部的一些活动，又十分警觉，在其发布的布告则更露骨宣称：“查此次工潮，迹其种种行为，确系有奸人主动，图谋不轨，若不赶紧取缔，诚恐祸成燎原。”

为了领导好这次罢工斗争，中共北方区委与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全力以赴，组成强大的五矿罢工指挥机构。决定让邓培脱产，以全部力量投身于开滦罢工斗争，让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副主任王尽美参加指挥部。这些都是北方区委所采取的重大步骤。同时我也参加了罢工委员会，任中共党团组织负责人兼指挥部主任。先后在五矿罢工指挥部工作的主要人员还有：梁鹏万、阮章、袁乃祥、彭礼和、李梅羹、吴先瑞、李星昌、只奎元、董鸿宾、阮永、王麟书、王德舟、贾纡青、王宝仁、金满等二十余人。

这次罢工组织是相当严密的，领导罢工的机构是罢工委员会，对外仍用五矿俱乐部的名义，罢委会系由各矿工会的代表和北京区委（罗章龙）、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王尽美）、唐山地方党（邓培）的代表组成。执行机构为罢工指挥部，以下是各矿基层组织，全体

罢工工人都组织在“十人团”中，每十人组成一“十人团”，选团长一人，负责组织和召集团内活动。指挥部还设有调查部和纠察部。调查部从事调查内外奸细，查处破坏工会的事宜，如有情况立即报告调查部长，提到罢委会中讨论。纠察部下设纠察队，共有纠察队员近两千人，分设几个大队和支队，纠察队由张隐韬等同志训练，纠察队员中有不少人是经历过行伍生涯的。他们具有战斗经验，由他们督导上阵，能做到见阵不惊，勇猛顽强，这种精神在和敌人多次枪击的激烈冲突中完全体现出来了。平日，他们巡行于街市，保卫厂矿，守护矿井，维持开会会场秩序。开滦矿工的纠察队在北方的各次大型罢工斗争中，是组织得最好的，远近闻名，当年报刊曾有过详细的报导。

罢工指挥部为适应斗争形势需要，有时设在铁路与工矿中心地区，有时改在唐山大学办公，均以取得广大革命群众的掩护与支持为条件。

罢工指挥部事前充分估计了敌人的反动本性和可能采取的手段，为了防止敌人的突然袭击，指挥系统始终分散隐蔽，罢工指挥部设在南厂（即唐山铁路机车厂）附近。宣传机关则分设在各矿厂郊区工人住宅内。掌管工会基金的财务机关设在较安全的山海关铁路工会附近。在五矿罢工期间，还在天津租界设置罢工事务联络站，由宋天放、李梅羹等在联络站负责，所有关于罢工新闻公告文件等，均在天津秘密印刷发布，并开辟有内部交通接头处。同时，在开滦罢工期间，党集中了唐山地区的党员，其中包括铁路机车厂（即南厂）、开滦五矿、水泥厂、秦皇岛桥梁厂、唐山大学等处的党员，组成开滦罢工中共党团，成为罢工斗争的核心机构，一些重大决策都须经党团讨论。罢工党团设在市外，以备随时转移地址。当时唐山党的领导力量是很强的。在罢工期间，斗争形势瞬息万变，并且多次发生武装冲突，党组织面临繁剧任务，始终保持步伐整

齐，临危不乱。这些都说明唐山党组织确实具有相当强的组织与指挥能力。

矿局对付罢工，诡计多端。归结起来，其第一个办法，就是武力镇压，以保护英人利益为名，四处求援，调动军警来镇压罢工。第二个办法就是从内部离间工人的团结，瓦解工人组织，派遣所谓“和平使者”向工会活动。第三是用经济围困方法，威胁工人生活，借以使工会就范。矿主既采用上述各种方略围困工会，工会亦针锋相对，组织反击，如此相激相盈，造成长期罢工局面。

罢工以后，矿局外籍员司感到非常恐慌，一面请天津英领事派兵增援，到矿场保护；同时又请曹锟加派中国军队与外国军队协防。当年开滦五矿虽是一个工矿企业中心，但同时也是一个军事重镇。天津迤东、唐山、开平、滦州一带，军阀政府的军队计有开平镇守使殷本浩驻军一师；滦州第十五师（师长彭受莘）、十三混成旅董政国一旅驻军；天津直隶警务处杨以德所辖的保安队共五大队约三千人。此外，外国军队驻唐山者有英国、印度兵一中队约五百余人，由英国人斯莫莱（Smalley）上校统率；林西、赵各庄分驻英兵各一队，约三百人，由芬尼士（Finnes）上校统率；秦皇岛有英国兵一队约五百人，由詹姆士（Jams）统率。总计在这一地区约有兵力上万人，故英国矿业资本家在获悉罢工消息后，第一是给曹锟发了一个电报，要求曹锟政府尊重条约，保护英国人的利益。于是，曹锟就派了一个师到矿山来镇压工人罢工。第二是英国董事会在罢工期间，又前后送了一百二十万元给天津警务处处长杨以德，重贿杨以德。杨主张借武力解决，派了大量保安队进驻矿山，伺机镇压罢工。这样，罢工期间，矿上有帝国主义的军队、曹锟的军队，还有天津警务处杨以德的保安队等，构成了对付工人的强大军事镇压机器。

面对上述强大的敌人武装势力，罢委会曾作了详细分析，认为：开滦五矿工人的罢工，仅靠二千徒手的工人纠察队是无法对付

上万的武装军队的。如果敌人的这些武装力量都联合一致，对罢工采取强硬态度，那前途就非常可虑。罢委会研究决定，采取分化的策略，争取能同情工人的部队，而孤立顽固的势力。于是指挥部通知各矿工会组织宣传队，分途向各驻军宣传罢工的起因，并指出罢工的举动是文明国家的通例，是民主国家工人的正当权利，不可用武力干涉，而这次罢工实出于争取生存权利，是被迫出来的。工会也向军队写信，说明工会态度，揭露英国资本家欺凌工人的罪行，希望驻军不要同工会对抗。我们不仅向兵士做宣传，也向驻军长官做宣传。士兵听后甚为感动。殷本浩、董政国等平日对英国资本家及唐山的洋员横行本怀不满，又见保安队军纪败坏、鱼肉乡民的行为，亦大不以为然，群众对保安队更是人人切齿。殷、董在我们做了工作后，采取不干涉态度。某军官说："我们没有得到什么钱，工人又都是我们的乡亲，我们没有义务来屠杀工人。"他们保证不开枪打工人。殷本浩还主动要矿局让步，提出调解方案，并愿意在必要时出面调停。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全力对付杨以德的保安队了。我们对保安队则针锋相对，保安队巡逻，工人纠察队也巡逻，互有冲突。工人纠察队并不示弱。遇到保安队抓人，纠察队就去把人抢回来。有时，保安队出来巡逻，我们纠察队巡逻的人也抢他们的人。在罢工期间，工人纠察队同保安队诸如此类的冲突为数不少。我们集中力量对付杨以德的同时，对外籍军队也极力做争取工作。工会特地用英文书信、传单向英兵解释，英国既称民主政治，工会有罢工自由，更应尊重中国主权，和平相处。我们还招请外报记者，说明罢工要求条件及工会的态度。外籍军官詹姆士表示，英军保持中立，不介入罢工事件。经过一系列工作，在保安队中除一部分特别顽固者外，其他都对工人按兵不动，这样就减少了双方不必要的武装冲突。

当时，英矿局规定：自总矿师以下外国员司一律驻守厂内，守

护发电厂、锅炉间、电机绞车、水泵及其他重要部门。但工人及市民平日对矿局的英、比籍高级员司的专横态度，深恶痛绝，因此罢工后，外籍工程人员时恐报复，不敢外出，好象当年义和团再临眼前似的。

一次，工人纠察队在赵各庄阻截比国工程师马孟达（Malmendier）外出求援兵，双方遂起冲突，指挥部闻讯前往解释，马已面无人色。有些外籍员司乘机请假避往天津或竟辞职回国。他们到外地和回国后，造舆论写文章，大肆污蔑说："现在唐山又出现了新的义和团，是新的土匪。"以致引起英国朝野大为震动。《泰晤士报》曾著文报导此事。

矿局在调集军队对付工人的同时，还从外地招募工人（"夫役"）进矿工作，借以破坏罢工，约在罢工开始后的两三天内，就招来"夫役"约三百名，以后又陆续招来数百名，其中包括一些技术工人（机器匠和电机匠等），大多是在天津招募的，分派到各矿企图代替罢工工人的工作。我们闻讯后，就派工人纠察队设法赶走他们。杨以德则出动保安队保护他们所招募的工人下井劳动，纠察队就把住井口，不让他们下井。总之，敌人施出计谋进行破坏，我们就和他们斗。尽管敌人力量很强大，但我们除注意策略外还广泛动员群众，他们亦不敢小视。在双方搏斗中，情况也十分惊险，十分激烈。在斗争中时时处处都体现了工人群众万众一心，勇往直前，有进无退的革命精神。

最激烈的一次斗争发生在罢工后的第四天，十月二十六日晨八时，罢工纠察队正巡行于西大街，突与保安队遭遇，双方发生冲突。保安队势众，当场抓走纠察队员张隆、高金声、刘福存、高振中、张永利、张永顺、杨荣林等十余人，押囚在警察局。工人闻讯后，群往营救，保安队见工人来势勇猛，遂开枪射击，当场重创倒地者七、八人，轻伤无数。枪声愈响而工人来者愈多，保安队不敢再

开枪，只得退守在警署门口，相持数小时始散。这次事件工人表现十分英勇。但事件发生后，也有些胆小怕事者，于是谣言纷起，加之敌人从中捣乱，一时人心惶惶。罢工委员会召集工会代表讨论，结果大家一致认为，这不过是敌人有意制造恐怖，罢工委员会应力持镇静，毋稍示弱，使敌人狡诈阴谋无法施展。指挥部派出宣传队、救护队和纠察队及时援救受伤工人，并到街头演讲、巡逻，劝慰大家不必自相惊扰，罢工秩序因此复获安定。同时罢委会通过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和北方区委，在社会上大造舆论，使杨以德和矿局甚为被动。

矿局对罢工采取所谓“糖、棒”政策，在一面重贿杨以德，借武力解决罢工的同时，一面又唆使唐山天主教堂神父、荷兰人薛里渊(Soherion) 出面，劝告矿区中信仰天主教的工人“不要为过激派利用，或受人煽动”，企图使工人脱离罢工。他们分矿区进行破坏，以蚕食手段，分裂罢工阵线。秦皇岛经理处运输处长李克碑(Rickey-by) 用钱收买一小部分工人破坏罢工，其中一些被罢委会的调查部侦知后，派纠察队制止。敌人所谓“糖”就是对工人作很小的让步，或是收买部分工人，进行破坏，或是派出如薛里渊之流伪装慈善面目，祈祷和平，达到分裂、瓦解罢工队伍的目的。而所谓“棒”就是拒不承认工人自己的工会组织，不承认工人有罢工权，不与五矿俱乐部作对等的谈判，搬出刽子手杨以德，杀气腾腾地采取铁血政策，镇压罢工。

罢工指挥部的干部，为数众多，如邓培、只奎元、王尽美、罗占先、张瑞峰、董宏猷、梁鹏万等，他们密切联系群众，站在斗争第一线，有勇有谋，在资方采取“糖、棒”政策时，依靠指挥部，依靠工人群众，作到了运筹帷幄，及时针对敌情作出决策，使敌人的“糖、棒政策”未能奏效。

资方在开始的几个回合失败后，未能平息工潮，便进一步实行

大规模缉捕罢工领袖。十一月中旬，矿局与直隶警务处密谋，指示警察当局逮捕指挥部领袖邓培、只奎元等，并同时派警察到北京会同京师警察厅带眼线韦振清到打磨厂聚泰店及玉隆店缉拿董宏猷、刘国木、常振庸、刘明达、梁鹏万、曾子才、伍有临、邓扬、万安全、萧渊、白天柱等十一人。他们是应书记部邀约赴北京出席路矿联席会议的，军警到达打磨厂时，他们已迁移住址，幸未被捕。但随后在赵各庄破获工会机关一处，并捕去工会委员张志业；又在马家沟拘走二人。不久，杨以德又从各方面探得矿工会罢工指挥部机关人员名单一份，便广派探警，分途搜索，指令保安队、警察局务必拘捕煽动工潮学生及罢工领导机关人员到案严办云云。并在矿区张贴布告，扬言根据治安警察法，对罢工者要严加法办，“工人之中有一部分不安分、不明事理及法律之人，妄听奸人煽惑，以罢工为要挟”，“意图扰乱，定即会同军队严拿惩办，勿贻后悔”云云。军警巡行街市，查封罢工机关，大量拘捕工人，书记部工作人员彭礼和亦不幸被捕。一时白色恐怖笼罩唐山地区。

羽檄纷驰　声援罢工

在开滦罢工期间，为扩大影响和揭露敌方阴谋，我们积极开展了宣传工作。当时我们宣传着重从约法精神、民权保障、革命的正义与革命人道立场出发，借以动员中外舆论，孤立敌人。当时全国工会函电交驰，纷纷申讨英国资本家与北京政府。

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处，启新洋灰公司工会，秦皇岛工人俱乐部，唐山大学学生会，长辛店、石家庄、南口等地铁路工会，津浦铁路工会，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等革命团体，均发出通电，呼吁援助开滦罢工。函电内容极为生动，大义凛然，仿如海宇春雷！其中文字多属上选，于此足见革命文风傲睨一代，有不可逼视之处。

罢工期间在北京曾举行过招待会，北方区所属工会、学生会、各法团、参众两院议员与中外新闻记者等出席参加，会上介绍工人斗争情况，揭露敌人残杀工人的暴行及其所施阴谋伎俩等，效果很好。罢工委员会通过各种渠道发布新闻消息。北京《晨报》、天津《泰晤士报》、《工商新闻》、上海《申报》等都及时报导了罢工消息。

十月二十六日枪杀矿工惨案发生后，我与罢工委员会商议决定，以开滦工人名义通电南北政府议院及全国公团，声讨直隶省和警务处杀人罪行，在致参众两院函中云："杨以德残杀工人，媚外贪财"，矿务局以巨款贿买国贼杨以德，"残杀工人六名、受轻重伤者五十七名，又失踪已查知者三十一名，失踪而未知者尚不知若干……""望诸公早日将杨以德提出弹劾，免职惩办。"函电在报上刊出后，在国会内引起震动，杨以德残害工人罪行昭示于天下，南北各公团声援五矿罢工之呼声大增，如浪潮遍及各地。议员胡鄂公、蒲伯英等三十人联名于十一月二日为开滦矿务局勾通军警惨杀工人案，正式提出质问，质问书云："为质问事，窃查开滦五大矿工人总同盟罢工风潮，早已发动多日，乃当局不思设法调处，冀求解决，反用武器压服，以至迁延至今，愈趋险恶。""方今国会重开，法律彰明，究竟政府对于保护劳工，有无诚意？""派兵残杀工人，究属根据何项法律！""对于杨以德，开滦矿务局及该局洋人等……均应一并严行查办、分别惩撤。"十一月十五日北京各报，又全文刊载了参议院议员张汉章等人的质问书和议员江浩等二十八人的质问书。张汉章等在质问书中质问："查此次风潮，缘于工人受经济之压迫，同盟罢工并非叛逆行为，何物杨以德竟敢令保安队开枪射击，死伤多人"，"同盟罢工，此事在外洋视若寻常，即吾国近年亦屡见不鲜，何有罪名之可言"，"杨以德据何法律，而敢处工人以死刑，是其滥用职权，已构成刑事杀人之罪。"张汉章等二十一人依法提出质问：政府究竟如何处置？议员江浩等的质问书，亦对矿局的违

法行为要求立案处理。议员们纷纷向北京政府提出质问，在上层造成了声势，使矿务局与杨以德更处于四面楚歌的孤立不利地位。

先是，北方区委很早就注意团结思想比较开明的旧国会议员，让他们理解我党的政策。在开滦罢工中，两院议员对于直系军阀镇压罢工，屠杀工人的罪恶行径，也无不表示义愤，仗义执言。当时参众两院议员江浩、胡鄂公、张汉章等具有代表性的三份质问书，都是在北方区委影响下所采取的同情罢工的行动。参众两院议员前后列名提出质问与弹劾者为数不少，声势之大可以概见。当时议员中靠拢党的有江浩、范鸿均、胡鄂公等。

十月二十六日惨案后，我们还设法向国外发通电，由于费用太贵，我们就采用新闻方式，向路透社发消息而间接传至英国国会和政府。电讯揭露开滦英国资本家的罪行，说英国自称为自由民主的国家，焉能坐视不理。于是英国国会有议员提出质问，英国工党执政大臣到会答辩说："在工党统治下是不做屠杀工人的事"，意思是说英国工党政府未参预唐山屠杀工人的事件，实属掩耳盗铃。他在国会还要装腔作势，一摊手说："我的手上没有沾工人的血。"尽管如此，对执政工党也不无影响，后来矿局也受到英政府的一定压力。

在各界对开滦罢工的援助声中，值得提出的是唐山大学的罢课声援。他们由声援罢工转变成驱逐校长的学潮，前后竟长达半年之久。

唐山大学系北京政府交通部主办的专科大学。该校学生曾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小组，随后发展了中共党与团的组织，党员有董宏猷、许元启等。

杨以德屠杀开滦罢工工人的事件发生后，唐大学生出于义愤，学生会组织同学上街宣传，声援罢工，反对政府屠杀工人，罢工进

行到二十天左右，斗争处于艰苦时刻，唐山工人到校演讲深得唐大学生的同情，为了以实际行动支援罢工工人，学生会决定举行罢课、上街募捐，并发表公告，痛陈矿工之苦况。今将《唐山大学学生赈工会公告》援引于下：

全国各学校、各工商团暨各报馆公鉴：欧战告终，真理显彰，世人皆知，世界之和平，人类之幸福，非武权之为力，实劳动之为功。而彼致和平造幸福之工人，处此物质文明生活高昂之世界，加以资本家之苛待，外界之藐视，反恩人为奴隶，天下至不公平者，莫甚于此！欧美工声，日甚一日，奔走呼吁，以谋增工资、减工时之胜利，辄以极大之牺牲，达其最后之目的。迩者吾国开滦三万余苦工，因生活困难，受迫不堪，方群起向当局要求加薪，及改良待遇章程，此未始非我国劳动界进行之曙光也。夫矿工为人中之最苦者，终日匍匐暗道中，面目黔黎，手足胼胝，其不受矿毒，不死于夭折者幸矣。凡目睹其状，耳闻其情者，当如何悯恤，为之设法以改良此蛮无人道之生活也。今彼工人宣言罢工，已三星期于兹，其始也，矿务局由津雇人替接，以示拒绝，并由保安队来唐保护；后两方相起冲突，保安队即鸣枪轰击，工人受伤者不可胜数。血肉横飞，哀号呻吟，稍有人道者，何忍出此！日前津警察厅长杨以德来唐，复用种种威言，恫吓工人，冀其屈服开工。身为厅长，不察事理，反一味袒护矿局。然各工人已饱受资本阶级之苦虐，此次忍无可忍，不得已而出此举动，是以坚持到底，非达目的不止。夫劳工神圣，人所共知，矿工为同人辟利益，原为我人增幸福，其服务于社会者何如？我人知矿工在社会者何如？我人知矿工在社会中，所处之重要，知矿工所受之苦痛，即当与以特别之同情及援助。且该矿工所请条件，皆出于至诚之心，实至微之要求，可谓让步极矣。今矿局以图利心切，拒绝要求，日以武力压制，我人纵不愤矿局之斲丧天良，独不悯工人之痛苦乎！同人等肄业唐地，闻见较详，爰本赈助之意，

认为工人略述苦况，哀告于全国父老兄弟姊妹们，以冀有援助，则不特唐地工人之幸，抑亦劳动界前途之幸也。再者：五矿罢工已越三星期，工人之资斧窘极，维持困艰，危在旦夕，诸君子能解囊慨助，敬请早日赐下，并请汇寄敝会会计贾存鉴代收。

唐山大学学生赈工会谨启

原载1922年11月16日天津《泰晤士报》

唐山大学学生会的行动，使反动政府和学校当局十分恼怒，已伏下镇压之机。矿工俱乐部不断派人前往学校帮助学生会工作，同时也邀请学生给工人讲演，同学在矿工支持下热气很高。事为教育部和交通部所悉，急令在京的唐大校长俞文鼎由京赶回；俞文鼎返回后，不顾学生反对，竟无理开除五名学生代表。并威胁学生们说："学校是靠政府交通部给钱办的，现在你们站在工人方面，反对政府，我们学校还能站得住吗？这岂不是等于自杀吗？"他的这一套言辞，对学生根本不起作用。于是校长又邀保安队进校弹压。这样一来更使学生气愤，且俞文鼎自长校以来恶迹多端，同学遂转而向学校当局展开斗争，实行罢课。十一月十八日，俞忽出布告，以学生行为过激，奉交通部令，着即解散。五名学生代表送天津警厅关押，强迫学生收拾行李，由军警押送天津。同学受此压迫，遂向各界呼吁，并向政府与国会请愿，要求撤换校长，风潮愈演愈烈。这时开滦罢工已经结束，各界转向支援唐大学潮，终于使俞文鼎被撤换。此次学潮，一直持续到次年春天才告结束。

募集罢工基金

准备罢工时，书记部在北京召集路矿联席会议，专门讨论支援五矿罢工问题，其中最重要的为罢工经费问题。矿工俱乐部代表提出报告，估计当前罢工最大限度以二十天为期，按这一期限计

算，工会罢工基金准备尚嫌少，大多数计日发工资的工人更须依靠工会救济，因此决定成立罢工经费募捐组、保管组及监察组。募捐组由各主要铁路工会负责人组织。保管组由罢工委员会负责人只奎元等负责（书记部人员规定不参与财物保管）。监察组由矿工会代表李兴昌等三人和铁路代表甘达等二人共同组织，以邓培为主任。同时，由北方区委报告中央，函达全国各工会就地成立开滦五矿罢工经济后援会，大规模进行支援及捐款活动。

当时书记部曾有规定，书记部工作人员不参预钱财的管理和出纳，完全由工人代表和当地干部经手，书记部只提建议。

最先由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公开宣传筹备募捐事宜，随后唐山大学也成立了矿工罢工后援会。同时，中国南北各工会，各学生会，国际革命机构，海外华侨各团体纷纷成立开滦五矿罢工后援会，一齐动员，奔走呼号，集腋成裘，募集寒衣药物，源源送到矿区备用，有力地支援了罢工。当罢工面临紧急关头时，罢委会报告存粮存煤将罄，急需补充，否则有断炊之虞。尽美建议急电上海中央，催促汇款，我即用英文发急电（SOS）致上海中央，文云：Shanghai Commecial Press Miss Dshun-yin Tanshan in Dancer Dragon. 即“上海商务印书馆钟英女士，唐山危急，龙”。此电由唐山在天津联络站派宋天放到北京拍发，第三日即得中央回电。事后据说当时中央在开会，大家正为某项问题发生分歧，各逞己见，互不相下，忽接此电，国际代表马林说：一切纷争应立即停止，率先抢救开滦罢工。中央竭力罗掘，得款一万元，即派专使携款到天津，我将款送交保管组负责人领收。当时收款人问道“此款抬头用啥名字？”梁鹏万说：“就写新加坡工党吧！”此款到后，使罢工委员会及时解除经济危机，使局势暂获稳定。

在罢工期内募得的捐款约为五万元，其中党内外募捐一万余元；铁路、海员工会二万元；国际工会方面一万五千元，由魏尔德

(Wild)交来；其他方面机关团体五千元。上述捐款均由罢工委员会统一收支。据杨以德当时搜查所获，事后公布的矿工会一部分账簿所记：京奉铁路工会一千元，香港海员工会二千元，驻马店工会机器研究所一百七十元，浦镇机器研究所一百元，大槐树机器研究所五十元，山海关铁路工人俱乐部五百元，长辛店工人俱乐部二百元，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三百元，南洋新加坡工党一万元。以上共一万四千三百二十元。实际上当时按各地工会捐款系分批汇寄，如长辛店前后寄款三次，其中一次曾寄三千元，其它各工会亦然。估计全部罢工款项总额约在六、七万元内外。

当时北京《晨报》亦报导过捐款情况，其中记载有“北京方面得款三千八百元，南洋孙某汇来万元，广东海员工会二千元，安源一千六百元，京奉全线助款约七千元，以上共二万六千四百元……”上述记载略有出入。

国内外募集支援罢工经费积有成数后，源源汇寄工会，其中还有少数实物，如医药、寒衣、日用品等。罢工一开始，罢委会就动手考虑困难工人的救济问题，办理粥厂，搭盖临时伙房，安设巨锅，对于急需救济的工人及其家属按户登记，分区供应稀饭，窝头或其他面食品等。工人在这个“免费食堂”排队依序进食，有条不紊。

罢工委员会负责人每天饭后分区召集群众开会，报告当前罢工新闻，听学生演讲，念罢工小报，当众散发工会宣传品。有时自己带头执三弦或小鼓、竹片，高唱罢工歌曲，杂以鼓词、快书，兴尽始散。时有当地民间艺人演唱“矿军下江南”鼓词，内容是说江西矿山工人在嘉靖四十五年起义，诛杀贪官污吏，占领江西、浙江十余州县，建立平民政府等。这些内容极为新颖，听众叫座，欢呼不置！办起这个“免费食堂”效果很好，增加了团结战斗的气氛。

开滦罢工正是煤炭产销旺季，书记部在准备罢工期间，考虑到罢工的基金可能问题，曾向各路工会及其他工团作了动员，加紧募

捐工作。罢工开始以后，捐款已达到一个相当的数目，但开支也逐渐加多，特别在罢工进行二十天以后，正值天寒岁暮，经费更感紧张，加之，十一月中旬又因机关被抄查，捐款损失了一部分，由于党内外再次积极筹款，才得以维持。大灶食堂直到最后，仍照常进行，始终没有停伙。

矿务局让步与复工

这次罢工，工会原订计划以坚持二十天为期，届时资方损失巨大，将寻求解决。但罢工到二十天时，筹募的罢工费已大部用罄，而来源渐少，时届旧历年关，冰雪冱寒，工人及其家属数万人，嗷嗷待哺，啼饥号寒，工会多方筹措，设法渡过难关。但当时有些家口众多的少数工人，见资方仍顽固不化，主张无条件复工。罢委会便多方抚慰，号召大家坚持到底。正在此时，开滦矿务局董事会据英国公使馆提供的罢工情况："开滦工潮主持者，正在准备发动全国的铁路工人，发起更大规模的反英杯葛（Boycott）运动，如果这样，英在华北利益将蒙受重大损失。"因此他们为了在华北的长远利益起见，决定对工人做出适当的让步。而杨以德等人仍主张与工会对抗，蛮干到底，并多次向天津开滦矿务总局申言反对和平解决，开滦矿务局董事会，权衡利弊，拒绝其请求。事实上，矿局已因罢工风潮损失浩大，据事后获知的材料，一九二三年二月二日开滦总经理致矿局董事会伦敦开平公司的信中称："此次罢工意外的直接支付的开销是 181,563.94 元，同时总稽核估计总损失包括售煤与直接支付的开销共为 746,000 元。"实际损失要比此数更大。除十月与十一月直接售煤的损失外，车皮已被分散，正规的营业计划受到障碍等等都未估计在内，至于进行贿赂和收买工人的款项，更是无法估计。

十一月十五日矿局派人向工会表示愿意接受部分条款，杨以德亦将保安队撤回天津。罢工委员会即开会讨论。大家认为距原六条较远，少数委员仍主张罢下去，不达全胜决不上工，但罢工势难再延。因此党团会议又详加研究，鉴于当前局势难以扭转，便作出决定下令先行复工，以待来春再战。经罢委会作最后裁决，遂于十一月十七日由矿工俱乐部下令复工。复工那天，矿局总矿师宣布承诺工人部分要求，其余以后再作商议，矿区保安队全部撤离，释放被捕工人，矿局为工人鸣放鞭炮，欢迎工人进矿上工，于是开滦罢工宣告结束。此次罢工历时二十五天，英资本家共损失达一百五十万英镑。罢工结束后，当地党与工会组织随即转入罢工善后安排和从事保障工人既得利益的工作。不久，我回到北京，此时邓培、王尽美均已在京。北方区委详细讨论了五矿罢工的经验与教训问题。在区委会上，有的同志愤愤不平地批评罢工缺点，说自书记部成立以来，领导了十多次罢工，结果都获全胜，哪一次不比开滦的结果强！但区委决议认为一切斗争要从全局考察，不能片面地挑错儿说话，罢工斗争如同作战，胜败乃属常情，不宜自馁。

另外，开滦煤矿股票在国际市场急剧下跌，在开滦五矿罢工之前，开滦的股票是非常稳定和值钱的。自开滦五矿工人罢工后，股票市场纷纷抛售开滦股票，致使股票价格一直下跌，资方因此也吃了大亏。

铁 牛 事 件

在开滦罢工两个星期僵持不决之时，工会中有些急进青工，不能忍耐而主张采用激烈手段破坏矿井，与敌同归于尽，并想借此手段，令其无法生产，以挟迫矿局屈服。有的甚至说："与其不死不活，不如奋勇向前，宁可人头高挂，决不输却威风！"一时附和的也

大有人在。当时全市讹言盛行，一夕数惊！军警戒严，风声鹤唳，真是草木皆兵！针对这种情况，指挥部负责人即将此问题提出讨论，会议上大伙认为遵循正当罢工斗争途径，坚持不懈，估计可以达到胜利。如改途易辙，必须重新部署，不说困难多端，即使勉强执行这些主张，也必定有害无益，况工会大多数会员都不同意这种做法。因此，指挥部决定向这些人多做解释说服工作，顾全整个斗争阵营，坚持原定斗争部署。他们最后明白了，也就不再坚持了。

正在这个时候，忽然发生一件极不利于工会的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原来京东地区向有秘密帮派组织，并有矿工加入。他们平日结党自卫，渐至为害一方。马家沟、林西一带帮派组织横行事，所见亦属不鲜！五矿罢工后，当地帮派头领起初是坐山观虎斗，不愿积极参加罢工斗争，更有少数游手坐食之流，颇思乘机捞一把。据邓培谈，某帮头目竟异想天开，说书记部以巨款援助罢工，本身当为一大财主，因此颇思绑架书记部负责人，或勒赎，或送官，可借此掳得一笔横财。他们正在设法踪迹书记部负责人行止时，事为罢委会所侦悉，乃转告邓培，因此让我多加小心，注意防范，免堕陷阱。我说："既有此事，便不应仅作消极防范，这是工人内部的事，要认真考虑，彻查明白，然后予以有效处置。"随即交有关方面加以调查研究，终于把问题弄明白了。原来，在组织工会的过程中，最初是把力量集中在技术工人方面，借以带动一般在册的工人，工会会员也主要是以上述两种工人为成员。但事实上五矿地区范围广阔，加上生产方面存在某些劳动力不均衡现象，因此矿局经常招募一批季节性工人，这些工人名不在工册，叫做短牌工人（临时工）。短牌工人系临时性质，没有被组织在工会以内。他们在工作与生活方面所发生的问题也就在客观上被忽略了。当全矿进行同盟罢工，面临巨大斗争场面时，数以万计的短牌工人没有组织在战斗系列之内，这是非常不宜的事，果然问题就在这里出现了。当时短

牌工人人数既多，其中自发性的帮派组织和秘密结社习惯也是普遍存在的。在这些群众的自发组织中，有一派势力较大，共奉一个绰号为铁牛的工人做首领。这一群青年工人沾染旧社会习气颇深，平日自由放纵，游侠自喜，身藏利器，横行无忌。他们自觉没被工会吸收，有问题既无法提出，也无人理会，于是对工会渐生隔阂与误解，时时抱怨工会对他们不公平。有时工会内外双方群众甚至发生冲突。他们中还有个别人异想天开，打算绑架书记部负责人进行勒索，以泄私愤。此事的缘由弄清后，我感到问题重大！当时有人主张派纠察队以武力压制，狠狠教训他们一顿，认为这样他们就不敢乱动了。当指挥部讨论这个问题时，大家认为对短牌工人动武的办法不妥，如果这样，会造成工人内讧，影响大局。经过考虑后乃决定派人把铁牛请来说理。

在工会的一间小平房里，铁牛偕同亲信三人被引进来，他们开始神情有些局促不安（屋外有纠察队站岗），我便向前招呼并同他们握手，他见我服装不整，风尘满面，有些疑虑，问道："你是大当家吗？"站在一旁的同志答道："这就是咱们的大掌柜！"铁牛自觉有些尴尬，嗫嚅说："我们一伙董事会不重视，工会也吃不开，实在无办法！"纠察队长从旁说道："书记部是工人本身的组织，对书记部绑架行为无异与工人为敌，工会不能坐视。"铁牛闻言，惶恐愧怍，连称"对不起！"我安慰他说："目前罢工工会工作繁多，实在忙不过来。许多事考虑不全，照顾不周，请兄弟们大家互相原谅！目前我们应该首先向敌人进攻，共同一致，齐心协力，打倒洋资本家的气焰，关于工人本身利益问题，才有办法解决。"铁牛沉吟片刻，叹了一口气说："我们也是莫可奈何……！"这时邓培正色直言说："工会基金筹来不易，是罢工成败所关，所以由专设机构严密保管，谁也不能乱用一文钱。千万不能胡思乱想。关于短牌问题，罢工提出条件中已经提出，不分长牌、短牌，通是一样。今后工会决定加强

组织短牌工人积极参加罢工斗争，也可入纠察队编制。大河水涨，小河自然也水满，不必过虑！”一席话说得铁牛连连点头，他坦白承认了错误，表示今后永不反悔。最后双方商定由铁牛所领工人另成立一纠察支队，隶属总纠察队建制。短牌工人经济、生活问题由工会全面安置，同样处理，在政治、组织等方面一律平等。这样，一场风波方告平息。铁牛后来率领其徒众，亲到工会道歉，表示永不再起异心，随后纠合大伙积极参加罢工纠察队工作。他们亲眼见到工会会员万众一心，努力向前，甚为感动，对伙伴说：“书记部经手募款钜万，账目公开，不沾分文，自老罗、老邓起，他们带头随同大伙一道喝稀粥，睡冷炕，我们如果再有歪心那就真不是人了。”把这部分群众争取过来，又加强了斗争的力量。

有一次我和邓培等正在新街开会，偶然被少数侦缉人员发现，冲进屋内，当场逮捕了几个人（我和梅羹在内），出门后适遇铁牛领纠察队巡查路过，他们人多势众，见状立即上前动武，驱逐侦缉队，夺回被捕人员。在罢工斗争期内，工人与军警双方直接斗争中，铁牛不只一次戮力向前，才使危局转安，因此多次受到指挥部的表彰。

罢工经验与教训

五矿罢工结束后，北方区委首先在全体委员会议上提出讨论，作了初步总结。后我出席中央会议时作了详细报告。国际代表也参加中央会议。中央对于五矿罢工经验与教训经过郑重研究后，一致认为：近一年来北方书记部领导各铁路罢工，迭获胜利，但开滦罢工结果却未完成任务，这项事例须认真总结经验，正视缺点，加以改正，争取在最近期间重新开展斗争，获得全胜。两次会议中均谈到这次罢工的认识与估计问题，认为：英国是世界煤矿垄断资本

最突出的国家。英国煤矿有一千多处，近三百年历史中，年产约三亿吨（一九一三年），占世界煤产量五分之一，煤的出口居世界市场首位。在英格兰（约克、德尔比、洛丁汉为中心）与南威尔士（温西、加底孚为中心），煤矿工人超过百万以上。他们生活条件低下，因此罢工频繁；此起彼落。许多罢工迁延长达四、五月之久，不以为异。故煤业资本家对付罢工诡计多端，积有许多经验，成为工人阶级的劲敌。在此次北方三星期罢工斗争中，中国工人受到了很深刻的锻炼，吸取了丰富的经验，数万先进产业工人与北方区委党组织成员，在与帝国主义及北洋军阀的英勇斗争中，团结一致，出生入死，蒙受重大牺牲，坚守岗位，与敌长期周旋，博得中外革命团体的赞扬，实具有深远的重大政治意义！

中共中央为了研讨各铁路与开滦五矿罢工经验，曾举行座谈会，在会上详细交流各方经验，检查缺点。出席会议的同志指出，全国铁路与矿山斗争战线广阔，经验丰富多方，得失互见，应加以详细研究，以寻求其中胜负真正原因之所在。至于这次五矿斗争中以极少数人力物力，尽力支持了二十五天，党在北方工人中的威信有所增加，这是事实。随后，国际代表为了解开滦罢工详细经过曾来到北京，当他聆悉关于开滦罢工全部情形后，郑重发言说："象这样大规模的罢工，在老奸巨滑的英国资本家与野蛮的中国军人面前，居然坚持相当长时期的斗争，这在欧洲国家也不是常见的事。"他勉励大家鼓勇再来，不要斤斤计较眼前一时的得失。

会后，国际代表问我在罢工中花费了多少钱，我以实告。国际代表聆言笑道："太节约了（biliger），若在法国，虽十倍于此数目还办不到呢。"后来职工国际专文叙述开滦五矿斗争时说："中国唐山开滦五矿罢工虽没有象当时铁路工会斗争一样取得预期的胜利，但是由于这次罢工人数众多，时间延续颇久，在罢工中又表现出工人具有强大组织能力，引起世界舆论重视。因此开滦大罢工在近

代中国革命史上实具有极重大的政治意义。”

总之，这次罢工，书记部全力以赴，经过充分准备，使罢工的组织完备而又严整。为了指导这次罢工，北方区委和北方书记部派人亲临指导，设立指挥部有效地指挥和领导了斗争的开展，使斗争取得了一些成果，这是不容否认的。尤为重要的是，从斗争中，我们学会了组织和领导大规模的工人斗争，经验是极为宝贵的。指挥近五万产业工人，面对强大的敌人，坚持二十五天的激烈鏖战，历史上并不多见。这一点，为当时的中央会议和共产国际代表所一再肯定。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仅一年多时间，在其领导下，显示了我国工人阶级团结的巨大威力，已使阶级敌人胆战心惊，认识到工人革命力量不可轻侮。这次长期的大规模斗争对于北方工人阶级来说，也是继陇海铁路大罢工后又一次创举，其业绩足使青史留辉。

在开滦罢工过程中，罢工指挥部工作的同志，所有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都一无例外地参加战斗。他(她)们坚守罢工阵地，艰苦卓绝，积极战斗，负伤不下火线，在敌人严密通缉、可能逮捕入狱、重刑拷打的情况下，仍然奋不顾身，如五矿八代表，北方书记部干部、唐山大学的党、团员和唐山地区的干部等，他们以身作则，带领群众，前仆后继，奇情壮采，尤为不可胜纪。

但是事后有人因身处局外，不明真象，甚至虚构事实，颠倒黑白，借以贬低这次罢工的意义，这都属别具成见与违背历史的不负责态度，理应加以明辨。

开滦罢工人数众多，经时颇长，敌我双方事态繁复，斗争激烈，而且双方互相封锁情报。因此当年除身历其境的主要负责人员外，一般局外人士对于罢工斗争内幕，是难以悉其底蕴而窥其全貌的。

长期以来，对于开滦罢工这一段历史，由于文献不足，当事者

风流云散，更增加了研究方面的困难。

开滦罢工一文写竟，已届午夜，怀念往事，怅触前情，援录旧作开滦罢工纪事诗四首，以殿本篇。

开滦罢工纪事诗（四首）

（一）

登山海关

风雪榆关道，
同君到海隅。
地掀千嶂起，
波涌片帆孤。
海岳兼形胜，
天人辟坦途。
叮咛五矿事，
喜汝建良图。

同游者邓培与尽美。

（二）

开滦半壁半修罗，
五矿由来半份多。
慷慨悲歌新乐府，
万人齐唱罢工歌。

修罗即地狱。半份指矿井无完全身份的短牌临时工人。

（三）

大地煤山万壑陈，

熊熊烈火耀星辰。
如今春动龙蛇起，
冀北千秋史册新。

（四）

林西查哨

锄头镰刀大纛旗，
同君会哨到林西。
短衣皂帽齐眉棍，
众志成城话战机。

于林西露天食堂座上口占。同行者英韬与咏裳。

十六、京绥铁路罢工

张家口的工人运动，最早是铁路工人带头发动起来的，随后逐渐发展到其他各业工人。在初期，工人斗争是自发性的。一九二〇年，京绥铁路工人为要求发欠薪，举行过一次经济性的罢工。到一九二一年，因路局不遵守签定的规约，又进行了一次罢工。京绥路工人的斗争是有传统的，党在京绥路发展工人运动虽是循序渐进，但也有曲折和反复。

一九二一年夏，我曾到南口访问，我在车站认识了一些司机、扳道工和调度工等，从谈话中，知道他们中间很多人参加了“精业传习所”，传习所是以传授和研究技术为主的团体，成员中大部分是技术工人和下级员司，以天津人为多。他们成为一帮，为了自身的利益也向路局作一些斗争。该团体的主事人张齐贤是一位熟练的技术工人。他读过很多旧书，性格爽直、热情，重江湖义气，和我一见如故。当时铁路上敌人眼线很多，为了不引人注意，我和工友们经常在火车的守车上攀谈。一次，我和张齐贤同坐在一节守车上，车厢不大，中间支了一张木床，平时我们盘坐在床上聊天，入夜则抵足而眠。这天，我们天南海北地扯了一阵后，他对我说：“我平生很想做一番事业，为此要结识一批有才识的人，也就是招贤礼士，我虽比你年长一些，但我看你很有胆识，你肯来帮我的忙吗？我还希望你多多介绍一些北大同学来。”张流露出对北大学生的一种敬慕心情。就这样我们交上了朋友，通过他，又交结了一些人。逐渐地我向他们宣传一些革命道理和共产党的主张，我和张齐贤也谈

得比较深远一些。他听后，对我说："中国是几千年的文明古国，朝代鼎革也很多，社稷的基础和国家力量的源泉虽是我们劳动人民，但是多次革命对劳动人民来说都未彻底成功，现在世界形势确已大变，闭关自守的时代过去了，北大同学提倡工人出头领导社会主义革命，这是新兴势力，我是工人当然是很赞助的，理应积极参加和支持你们的工作。但是我们的敌人很强大，我们工人目前的力量却很小，阻力很大，我愿意尽自己的力量，不过我个人力量是不足道的。"他的言谈表明了他裹足不前的态度，思想顾虑重重。接着他又补充道："不管今后情势如何变化，我是不会反对你们的思想和行动的。"的确他在后来的工会运动中起过相当的作用，帮过我们不少忙，但始终未站到党的队伍来。他的谈话也使我得到一些启发，上层工人由于客观条件不同，内心顾虑很多，畏难情绪很重，于是我下决心去大厂做发动工作。

我找到南口机车修理厂（通常叫大厂），大厂的工人工作累一些，力气活多一些，工资收入也较少，他们受压迫深重，因而革命性强。我在大厂认识了一些工人，其中有一个叫张太清的，为人正直，在工人中也有威望，我依靠他联络了一些工人，他后来成为党员，大革命中牺牲了。当时大厂工人还比较散，帮派也多。我就向他们宣传组织新式工会的必要，只有工人团结起来，斗争才有力量，工作条件和生活境遇才会改善等等。在一些觉悟工人的带领下，工会组织起来了，果然很有势力，慢慢发展到车务工人中间，原来传习所的一些人也倾向过来，合并后组成了京绥路车务同人会（当时工会组织的名称很不统一，有叫俱乐部，老君会或同人会的，往往视各地历史情况，和工人们所乐于接受的情形而定）。这是我们党和京绥路工人建立的初步联系，也为进入张家口市工作开辟了途径。

后来，我忙于陇海路的工作，就推荐何孟雄到京绥路工作，他

到那里继续开展工作，进一步打开了局面，成绩显著。一九二一年冬春，书记部就正式任命他为京绥路工会秘书和党团书记。

一九二二年，以张家口为中心的京绥路工人运动，逐步走向高潮。开始，同人会组织中员司占的比重大，会中的权利多为员司所把持，组织比较松散，经何孟雄积极整顿，同人会精神为之一振，会务更有春云渐展之势。

时值直奉军阀战争后，路局拖欠京绥路工人工薪达七个月之久，工人的生活非常困难，实在难以维持。同人会派出代表，多次到路局交涉，要求发放所欠工薪，要求承认同人会的权益。但路局态度蛮横，拒不承认同人会有代表工人的资格，对所提要求也置之不理。于是工人们十分愤慨，要求工会采取行动向路局示威。

这时唐山五矿罢工斗争正在激烈进行中，北京区委派人到唐山，要我回京商议京绥铁路工潮事，同时我也接到南口工会来信说：南口斗争局势紧张，如箭在弦，一触即发，要我抽空到京绥路一行，以便共决大计。于是我临时召集唐山党组织会议，共同讨论去京绥路的事。会上有人认为唐山形势正急，不主张我即离唐山。尽美却力排众议，说："五矿事，看来双方已成相持局面，恐还须经些时日才能解决，为了五矿罢工胜利起见，文虎也应到北京报告实况，调集支援力量；同时京绥铁路亦事关全局，十分重要，如京绥路能速决胜利，对唐山形势也很有利。因此，文虎必须前往，不宜坐失良机。俟京绥路部署就绪或斗争结束，再返唐山也不迟。"大家听后，又议论一番，最后均同意尽美主张。我随即动身返京，并于十月二十五日下午由京直抵南口，找到京绥路工会与孟雄见面，经孟雄详细介绍情况后，遂共同商议方案，决定实行罢工。并通知沿路各站统一行动。我们当即与工人代表研究罢工细节，并强调罢工期间的纪律很重要，是关系罢工成败的，为了对付敌人的破坏，还决定组织敢死队、纠察队。同时还组织一个宣传队，在罢工期

间，宣传鼓动是必不可少的，对稳定罢工队伍的情绪，揭露敌人的破坏活动都是十分重要的。这一切都是连夜准备停当的。次日（十月二十六日）又向路局正式提出“补发所欠薪金”，“承认工会的权利”等要求。路局仍然置之不理，工会又提出如不答复，则全路将要罢工。路局认为象过去风潮，不以为意，竟讥讽工人：“看你们如何罢工法？”工人闻讯后，非常气愤，齐集工会，要求拚死奋斗，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是时，工人莫不万众一心！于是，工会决定在向路局提出条件的二十四小时后宣布罢工。十月二十七日，京绥路全线车务与大厂工人近一千五百多人开始了总罢工。

罢工后，工会向各界发表宣言，表示这次罢工实出于不得已，路局迫使工人走投无路，只有采取最后行动，进行罢工，以待解决，并在宣言中将七项要求附后，布告全国，其条件为：

（一）工人一律加薪，从要求之日起实行。

（甲）工人月薪，无论多少，一律加增二元。

（乙）工人跑车饭费，一律加至三角。

（丙）每年加薪一次，至路局工人薪资表最高资额为止，但遇社会生活程度超过此项高资额时，须重新定薪资表。

（二）每逢礼拜日节日、路局官假、及工人应休息之假日中作工者应给双薪。

（三）工人因病身故者，给全薪一年与其亲属；因公遇险身故者，给全薪二年；如系积劳或因公致病者，其假期不论长短，均不得扣薪。

（四）直奉战争期内，工人在官假中曾作工者，请照局电，一律补给双薪一月。

（五）承认现在的车务工人同人会有代表工人之权。

（六）局中因故开除工人，须先期以充分理由通知车务工人同人会，俾有辩护余地。

（七）工人亦须一律发给与本路下级员司同样的制服。

罢工宣言张贴通衢要道，工人们正气凛然。工人纠察队、敢死队巡行车站、道口。宣传队走上街头，向群众讲演。京绥铁路充满革命气氛，口号声荡漾山城，张家口一派沸腾景象。

罢工坚持两天，一切运输陷于停顿，货物积压，路局顿陷恐慌之中，指使机务段工贼开出车头，企图破坏罢工，同人会会长李连升闻讯，率领敢死队，立即赶到新安街东口一带，截住机车。当时正值初冬，塞外寒气逼人，李带头甩掉上衣，赤膊躺在道轨上。在他的带动下，敢死队队员们也甩掉上衣，挨个卧轨，足延绵半里多远。这时车头步步逼近，队员们毫无惧色，均置生死于度外，场面极为动人。李连升眼看车头逼近，乃挥舞手中旗帜，工人们随即呼喊，声响震天，工贼胆怯，车头被迫停止，这一回合胜利了，工人们无不欢欣鼓舞，认识到众志成城，团结斗争力量强大。反动路局见此招失败，恼羞成怒，加派二百名警察前来镇压。工人们则对警察宣传罢工理由，争取警察对工人的同情。在工人们的宣传攻势下，警察采取了中立态度。随后，察哈尔都统张锡元，派其参谋长率一营武装士兵包围车站，声言要捉拿李连升，想借此恐吓工人，达到复工的目的。我们估计到敌人的阴谋，要求工人中的党团员和活动分子坚决顶住，在这关键时刻不能退让，要他们以行动鼓舞大家，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于是工人们在工会党团的组织领导下，团结一致，顽强搏斗，李连升据理力争，在群众的护卫下，敌人终未敢动手。至此，京绥路的后台、吴佩孚御用内阁的交通总长高恩洪感到无可奈何，指示路局答应了工人所提的条件。罢工仅历时三天，经过了激烈的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书记部在该路工人群众中威信大增。该路工会以外的群众组织大都解体，其工人均投奔同人会接受党的领导。

在罢工胜利结束后，我又连夜赶回了开滦。

十七、正太铁路罢工

当年，石家庄正太铁路是在福建派和法国人把持之下。帮派势力相当雄厚，监督丁平澜，参赞许柯山，机务总管施恩孚等。这一帮人从清末到民初三十多年间曾在福州经营产业，后又来到正太路，因此人们说正太路是福建铁路。确是如此，他们把持铁路，任用私人，恣意压迫工人，只要他们的亲信到铁路上工作，不论技术如何，工资至少三十元。当时铁路各工厂的一些工头陈顺来、姚福祥等在大桥街明盛园饭庄外院租一所房，成立石家庄正太铁路工业研究会，每月收工人一日工资作为工人会费，工人多敢怒不敢言。大小工头们每天在会里喝茶闲聊，不为工人谋一点福利。这种研究会只不过是法国人、福建帮的御用组织。

石家庄地方不大，但它处京汉、正太两路的交接点，那时两个车站并存。由于地理位置的重要，所以北方区党组织对石家庄比较重视。工人运动在长辛店展开后，中共北大支部就派人沿京汉路南下，到石家庄发动工人。

石家庄早期的党员

孙云鹏是石家庄铁路工人中第一个党员，系由我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事情的经过是这样，长辛店有了俱乐部后，我便同史文彬一起到了石家庄。史文彬在石家庄铁路上熟人很多，他有一些亲朋好友，还有不少徒弟。我经史文彬介绍，认识了孙云鹏。

孙是当地工人的一个领袖，初次见面后，对他的印象是朴实无华，但觉悟不高。在我略略说明来意后，他率直表示不愿参加我们的革命工作。他自找理由说："我文化水平低，干不了。"虽然孙云鹏拒绝了我们，我还是决心再做他的工作。因为他在正太铁路上群众基础好，很有威信，对打开局面很有作用。于是，我就留在他家住了两三天。一天孙夫妇二人陪我游览石家庄附近名胜和井陉煤矿。该煤矿是德国侵华军人汉纳根(Hanaken)在远东的一个冒险乐园。在游娘子关时，孙夫人还兴致勃勃地指点雄关，向我口述唐太平公主率娘子军攻城夺寨的传奇故事。在旅游期间，我也乘机向他们讲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故事和苏俄产生的变化，以及共产党的性质和中国工人也要走俄国革命的道路等等。他们也向我提了一些问题，我都给他们逐一解释了。我对孙说："你是铁路上的，到北京很方便，有什么想不通的，可随时跟史文彬一块到北大西斋找我。"经过几天的工作，孙云鹏的认识有了转变，并表示愿意做些工运工作。这以后，陆续有书记部工作人员和他联系。一次，他到北大找了我，这次见面，大为不同了，他主动说："共产党是正派人，处处为工人着想，你们大学念书的，出校后就有官做，但你们为工人利益东奔西跑，不求官禄。我们工人自己为什么不关心自己的事呢？"又说："以前我听人说过共产党不可靠，现在看来，这是造谣，是昏话。"孙云鹏的觉悟提高很快，他出身工人，很容易接受党的教育，一旦觉悟，作用就很大。经过多次交谈，我有意发展他入党，我向区委提出了这个意见，经过党组织讨论，约在一九二一年冬至次年春季之间，孙云鹏成为正太路第一个工人党员。孙云鹏入党后，接着又发展了一些进步工人入党，其中有施恒清等，后来又建立了党小组。孙云鹏入党后，工作更积极，他们又把工作推进到阳泉、太原以及整个正太路。

一次，孙云鹏提出，长辛店工人俱乐部有吴雨铭协助工作，石

家庄是否也能派一个同志常驻那里帮助开展工作呢？我答应了他的要求，这就是以后张昆弟去石家庄正太路工作的缘由。先后被派到正太路工作的干部为数不少，除张昆弟，还有袁之贞、刘明俨、贾纡青、高克谦、吴先瑞等。

张昆弟，湖南益阳人，一九一九年赴法勤工俭学，一九二一年回国后，我介绍他在北方书记部工作，一九二二年入党后，继又派他到正太路任特派员。张昆弟办事稳重，在群众中有威信。

袁之贞，河北霸县人，他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一九一五——一九一六年）到法国当华工，积极从事工人运动。后来回国，在北方书记部工作。他虽是工人出身，文化程度较高，法文、中文都不错。当时约三十来岁，很能干，善于联系工人群众。我们派他到石家庄工作。后来，他成为正太路的一个重要人物。张昆弟有些办不到的事，他却能办好。因张昆弟是南方人，他的话北方人听不大懂，袁是本地人，没有语言口音问题。当时，他负责党的宣传、教育、训练等工作，工作很有成效。

自张昆弟、刘明俨、贾纡青、袁之贞他们到石家庄正太铁路后，组织了工会，在工会中建立了党团组织，张昆弟任党团书记，直属书记部领导。共青团的领导由另一位同志张廷瑞负责。孙云鹏的女儿孙素华当时是团员，也担任团的工作，表现很好，后来我们选送她到苏联东方大学学习。孙云鹏的家属高登五很能干，虽是一位家庭妇女，却为工会做了不少工作，石家庄工会中的许多事她都积极参与，那时许多机密会议都在她家开，她也参加，很有主见。她的轶事很多，十分大胆泼辣，一九二四年孙云鹏被捕，关在天津监狱，高登五亲往天津，一天拦住省长王承斌汽车，上前告状请求释放云鹏，王亦无可奈何，后孙经党营救，适逢冯玉祥政变后，孙云鹏出狱。一九〇七年石家庄总机器厂洋总管唆使工贼李某毒打孙云鹏，高登五知道后，亲到洋总管家问罪，对方自知理绌，道歉了事。

曾派到石家庄工作的贾纡青，湖南郴州人，他到石家庄工作不久，又调往他处。同去的还有吴先瑞。吴是湖南宁乡县人，北方书记部工作人员，先在唐山作工运，后被派往石家庄。那是在石家庄第一次罢工时，他和我一同去石家庄的。还有一个叫刘明俨的湖南人，因说不了北方话，去石家庄不久即调离了。

经过一段努力工作，正太铁路工人的队伍齐整了，斗争情绪也高了。当各条铁路工潮勃兴时，正太铁路工会也跃跃欲试，要求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一九二二年十月前后，他们向路局提出了九项要求，路局延宕经月，没有下文，于是工会决定罢工斗争。罢工前，张昆弟从石家庄来唐山找我，我正在料理唐山罢工的善后问题，已是十一月底了。他见到我后，说："老孙让我来找您，让您去石家庄一趟，我们初次领导罢工，没有经验，怕有失误。"看来，孙云鹏稳健持重，很有心计。我于是从唐山带了张隐韬、吴先瑞去了石家庄。隐韬是北方书记部中懂军事的人，对作战、训练都很在行，由他负责武装纠察队的工作，所以派他到石家庄领导和组训工人纠察队。吴先瑞一直在唐山工作，领导过罢工斗争，积有相当的经验。我们几人来到石家庄后，立即召开了党团会议，讨论解决三个问题，（一）大家分析了罢工的准备情况，认为时机成熟，可以罢工了；（二）讨论加强宣传组织工作；（三）敲定罢工日期，由孙云鹏正式向全体工人宣布罢工命令。会后，我又赶回唐山，隐韬和先瑞留下帮助云鹏他们领导罢工。

九项要求与五项条件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在张昆弟、孙云鹏、刘明俨、贾纡青、吴先瑞、张隐韬、施恒清等领导下，正太路工人举行了第一次大罢工。罢工委员会发出正式罢工宣言，要求路局履行工人所提的

九项要求。其条件如下：

（一）加薪分三等：（甲）现得薪金十五元以下者，加日薪二角。（乙）十五元以上至三十元者，加日薪一角五分。（丙）三十元以上者，照原价加十分之一。

（二）以后每年按第一条之规定，加薪一次。

（三）路局增用工人，须先尽容纳工会之所介绍者。

（四）凡车务处工人以及夜间守厂与屋外操作工人，均应由路局每年发给羊皮大袄一件。

（五）星期日，国家例假日，及重要劳动纪念日，均须放给例假；按照员司成例，并每年给二十天特假。例假及特假，仍给工资。倘若于假期间加工，而得工人同意者，给双薪。

（六）路局每月须辅助工会所办之每一工人学校二百元。开办费由路局全给。

（七）工作时间，不得过八小时，否则，照所增之时间增薪。

（八）工人因工受伤，除应由路局供给医药费外，其因伤不能做工者，仍发薪，治愈而成残废者，照最后工资给予抚恤至死后三年为止，除由路局给予三百元之丧葬费外，并照最后工资遗恤金于其家属至三十年。又在路局服务，满二十五年，或十五年，而年逾五十五岁者，应照最后工资给予养老金，至死后三年为止。

（九）由路局发给工人本路常年免票，及无限制之家属免票。并每年发给全国铁路免费通票三次。

宣言发出后，路局仍无反应，罢委会于十七日又发出第二次宣言，除前所要求的九条外，又提出五条，内容如下：

（一）路局应承认正太铁路总工会有代表全路工友之权。

（二）罢工期间不得扣薪。

（三）不得因罢工而借端开革工人，以后路局处罚工人，亦须先得工会同意。

(四)本会会员有因小故而被革除者,应即复职。

(五)短工均改长工,以后新上短工,满一年后,亦须改为长工。

同时提出:"这些新旧条件,共计十四条,倘铁路当局不予我们以满意答复,我们决不上工。"

正太路工人在党的领导下,态度十分坚决,各地路局也纷纷来电,表示声援。唐山京奉路职工总会、津浦路工会、汉冶萍总工会、京汉路长辛店俱乐部等以及筹备中的全国铁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都来电和实物支援。

唐山京奉路职工总会电云,北京晨报馆转各界同胞:正太铁路的工友们,因为生活问题提出最低要求九条,当局始终无诚意解决,乃于不得已之中实行罢工。迩来军阀及资本之势力到处皆是,同胞若不急起援助并监督这二种势力的行动,则唐山矿局事件难免再见发生。并愿同胞督促正太铁路局及交通部速将该项罢工解决,免得风潮扩大,工友受罪,敝会本同一阶级的友谊表示以实力援助。

汉冶萍总工会电云,全国各报馆各工会转全体工友暨各界同胞钧鉴:顷接正太铁路全体工人罢工宣言,真令人读之酸心,闻之流泪。作工二十余年没有加过一次薪,工资又极低,不但使工人家中的老小得不到安然生活,就是工人自己也吃不得一顿饱饭,穿不得一件暖衣。请看社会上的生活程度,比较往年增高了多少倍,工人的工资依旧同二十年前一样。以那时所定的工资,谋现在社会上的生活,怎样不饿肚皮,现在就是想拚命工作也快要无命可拚了,慢说一家老小哭哭啼啼望着要吃要穿呢。全体工友们!各界同胞们,这是何等的伤心惨目呀。

全体工友们!我们工人为世界的创造者,为社会尽了无穷的功绩,倒落得自己啼饥号寒,那创出来的利益,全部的被个人或最少数的资本家独占。正太铁路是我国最富的一个运输道路,那些外国资本家操纵我国经济命脉,掠夺我国的贫苦人民,逼迫我们最

亲爱的正太铁路全体工友走最后的路，再三要求不遂而至于罢工以求解决，这是何等悲壮的事。那外国资本家只顾他几十万的利益，那管我中国的国弱民穷，他更是最希望中国永久的国弱民贫呢。现在正太铁路的全体工人为争生活的安宁，和改善起见，自动的向掠夺中国人的外国资本家奋斗。他们正在万分痛苦之中，凡我国人都应起来援助这艰难困苦中奋斗的苦同胞——正太铁路的全体工人呢。

坚韧不拔的正太铁路的工友们！你们在痛苦中与外国资本家奋斗，我们万分敬佩你们努力的精神，要抱定宗旨，坚决向前，我们工人所受的痛苦是万恶的资本主义给我们的。我们中国的工人现在是受国际帝国主义，外国资本家的压迫，特别厉害。我们要一致努力打倒国际资本主义，铲除外国资本家，争得我们工人应有的权利和生活的安全。看你们最低限度的要求条件，是十分正当的，为要求生存权和劳动保护权是我们工人应做的事业，何况逼得我们工人受不堪的痛苦呢。

各业工友们！正太铁路的工友们，正在艰难奋斗之中，我们要一致起来作实力的援助呵！

浦镇津浦路工会代电云，正太铁路总办鉴：昨贵路工友罢工宣言，敝处工友诵读之下，不胜愤激之至。我中国铁路工人近来感生活之苦，待遇之苛，群起纷争，罢工之声相继而起，贵路待遇我们工友素较别处苦甚，今值此工友觉悟之际，不作设计改善待遇，反加压迫，视我工人如牛马奴隶，置众工友之要求条件，至今三月有余若无所闻。汝等洋资本家残暴贪婪之欲完全表示出来，真世间罕闻见之事也。盼望贵当局早日醒悟，尊重我中国工人之人格，速允要求条件，实汝等洋资本之福利也。

为支援正太路工人的斗争，全国铁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也发出通电，揭露外国资本家对中国工人的压迫和剥削，其电文曰：正

太铁路为全国铁路中第一腐败，实权尽操在外人之手，外人以掠夺金钱为目的，遇事贿赂，平素对于工人，视若犬马之不如。十年以来尚没增加一次工资，工人谋一工作，非事先以重金运动不可，一般狐假虎威之员司，以虐待工人向上司讨奖。工人处于九层地狱之下，已非一日。因此工人乃前聚集筹商救命办法，向路局提出九条哀求增加工资，提高地位，当局竟置之不理，酿成工人罢工，交通停止，路局应负其责。至今路局不仅毫无诚意，并求来大兵弹压工人，故意欲陷全路工人于死地。全国同胞，工人罢工，出于路局虐待之所至，工人向路局之所要求，出于救死之一途，万请即本人道上之主张，迅速援助正太全路工友。万一正太全路工友要求之条件一无所得，反遭屠杀种种祸害，即全国同胞之良心必不能忍，凡属于工人阶级中的队伍，尤望本同一阶级切肤之痛，实力援助，使正太工友得到最后胜利。不然，一处工友失败，各处工友都有关连的。特此电闻。

正太路工人的罢工斗争之如此坚定，除因得到各地工人的有力支援外，还有一个原因，那时我们有了一个后方，就是京汉路。从长辛店、保定、正定等地工人都给了正太路工人的斗争以巨大的援助。在罢工斗争的相持时期，京汉路工会向政府和各工团发出呼吁，其文曰：

（一）北京国务院参众两院洛阳吴巡帅保定曹巡帅太原阎省长，暨各界公团各地商会农会学生会各报馆交通部正太铁路局均鉴：正太路工为生活压迫提出要求，而该路局蔑视工人，竟置之不理。他们现在，已经万不得已罢了工了。唉，苦哪！为痛苦而罢了工，更是天下最痛苦悲惨的事哪。盼望诸公俯体苦工人之衷怀，援以鸿力，施以臂助，俾得早日解决，而救彼辈于水深火热之中，则感大德于无既矣。细查该路工人所提条件，于要求中可想其待遇状况之难堪。夫当此生活程度日益增高，社会经济日加迫亟，以十余

年前之所定工资，来度今日米珠薪桂之生活，虽三尺童子犹知其不可，况终日营营之资本家乎，是诚资本家和劳动者挑战也。而洋资本家每年在华掠夺金钱不计其数，彼之丰衣美食，高楼大厦，罔不由工人血汗得来，是可忍，孰不可忍，是洋资本家真无人心也。我们同属于工人阶级，今为一致攻击我们的敌人——资本家起见，特此对此麻木之社会呼号，仁德之诸君子请命，此而不灵，亦惟有一致实力援助，以表示社会之悲哀，人形之惨淡而已。倘能借斯转变，转祸为福，使正太路工友同登任席之上，是所望矣。

（二）全国各工团各报馆以及各界团体钧鉴：正太的路工弟兄们，已于十五日宣布全路的总同盟罢工了。我们还记得，在最近的以前，唐山五矿的洋资本家曾用过手段雇用军阀的走狗——杨以德——去摧残过我们的矿工弟兄，现在正太的工友们，为压迫的苦痛、苛酷来罢工，要知道亦是英国的资本家呀。我们已经注意了！我们绝不放任他们去失败呀！绝不能叫军阀走狗再来摧残他们的呀。危急了！我们京汉和他们是唇齿相关的，决要起来援助的。并希望他们得到大家的帮忙，快快解决，胜利。

高登五巧计退敌

正太路的罢工正值年底，天气寒冷，工人生活益发困难，但他们仍坚持着。家在外地的工人，每天由工会发给每人四个馒头。家在附近村庄的工人，每天回家吃饭。由于路局迟迟不答复所提条件，工人们干脆用苇席搭起窝铺，昼夜值班，严守各厂厂门，工人们用道木横架拦住，不让机车行驶。斗争坚持了一个星期仍无结果，工人们不气馁，就地搭起锅台烧饭，坚持斗争。但经济的确愈加困难，正在这时，京汉铁路正定工会委员长康景星从正定把各路工会援助正太路罢工斗争的现洋运到石家庄。这批现洋运到后，高登

五想出一个办法，把现洋分别装在几个箱里，因现洋不多，箱底就垫上一部分杂物，现洋放在上面，在发放救济款时，有意让工人都看见，工人们以为满箱都是现洋。当工人群众领到救济款后，都相互转告，说不要紧了，各路工会支援我们许多现洋，可以继续坚持斗争了。这样一来，人心就更为安定了。

当罢工斗争进入关键的时刻，有人从中破坏罢工，但一时查不出来。一次召开工会会员会议，按惯例，每次召开这样的会议，会员都得凭证入场，而这次会议之前，高登五却暗中告诉纠察队长，让门卫先不要检查出入证，待开会后再说。会议刚一开始，她突然登台宣布说，请每个到会会员亮出自己的工会证，并按组坐好。随即派纠察队逐个检查，有些混进会场的人被查出来，并拘留审查，结果，破坏工人罢工斗争的坏人被查出来了。

罢 工 胜 利

经过整整十天的坚决斗争后，路局无奈，他们派警察所的丁镇金到石家庄找孙云鹏，示意要解决这次罢工。孙回答说，只要允许我们的条件就开工，否则，决不开工！过了一、两天，即二十六日，厂方果然通知接受复工条件，共十四条：（一）加薪，除十一月已加一成不计外，凡工人薪金在十五元以下者，一律月加三元，十六元至三十元者，一律月加二元五角，三十元以上者，一律月加二元。（二）以后加薪办法，照京汉路新章程办理。（三）雇用工人，工人代表可以向路局介绍。（四）本路所有打旗挂钩下夜护勇查道护勇，各给皮袄一件，每隔二年一换。（五）放假，本路放假日期，一律给薪，放假期内作工者准给双薪。（六）工人子弟学校，照京汉京奉各路，呈由交通部办理。（七）做工钟点，照京汉长辛店钟点。（八）因公受伤，所有工人因公受伤者，在医治期内概不扣薪。因公受伤立时毙

命者，路局给予一年薪资。（九）工人免票，每年准给三次。（十）罢工期间，不应给薪，兹为体恤起见，准给七天薪资。（十一）罢工工人，本路不因罢工开革工人，准一律上工。（十二）已革工人复职，毋庸议。（十三）短工改为长工，凡短工到工满一年者，路局准其改为长工。（十四）加点，打旗挂钩照司机升火一律加点。

正太铁路罢工计十二日之久，路局损失达三十万元以上，终因路局让步而复工。开工那天，全路工人欣喜若狂，上街游行，庆祝胜利，工人手执“罢工胜利”、“全世界的劳动者联合起来”的标语旗帜，并发出开工宣言，气势雄壮，其文如下：

胜利了！我们此次罢工，得到最后的胜利了。

我们的胜利，虽不能说十分圆满，但是这种小小胜利，已不是和我们早先一样的散漫群众所可得到手的，是我们有了团结之后才能得到的。劳动者要解除痛苦和压迫，须得团结起来，这又是一次证明了。团体既然这样有价值，我们以后便当尽力把团体更坚固起来，更扩大起来，以便努力于解除一切痛苦和压迫。又此次罢工，各地的劳动团体，援助我们的力量很不小，在他们固然是因为有了阶级觉悟，明白了直接或间接的利害相关的地方，可是使我们不能不极端的感激他们。还有各位调停人，为我们的事，也费了许多力，也是我们所深深感谢的。我们于今天开工了，在这一天，我们更感觉得劳动者阶级的团结之必要，所以我们要高呼“全世界的劳动者联合起来”，并祝“劳动万岁”。

这次正太路工人在罢工斗争中，尽管遇到不少困难，但最后终于取得胜利。经过这次斗争，更进一步扩大了党在工人群众中的影响，大大提高了全路工人的斗争信心，使全路工人更为团结。同时，它的胜利，对正在开展罢工斗争的全国南北各铁路、矿山和城市的工人群众，发生了积极的影响，也为正太路今后的斗争准备了有利的条件。

十八、“二七”大罢工

“二七”斗争是中共建党一年半以后所发生的重大事件，我在党的领导下，协同北方区委诸同志躬亲其事，共同奋斗，倍历艰辛，今将事变过程纪要如下：

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

溯自一九二一年下半年起，中共北方区委所组织的八条铁路的罢工(陇海、津浦、粤汉、京绥、京奉、道清、京汉、正太)，一般都取得了胜利，对全国均有影响，以后又组织了历时最长的开滦大罢工。

一九二三年一月，中共北方区委开了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总结了北方铁路、矿山罢工的经验与教训，并决定今后的斗争方向。认为过去罢工多偏重于经济斗争，以后要求各条铁路多组织政治斗争，在斗争中应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争取组织工会的自由权利等，把政治斗争口号放在首位。原则既定，便开始规划具体方案。当前的主要工作就是积极成立铁路总工会，首先是成立各路总工会，其中以京汉路总工会最成熟。早在上年四月，首由长辛店俱乐部发起筹备京汉铁路总工会，并成立了总工会筹备会，当时，全线十六个站已先后成立了分工会，连郑州原为交通系所辖的工人传习所的工人也都悉数加入工会，全路形成了统一局面，决定二月初在郑州公开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其它各路也分

别筹组总工会。这一方案已向中央汇报，希望在适当时候，在全国范围内采取一致行动。这个决议随后提到在郑州举行的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会议上，经决定在二月一日在郑州公开举行京汉路总工会成立大会。

在这次区委会上，守常还提出："现在北大放寒假了，我应湖北教职员联合会的邀请，在寒假期间，我准备到武汉大学去讲学，北方区工作请文虎负责。"（一九二四年二月十六日出版的《新学生》第十四期上曾刊载了李守常先生的《纪念"二七"并追悼列宁》一文，其中曾称："去年'二七'前几天，兄弟适因事情到汉口……在船上又知道流血事件"。在一九二三年一月，李写给北大周启明的信中，也说及武昌高师教授胡小石约请他到武汉讲学的事）当时，学校放寒假有一两个月的时间，我们考虑守常平时很忙，现在利用假期外出讲学，也可以换换环境休息一下。守常往常在寒暑假也要回到昌黎老家或附近的五峰山住一段时间的。因此，大家一方面同意他换换环境，另一方面也希望他快去快回，因为有的工作需他定夺。他鼓励大家说："不要紧的，你们会搞得好的，我在不在都一样。"临行时，我去送他，握别时我问："这次郑州开会，洛阳西宫（吴佩孚驻地）想无意外？"守常沉思片刻后，说："吴子玉（即吴佩孚）近来正在忙着装点门面，笼络人心，想不致做出什么毁坏自己声誉的事吧！如果有什么事，你去找白坚武谈谈。"他离开北京到上海后，住在一品香饭店，曾给我来信，告知旅途情况，未及其他。

当时，大家也都未料到会由于京汉路总工会成立而发生突然事变，所以我们按原定计划到郑州开会去了。

京汉路总工会的筹备工作是公开进行的。上海、北京、武汉、广州等大城市的大报都刊登大幅广告，通知并邀请各团体来郑州参加成立大会。当年的报纸曾对大会筹备情况有如下的报导："总工会组织，在数月前便已着手，现在才告就绪，定期二月一日，在郑

州开总工会成立大会。因为郑州居京汉路中心，全路工人，赴会较便，先期并请了全国各工团代表，和各界人士，到郑观礼。武汉方面前往郑州的，共有三四百人，并赠送总工会匾额和其他物件多种。其他各处代表到郑的，亦颇不少，郑州各大旅馆，一时顿现人满之患。总工会会场，设在普乐戏园，座位极宽，预备大众听讲，其他设备，都费了好些时的布置，数千元的代价，满拟此簇新的工人团体，立时就要涌现在吾人的眼帘，发生吾人的许多美感。”

为使这次成立大会得以顺利召开，京汉路总工会筹备会将召开大会的时间、地点，事先通知了京汉路局局长赵继贤。赵继贤是个惯搞阴谋、诡计多端的政客。他表面同意成立总工会，假惺惺地允许工会代表可以免费乘坐火车去郑州开会，专为代表拨出头、二等车厢，还公告将一月二十八日星期例假移到二月一日，以便代表赴郑开会，并赠送锦旗，以此表示他支持工会成立。而暗地里他却于二十五日密电吴佩孚，加强反革命部署。二十九日，吴佩孚在给靳云鹗的密令中说：“郑州靳总司令鉴，顷接京汉路赵局长径(二十五日)电云，据报二月一日，本路全体工人，将在郑州开成立大会，各路与会者甚多。以未经地方官厅许可集会，竟敢明目张胆，聚众招摇，不特影响所及，隐患堪虞，即此目空一切，荒谬绝伦，将来群起效尤，愈演愈烈。蚩蚩愚氓，必将误蹈法网，而不自知。瞻顾前途，杞忧无极，务祈麾下迅饬预为防范，切实监视。本路幸甚，地方幸甚等语。即希预为防范，设法制止，为盼。吴佩孚。艳(二十九)。”

大会未开，已为隐忧所罩。

一月二十五日，我同史文彬等到了郑州。在这前后，全国各铁路工会代表已齐集郑州参加京汉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其中有：京奉路王麟书、梁鹏万；津浦路李宝臣、王荷波；正太路孙云鹏、张兴义；京绥路王学闻、张汉清；陇海路魏荣珊、王符圣、程圣贤；胶济路李青山、伦克忠；道清路魏宝鉴；粤汉路李书箴等。此外尚有北京、上

海、武汉、广东等省市工会代表共三百余人。

我到郑州后，聆悉各方面报告，知道近日敌人对京汉路总工会召开成立大会非常恐慌，情势变化很快。据洛阳工会党团负责人报告：最近截获保定、北京致洛阳吴佩孚密电数起，其中曹锟与交通系赵继贤等认为京汉路总工会开会是有重大政治阴谋。电文称："近来书记部工会声势日增，过激气焰嚣张，各路罢工影响铁路秩序极巨"，"最近全路总工会代表借口开会，群集郑州，据报有潜谋不轨情事，市面人心惶惶，一夕数惊。郑州当南北要冲，设有疏虞，后患何堪设想。应该当机立断，严令制止。并查拿该部（指书记部）首要分子归案究办，以遏乱萌"云云。同时又得悉交通系主脑曾偕京汉、京绥等路局长亲自到洛阳西宫向吴佩孚面陈北方铁路危机，请吴防止赤化，并且以危词激吴。说什么"赤党一声呼啸，全路为之震惊，此等声势，真要强过几师雄兵"。吴佩孚大为震惊。我们又从各站来信得知：曹锟屡电吴佩孚增兵京汉沿线各站。当时沿线驻防军警约二万人以上，其分布为保定一旅（第十四混成旅，旅长时全盛），长辛店二营（驻宛平县，由张国庆率领），琉璃河一营，石家庄、安阳、许昌、信阳等地各一、二营不等，汉口镇守使一旅，足见曹、吴已有与工会兵戎相见的准备。

得悉各方面情况后，我立即召集了京汉路总工会党团会议，讨论应付曹、吴问题。党团成员包括北京、郑州、武汉三处党员。京汉路总工会党团会议负责人为罗章龙（党团书记）、王仲一和史文彬、许白昊、林育南、李大汉（震瀛）、项德龙、吴汝铭、李求实、康景星、葛树贵等，皆为党团成员。这些人分住在郑州金台、福昌、五洲各旅店。另在钱塘里某号设党团办事处。

一月二十七日，据报：吴佩孚派副官某来郑州活动，并率便衣军警到工会代表寓所窥探虚实。第二天，郑州警察局长黄殿辰来工会谈话，自称奉上级命令禁止工人在郑州召开大会。接着，总工

会筹备处又接到吴佩孚电请工会派代表到洛阳谈话。看来形势已剑拔弩张，冲突之势在所难免。于是，我们一方面大造社会舆论，在报纸上揭露敌人的破坏阴谋，并指出工会坚强决心，严阵以待（如在北京《晨报》刊布消息）；另一方面经党团会议讨论决定派史文彬等五位代表，于三十日乘专车去洛阳见吴佩孚。吴佩孚非常狡猾，他在谈话中，对代表说："你们工人的事，我没有不赞成的……不过，郑州是个军事区域，怎么能开会呢？你们不开会不行吗？……你们说开会没有什么，我也知道，不过……你们若是非开会不可，我也没有办法了……"吴所称军事区域，并非真实原因，因为当时郑州并非戒严区域。实际上，吴已接到曹锟密令，和听到交通系危言耸听的话，如说"书记部狼子野心，目前集中郑州、开封一带的代表近千人，均系来自南方的革命党人……"，等等，所以吴遂决定采取强硬的办法来对付我们。

三十一日晚，赴洛阳代表回到郑州，在党团会议上报告与吴佩孚谈判经过，知道吴佩孚态度狂妄，情势十分紧迫，求实建议我致函白坚武，晓以利害，要白向吴进言转圜。我说："事到如今，已不是口舌所能争的了。"大家也都这样认为，赞成以实力与吴周旋。讨论结果，决定必要时以举行京汉路全路政治罢工来争取工人自由权，不达目的誓不中止。当晚并决定总工会按原定计划举行成立大会。

二月一日早晨，郑州警察局长黄殿辰临时宣布戒严，军警出动戒备，如临大敌，禁止工人代表进入会场。但代表队伍及群众仍冲入会场（普乐园戏院），在军警的包围之中，宣布开会。首由主席史文彬宣布组织总工会宗旨，并痛斥此次强权无理压迫工会的行径，遂即郑重宣布京汉路总工会的正式成立，群众高呼："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劳动阶级胜利万岁！"群情激奋，奏乐欢呼，声震屋宇。既而黄殿辰到来，百般恐吓，显然非欲造成血案不可。但是看到工

人势盛，未敢动武。延至下午四时，代表始冲出重围，宣布散会。

风云突变　全线罢工

二月一日下午，军警强迫工会工作人员离境，代表驻地亦被军警监视，总工会在万年春饭馆所定的饭菜，亦不准出售，代表一时完全丧失自由，饮食不得。各团体所赠匾额礼物等亦被毁弃在路旁，总工会会址也被军警霸占，不许工人进出，文件悉被捣毁。

当晚，京汉路总工会党团召集各处代表举行全体会议，谴责吴佩孚摧残工会。成立会遭到如此严重摧残，代表们忍无可忍，在党团同意下，决定进行政治罢工，并决定成立罢工委员会，统一指挥全路罢工行动，当即通过一项决议和罢工宣言。宣言内容如下："全国工友们，各界同胞们：我们京汉铁路的工人，本着国家约法上所赋与的自由，和保障自身利益的宗旨，组织工会。一年多以来的努力，成立了全路十六个分会。我们的总工会筹备了半年多的工夫，耗费我们许多的精力、时间和血汗的金钱，惨淡经营，才得到组织完备，定二月一日在郑州开成立大会。期前邀请各业工团代表及各界人士参与盛典。届期来宾到会者数百人，一切设备完全，准备开会。

咳！意外的悲惨发生了，黑暗的势力横来了！万恶的军阀爪牙（郑州军警长官）用武力横加压迫，禁止开会，封闭会场，阻止我们和来宾在街上行走。所有各地工团所赠送的匾额对联，均遭遗弃道旁。我们神圣的最高机关——京汉铁路总工会——已经被军警占据了。会场中文件什物，均被抄查捣毁。各工团代表及来宾均被监视，言行不得自由，并勒令出境，酒席也被禁止了。满街军警林立，旅馆都有兵士驻扎。一时狂风惨雾，郑州全市陷于黑暗之境。工友们，同胞们，你们想想：这种横暴无理之策，怎么不教我们

愤激痛恨呵！这种事，凡是有血性有人心的谁也不能忍受呵！

我们考察这件事发生的原因，实由本路局长赵继贤、南段处长冯澐丧心病狂，捏造谣言，唆使军阀吴佩孚命令郑州军警当局所致。工友们呀，被压迫的同胞呀！你们要看清楚，压迫我们剥夺我们的自由的，解散我们的工会的，侮辱我们的人格的，是误国殃民的军阀和他们的奸险的爪牙呀！我们要认清楚我们的仇人，我们不能忍受这种欺侮和宰割呀！我们要紧紧的团结，反抗我们的仇人，向我们的仇人进攻呀！反抗呀，进攻呀，我们是没有一点恐惧的，因为仇人——军阀财阀和其走狗——的势力都在我们被压迫的无产阶级手里。被穷苦压迫而去求生的警士和兵士，都是我们无产阶级的兄弟朋友。他们明白了，他们决不会帮助仇人压迫我们。我们无产阶级有最大的权力，我们劳苦群众的团结就是我们最大的权力。我们还有最精良最坚强的武器，我们现在为反抗我们的仇人——万恶的军阀，为保障我们的人格，为争回我们的自由，我们要拿出我们的武器了，我们要发出全体动员令了，我们要向前进攻了。工友们！同胞们！我们郑重的宣言：'从本月四日正午起，京汉路全体一律罢工，不达到下列的条件，决不上工！'我们要求的最低限度的条件是：

（一）要求由交通部撤革京汉局长赵继贤和南段处长冯澐；要求吴、靳及豫省当局撤革查办黄殿辰。

（二）要求路局赔偿开成立大会之损失六千元。

（三）所有当日在郑被军警扣留之一切牌额礼物，要求郑州地方长官，用军队奏乐送还总工会郑州会所；所有占领郑州分会之军队，立即撤退；郑州分会匾额重复挂起，一切会中损失，由郑州分会开单索偿，并由郑州地方长官到郑州分会道歉。

（四）要求每星期休息，并照发工资。

（五）要求阴历年放假一星期，并照发工资。……"

罢工委员会的公开司令部是京汉铁路总工会，决策指挥机构是中共京汉铁路党团。由中共北方区委及劳动组合书记部负责人罗章龙、中共京汉铁路总工会支部负责人史文彬、中共北方区工委负责人王仲一（王震异）三人组成领导小组。罢工委员会还建立了包括罢工组织、宣传鼓励、纠察、交通、秘书等机构。

为了迷惑敌人，不致引人注目，决定京汉铁路总工会迁至汉口，而实际指挥机构——中共京汉铁路党团则移往北京，驻守北段，通过全路电讯系统，调动机车，指挥全路统一行动。

二日，我偕罢委会部分成员赴汉口，并南至长沙，会见湖南书记部负责人毛泽东、郭亮等，商讨声援罢工事宜，接着又赶回汉口。三日晚，我同罢工委员会委员五人、纠察队员十余人乘坐专车由汉口北开，沿途巡视罢工情况，在信阳、广水、郑州、新乡、安阳、石家庄、保定等站召集当地工会委员、纠察队长等负责人举行会议，要求他们加强团结，遵守罢工纪律，争取最后胜利。沿途所见，罢工准备就绪，秩序井然。

为了扩大声势，吁请全国支援，经京汉路总工会党团向中央负责人报告后，二月三日京汉路总工会罢工委员会向全路工人发出紧急通告。五日我又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名义于北京发出通电，檄告全国各工会团体共同奋斗，电文如下：

“全国各工团钧鉴：此次京汉总工会在郑州开成立大会，横遭军警压迫，已于本月四日上午十一时全路罢工以示抵制，此中经过想贵会现已闻悉。本部素知军阀怙恶，与我工界势不两立，此次郑州事变，不过初发其端。因此对于京汉工友宣言为争自由而战之旨，极表同情。盖军阀今日可施之于京汉者，他日即可施之于他处。如吾人今日饮泣吞声，不复与较，非但全国工会将悉受摧残，吾劳动界恐永无宁日，循至莽莽神州，尽变为军阀官僚游民出没之场，而神圣劳动永沉地狱不能自拔矣。我劳动界年来发扬蹈厉，颇

多明达好义之士，睹此惨状，讵能容忍？尚望本阶级斗争之精神，切实援助，是为至要！中国劳动组合书记总部冬。”

这样，京汉路大罢工就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引起了全国各地的注视。从三日开始准备罢工起至五、六日这段时间内，北段（郑州以北到北京）、南段（汉口大智门到郑州）统由工会派专人严格管制。沿站水泵、道辙、电报、电话、火车头、轧道车等，统归罢工委员会调度指挥，并预防破坏罢工行为。于是自四日十二时后，全路各项客车、货车、军车、车站、桥梁、工厂、道棚一律遵令罢工，参加罢工的按路局册共计三万人，其实则远远超过此数。

现在回头来分述京汉路几个主要大站，如长辛店、郑州和江岸等分工会罢工前的准备和罢工斗争情况。这些曾详载于我当年所写的《京汉工人流血记》之中，其中包括许多历史文献，现略作补充援引如下，以飨读者。

在长辛店：该处赴郑代表回来后，便召集一委员会，报告总会被蹂躏情形，及总会的决议案后，即开始准备一切罢工事项。越日复召集一全体会员大会于娘娘宫，到者三千余人，工会委员报告情形毕，群众热潮如狂，呼声动天地，均愿为自由而战。大会既散，罢工便随之开始。同时复发表一电，其文如次：

万急，北京大总统、国务总理、交通总长、参众两院、保定曹巡阅使、洛阳吴巡阅使、各师、旅长、全国各工团、各报馆、各邦人士钧鉴：敝分工会接本总工会急电，定于本月四日十二时全路一致罢工，此次罢工原因，完全是为着争自由争人格，敝分工会深恐奸人从中蛊惑，杯弓蛇影，淆乱是非，故将此次罢工原因涕泣详陈之：本路工人因生活困难，员司压迫，即起组织工会，先后成立，本路共组成工会十六所，乃设总工会于郑州，二月一日即京汉铁路总工会之成立日也。原定是日开成立会，约请各地工团代表及各行政机关人员和各界名流硕士与会，借此联络感情，指教我们的缺点。此

会之正大光明，谅早邀各界人士洞悉。乃本路赵继贤局长，江岸分局长冯澐，郑州警务局长黄殿辰连电曹、吴两使，诬称工团为不法团体及许多不近人情之语，吴使即电黄殿辰有据某某电称，当相机制止，万勿激生争端。黄殿辰接电后，乃擅作威福，逞其恶性，即严行禁止开会。一月三十一号各地代表齐集郑州，馈送许多礼物，二月一号总工会即派代表迎接来宾，及所赠之匾额对联。其秩序为音队在前，次为代表，次为匾额，次为本地工友，由郑州之第一宾馆迎至总工会，秩序井然，并无喧哗杂错行动。乃黄殿辰召集许多军警，上刺刀，实子弹，阻止工人行走，并派军警数营包围工会。即会场、旅馆，亦使兵卒占据，严行监视各代表行动；饭馆茶铺，不许工人吃喝，工团所送之匾额，尽被兵士捣破。黄殿辰并声言："我在郑州一日，即一日不许工人开会，所有打破之匾额也不许工人搬至工会之内。你们有能力即行全路罢工，使我黄殿辰屈服，我一步磕一头，将匾额亲送至工会。现在呢？你们快些滚蛋。"唉！民国约法上说人民有集会结社之自由权，工人亦为人民之一分子，何以我工人无之。语云："不自由，毋宁死"，我们要争我们的自由，争我们的人格，我们只要与侵犯我们自由的人宣战，直接侵犯我们自由的人黄殿辰、赵继贤、冯澐三人而已，我们自不能与他甘休的。我们一切行动均听总工会指挥，请各界人士，伸张公理，为我们苦工人谋自由幸福，我京汉全体工人是感激不尽的了！谨此宣言，诸希谅察。

京汉铁路总工会长辛店分会叩

此电未直讦吴佩孚、曹锟，尚欲为之留些余地。又后来黎元洪发一献媚军阀的命令内说，此次罢工未经呈报云云，但文电俱在，岂能一手可以掩尽天下耳目？

罢工日正午，适有自保开来一列车，行抵辛店，即由工会命令停驶。是夜复有一自汉北来通车，至辛店亦行停驶。工人待遇旅

客，极有敬礼：男子则为代雇车马，妇女则延至工人家住宿，次日派人护送至京。故社会上一般人士，对于工人均怀一种好感。

自北而南——京汉路工人惨遭屠杀

五日早晨，路局赵继贤已奉吴、曹两军阀密令，令他严厉处置，但同时北京总局茶役亦举行同情罢工，总局更是死寂的了。是日赵即发一布告，里面说的均是恐吓的话，并限工人十二小时内恢复工作。嗣见工人不以为意，又派三宣慰员诱工会谈判，大意说先行开工，再论条件，经工会严辞拒绝，无结果而去。此时吴佩孚又来一电，说他有五百工兵，可以担任恢复交通，令赵放手办事。接着下午一时起，先后有军队多起开来辛店，均系全副武装，由员司开车运来的。计有游缉队张国庆一营，保定十四混成旅时全盛所部二营，琉璃河第六连。军队到时，分布各要隘列营，全体工人遂亦前往示威并向他们散发传单，一时兵士均为之感动。传单录下：

“兵士们！警察们！我等都是苦同胞们呵！你们为的是家里要饭吃要衣服穿，才出来当兵或当警察，我们也是为着家里的人要饭吃要衣穿才出来卖力气，寻工做。你们是月中关饷，我们是月中开支，唉！讲起你们的饷有二三月四五月或六七月没有关的，岂不是跟我们一样的苦吗？我们罢工是跟你们告老或解甲归田一样，因为我们不愿干了，是不犯国法的；你们这次来此，我们十分欢迎你们，感谢你们！但是外面的风传，实在是不好听，都说你们是来压迫我们的，我们不相信。因为我们同是苦同胞，应该互相联合互助，不应该残害。俗语说得好：‘强不欺弱，众不暴寡。’你们手里有枪有刀，有子弹，你们是强者，我们是弱者，你们若来残害我们，恐怕于心不忍吧？亲爱的军警们呵！我们愿和你们结成很好的朋友。兵、警、工同是苦同胞，有什么分别呢？如果你们不愿意，定要来

残害我们，我们只拚着一条穷命，将来历史上留个好纪念。就是有强力，有枪刀的军警，残害手无寸铁的苦工人，好听么？我们知道你们来到这里的军警，全是我们的朋友，我们不疑心并且知道你们一定不会残害我们的。京汉铁路总工会长辛店分会启。”

军队六营将长辛店包围定了，于是禁止工人在路上往来，偶语，开会，每数十步设岗放哨，并有许多密探出没工会附近，调查工会中主要人物的住址。娘娘宫也不准工人前往集会了。但是奸猾的赵继贤此时态度竟变和缓了些，曾数次派人向工会代表接洽，意在调查工会的主要领袖，安排摆布他们的最狠毒的阴谋。

六日晨工会调查队报告，军队行动极可疑虑，并闻涿州方面尚有大军来到，一时全市空气益臻紧张。工人见辛店形势已如此严重，均知此番必致演一出大悲剧，但为自由而死，死亦何憾！故工人态度仍不稍变。六日，工会复发表第二次宣言以杜谣传，宣言说：

“全国父老兄弟姊妹们！我们京汉全路已罢工两天了，此次罢工原因，本分工会二月四日所发出通电，已说得很明白，南方各地，想必由江岸总工会，发布详细的宣言，务使各方面的人们，明白个中真象。乃北京的报馆，还有一二家登载些不十分的确的消息，现在再把我们为什么罢工及罢工后所取的态度简明的说出，并希望亲爱的同胞们给我们以充分的同情和援助。

我们此次罢工，是因为京汉总局长赵继贤，江岸的分局长冯澤，运动野蛮的郑州警务局长黄殿辰，以武力禁止我们二月一号在郑州所开的总工会成立大会，并捣碎各工团送我们的匾额对联等礼物，驱逐各地代表出境，封闭郑州工会。还要胡说：‘我黄殿辰在郑州一天，就一天不许工人开会，如果你们有本事，就实行全路罢工’。我们认为这件事是赵冯黄三人合伙以强力来侵犯我们应享的集会结社自由权，也就是这三人无端蔑视我们的人格的表示。所以当时聚集各地代表在郑州开了秘密会议，议决总会移江岸，再命

令全路一致罢工，以争回我们应享的集会结社自由权和人格，并保持我们的第二生命——工会。二月三日晚上，江岸总工会的密电到了，京汉全线一致于四日停工。停工之后，我们本全路一致的精神，各分会什么条件都不提起，专听江岸总工会的命令，总工会叫我们怎样办，我们就怎样办。在罢工事件未解决以前，除了听总工会的指挥，别的什么全不知道，这是我们至死不变的信条。我们希望这次宣言能使全国同胞都十分明白我们是受着怎样的压迫，而不得不出此最后手段，并希望他们的同情和援助。谨此宣言。

京汉路辛店分工会启·二月六日”

在郑州

二月四日上午十二时，即郑州遵总工会命令举行罢工之时，照例发一宣言向外界明白解释。又每一工人手中执有一种传单，其文如下：

“工友们！我们因受种种压迫摧残，逼得无法，出于全路一律停止工作，这是我们最痛心的事！我们要万众一心，坚持到底，要谨守秩序，静听总会解决，至要至要，切嘱切嘱。”

观此知此次罢工精神至为一贯。是日下午，第十四师师长靳云鹗，召郑州分会委员长高彬、姜海士、刘文松三人至司令部。靳见面大骂，出语鄙恶，无复有人类理性，高等置不与辩，将总工会所发罢工通告与彼看。彼看毕，谓“你们是听总工会命令的，你们无权，不同你们说罢。”三人遂退出。五日无事，至晚上，一巡官至高彬、姜海士家，言师长请彼等至第十四师俱乐部讲话。二人至彼，郑县巡警局长黄殿辰亦在彼处，命将二人拘留，加上脚镣手铐，如同大盗一般。刘文松闻讯，谓分会事，三人共同负责，现在二人受苦，彼一人决不躲逃，以图苟且，即时驰至该俱乐部，请与二人一同受苦。工人闻讯，大愤军警之滥用职权，又感刘文松之义气，敌忾之心，更为坚决。六日早又捕去二人，一名王宗培，一名钱能贵。王

在家扫地，被便衣警察捕去，谓其时常出入，不是好人；钱从前因其子与警察小有嫌怨，警署挟恨，故借此报复，二人亦均上镣铐，钱双手被麻绳紧缚，两腕尽肿。是日上午五人同被驱至车站，意在借以示众，威胁工人，工人不惟不惧，反加愤激。是日下午，警署雇人鸣锣，招呼工人上工，工人置之不理。

在江岸

总罢工的第二日（二月五日），萧耀南派其参谋长张厚生至江岸，先使该地警官某，以强硬态度，要挟工会交出杨德甫、朱兰田、张濂光、罗海臣、林祥谦五人，工会答以“如有对于曹吴及交通部正当负责人来，总工会当然有全权代表与之正式接洽，否则，恕不能接待。”延至午刻，忽探报厂内已被大批军队占领，大智门车站已开始卖票，张参谋长在工人家，拘去开车二人，用军警压迫，即行开车。分会委员会闻此，即派纠察团进探，一时集于厂门者约二千人，冲破军警防线，将该二工友抢回。当日上午，军警忽拘去纠察团工友三人，工会特派代表张濂光、项德隆、罗海臣等四人，请军警释放无故被拘的三人，虽军警方面百般威吓，谓须枪毙斩首等语，他们毫不为动，军警无法，始将三人释放。这是敌人方面用破坏不成，继之以威吓亦失败。

先是武汉各工团代表自郑州归来后，各以此次所身历的压迫与不自由，当众发表，有痛哭者，有愤詈者，其奋发激昂的态度，实可动天地而泣鬼神。所以全体议决，愿以死力与京汉铁路工人一致进行。遂于大罢工的第三日，由各工团各派代表数十百人，各持旗帜来江岸慰问，即在江岸举行慰问大会，当时全江岸工友到者约万余人。首由京汉铁路总工会执行委员长杨德甫同志报告招待慰问代表的盛意，并申述此次大罢工之意义及希望。继由各工团代表及真报馆记者数十人演说，无不激昂慷慨。最后由京汉总工会秘书李震瀛代表总工会向众致辞，略谓：“我们此次大罢工，为我

们全劳动阶级命运之一大关键。我们不是争工资争时间，而是争自由争人权。我们是自由和中国人民权利的保卫者，工友们！我们京汉工人的责任是如何重大呀！麻木不仁的社会，早就需要我们的赤血来薰染了，工友们！在打倒军阀的火线上，应该我们去作前锋，前进啊！勿退却！”群众高呼“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武汉工团联合会万岁！”“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啊！”群众于愤怒之余，遂举行游行大示威，由江岸经过汉口租界以抵华界，历二小时方散，此种闯入租界示威，实为创见。

由于双方斗争激烈，南北情况复杂，虽然当时大罢工的中心设在北段长辛店，我们对外宣称是把总工会移至南方。但军阀与交通系却很狡猾，他们知道京汉铁路工会主要力量仍在北段，认为只有破坏长辛店基地，才能根本解决罢工问题。所以敌人后来先从长辛店下手，于二月六日深夜，曹锟的直属军队率先发难，在长辛店把罢工主要领导人都逮捕了。然后推向南方，郑州、信阳、江岸十几个车站工人先后遭到屠杀。

从二月四日起，我和仲一、孟雄、君宇、梅羹等经常驻守前门车站，与长辛店、郑州及汉口各站联络。六日晚，长辛店消息紧急。印刷厂小赵（赵长润）专程来京报告连日敌我斗争情况，传达史文彬等捎来口信，说有要事，让我速往长辛店商量。

七日拂晓，天气奇寒，滴水成冰。我同书记部小刘（刘伯青）乘交通专车赶到长辛店。下车后，遥见芦沟桥附近军队活动不停，心知情况有异。沿途急行，到达工会时，只见屋内外挤满了人，还有家属妇幼，人声鼎沸。原来是拂晓前，当地驻军闯入工人住宅区，挨家搜索，将史文彬、吴雨铭、陈励茂、武把、洪尹福、吴春溪、杨锡珍、王永泰、卜润舟、李柱、易顺等十一位工会领袖捕去，所以群众愤怒非常，但一时不知所措。

工会干部杨诗田（党员）前来迎接我们，告诉我史文彬等十一

人现正关押在火神庙军营。进到院内后，群众中有高喊："书记部老罗来了"，当时大家都处于忙乱中，极想书记部来人出主意，形势非常紧迫。我向大家说，军队无理捕去我们工会委员十多人，咱们大伙应该一齐起来，去旅部把他们要回来。大家同意并应道："好！咱们就去把老史他们要回来！"于是我和工会秘书立即动手写了旗帜标语和"要求释放被捕工友"，"还我们的工友，还我们的自由"等大幅标语。葛树贵吹哨集合纠察队，整理群众队伍，高举标语旗帜，工人大队齐向火神庙进发，一路高呼口号，市民围观，夹道助威，声势极为浩大！

我和葛树贵领队前进，杨诗田压队，工人群众队伍约三、四千人，由工会会址快速涌向火神庙，立即将警署包围。此时庙内有驻军和警察近两个营。先时，我们派代表韩连金持文告向前打话，说明来意，随后又派孙呈武、刘斌进内交涉。军队见群众队伍不断涌来，立即后退，举枪作射击状。不久，敌十四旅四团三营又驰至，双方开始冲突。军队即向工人队伍开枪，工人纠察队副队长葛树贵、杨顺起率领工人高喊："敌人向我们开枪，我们去夺枪"，于是双方搏斗，卷入混战状态，一时枪声如沸，弹雨纷飞，当时我和葛树贵站在一起，敌人开枪后，均受伤倒地。这次工人惨遭屠杀，后经判明，抬往医院、重伤不治、当即牺牲的有葛树贵、杨诗田、辛克洪、刘宝善、赵长润等五人，其余负伤人员二十九人。除死伤外，又被捕去王永福、刘炳波等二十余人。许多工人同志伤治愈后，继续坚持参加罢工斗争。

我负伤流血倒地后，经由纠察队员救护，突出重围，即让纠察队员迅速将受伤工友救出，护送回家治疗，并通知罢委会诸人离开长辛店到北京集合，准备继续指导罢工。

回到北京后，袁之贞、杨宝昆等已分别派人到西便门及丰台迎候，随即召集紧急会议。当场决定将长辛店组织暂移前门工作，函

派宝昆兄弟到丰台成立机关，从事被难工友及其家属救济工作，一方面又加派人到郑州、石家庄、南口、唐山、天津，就近指挥当地铁路同盟罢工。

七日下午，江岸工会遭到屠杀，第三日（九日）接到京汉南路报告称，“二月七日（农历十二月二十二日，过小年前夕）早晨火神庙浴血后，是日下午，汉口江岸车站亦发生萧耀南军队屠杀铁路工人的事，当场牺牲有三十二人，伤两百余人，被捕三十五人。当时江岸分会林祥谦被捕，壮烈牺牲，施洋亦被捕。汉口方面军队行凶者为萧耀南（湖北省长兼督军）、张木阶（参谋长）。与林祥谦同时牺牲的还有曾玉良（扬州人，三十二岁）、纠察队员刘文银（司机）、刘寿其（铜匠）、林材泳（翻砂工）、林元成（林祥谦之弟，信阳升火工）、徐延发（钳工，湖北黄安人）等。长辛店、郑州、江岸既同遭惨祸，各小站分会，备受蹂躏，自不待说。保定分会执行委员长何立泉、白月耀则被曹锟捕去，处以极横蛮之站笼。五百余工会会员捕拿逃亡殆尽，工会财产被抄。高碑店工会干事二人及正定委员长康景星同日被捕，囚在保定陆军执法处。彰德工会办事人，亦先后入狱，或逃亡在外，不能回去。信阳执行委员胡传道，因军警强迫开车，不允，竟被断去一臂。此外，新乡电报生赵密，亦与郑州五工友被捕押保定严刑拷打。郾城南北诸站受祸略同。沿途各站无一幸免。

“二七”全路死难烈士约四十余人，他们是葛树贵、辛克名、刘宝善、杨诗田、林元成、施洋、林祥谦、徐言发、陈芝槐、陈道忠、王起鹏、叶志松、曾玉良、钱惠和、陈年伯、刘长发、朱仁斌、秦均、梅启发、吴采贞、王先瑞、李开元、龚德咏、陈端炳、刘文银、叶青山、梅才咏、刘耀亭、姜和顺、杨庆寿、郑成、李玉、柳成有、胡兴顺、邵成鹰、张福狗、刘寿真、林开广、武把、高斌、丁道启、晏佑来、吴海发、高顺田、胡如树等。

罢工遭到曹吴军阀残酷镇压。京汉南北各站在全路斗争中牺

牲四十余人(见上)，入狱百人，负伤者五百余人，失业兼流亡估计将达一千户，家属牵连被祸者不计其数。

“二七”大罢工，由于京汉工人阶级遭到了反动军阀的残暴镇压和血腥屠杀，当时所发生的对外对内各项问题，头绪纷繁，集涌而至，同时得悉京汉沿线军队集结益多，敌人势将继续运用武力扑灭工会，如坚持、扩大罢工，其结果必致战线扩大，造成更严重牺牲。于是经北方区委扩大会议反复讨论，会上虽有人主张绝不复工，坚决与敌人斗争到底，但是区委考虑到，这样做事实上是办不到的，会招致更大的损失，遂决定忍痛复工。

复工通电发出后，区委会议继续讨论善后方略。会议决定：(1)京汉铁路总工会迁往天津办公，由各路加选委员以加强工会组织。汉口江岸京汉总工会办事处立即撤销，原有罢工委员会委员一律齐集天津开会。(2)各铁路同盟罢工一律停止。(3)组织“二七”善后委员会，立即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办理抚恤伤亡，慰问在狱诸工友，登记失业，安置烈士墓葬及家属生活等事务。(4)在北京及其他城市，工矿区举行追悼“二七”烈士大会，编印“二七”斗争的小册子等。会后即派人到京汉沿线各站，京汉以外各线路传达上述决议。北方区委在二月底三月初派人分途到京汉路各站抚慰工人及被难家属，并在北京、长辛店、丰台、天津等处分别设立失业工人及流亡家属住宿站，从事救济抚恤工作。各工会负责人推选代表组织救济抚恤委员会。工人群众对此项工作一般表示满意。

北方区委扩大会议后，党与工会各级组织正在开始根据决定部署各项工作，准备付诸实现的时候，交通系和北京军警机关正暗中勾结，向中共北方区委与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强烈进攻。交通系为赵继贤主谋定计，迭向曹锟、吴佩孚、王怀庆等多次提出过激党“黑名单”，企图借曹吴之手将书记部人员一网打尽，当时王怀庆

在北京通衢大街张贴布告，内云："主张共产，宣传赤化，不分首从，一律处死。"自此，北京军警手持"黑名单"大肆捉拿中共与书记部人员，灯市口工会招待所被查封，捕去负责人；草厂胡同二号曾被搜查一次，捕去同志一人；北大印刷所《京汉工人流血记》浇铸纸版亦被查获；查封《工人周刊》，捕去工人。此外在天津，《工人周刊》发行人被捕；郑州、丰台等处工会组织亦被查封，逮捕工人、学生达四十余人。一时造成北方空前恐怖状况，真是缇骑密布，陷阱纵横，大有寸步难行之势。

在北方军警大规模搜捕期间，北方区委决定仍按原计划在京召开京汉路"二七"死难烈士追悼大会。随后在上海亦举行"二七"烈士追悼大会。北京追悼会由南城高师学生会名义负责筹备。一九二三年三月二十二日，在琉璃厂高师风雨操场召开追悼"二七"被难诸烈士大会，由书记部代表王铮，京汉路工会长辛店参加火神庙斗争的工人刘监堂和施洋夫人等来做报告，到会者千余人。大会还通过严惩凶手决议案。来自全国各地的学校、机关、工会代表登坛演讲的有三十余人，悲歌慷慨，震动幽燕。会毕举行火炬游行示威，队伍直达民贼盘踞的总统府，高呼惩办祸首，为死难烈士复仇，实现民主自由等口号，并提出七条要求：立即撤退长辛店驻军、释放被捕工人，惩办凶手、启封工会等。群情激奋，誓为争集会、结社、罢工自由的后盾。

"二七"追悼会还收到来自国内外的花圈、挽联、诗文、悼词等约五百余件，会场临时编印《"二七"悲愤录》，传诵一时。

远在南国的中国海员总工会在追悼大会召开之际，也拍来电文："二七烈士们，你们是中国工人革命的先行者！你们所作是象征人类崇高的道德，无限的智慧，热烈的情操与最大的勇敢。中国人民的真正自由平等，只有追随你们的足迹奋斗才能实现！"

从此以后，全国各城市工矿地区年年此日多举行纪念，"二七"

成为中国工人哀思奋进的日子。当年有一首流行的“二七”纪念歌词云：“二月七日，正是那年今日，怆神时，芦沟桥畔血，丹水池边雪，保定狱中链，辛店站前旗，万众同仇感，四海知！‘二七’烈士永垂革命史册。”

北方书记部素来纪律严明，在历次斗争中，党员不得擅离职守或撤出战斗岗位，因此全体工作者在复工后，迅速转入地下，继续坚持斗争。“二七”被迫停刊的《工人周刊》，于一九二三年五月又重新复刊。半年以后各路工会渐次恢复，一年后，成立了全国铁路总工会。

当时监禁在保定直鲁豫巡阅使署军政执法处监狱的所谓“二七案犯”三、四十名，军法处审讯数次，均无确实口供。军法处法官追问罢工谁指使，党羽为谁？工会幕后人物为谁？工会与书记部关系？在狱工人坚不吐实，只申辩工会为拥护自由民主，为约法而罢工，不知其它。军法官云：“你们工人都是老粗，懂得什么约法？显见受共产党利用，受北大学生利用，陷罹法网，你们只要供出书记部主持人姓名、住址，政府把他们抓起来，就可以释放你们出去。”工人们故作不知，纷起抗辩，据理力争。法官只得说：“主犯未获，不能结案，你们就不能出去，今后当继续通缉主谋的人犯归案究办。”这些同志坚贞不屈，直到直系军阀倒台后，才由党营救出狱，历时两年多。

《京汉工人流血记》

直到一九二三年六月召开党的“三大”时，我一直留在北京负责北方区委工作，处理“二七”善后事宜，召集“二七”纪念会等。在这段期间编印了《京汉工人流血记》。

关于《京汉工人流血记》的编写经过，先是二月二十一日，我综

合京汉全路各站报告，写成《二七大屠杀经过》一文，于同月二十七日在《向导》第二十三期上刊出。但此文限于篇幅，未能将事变因果全貌记述出来。旋接中央来信，嘱编一书详记始末，于是乃动手编写。开始在“二七”后的二、三个星期，曾由长辛店支部和北大支部组织力量，到“二七”罢工沿线，搜集资料、照片。一九二三年三月初开始整理，起初材料太多，后精简大部约有十万字左右，至三月下旬完成。剩下的资料照片，原准备以后有条件再印，后因地下机关被破获，都丢失了。开始动笔时在高师宿舍，后因环境纷杂，敌人眼线很多，工作未便，乃在沙滩附近骑河楼临时找了个小房子继续写作，由李梅羹助理缮校诸事。当时天寒无炉火，二人用芦花败絮裹腿，盘坐在土炕上呵冻挥笔，日夜不辍，边写边印。当时市面上找不到印刷的地方，后由北大印刷厂工人党小组想办法，由他们全包下来的。当时还收集了几十张照片和图片，由于做铜版很贵，受到限制，未能刊出。在编排时，中间有些空白，我们就把平时学习翻译的马、恩、李卜克内西的原著（如《共产党宣言》自译稿）择其名言，以革命语录形式付印其间，还把德国革命诗人海涅的诗《宝剑火花歌》和自编的诗句补在空白处。全书的排版和封面设计悉由刘伯青负责，封面是三色套版，绘一挥大锤的工人，封面题字是由宋天放书写的。编成后，我写了序，由高君宇写了一篇后记。当时由于印刷工人不多，且都是以义务劳动额外承担的，人手不够，于是我们支部的同志们都帮助排字、组版、摆车、印刷和装订。所以这本书完全是党员们自己亲自劳动印刷出来的，对我们支部也是一次锻炼，使我们学会了从写稿到排字、组版印刷等全部工序。后来对这些工作我们都能干得很好。

《京汉工人流血记》除序言及后记外共十章，并附有“二七”罢工工人死伤调查表和第三国际执委会告中国铁路工人宣言。各章题目是：

第一章　京汉工人的狂飚运动
第二章　二月一日军阀进攻
第三章　如火如荼的京汉路各站鏖战情形
第四章　惨杀以后
第五章　六路及京沪武汉工团援助纪略
第六章　北京市民空前大游行
第七章　献媚军阀的北政府及奸商
第八章　全国一致的不平鸣
第九章　国会方面的调解
第十章　结论

在书的序言中，我首先向世人扼要地讲明了编写《京汉工人流血记》目的，并批驳了种种诽谤“二七”罢工的谣言，指出：

“这次京汉路二万多工人因争开会的自由举行总同盟罢工，大招军阀的嫉妒，致演出二月七日的大惨剧，凡是稍具常识的人没有一个不说是民国成立以来极重大的事变；凡有血气的人也没有一个不愤懑填膺的。但是社会上知道此事底细的人却是很少，因为：第一在罢工期内万恶的北政府禁止此项消息的传播；第二洋资本主义国家和中国资本家走狗所办的报纸及通讯社等，故意登载些淆乱黑白颠倒是非的新闻，冀以扰乱社会的视听。此外更有一派糊涂可笑的记者，疑心此事是为所谓政争内幕的一幕，恐为他人作宣传，不愿意忠实的登载。因此，社会一般人士竟不能对于社会这样严重的事变，得到一种正确明了的印象。我们对于前二项原因，自然是认为当然的；对于后项的‘记者’也只有怜悯他们无知识。倒是‘二七’大牺牲的事实，本社同人至今不能向社会作个忠实的报告，这是我们日夜不安的。

本社同人于役劳动运动，前后三年，本想将这回事变的详细情形，乘此机会，尽情的说出来，但是后来因为各地详细报告尚未寄

到，而又限于时间和经济，不能尽量编入，才决定先行出这个小册子。所以论到这本小册子所介绍的材料未必便能满读者的意，但是那些被军阀与帝国主义摧残和蹂躏的资料，吾人天天处处耳闻目见，不啻千万，何待陈述？所以我们愿读者记取的倒是应该注意这些材料所代表的真意义和价值，这又是我们引以自恕的。”

为进一步从理论上批驳资本家及其走狗们所散布的颠倒黑白的谰言，更重要的是促使社会上一般人士对当时中国社会问题的严重性有所认识。序言以较多的笔墨论述京汉路二万多工人举行罢工的历史必然性。

“我们知道，无论什么事实，决不是偶然发生的。这回二月七日的事，可说并不是发于京汉路的二万余工人，也不是兆于二月一日郑州禁止开会，更不是单为着京汉总工会所提出的几个简单条件——我们如果稍加思索，便能知道二七事变，至少也包含了下列的几个蕴义：

中国自辛亥运动以还，政象纷变，元恶巨憝，迭为起伏，遂形成现在割据的封建政治。封建政治的基础是建筑在黑暗的暴力上面，他们盘踞疆土，瓜分政权，霸占铁路（现在北方铁路已是曹锟，吴佩孚的家产，关外的铁路是张作霖的私有物），他的表现是与任何进步的思想相反对的，代表这个态度便是荒谬的北洋正统观念！他们反对约法，反对民主主义，反对新文化运动，反对社会主义……反对一切的民众进步的思想。无论哪一个贼目当政，都是取同样的态度。今京汉路工人的团体既是民众觉悟的组织，京汉工人所争的既是约法的自由，这均是他们黑暗暴力的劲敌，北洋正统迷梦的仇雠，所以我们知道即使没有二月一日的事，他们也是要图谋倾陷的，因为他们卧榻之侧决不容有觉悟的群众的团体和活动。从这一点看来，二七事变是国民直接与军阀抗争，是封建暴力与光明的势力抗争，是被支配者与支配者抗争。

“然而同时我们又知道，这种封建式军阀的存在和兴盛，是全仗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扶植的。除去现在的苏俄而外，无论英法日美……任何国的政府都是资本帝国主义的政府。他们的基础建设在资本主义制度上面，他们的表现便是经济侵略政策，他们利用中国有卖国丧权的政府，做他们忠实的走狗。利用中国常在内争之中，而不能发展国民经济的能力，以便销售他们的洋货，榨取中国的财源。他们为种种自利起见；于是一面供给军阀的枪械子弹，高利借款供给军阀的饷源，间接的来压迫中国民族；一面又管理税源，开设银行，发行纸币，安设驻防军警兵舰直接的来压迫中国人民。在这种设施之下，他们几无时无地不伙同他们所豢养的军阀政府，来妨碍民众的觉悟，禁止民众的团结；其所取的态度和方法是比较国内军阀更狠毒的。所以这次京汉工人的举动发生，东交民巷的公使团——即北京政府的太上政府——便严厉的训诫北廷要他严厉处置。由此，我们便可以知道二七事变是中国的劳动者与外国资本帝国主义抗争的表现，是中国民众受外国酷虐侵略后的一种反映。京汉流血的工人便是开始进攻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先锋。”

在序言的结尾，我们作出这样一个结论：

“我们断定工人们的运动反对国内的军阀是直接的形式，反对外国资本帝国主义政府是联带的结果。他们进攻的失望，虽然这般的沉痛，但是他们运动的意义却是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明白无比的——所以二七惨变实在是中国民族革命史上阶级斗争的一段。大家必须在这个沉痛记载上去体认阶级斗争的真意义。

“最后，如果我们相信中国将永远沉沦，世界人类将必归毁灭，现在就不必多说。要是我们尚有一点为中国民族求自拔，为世界人类谋拯救的意念，我们便应当不迟疑的实行内与封建式的军阀外与资本式的帝国主义作战，我们便应当谋中国民族的革命和世

界民族的革命。但是这般伟大的事业，在中国究属哪一个阶级负担，自来有许多学者教授们是很怀疑的。他们的意思：中国劳动者的能力和意识远在西欧诸国劳动者之下，决不能担这般重大的干系，所以近年来有许多革命的青年投身劳动运动，他们见着总以为是愚公移山的笨举动；此外有班堕落的人们满存着传统的鄙夷劳动者的成见，那就更不消说了。自二七事变以来，却表示了中国劳动者的伟大能干和魄力，证明中国无产阶级确能担当中国的革命——甚至于世界革命的责任。这不能不说是惨淡无光的旧社会中得到了一度新的兴奋。从此中国全体劳动者的脑筋里也加了一种新鲜的印象，将自然而然地向革命的趋向进行了。

“至于革命的青年们对于这次惨变，本当无所用其留恋，也无所用其悲哀，更无所谓失望，霎时起灭的报仇雪恨的浪漫心情尤不是真正革命者唯一的态度。我们唯知道以后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责任，是永远在无产阶级的仔肩上，大家只有前仆后继的在此革命长流中涌进，最后的成功，终归于最后努力的人！”

接着，该书分章叙述了京汉路工人斗争的史实和“二七”惨案及其后的救援工作。该书于三月底在北京初版，约印五千册，后改由广州人民出版社重印多次，前后约印五万多册，先后在北京、上海、广州发行，畅销南北。

一九二三年五月及一九二四年的《向导》上曾介绍此书，说：“二月七日京汉路的大惨杀，不仅是中国劳动运动史上一大事；而且为民权运动史上一大事。发踪指使的不仅为直系军阀吴佩孚等，而且为英国领事、英国烟厂、棉厂各大班。故是役之意义不仅为军阀与外国侵略家打破劳动运动的新势力，而且为军阀与外国侵略家打破国民运动的新势力。是书记载详明，分析精到，一字一句，可歌可泣，凡留心中国新兴势力发展的人，皆不可不人手一篇。”

《京汉工人流血记》的出版、发行，其影响有一点我们当时未曾意料到的，即这本书对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加强国共两党的合作也起了一点作用。有一次，孙中山的代表张溥泉在上海曾当面告诉我说："一九二四年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见孙中山，向他提出国共合作问题。孙开始对同共产党合作理解不足。马林曾把《京汉工人流血记》、《向导》等刊物送给孙中山阅看，孙看后向左右亲信说：'我想和共产党合作，你们却不赞成，你们自高自大，自以为有军队，有广州地盘，瞧不起共产党，而实际上共产党力量比我们强的地方很多。我当年开始搞革命时，策动群众，少则百、八十人，多不过几千几百人，你们看共产党发动群众斗争，动不动就是几千、几万，甚至几十万人。"二七"罢工就是例子。从这一点看，我们还不及共产党。'" 孙中山从中国南北多次大罢工认识了共产党的群众基础。所以，后来马林再访孙中山时，孙对共产党有了正确的认识和评价，国共双方在平等基础上开展了革命合作。

《京汉工人流血记》是记载当年"二七"大罢工的重要革命历史文献。它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第一次跃登世界革命舞台的伟大斗争。"二七"斗争距今已六十年了，在此悠长岁月中，年堙代远，史迹沉霾。本书从三十年代起被列为禁书，几历沧桑，始得于一九八一年重版，获见读者，此书的重版，也可以说是对"二七"烈士们的一种纪念。

综计自《京汉工人流血记》出版后，当时，中外出版机构以"二七"大罢工史实为题目出版的书籍、画册等约几十种，其中内容正确的固然不少，但亦有少数材料和党的文件与当时史实不符，如马超俊写了一本书，说"二七"罢工是国民党领导的，有很多国民党员参加等；又如《二七工仇》一书是杨德甫、陈天等人投靠奉系军阀后，假借湖北工团联合会及京汉铁路总工会上海办事处的名义编印的。杨德甫等人在罢工紧急时逃往庐山，离开岗位，只有施洋、

林祥谦、曾玉良等共产党人坚守岗位。这几个离开的人在罢工失败后，对党抱怨；发起宣传攻势，攻击共产党。这些人到上海后与反共的军阀政客相勾结，在上海租界挂起了京汉铁路总工会的牌子，同共产党对抗。他们将《京汉工人流血记》的文章剽窃了一些，又加以篡改，改头换面，编成《二七工仇》这本小册子。例如，说他们是真正的工人，暗示中共是知识分子；又说他们不卷入政治漩涡，不介入政治，不跟共产党走。《京汉工人流血记》中有第三国际高度评价二七罢工的电报，他们给删掉了。后来，主持编印《二七工仇》的杨德甫等人曾到东北，找到张作霖说：我们是反对吴佩孚的，是京汉工人。张作霖讲：反吴佩孚是好事，你们有什么要求？杨等讲：我们名义上反对吴佩孚，实际反对中国共产党。于是，张作霖送给他们几万块钱，他们用这笔钱作活动经费，进行反共，到后来，这些人彻底降附军阀，干着工贼的勾当。

“二七”后，党内外议论纷纭，不少人还投来书信，指责、非难这次斗争，有的则表示怀疑，还有一些好心人规劝以后不要采取这种得不偿失的斗争方法……。为了回答某些人的责难，向那些不明事实真象的人们说明“二七”罢工的原因，除编印《京汉工人流血记》外，北方区委还让席咏怀代笔，作了“二七”复信，信中指出：目前，罢工斗争是我国工人阶级反对军阀、财阀，所必不可少的斗争手段，工人阶级为全国人民争自由、争民主，为的是使我们国家摆脱列强侵略和军阀统治，建立一个繁荣富庶、人民丰衣足食、礼让廉洁的新社会，今天流血牺牲是值得的，今天流血斗争，就是让我们的后代不再进行这种斗争。

党内也存在着不同的意见，这时，第三国际发来一个正式电文给中共中央，转到北方区委，表达了第三国际对“二七”斗争的支持。

第三国际认为“二七”是近代革命史上的重大事件，应很好地

总结经验教训。后来，党中央在“三大”上作了总结。第三国际的这封电报是党中央在“三大”做“二七”总结的重要依据。

第三国际、职工国际还几次派专人了解“二七”斗争情况，还请工人代表到国际去作报告。共产国际也写过一本有关“二七”的书，一九二八年我去参加“六大”时，他们送给我一本留念。

“二七”烈士，不怕流血牺牲，前仆后继的大无畏革命精神，是令人永志难忘的。

十九、中共“三大”及中央执委会

一九二三年六月，我离开多年战斗和工作的中共北方区委，去广州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这次会上，我被选进中央局工作。

“三大”前后

一九二三年六月十二日至二十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这是二十年代我党最重要的一次全国大会。会议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奠定了国共合作的基础，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是年五月间，中共北方区委接到中共中央通知，决定在下月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要北方区选派代表出席，代表人数根据北方区内党员人数比例，约十至二十名党员中选派一人。要求以产业工人为主体，其次为从事工农革命运动的主要负责人和省、区的书记。根据中央通知，北方区委进行了讨论。事后，发通知到所属铁路、矿山和北方区各大城市的党组织，说明中央即将召开“三大”的意图，要求同志们重视这件事，及时选派代表。对较为重要的地方如长辛店、天津、唐山、南口、洛阳等产业工人区，要求他们选派当地的代表参加。

通知发出不久，又接到“钟英”（当时中央的代号）给李守常和我的信，内容是了解北方区参加“三大”的准备情况；补充了出席

“三大”应该注意的事项，多半属于事务和保密工作问题；信中还要求李守常和我都出席“三大”。当时北方区委书记是李守常，我是区委委员，兼管组织工作并任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中央希望我们去，以便于全面了解北方区的工作情况。我们两人也经群众选举，通过为出席“三大”的代表。北方区在所属铁路、矿山及地区支部，经选举产生出席“三大”代表共十二人，居全国各区代表人数之首位。其中有：

李守常（北方区委代表）

罗章龙（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兼全国铁路系统党团代表）

王荷波（津浦路总工会党团代表）

王仲一（津浦路总工会党团代表）

王　俊（京汉路长辛店工会党团代表）

张德惠（京汉路长辛店工会党团代表）

何孟雄（京绥路总工会党团代表）

邓　培（京奉路总工会党团代表）

孙云鹏（正太路总工会党团代表）

陈　涛（北京地区工会党团代表）

刘天章（陕西中共支部代表）等

为安全和保密起见，代表们分批出发，尽量做到不乘同一趟车，不坐同一条船。我是先坐火车到天津，转乘海轮去上海，再坐船到广州的。和我同船到广州的有湖北代表项德隆。到广州后，我们立刻换上了一套半长不短的“唐装”，一副广东人打扮。广东区委派有专人负责接待。当时广东区委对外的代号是“管东渠”。我没有固定住所，时而在谭平山家中，时而在广东区党委机关，有时还住在第三国际代表马林的住所（开滦罢工期间，他曾亲来北方，深入基层，视察工人情况，与我过从较密）。我第一次到广州，道路很不熟悉，几乎每次开会都有人来指引，带我们去会场。广东

区委同志担负大会后勤工作是很尽力的（当时一些中央负责同志也没有住在大会会址）。

出席大会的代表，除上述北方区代表外，还有南方各地代表，他们是：

陈独秀、张国焘、毛泽东、朱绍莲、林育南、项德隆、陈潭秋、恽代英、王用章、谭平山、阮啸仙、刘尔嵩等

还有一些代表和没有表决权的列席人员、以及共产国际代表、少共国际的代表等。总计有三十多人出席了这次大会。这次大会代表的组成，具有相当的广泛性，其中以铁路和矿山工人运动中涌现的新人物占相当大的比重。这是前两次大会所未有的。

“三大”的筹备工作从五月就开始了，到正式开会约近一月时间。筹备工作主要由第三国际代表和二届中央委员会主持。各地代表齐集广州后，在正式会议开幕之前，上届中央召开中央扩大会议，我也参加了这次准备会议。会议主要是讨论准备“三大”的各项问题，由国际代表马林主持。

在扩大会上，马林报告了国际形势和国际工人革命斗争的概况，并强调了建立国际工人阶级革命的联合战线问题。他传达了共产国际的一个文件，是关于指导国共合作问题的。文件是由英文打字机打印的，由翻译译成中文，全文有几百字，大意说：中国当前的中心任务是国民革命，中国革命发展很迅速、前途很乐观，年青的中国共产党现在应该联合孙中山的国民党左派分子共同革命。这个文件无疑对这次会议起了指导作用。这次会议起草了政治报告和准备了决议案。

“三大”的事务性准备工作和生活安排，统由广东区委谭平山、刘尔嵩、阮啸仙等人负责。

“三大”正式召开前，马林还事先找各地代表谈话，特别是工人代表。内容主要是交待和解释国共合作的必要性。这一问题，对

工人代表来说是一个新课题。过去各地劳动组合书记部全力做工人运动，对国共合作多不理解，马林的谈话就很必要了。除此之外，马林还向代表谈到了下届中央的组织安排，党章和决议的准备情况，并不厌其详地反复说明为什么要这样做的理由。马林在提到“三大”的组织路线时指出，下届中央要多选一些工人同志到中央来，包括长期在基层做工运工作、能联系群众的同志。他谈话涉及的范围很广，除国共合作的政策外，还谈了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妇女运动以及共产国际的观点和政策。在大会期间，马林是每会必到的。

大会的地址，是在永汉路太平沙望云楼，即陈独秀的住所。他家有一间较宽敞的客厅可作为大会会场。会议有时也在春园马林的住处召开。会议的日程安排有：国际代表的报告，“二大”中央报告，各区工作报告，并分组进行讨论。还成立了若干小组，分别起草决议和文件。这次大会通过并公布的文件和决议有：

一、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

二、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

三、关于第三国际第四次大会决议案

四、劳动运动议决案

五、农民问题决议案

六、关于党员入政界的决议案

七、青年运动决议案

八、妇女运动决议案

九、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

十、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

十一、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宣言

“国共合作”的问题，是“三大”的中心议题。这个问题在报告和决议案准备小组会上讨论费时较多，最后大家接受了国际代表

的意见，并做出了相应的决议。“国共合作”的问题，如果从酝酿时算起，时间就比较长了。早在建党初期，苏俄和第三国际就着手联合国民党的准备工作。当第三国际派代表东来帮助建立中共组织时，苏俄政府也同时派人来中国活动。先是在陈炯明驻防漳州时，苏俄曾派某海军大将亲率军舰悄悄进入闽南，访问陈炯明，表示愿以军火资助陈扩充军队。陈当时受宠若惊。但是，由于漳州海港设施简陋，海轮不能入港，无法起卸大宗军火，致未实现。一九二〇年冬，陈炯明攻占广州后，引孙中山入粤，于是联合国民党事复又积极进行。

中共“一大”前后，陈独秀曾与孙中山交换对时局的看法。随后，陈又介绍国际代表马林于一九二一年十一月由张继陪同前往桂林会晤孙中山。当时马林化名为西蒙博士(Dr. Simon)。张太雷系马林的翻译，亦随同前往。双方在会谈中，广泛涉及苏俄对远东的各项政策。一九二一年岁杪，马林始返沪。旋又到北京，在北方区委会上报告赴广西与孙中山晤谈情况。其双方谈话内容：（1）有关革命的三民主义理论问题，赋予三民主义以革命内容。（2）建立有广大工、农、学生为基础的群众性的新型政党，涉及未来国民党的改组问题。（3）建立革命性新军队，同时改造旧军队，设置军校改革军事教育。（4）苏联以实力援助广州政府，包括财政、经济、军用物资与专家等。

经过这次双方会谈，孙中山同左右详加研究与突破现状有关问题。这样酝酿经年，直到一九二三年全国工运兴起后，孙对中共与苏俄才有了新的认识。最后，孙中山终于下了亲俄决心。他对左右亲信汪精卫、胡汉民、张继等说：苏俄是社会主义大国，国力强盛，可与为友。中共是中国新兴势力，我们在推翻清朝革命运动中，黄岗、潮州之役，人数极少，镇南关之役不过二百人，钦廉之役不过一百余人，现在中共组织工农革命运动，群众一起来，动辄

成千逾万，开滦'二七'罢工规模浩大，震动中外，其势尤不可侮！左右听后，亦以为然，联共政策，遂确定下来。

在这期间，国民党酝酿改组。一九二二年九月六日，成立修改党章起草委员会，并延聘陈独秀加入委员会。十一月十五日提出修改草案，十二月十六日通过。一九二三年一月一日，公布党章，同时发表宣言后成立上海执行部。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孙中山得滇军杨希闵、刘镇寰之助，击败陈炯明。一九二三年三月孙再回到广州，国共合作条件遂经双方正式商定：即自上而下，在中共协助下改组国民党(包括中央及地方)，接受苏俄各种援助(包括军事、意识形态各方面)，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建立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

在此之前，一九二二年十月，越飞(Jeffe)来华，旋赴日本与廖仲恺会谈合作问题，表示愿提供物质援助，并晓以利害。越飞后来又访孙中山，双方谈话结果，发表了一个公报，即所谓"孙越宣言"。

又据国际代表报告：一九二三年前国民党以中国革命正统自居，一部份人认为中共在中国社会尚无政治力量与地位，实在无资格与国民党谈合作，因此主张只联俄不联共。直到"二七"前后多次大罢工发生，中共政治声望猛然增高，孙中山才断然赞成与共产党全面合作，借以增高国民党在工农群众中的影响。

溯自一九二二年下半年始，中国共产党在党报《向导》上先后刊布了几个文件，包括党的宣言及陈独秀的署名文章。在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即一九二二年九月二十日，陈独秀在《向导》第二期发表《造国论》，主张两大阶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联合的国民革命，倡议组织真正的国民军，创造真正的中华民国，建设民主的全国统一政府，采用国家社会主义开发实业。

一九二三年四月二十五日《向导》第二十二期，刊布了陈独秀

以《资产阶级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为题的文章，对资产阶级进行了分析。据该文论证：（1）革命的资产阶级，如华侨及长江新兴工商业家之一部份。（2）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为官僚资本家及买办资本家，如新旧交通系。（3）非革命的资产阶级，不问政治，采取中立立场，如小工商业家。（4）革命的资产阶级应该和无产阶级联合打倒共同敌人，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上面两篇文章可作为当时主张国共合作的代表理论。国际代表马林以孙铎的笔名在《前锋》创刊号上发表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亦表达了同样性质的论点。

“国共合作”在共产党内也为许多人所不理解，特别是工人和作工运的同志，因为国民党并不注重工人运动，在工人中影响甚微。而国民党脱离群众，成份中官僚、政客不少，鱼龙混杂，却为人所共知，许多同志不愿与之为伍，反对加入国民党，形成一股阻力。直到这次会议，经过多方工作，“国共合作”始为全党所接受。陈独秀在会上多次提出中共应全力帮助国民党，各级组织应派出最得力的干部协助国民党进行改组工作。自此，“国共合作”乃成为全党的一项中心任务。

对“二七”斗争评价，也是会议郑重讨论的议题。“三大”正值“二七”斗争四个月之后，为总结这次罢工经验教训问题，首由北方代表，书记部负责人提出“二七”斗争的详细报告。报告后展开讨论，有人认为“二七”罢工与军阀武装冲突，如以卵击石，伤亡重大，得不偿失，是闯了大祸，并提出要处分闯祸的人。但是绝大多数代表批判了这种错误意见。在讨论中，马林发言高度评价这次罢工的政治意义，肯定了这次罢工的重要价值，并总结了罢工的经验。我记得这次讨论会是在春园举行的。

原来对于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问题，在“三大”以前，二届中央曾召开扩大会议（杭州会议），作出了决议。这次大会着重总结

其经验教训，重申二届中央决议，认为："二七"事发于北洋军阀统治强盛时期，犹如万马齐瘖之会，风雷乍起，给予北洋军阀一大闪击。事虽未成，但在政治上确有极大影响，足使曹吴气夺，令天下振奋。事后证明，"二七"的政治影响确实很大，北洋军阀从此陷于与全国人民为敌的困境。反对封建军阀的伟大统一行动，由此酝酿臻于成熟。

国际代表在会议上还强调，北方开滦罢工与"二七"罢工从表面上说来，虽都不算成功，但却是中国工人革命运动史上空前的有组织的大规模战斗。开滦反帝斗争、"二七"反军阀斗争与党的纲领要求完全符合，从此以后，中国工人阶级才真正登上世界政治舞台。"二七"后共产国际来电，亦云："确实说，你们的行动，是已经走到世界无产阶级的行列里了！"在"三大"会上，秘书处并以《京汉工人流血记》作为正式文件分发给各代表。

中央执行委员会

经过讨论和选举，"三大"选出了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的中央委员九人：陈独秀、李大钊（守常）、毛泽东、罗章龙（文虎）、王荷波、蔡和森、谭平山、项德隆、朱绍莲。新中央委员会名单，系由国际代表向三届大会提出讨论后通过的。国际代表强调，中央委员会组成应以工人运动领导者占多数，其中必须有产业工人。这一原则，为大会所接受，认为是进一步发展工人党的组织的重要保证。因此，"三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会显示了工人革命政党，阵容颇为严整，工作效能亦高，为前两届中央所不及。

"三大"选出了五人中央局，其成员为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谭平山和蔡和森。推举陈独秀为委员长，毛泽东为秘书，罗章龙为会计。委员长主持一切中央局及中央全会会议，与秘书共同签署

一切公文函件，秘书负责党内外文书、通信及开会记录、管理党内文件等，会计管理全党财务行政，并对中央机关和各区各地方机关财政、行政负审议之责，主持审计财务预算和决算有关事务，稽查现金出纳等项工作。中央委员李大钊、王荷波、项德隆、朱绍莲则分别参加北方区、上海区、鄂区及湘区的委员会工作。

“三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原在广州，后因地处偏隅，交通不便（当时粤汉路未通），对指导全国斗争不利，中央乃决定迁回产业工人聚居的上海，留中央委员谭平山在广东工作，并改选王荷波入中央局。

中央作出上述决定后，我和荷波都到中央局工作。我们二人原来均在北方区委工作，同时又都担负铁路工运工作，唯恐同时离开北方会影响北方区工作，所以有些顾虑，想保留一人在北京工作。我于是将此意见报告中央，并表示愿意继续留在北方区工作。中央乃将我的来信转商国际代表，意思说，文虎本人有意留北方区，由荷波一人南行，这样可减少北方当前的人事困难。中央和国际代表考虑后表示不同意，批示说：“文虎不能留北京，应该从全局着眼，三代会既已作出决定，就应该全部执行。”国际代表坚持让我和荷波二人均应到上海中央主持工作。

北方区委乃立即举行会议，商定关于我离京交代工作诸问题。长辛店、石家庄、天津、唐山、南口等处党的负责人均应邀来京参加会议。会议对当前工作及人事调整等均作了具体决定。会毕，尽美和我共赴天津，抵津后又参加了天津市有关工作交接事宜。天津会议结束后，决定派尽美回山东报告北方区委决议案。我于一九二三年七月乘津浦路火车南下，尽美亦同车到济南。时尽美患病颇重，临别时，我再三嘱咐尽美去青岛德国医院检查身体，作作透视，并休养一个时期后再工作。我对他表示：“一年期满，我仍当北来，望多保重。”尽美说：“我自觉体力日弱，不知以后如何变化，

党需要兄方面甚多，不必一定要回北京。”

车次浦镇，王荷波得信到站相迎，并领我至其家下榻。其室内只有一双人铺，因嘱其夫人至邻家借宿，留我共榻。我遂传达中央来信旨意，荷波漫应之。荷波夜间向我谈说：“虎兄，你大嫂闻你在火神庙蒙难，曾亲往寺院祈祷，她并求签问卜，据称，你在三十六岁还有一跳（即惊险事故），当小心在意。”我听后，暗自好笑，因答道：“我们天天在‘跳’，何待三十六岁？”荷波道：“那是自然，娘们的话，信之则有，不信则无。”二人一笑而罢。次日，我劝荷波就此同行到沪，荷波初尚感犹豫，说不愿离开工厂，怕脱离群众。其夫人在旁催促他说：“你走，我同你一道去好了，是真神到处可以显灵。”荷波遂决定离开多年的工作位置，携眷赴中央工作。

车抵上海，我与荷波寓火车站界路旅社，随至中央接头处。晚间，仲甫来寓，倾谈至深夜始兴辞而去，并约定举行中央局会议。

当时出席中央局会议除中局委员外，尚有共产国际代表、少共国际代表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等。会议首由国际代表马林致词，接着是委员长陈独秀报告政治问题及中央局今后工作纲要。报告后即席讨论工作纲要，并进行具体分工。其后，润之因事赴湘，改由我任秘书兼主持宣传部工作。王荷波则任会计，监察财务。蔡和森负责《向导》编委。当时，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是恽代英。代英因事离职期间，有一个时期由我兼代团中央书记。

在这期间，中央发出的重要文件都由委员长和秘书联署，方发生效力。一般信件则仅署名钟英（中央代号）。中央代号也时有变动，从一九二三年九月起至一九二四年上半年，中央连续发布的通告，大多由独秀或我起草，并由我们二人共同联署。如目前保存下来的十三号通告，就是经中央局讨论后由我起草的。该件的署名：委员长 T. S. Chen是陈独秀的英文签名；Lo Dshan-Lung 是罗章龙的德文签名。

国际代表经常列席中央局会议，因我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所以大家对国际代表很尊重，实际上很多决议都经过国际代表同意。

随着工作开展，中央局成立了秘书处、组织部和宣传教育委员会。

秘书处：掌管文告、总务、对外联络、交涉等事项。

组织部：主要负责组织、建党、人事调动、党员训练等。组织部长为毛泽东。

宣传教育委员会：主要负责宣传工作、教育工作。宣传方面主要是办中央的党报——《向导》，后又加了《中国工人》，并协助国民党办了上海大学，邓中夏任上大总务。还办了训练班，组织学生出国学习等。我兼负宣传方面的工作。

还设有几个委员会，主要工作是设计、规划、制定方案。有工人运动委员会、青年运动委员会、妇女运动委员会等，稍后成立了军事委员会。

工委：王荷波为主任。

青委：实际就是共青团，书记为恽代英，委员为李求实等。

妇委：向警予为主任，下面设妇联。

“三大”后的军事工作，属中央局直接领导，中央及各地没有正式设立军委。

另外各省还有民委，党中央没有。主要是做国民党的统战工作，也就是后来的统战部。

三届中央的全部工作方案，主要可分为党的日常工作与“国共合作”两个大的方面。前者主要包括党的宣传与组织工作，工人运动、农民协会、青年、妇女工作等。后者包括有关改组与加强国民党等工作。

日常工作中值得一提的是，“三大”以来在工人运动方面作了

新的部署。其重心特别放在当时比较薄弱的上海、广州与武汉等处。于是开始集中干部在上海建立工人俱乐部，项德隆、林育南、邓中夏、何今亮、李震瀛、刘剑华、李立三等先后调到上海沪东、沪西二区主持工会工作，从而揭开了上海工人斗争的序幕。随后纱厂、丝厂罢工相继兴起，影响波及武汉、广州、青岛及北方各地，工会运动风起云蒸，经时约一年遂汇合成为全国范围内的“五卅”运动、省港罢工运动和全国总工会的建立等，这是三届中央坚持工人运动均衡发展新方针所获致的革命成果。在农民运动与军事工作方面，当时亦渐渐开辟道路，积极建立新的群众组织。

帮助国民党改组，其中包括建立黄埔军校，目的是为了争取工农运动进一步开展。当时最迫切的工作是筹备北伐，摧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力量，迎接大革命的高潮。“三大”在中共党史上，在大革命高潮进展中，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

关于国共合作，从一九二三——一九二七年都贯彻这个精神，原则始终没有变动。这个时期国共合作，对方是孙中山。孙中山当时特别重视双方平等合作，成立了改组委员会。国民党方面以孙中山为代表，共产党方面以陈独秀为代表，苏联派来了特别顾问鲍罗庭。孙对鲍的意见很重视，鲍在两党合作中处于一个特殊的地位。现今留有一个文件，记载了孙中山聘请鲍为总理特别顾问，国民党中央常委，总理如果缺席，会议由鲍罗庭主持，会议决定的问题，要得到鲍罗庭同意。意思是：鲍在国民党会议上有“否决权”，可代行总理职权，权力相当大。为了国共合作，苏联派出以鲍为首的广泛的顾问团。有政治的、军事的（海陆空三军）。军事顾问团以加伦为首席代表。加伦是军事顾问团总顾问，如东征、海南岛战争、北伐战争，加伦决策起了重大作用，大家十分尊重他的意见。广东政府海空军方面，苏联顾问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当时有十几架飞机，由加伦领导。并曾由中共中央派刘云等到苏联学习

航空专业。各军政治部主任及政工人员，也由苏联顾问及共产党共同协商派出。

黄埔军校，原来是清朝训练海军的地方。新建的黄埔军校的教官多半是中共和苏联顾问所任命，经费全部由苏联供给。苏联前后分批送给一万多支枪，各种型号的轻重武器都有，质量很好。苏联在莫斯科办了一个专供国民党留学生学习的“中山大学”，去学习的人不少，有名可查的就有一、二百人。我党还派出了一些军官在国民革命军中工作。当时，中国的军官主要来自保定、清河两个军官学校。海军方面，最大的一条舰是中山舰，掌握在共产党手中，舰长是从北方区烟台海军学校党支部挑选出来的。

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任务是帮助改组国民党，不少中央委员做这项工作。国民党省党部的改组工作，中共也投入了不少力量。北方是北方区委主持，南方是广东省区委负责。通过改组国民党造成一个国民革命的高潮。第十三号通告前段主题就是讲这件事。

十三号通告后段讲的是争取关税独立自主问题。当时，这件事比较复杂。孙中山的口号是争“关余”。北京政府段祺瑞的意见是与帝国主义协商，稍为提高一点进出口税率，使北京政府财务上有所增加。这个要求最低，当然说不上维护国家主权及人民的利益。“关余”问题是南方政府关心的问题。因为北京政府外债太多，以海关收入担保，还本付息。每年关税实际收入比还债数额多些，多的一部分叫“关余”。孙中山当时在西南组织了一个西南政府，北洋海军有几十条军舰拥护他，纷纷把兵舰开到广东，因此孙要把“关余”争来发海军军饷。共产党认为“关余”是临时的财政措施，我们的目的应该是收回关税自主权。在中共策动下，后来全国爆发了关税自主运动，北京政府被迫召开关税会议，帝国主义亦被迫让步。

关于中央通告

为了执行“三大”的政策，三届中央产生后，从一九二三年六月至一九二五年一月，前后签发的正式通告约二十四、五件，目前保留下来的很不完全。

“三大”中央拟了一个全国工作规划，内容包括有宣传教育、建党建团、工运、农运、妇运、青年团工作等。各项工作还分别有所规划。中央的通告反映了上述规划的内容。当时的大部分通告由委员长陈独秀和我共同签署。一九二四年夏我以中共中央代表名义被派出国工作，我出国期间的通告则由陈独秀和毛泽东共同签署发表。

目前中共中央机关保留下来的由独秀和我共同签署的中央通告还有五号、九号与十一号、十三号等。现已公布的有第十三号通告，该通告是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发出的，前部分专说国共合作问题，后一部分说的是收回海关问题。

通告十三号

各区执行委员会并转各地方同志们：兹有两个重要工作，望同志们努力进行。

（一）国民党改组问题

自大会议决本党同志参加国民党扩大运动以来，以种种障碍未能见诸实行。第一次本党执行委员会开会时，适值国民党有改组之议，遂议决关于国民党进行计划，以冀实行大会之议决案。此时国民党之改组已着着进行，颇有振作之希望；广州已设有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其驻沪执行部业已成立；广州上海二市，已着手党员重新登记，定期开全体大会，分区组织；明年正月在广州召集全

国大会，赴此大会之代表，每省六人，由当地推选三人，由总理指派三人，其曾有组织之处，业已准备推选赴会之代表。中局方努力进行复活国民党之工作，各地方同志在此工作中，望依下列步骤切实进行：

(a)有国民党组织之地方，同志们立时全体加入；没有国民党组织之地方，要即将同志非同志可加入国民党之人数及何人可以负责，报告中局，以便中局向国民党接洽，请其派人前往成立分部。

(b)在国民党已有组织之地方，本党地方会应即与S.Y.地方会合组国民党改组委员会，以主持目前即应进行诸事。改组分区事竣，即应由两地方会在各区指定我们的同志一人组织国民党委员会，受两地方会之指挥。

(c)吾党在此次国民党全国大会代表中，希望每省至少当选一人，望各区委会与地方会员预商当选之同志，此同志必须政治头脑明晰且有口才者方能在大会中纠正国民党旧的错误观念。旧国民党员中，我们也应该出力帮助其比较的急进分子当选。代表选定后，即报告国民党总部(上海法界环龙路四十四号)，川资由总部发给。

(d)此次国民党大会中最重要的问题是讨论党纲章程(其草案均见《向导》)及对于时局之策略，代表动身前各区均应详加讨论，俟各省代表过沪时，我们的同志再集合议决一致的主张。

(二)收回海关主权问题

协定关税制，税则与用人均不能自由行使主权，这是国际帝国主义者致我死命的最毒政策，因为在此关税制度之下，不得列强之许可，不能自由增加进口税，以遏外货之输入；不得列强之许可，不能自由增加出口税，以遏原料之输出；如此产业落后的国家，永远不易发展，永远为销行外货之市场。

目前广东海关问题，广东政府原来之目的固然仅在关余，然相

持之际已发展到用人问题。我党此时应一面声援广东政府并督促其根本的收回海关全部主权，勿仅仅争在关余；一面主张收回全国海关主权，废除协定关税制，以排斥英货美货为武器，若军阀有表同情者，虽与之合作亦所不惜。

各地方同志们应立即尽力之所能设法联络各团体，以地方公团名义，散放传单，通电全国，游行示威，发起排货。此主张一时未必即能贯彻，然我们断然不能失去宣传的机会。

以上二工作，为本党目前最急要之工作，各同志接到此通知后，拟如何进行，并已进行至何程度，各地方务须随时报告区委员会，各区会务须随时报告中局，中局即以此二项工作进行如何为各地方工作勤惰之标准。

十二月二十五日

委　　员　　长 T.S. Chen

秘　　书Leo Dschan-Lung

“三大”前后发行的主要报刊

中共“一大”前，最先刊行的党报为《共产党》月刊，至“一大”时停刊。“一大”以后，党以全力开展工人运动，当时上海党报为《劳动界》，由独秀主编。北方党报为《工人周刊》，由我主编。

中共“二大”后，国际代表马林来京时，向北方区委提出建议，出版一种英文日报，争取在中国外交界及国际工人运动中扩大党的影响。区委讨论后，决定创办英文日报，并定名为《远东日报》，由北方区委负责筹办，并在南池子冰窖胡同租定报馆馆址，克日开始筹备工作。

《远东日报》编辑部，主要由马克思学会西文翻译组负责。在筹备过程中，立案事宜发生波折，而且一时亦无法购置英文排字

机。由于上项困难，经中央商议决定作罢，改在上海出中文周报，即《向导》周刊。

《向导》周刊，原定名为《政治向导》，后简称《向导》。《向导》主编陈独秀，早期编委会成员有国际代表马林、伍廷康以及高君宇、李守常、罗章龙、张国焘、蔡和森等。编委会下设翻译室，有英、法、德、俄、日五个组。《向导》于一九二二年九月初旬集稿，每周星期三出刊。独秀主编《向导》，他几乎每期都执笔写文，仅在一九二二年十月出国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时中断了一个时期；一九二三年十一月间，独秀患慢性肠炎卧床不起，《向导》遂改由我主编了几期。

《向导》编委要求熟悉各国党的过去与现在的政治文献，须经常阅览中、西文报纸，如康民特尔、朴罗芬特尔出版的报纸与月刊，及英、德、法文版国际通讯等刊物。《向导》编委会对读者所提意见十分重视，一般均须作答，或在通讯栏刊布，或个别函复。《向导》编委在集稿前一、二日，齐到编辑室漫谈，交换对于下期题目及内容的意见。有时谈锋所及漫无界限，谈毕亦不必写成文。即令写成文章，由于篇幅所限，亦不一定全部刊出。

《向导》与一些党内刊物、书籍一度曾在北京印刷、发行。由于政治迫害，没有固定的发行机关。如第一期至第三期，总发行所为上海老西门肇浜路兰发里三号徐白民。第四期起始办妥邮局挂号手续。第六期至七期，在北京后门内景山东街中老胡同一号。第八期至十一期恢复徐白民，加北京大学第一院收发课转罗璈阶（我的学名）。第十二期，北京发行改由刘伯青负责（他同时是《工人周刊》助理发行人）。第二十期公开发行集中在北京。第二十一期至二十五期，除北京外，再加广州一处。第二十六期，北京照原址，取消广州发行处，改由杭州马坡巷法政学校安存真（安体诚）转。第二十九期，杭州发行处撤销，仍恢复广州昌兴街二十八号。第三

十期至三十三期，又取消广州发行处，恢复杭州原址。第三十四期又撤销杭州发行处。第四十二期，恢复广州发行处。第四十三期起，独存北京一处，其他撤销。第四十四期起，又恢复杭州原址。一年间《向导》发行不断变易地址，可见其处境的艰难。前后发行人与发行地址，大多数都被军警机关传讯或搜查过。北京大学、杭州法政学校就常为此遭到检查，发行人受到侦缉。

《向导》文风泼辣、形式多样。政论文章如刀枪上阵，言辞锋利，英气勃勃，凌厉无前。以笔名只眼、独秀、孤松所为短文及诗，则语调幽默，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一次，在我写的一篇文章中有“延误革命的佳期”的句子，独秀偶然看到，失声笑道：“以革命与佳期联用，实为新颖，形象非凡，气氛乐观。我们平日草文，均属一时急就的篇章。如从文艺角度看，竟无一是处。”三届中央还出版了一种党内刊物《党报》，记载党内文件和通告，但出版期数不多。

《中国工人月刊》：一九二三年中共中央曾决定办一种工人运动理论刊物，但因人力不足，久未实现。一九二四年，中央再次作出决定办一个革命理论与实践综合性的工人运动刊物，定名《中国工人》，我适由欧洲回国，遂推我负责主编，并组成编辑委员会。一九二四年十月，创刊号问世。后刊行国际职工运动专号，销数很大。至一九二五年五月前后，共出五期。经编委会审定的稿件，累计约几十万字。参加写文者有下列二十余人：邵时威、李守常、徐典、刘伯青、林伟民、若愚（林育南）、邓中夏、赵世炎、项英、辟世（任弼时）、张伯简、张特立、吴雨铭、罗亦农和我等。

《中国工人》当时在国内与《向导》平行发刊，销路仅次于《向导》，而为革命阵营第二大刊物。“五卅”运动发生后，因编委会重要成员工作繁忙，且分居各地，集稿发生困难。一九二五年六月，经中央决定，暂时宣告停刊。一九二九年重组编委会，由沧海（即

我的笔名)、石溪(育南)、项英三人负责。一九三一年后，印刷厂因故复停，《中国工人》便成绝响！

《中国青年》是一九二三年十月二十日创刊的，由恽代英主编。社址设在上海法租界辣斐德路一八六号。一九二六年五月移广州，改由李求实主编。一九二七年五月移到武汉出版，十月迁上海，易名《无产青年》。一九二八年十月，改名《列宁青年》(化名《光明之路》)，一九三二年停刊。

“中央出版委员会”，是一九二三年十月，中央局会议讨论关于党内外出版方针与机构问题时，决议由中共与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合组而成立的。以我、徐白民、恽代英、顾琢之、苏新甫等为委员，并指定张伯简、成伟、郭景仁等参加专门筹议有关出版事项。第一次会议决定统一中共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出版发行事宜。原在上海南市民国路小北门设立上海书店，经整顿后，由徐白民任上海书店经理。并以上海书店为中心，建立全国书报刊物发行网。各地负责人为：

广州《新青年》社苏新甫(一九二六年改设国光书店，由黄国梁任经理)；

武昌利群书社林育南(一九二七年设立长江书店)；

北京大学刘伯青；

杭州法政专门学校安体诚；

长沙文化书社易礼容；

太原晋华书社杜时；

济南齐鲁书社王尽美。

又决定自办国民印刷厂，厂址设在闸北香山路香兴里，延聘胡忧天任经理。

三曾里三户楼

党的“三大”在广州召开后，决定“三大”中央设在上海，“三大”中央局的常委全部到上海集中。常委们陆续到达，有的由湖南到上海，有的由北方到上海，有的由广州到上海，到达上海的时间路线都不一致。到上海后，在闸北找了一所房子作为中央办公处，这就是三曾里三户楼。

三曾里的房子是王荷波租的，离闸北火车站一二里路远。在中兴路与香山路交叉的地方有个小里弄，称三曾里。这个名称很费解，后来才知道这个里弄只有三个门牌，由此而得名。

三曾里的房子结构是普通的二层楼房子，用上海话说叫做两楼两底。我们决定找这地方作办公地点，是因为此地属于中国地界，周围有几十家缫丝工厂和一些手工业工厂。居民以广东人最多，其次为江北人。这个地方既不是贫民区，也不是绅士区，五方杂居，环境条件对工作很有利，所以才定了下来。这个房子，楼上楼下大小共有八、九间房，当时没有户口制度，但住房必须有个户主，我们三户联居，称它为三户楼。毛泽东、杨开慧一户，向警予、蔡和森一户，我一户，大大小小算起来有十口人常住。对外就说是一家人，向警予是一家户主。

毛泽东和杨开慧带着两个孩子住在这栋房子的前厢房。那时杨开慧身体好，虽然有了孩子比较劳累，但她仍然挤出时间做了很多工作。

蔡和森和向警予带着小孩住的房间和润之的房间只隔一层板壁。向警予在中央参加工作，负责妇委，兼做工人运动。在三户楼中间，她是年长的一个，做事很有经验。我们推她当户主，中央开会和里里外外的事都由她安排、照顾。

另外，有一个管事务的女同志，叫王熙春，共青团员。她是扬州邗江人，原上海某教会大学英文班学生。她排行第九，外号九姑娘，主要是在秘书处领导下负责对外联系，管理机关内一些政治性和事务性的工作，包括警卫、后勤等。房子上有一个警报电铃，也由她管。熙春同时负责女工运动，组织领导丝厂工会斗争，曾被捕过一次。我们还请了一个娘姨，叫魏贞秀，苏北盐城人，是个丝厂女工，有三十多岁。她是工会成员，不是党员，但很忠实可靠。

三户楼设有公共伙食，由向警予管理，平常吃饭有七、八人。每月休息时间由向警予和王熙春规定。为了工作，我们口头约定了一些共同遵守的纪律，不成文的公约，即不准到外面上餐馆，不看戏，不看电影，不到外面照相，不在上海街上游逛，休息时间和业余时间如要出外，可在空旷的地方散步，假日可到吴淞炮台，兆丰公园，或远处如松江、太湖、虎丘、苏州等地旅行。

中央机关不止这一处，英租界威海卫路瑞兴里也有办公处，其他如共青团中央设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和辣斐德路等处，国际联络处即外白渡桥苏联领事馆，太平洋工会书记处设在英租界汇山路。

经常到三户楼来的有王荷波，他住在英租界同孚路，是我们当中年纪最大的，约四十多岁。国际代表也来开过会，他不常在上海，有时到广州等地去。恽代英当时是共青团的书记，中央开会他也要来列席会议。陈独秀不住在这里，离这里有一、二里路，但在三户楼设有床铺，开会晚了或有事不能回去就在这里留宿。我们这个“家庭”对外以“报关行”作职业，即帮人填外文表格到海关去报税。经常来的这几个人对外就说是亲戚串门子的。其他人非经允许不准来。例如，有一次陈独秀的爱人高君曼来找陈，王熙春不认识她，不让她上楼。还有一次，湖南有个青年从长沙来找杨开慧，杨问明来意，知道他头次到上海，很想在此留宿，杨说不行，叫他回

去。这个青年远道而来，很难过，杨说你一定要离开，以后也不能来，就把他送到了车站。这只是一个例子，足见其严密了。一些特殊的、经中央允许的人和来接头的人可以来住，这个地方是不公开的。苏联领事馆派专人和我来往，他可以进我们的房子。当时，常委会在楼上的客厅举行。

在三曾里，我们订了《新闻报》、《申报》、《新申报》、《上海民国日报》、天津的《益世报》；订外文报有《密勒氏评论》，这是当时很有影响的一家外报。还订了一些外国杂志，主要是第三国际的英、美、德、法各种文字的报刊。润之主要看中文报，代英、荷波、仲甫和我都看外文报，有时我们也在一起谈论有关报刊内容诸问题。

毛润之每天早上利用吃早饭的时间看报，把重要的记录下来或剪下来。我们的报纸头天取回来，第二天仔细看，主要是了解政治情况。报纸中最使我们感兴趣的是《申报》、《新闻报》的北京专电，可借以研究全国的政治动向。我们的报纸不是送到所住的地方，而是送到信箱，由小王每天去取。我们的信箱不止一个，在北四川路离苏州河不远的邮政局地下室，也有我们的信箱，也可以收到报纸。

三曾里离环龙路执行部比较远，我们坐车子前去办公，大家指定一个地方集合，然后坐车前去，大部分坐出租汽车。当时出租汽车很多，随便什么地方都可以上车。就是专车，我们也不让他开到住处，让它在指定的地点停下来。

我从一九二三年秋搬到三曾里，第二年六、七月才搬走，住了近一年。后来我出国到欧洲工作，以后的情况就不太了解了。向警予住在此地，到丝厂做女工的工作也很方便。这附近有个湖州会馆，是浙江大资本家盖起来的，上海第三次工人起义时，它是最著名的司令部所在地。

三户楼诸人，平日生活十分紧张，如草拟文件、决议，为《向导》

及党报撰文，经常静思澄虑直至深夜，但大家以革命为信仰，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改进工作，生活又十分有朝气。“同心若金，攻错若石”，“团结一致，同舟共济”是我们遵守的信条。当时，我曾有诗记述三户楼：

黄浦① 激浪雪山倾，淮海风云会郡城。
东楚山川多壮丽，西方瘴疠② 满神京。
亡秦主力依三户，驱虏全凭子弟兵。
谊结同心金石固，会当一举靖夷氛！

按一九七〇年上海房管部门查到解放前一张房产建筑的旧图纸，确认三届中央办公处是在上海闸北区中兴路与香山路交叉的三曾里。但是，原房屋在“一·二八”时，被侵华日军的飞机炸毁了。现在原址建筑了一座新楼，三曾里已看不到了。

国际代表马林

一九二一年至二四年间，国际代表长期在中共中央工作者主要有马林与伍廷康等，二人对中国革命均有劳绩，而以马林的贡献最为显著。

马林自中共“一大”以来便在广东、上海工作。北方会议前后，马林作为国际代表曾留驻北京多日，参加北方区委会议，指导工人运动，同时研究国共合作问题，并提出方案与建议。马林全名：Henker Slievlied Maring，原籍荷兰阿姆士特丹（Amsterdam），在荷京大学读完政治经济学课程后，投身荷兰工人革命运动，担任荷京港运秘书。周游世界多地，后遂侨寓泗水。一九一四年成立东印度社会主义联盟。一九一五年出版荷文《自由呼声报》。一九

① 黄浦指黄浦江。
② 西方瘴疠指西方帝国主义侵略。

一八年出版印尼文《人民呼声报》。一九一八年间，马林因迭次著文抨击荷兰政府的殖民政治，被驱逐出境。一九二一年受第三国际派遣来到中国，帮助中共推动工人运动，有运筹帷幄之功。

当时，马林年富力强，兼通英、德、法等国语文，器识宏通，对中国革命问题从世界形势盱衡全局，故观察与议论非寻常之见所可比拟。仲甫对马林颇尊重，但二人秉性均倔强，如遇议论不合时，互以盛气相凌。一次仲甫尝向马拒绝国际经费支援，说道："何必国际支援才能中国革命！"马林颇为难堪。仲甫亦自觉失言。马曾戏称仲甫为"火山"。又一次在中央会议上，仲甫与马因争论，致使会议不能进行，我当时任三届中央常委会秘书，只得宣布暂时休会。马林心平气和去邻室抽烟，陈仍余怒未消。片刻后我说："时间已到，继续开会。"马问："'火山'是否熄了？"我说："熄了！"马林说："革命党头脑应该冷静。"时润之亦在场，会议结束后，润之提议：以后开会，大家不能发脾气。我们均表支持。

马林关心工人运动，身体力行，在北方时，尝不顾环境险恶参加工人支部会议。某次在会上与铁路工人谈话，有人发问"革命主要目的何在？"马答："首在争取政治自由，实现政治自由以后，经济各项改革自然水到渠成。"又问："敌势强大，如何着手？"马答："从组织群众力量入手。敌人对我施百吨压力，我们以千吨革命强力回报。"马林这些简明有力的谈话曾给予参加会议工人以极强烈的印象，亦是他长期从事实际工作，锻炼出来的战斗意志和语言。

一九二二年我在唐山领导开滦煤矿同盟罢工，斗争很激烈，双方冲突，死伤很大，罢工遇到重大困难。我即发了一个西文急电到上海中央，时值中央开会，陈仲甫和张国焘之间因意见分歧，相持不下，马林接电说："目前唐山问题是党的首要问题，要全力以赴！其他个人争执均属次要。"于是大家转入讨论支援唐山罢工问题，

及时作出决定。马林还为此事亲临天津和我见面，反复商讨罢工问题。

“三大”会上，代表们对“二七”罢工问题，认识不一致，马林在会上提出共产国际文件，对“二七”给予高度评价，表示同意国际的看法，以理服人。马林对确定“三大”路线，贡献亦大。

国共合作，起初阻力很大，第三国际授权马林具体执行。中共“一大”后，仲甫与孙中山交换对时局意见，即介绍马林于一九二一年十一月由张继陪同前往桂林会晤孙中山。直到党的“三大”，马林在这一期间做了很多解释说服工作，对国共合作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马林对中国革命视同自己的事，遇事率直倡议，不稍瞻顾。他曾担任《向导》编辑，很刻苦，每篇稿文都要我翻译讲给他听，不对的地方，就提出看法，要求我们改正。对他自己亦是如此。他在上海时曾向工委提议组织北方矿业工人联合会问题，当时我心不谓然，乃将此事提交中央会议讨论，会议上详加讨论后，认为北方矿区分散与铁路性质迥异，目前只有开滦、焦作煤矿尚有基础，六合沟、枣庄、阳泉与淄博次之，其他矿区尚无眉目。认为根据实际情况决定策略原则，北方至少须有几个大矿工会作基础，才能成立联合组织。目前尚无此条件，因此对马林提议决定缓办。此项决定尚未正式通知马林以前，马林托春木（张太雷）送来亲笔德文信一封面交给我，封面上书 Mandat（命令）字样，内容仍是坚持限期成立矿工联合会事，我即往见马林，将会议讨论情形详告。马不悦，说这是“外交词令”，但亦未坚持下去，此事遂作罢。事后马林自觉前信失之操切，乃在出席会议时加以解释，并撤回前次提议，同时，对中央工委处理问题态度认真负责加以赞许。由此一事可见当时国际代表与中共组织关系互相遵守民主原则，故能同心协力共赴事功。

马林在中国工作颇称顺利，自一九二一年至二四年，中国革命循序渐进，收到确实成效，马林之功不可抹煞。但由于当时国际东方部倾轧排外政策的结果，马林于一九二三年下期被调回莫斯科，改派伍廷康继任。伍为俄罗斯人，原先来过中国，后回国，自此以后长期代替马林职务。马林回莫斯科后与东方部意见龃龉，众口烁金，马林遂辞职重返荷兰，一年以后，我们于阿姆士特丹又曾相逢。

马林自离开中国后即返荷兰担任码头工会秘书，在汉堡参加国际运输会议，我们同时出席，在会上相遇。会后他约我到荷京阿姆士特丹一行，我乃与马林同往荷京访问，约经一周时间，即暂寓其家。其夫人热情招待有如家人弟兄，亲切异常。荷兰是世界闻名的航海国家，其海员工作效率为欧洲之先进。阿姆士特丹，港政修明，足与汉堡相埒。但见海上艨艟巨舰，往来如织，工人组织极严密，生产与文化均极可观。马林尽数日工夫陪同参观造船厂、堤防口工程以及近郊农场，其中奶油乳酪、蔬菜生产量丰质高，不愧为欧洲诸国的“厨房”。几千年东方专制大国毫无民主传统，视此蕞尔小邦，经济、政治、文化均远所不及。马林对中国革命备极关怀，他告诉我说：“中国是农业大国，无民主习惯，推翻一代统治者在中国历史上极为平常，但要建立民主制度却有重重困难。今天唯有通过工人运动可以接近民主，纵有困难，不宜灰心，舍此以外更无达到民主的道路。”① 在马林家连夕倾谈，情谊隆重，临行时，夫妇二人依依惜别，请留诗以作纪念，我用当地文体写了“十四行”诗相送，他们夫妇均曾学习过汉文，又要求把诗译成中文，我勉译成下列绝句一首：

海国西来万里轮，

① 关于马林在中国工作的概况及其评价，我以后在本书下集中还准备详细加以说明。

威廉① 霸迹已成尘，
唐山、辛店惊风雨，
话到当年情更亲！

夫妇两人阅后，喜甚，互道珍重而别。

环龙路国民党执行总部

国共合作具体执行时，中共曾多次郑重地进行讨论，各次会议均有国际代表参加。中央局会议曾作出决定，对于国共合作问题中共中央采取下列原则，即：

（一）中共保持独立自主原则，中共党报及中共各级刊物对国民党施政得自由批评，不受限制。

（二）中共领导的工农群众组织不受国民党及其政府干涉，工会、农会享有集会、结社、罢工、纠察自卫之自由。

（三）中共党员（包括团员）加入国民党，在国民党任群众工作，但一般不做国民政府官吏。工人运动领导者及中共所属工会会员不得加入国民党。

（四）在组织方面，自一九二三年七月起，中共中央由仲甫代表中共出席国民党最高会议。党组织自中央到省市各级按系统派遣党员分别协助国民党进行改组工作，包括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党部及基层组织，训练干部，整饬宣传机构，协助国民党工作，扭转该党在民众中的不良影响，帮助国民党改善军事教育训练，建立革命军队等。

根据上述原则，中共中央政治局派政治局委员（时称中央局常委）王荷波、毛泽东、罗章龙三人参加国民党执行部，协助国民党进

---

① 威廉 Wilhelm 系荷兰开国君主。

行改组事宜，后又续派中委李守常、谭平山等协助国民党在北方及广东的改组工作。中共各省委、市委分别派遣中共党员参加当地国民党省市委会的改组工作及军队改建工作。现就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与国民党执行部、黄埔军校的建立诸项略述大要如次：

国民党“一大”

一九二三年十月成立国民党改组委员会，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日正式召开。此次会议，中共方面全力以赴，动员党内大部人力协助筹备大会诸事。中共中央决定自中央到地方派遣多数干部参加国民党“一大”中央工作。派遣干部时，曾经过详细讨论，决定原则如下：

（一）李大钊、张国焘、韩麟符、毛泽东、高语罕、恽代英、谭平山、瞿秋白、于树德等参加国民党“一大”中委会，为跨党党员。

（二）原有国民党籍之加入中共党员，由中共方面提名参加国民党“一大”中委会，人名为：林伯渠①、沈玄庐②、邵力子等。上述名单是党中央向国民党提出的。

（三）省、市党部委员由国共双方经地方党部决定。人名为：夏曦、董必武、宛希俨、于方舟、侯绍裘、江浩、李锡九、谢晋等。作为

---

① 林祖涵（1886—1960），字伯渠，湖南临澧县人，常德师范毕业，东渡赴日本留学，1909年归国在吉林巡抚陈昭常处任吏员，其兄林建藩（修梅）曾任零陵镇守使，曾起义，与国民党有渊源。林于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 年任国民党本部总务部副部长，并参加改组国民党工作。

② 沈玄庐，原名定一，浙江萧山人，家资豪富，有沙田千顷，清末以捐款报效得任云南霑益知县，任满家居，有妻妾仆婢甚多，后在衙前做农民运动，借此与我党接近，随于 192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旋因其媳他恋迁怒于党，遂脱离党，后积极参加国民党清共工作，任国民党中委及浙江省政府委员。

跨党党员得当选为国民党机构委员。

（四）领导工人运动的中共中央委员及各级工运干部，原则上不参加国民党。如罗章龙、王荷波、项德隆、上海总工会负责人李震瀛、何今亮，北方工运负责人何孟雄、王仲一、张昆弟、邓培、孙云鹏、安幸生、康景星、李宝成，湖北工会负责人林育南、许白昊，江苏工会负责人朱宝庭、孙津川、姚佐唐、余立亚，浙江工会负责人沈干城、朱阿堂、赵济猛，江西工会负责人陈赞贤、王凤飞、袁孟冰，广东工会负责人阮啸仙、刘尔嵩等，均不加入国民党。

独秀对于我党领导工人运动的中委不参加国民党中委会的意见开始不同意，但是中共中央大多数中委都不同意独秀的主张，所以结果仍然决定领导工人运动的中委不参加国民党中委会。

（五）向三民主义注入革命因素。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中共中央提出大会决议草案及宣言内容，决议主要包含下列几点：

（1）对三民主义注入革命因素，重新作解释。

（2）提出联俄、联共与赞助农工的政策。

（3）国民党组织从总理制改革为委员制。

（4）选举时尽量引进国民党左派进入新中央委员会。

因此，国民党“一大”政治路线与组织路线体现着两党平等精神，从理论上奠定了名实相符的合作基础，两党联合会议决定了国民政府的施政总方针。

上海执行部国民党主持人

一九二四年一月，国民党中央决定设置国民党执行部于上海法租界环龙路四十四号，作为国民党最高执行机构。执行部内主要设立组织、宣传、工人农民等部及秘书处。国民党派定胡汉民、王精卫、戴季陶、于右任、叶楚伧、茅祖权等分任各部部长。中共

方面由中央政治局决定毛泽东、罗章龙、王荷波、恽代英四人参加指导执行部工作(恽代英系代表团中央参加执行部工作)，遇有特别重大问题则由国民党总理孙中山与中共中央书记陈独秀协商决定。同时，中共中央又决定派干部沈泽民、邵力子、瞿秋白、施存统、邓中夏、向警予、杨贤江、沈玄庐、张秋人、李成、刘伯伦等参加执行部各部门宣传与组织的基层工作。当时上海社会传称环龙路四十四号为“国共群英会”。

一九二四年五月五日，是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三周年纪念日，上海执行部国共两党工作人员齐集莫里哀路孙的住宅举行纪念活动。并在孙寓的花园中合影留念。当时参加者每人都有一张。六十年后，仅中国革命博物馆馆藏一张，但仍然清晰可见。

在这张相片中，国民党人有胡汉民、汪精卫、张继、茅祖权、叶楚伧、叶纫芳、戴季陶、林焕廷、孙铁人、喻育之、王陆一、周雍能、何世桢、葛建时、陈德徵和向昆等十六人。中共方面有毛泽东、王荷波、罗章龙、恽代英、向警予、邵力子、沈泽民、刘伯伦、韩觉民(团员)和张廷灏(团员)等十一人。总计二十七人。相片是由一家广东人开设的“王开照像馆”拍摄的。上海国民党执行总部全体工作人员只三十多人，而参加合影的居其中大多数，且都是双方的主要主持人。因而这张相片也就成为当年国民党与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实行合作的真实写照，珍贵的历史见证。不仅如此，在党的“六大”以前，中共中央的同志如此众多齐集一起留影的相片也是绝无仅有的。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中共中央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告诫全党党员，不计较权位，不营求私利，努力实干，相忍为国，把完成国民革命视为当前的迫切任务，耿耿此心，薄海皆知。

在国民党中，胡汉民与汪精卫是孙中山的左右手。孙的亲信大都为广东同乡，中心人物为胡汉民与汪精卫，外间称之为国民党

“平衡力量”。胡孙二人后乃分道扬镳。

胡汉民，原名鸿衍，字展堂，清末举人，一九〇三年赴日本入东京弘文学院，习速成师范，最先加入同盟会，为孙中山所倚重。胡平日对人称“位不过贤书”（意指最小的芝麻官），但自负极高，先是一九二二年五月，胡以代大元帅名义率师由韶关北伐，进入江西，攻下赣州。随闻陈炯明倒孙，即回师驰救，北伐遂无功而还。但胡对此颇炫耀，其部属也称他为胡代帅。

胡头脑冷静，能诗文，吐属隽永，外传说孙中山所刊布《三十三年落花梦序》，重要政治文告及悼刘揆一诸作品，均胡等捉刀。他尝戏用广东方言写咏史诗多首，亦极有风趣，其《垓下诗》有句云：

八千子弟向秦封，
破釜沉舟究不同。
咁样多人为你死，
因何冇面见江东。

胡对中国文、史、书法颇有研究，在办公室有暇辄练字，一心不乱，临“曹全碑”极为神似。

胡平日，高自期许，于人鲜所许可，尝在办公室当众评论汪精卫“华而不实”，戴季陶“有流无源”（指戴作文多译自日文书报），某某“周而不到”，《民国日报》文字散漫无章法，其他讥评尖刻，往往而有。他对我党诸人初亦不甚重视，不久态度渐改，尝对人言：“执行部中共党员各有长处，不可小觑。至于中共群众组织势力更不可侮。”胡对其属下曾说：“仲甫先生，戛戛独造，究竟与众不同。”胡善观察事物，但城府极深。一天会后，闲谈中俄关系，他说：“俄国即殷高宗时的‘鬼方’，当时中俄双方打了三年战争。”语意双关影射时事，因询问我：“罗先生对中俄关系掌故了如指掌，以为然否？”我已知其意有所指，因答道：“此乃先生创见，极可参酌，但就‘地望’而言，显属似是而非，且孟轲有言：‘此一时彼一时也’，战争与

和平本是常见的事。”胡聆言嘿然，忽扬声鼓掌道：“高见！ 高见！”遂彼此一笑而罢。

一九二五年胡因廖仲恺被刺案涉嫌，亲往苏联报聘，以贵宾资格出席第三国际第六次大会，其祝词云：

“……我以中国人民、中国工人和农民的名义，对允许我出席这次国际代表会议表示感谢。只有一种世界革命，而中国革命就是它的一部分。

国民党口号是：为了人民群众！ 这就是说：政权应由工农来掌握。”（一九二六年二月十七日胡汉民在共产国际开幕会致词）

这是胡言不由衷的例子。一九二七年胡是发动并亲自主持清党的大员。

汪精卫与胡性格各异，但极能干，故时称“汪胡”。汪敏慧过人，善属文，兼擅长演讲，激昂慷慨，感染力极强，满座为之倾倒。汪为人圆通无棱角，善窥人意，对人彬彬有礼，故人乐与往还。在大庭广众间，汪对孙中山称先生，对独秀称仲甫先生，对鲍罗廷称鲍先生，对其他诸人词令婉约无不气顺言宜，即偶发笑语亦令人觉其真挚可亲，故人称其为“政治尤物”！ 汪对当时国共合作政策始终毫无间言，热诚拥护，对中共遇事体贴入微，奉国际代表若神明。迹其用意无非是想在合作过程中博取个人超额权益足以凌驾胡之上。一次，我与汪精卫同车到静安寺路中华书局工人进德会演讲，汪在车中与我攀谈，郑重说道：“我参加革命以来，由于个人学无专长，至今一事无成，今后愿诚恳向中共工人同志学习，多读革命理论书，在即将来临的国共政府中，贡献微力。”① 由此可见汪说话动人处，“巧言如簧”，真是当之无愧！

张继，字溥泉，直隶静海人，是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孙中山指

---

① 汪精卫与我谈话时初读《京汉工人流血记》，误以为我是京汉铁路工人，故有意说向工人学习等语，后汪获悉我为北京大学学生，始知其误。

定他专门同我联系，加强执行部的日常政务工作，以提高工作效率。他在日本东京时与独秀友善，回国后时相往还。国共合作，张溥泉实为居间奔走撮合之人。在上海执行部成立前，国共双方接触频繁，多在法租界蒲柏路巨赖达路某里张溥泉寓所。一日，我至溥泉家商谈有关国共合作问题，谈锋所触极广，张性豪放，纵情高论，更无拘束。张云："同盟会革命得日本友人助力不少，今日苏联拥有红军几百万，只要从库伦出兵，中国局势立即可以完全改观。"张又云："我们过去从事中产阶级革命，十几年间浪费光阴，今后应改弦更张，从事无产阶级革命，还可以'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张继性情豪迈、健谈，其夫人亦身裁祁硕，丰仪俊秀，对客常提说我们溥泉是个直爽人，赤胆忠心，革命阵营少不了他，却不会做官……云云。张以目止之，夫人佯做不理，侃侃而谈。故外间流言张有"季常之癖"，未知确否？不久，鲍罗廷来到中国，张闻讯十分激动，走访仲甫，谈话中张幽默地说："国共合作'鲍姥'实良媒。"仲甫笑颔之。张去后，仲甫对我说："溥泉说'国共合作鲍姥实良媒'，老实说，不过炮姥做良媒罢了。"（鲍与炮谐音）从此以后，张溥泉乃成为国共合作狂热拥护者，直到一九二六年间，张溥泉忽一变而为仇共最力之一人。他向上海驻军李宝章献谋，派大刀队肆意砍杀共产党人和上海工人，要"一个不留"。前后竟判若两人。

叶楚伧在国民党原是很重要的人物，叶是上海《民国日报》的主编，同他打交道的人比较多；他又是江浙人，为照顾上海地区，让他来参加执行部。他表面中立，内心非常抵触，我们那时不把他当左派。他是做青年妇女部工作的，我党派向警予做助理，实际上是向一手把工作做起来，叶是不甚管工作的。

于右任，代表西北国民党的势力，是执行部内的左派。于曾任陕西三原靖国军司令，诗文与书法独步一时，有"北方之强"的气质。尝自述身世，言其少而孤贫，有"我亦凄凉托外家，如今棄笔走天

涯”之句。为人倜傥风流，不拘细行。如在上海闸北青云里办上海大学时，于对我说外间称上大为“野鸡大学”，并解释说，野鸡投宿榛莽，故与一般大学不同，上海大学是革命逋逃薮（如刘华、余泽鸿、黄仁诸同志均上大学生）。他当时支持国共合作，将工人部交给我们。在上海大学当校长时，亦将整个权力交给中共同志。他曾到苏联去过，后把在苏联所作的歌颂十月革命的诗写给我看，以表白他内心是拥护苏联和共产党的。他口诵七绝一首，云：“三原征战绩已陈，我亦关西一老兵（于常以“关西老兵”自称）；万里投荒阿穆尔，老而不死做诗人！”亦可见其性情为人之一斑。

另外，谢持代表国民党中国西部力量，辛亥革命时是四川省长，是右派代表性人物。孙让其参加执行部工作，不过是表示团结的意思。茅祖权是长江中部同盟会负责人，当过安徽省省长。在执行部任调查部部长，与仲甫同乡。

以后，戴季陶、朱执信、廖仲恺、邓演达等也先后参加上海执行部工作。戴季陶原名天仇，辛亥革命前的同盟会会员。讨袁失败后，政治失意，生活潦倒，流寓上海，混迹于证券交易所，慕陶朱公（范蠡）为人，易名季陶，后愿望落空，乃乘轮返川，在宜昌投江自杀，为一渔夫救起。其人文风平庸，但能阅日文书刊，抄译成篇，颇自矜持。平日好饮酒，醉后尝失言。在一次会议上，戴对《向导》文字不满，悻悻地向我说道：“你们太霸道，目中无人，要知你们是‘客卿’，我们随时可以下逐客令！”时汪精卫在傍，对其言感到惊讶，随笑道，你又说醉话了，我们并无主客之分，国共同志，大家都是好兄弟。几句话敷衍了过去。但戴心里并不悦服，耿耿于怀，现于词色。戴在宣传部任部长，旋开始宣传正统思想，扶植政治偶像。以上事例可见他与中共同人貌合神离，意见渐不协调。

在执行部内，左、右派斗争相当激烈。

当时，组织部有一个决策，凡是国民党老党员都要重新登记谈

话，每人必须填一张表，经审查同意后，方是改组后的国民党员，发给党证。一天，一个人冲到楼上，胡汉民、汪精卫都起来打招呼，他们三人交谈，我和润之不认识此人。那人说，我从同盟会开始，革命几十年还要填表？可不可以免填？这个人就是谢持。胡说，这是新规定，先生（孙中山）也同意要我们这样做的。此人将桌子一拍，就是不肯填表。汪精卫也出来说：上有总理，下有组织部。意思是要他向我们说。他到我们这里说了一遍，大家都不以为然地说，党员人人都要填，胡汉民、汪精卫也填了。要遵守孙中山先生的意见。此人一怒而去。润之说，派人送张表去，要秘书好好解释一下，可以放宽点。后来谢持还是填了表，但心里是很不舒服的。

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后，准备召开一个会议，成立上海第四区国民党党部。四区就是环龙路所在的法租界地区，有许多下野的国民党政客住在那里。有的当过军长、师长、部长、省长，大约有千余人。审查后发了党证，同时还清洗了好多。他们在审查时一下子送来许多表，企图蒙混过去。在这个成立会上，国民党左、右派斗争表面化了。右派酝酿要争得更多选票，争取区党部的多数。他们自己估计没有把握，准备采取两种方法。一是合法的争取多数，请孙中山先生出来说话。二是如果办不到，就纠集一些流氓，在会上抢主席台、制造武斗，以破坏选举。我们知道这个情况以后，认为会一定要开好。于是决定我们全体同志，党、团员及同情我们的左派都要出席会议，保证会议胜利开好。右派曾经去请示孙中山，孙没有表态。胡汉民、汪精卫说，开会那天除极少数人留室办公外，其余的人都去。还让新闻记者去采访。当时上海有许多外报记者。当时执行部决定，这个会最主要的是要组织好，主席台不能乱，万一他们武斗，我们要出面制止，使他斗不起来。同时又成立了纠察队，严格控制会场，制止武斗。由王荷波领导组织了一个很强大的纠察队，入主席台到门口设立岗哨。布置好了以后，王荷波对我说，现在准

备齐全了，他们如在外头闹，我们就在外头制止他。开会那天决定我担任区大会主席。第二天我们开会，右派就在外面扰乱，我们内外配合把会场控制得很严，流氓想进来，纠察队把他赶走。右派头子高冠吾多次捣乱都失败了。这一次斗争，右派失败了。他们不服气，在上海各报纸上写文章大肆攻击中共中央，攻击四区会会场主席，当时上海《申新》等报，曾记其事。

国民党执行部成立以后，继而成立黄埔军校，由是建党建军工作着着进展。在两党合作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双方冲突亦渐渐酝酿，逐渐产生和发展，至一九二七年而更趋显著。

封面设计：钱月华

椿 园 载 记

CHUN-YUAN ZAI JI

罗 章 龙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 开本 9.75 印张 231,000 字

1984 年 9 月第 1 版 1984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13,600

书号 11002·644 定价 1.90 元

内 部 发 行

内 部 发

书号 11002

定价 1.90 元